



CITYU HK  
PRESS

# 王實味

文藝整風與思想改造

北大三人行·中國知識分子三部曲

魏時煜



王實味  
文藝整風與思想改造

魏時煜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2016 香港城市大學

本書版權受香港及國際知識版權法例保護。除獲香港城市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媒介或網絡，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數碼化或轉載、播送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978-962-937-258-3

出版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香港九龍達之路  
香港城市大學  
網址：www.cityu.edu.hk/upress  
電郵：upress@cityu.edu.hk

©2016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ang Shiwei: A Reform in Think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ISBN: 978-962-937-258-3

Published b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Website: www.cityu.edu.hk/upress  
E-mail: upress@cityu.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王實味

## 總序

讀中學和大學的時候，歷史是只要每次考試前拿課本通讀一遍，就可以順利過關的科目。回想學過的歷史課本，最枯燥的就是大學裏讀的《中國革命史》：說到東風西風、勝敗英雄，既無對命運的感慨，也無哲學的歸納；這種寫法讓我不能了解史實，又不能享受閱讀的快樂。我開始走進近代中國的歷史，是從2003年拍紀錄片開始的。此後十三年間，與六十多位五四後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對話，成為我生命中最為精彩和重要的內容。在聆聽的過程中，以往讀到的中國歷史、人文文化的雪泥鴻爪，慢慢在我思想的畫布上形成圖案；在追問的過程中，我也逐漸認識了自己，並且專注地、持續地探索人性與人生。

「北大三人行」之三人中，關於胡風的著作頗多，關於王實味的研究在近幾年逐漸展開，王凡西仍舊鮮為人知。我分別從2003、2008、2011年開始圍繞這三人訪談，獲得了超過六百萬字的口述。本書既是這些對話的筆錄，也是一份重要史料，今天能夠成書出版，讓我在驚喜之外有些惶恐：我能否讓學生輩的八零、九零、甚至零零後的讀者，感受到我所感受到的心靈觸痛？書寫好了，編輯要一篇「總序」。我推翻了幾種「八股文」的方案，決定還是從最為個人的視角，講講這三卷本成書過程中印象深刻的幾件事。

## 你為甚麼做這個題目？

這是在訪談時，最常被受訪者問到的問題。開始時，我是去給朋友彭小蓮幫忙的，她父親在胡風案中受害，她有她記錄歷史的理由。我們拍的第一位作家是賈植芳，這是我第一次享受和一位率性、幽默、淵博、親歷了八十多年風雨的人對話。此後我們拍了很多胡風先生和賈先生的朋友，他們大多沒有接受過訪問，一是覺得做影視的人沒文化，二是因為他們自己有筆，可以發聲。因為小蓮的關係，我們獲得了充分的信任，受訪者做到暢所欲言。我們也事先做足功課，因為和歷史對話，是要有基礎的，否則無法探尋到思想的深處。

2008年之後，我基本是帶助手去訪問，有了之前的經驗，仍舊得到了受訪者的信任。這時再問我為甚麼做這個題目，我回答因為從小長在一個平等、開放的家庭，對於自由平等有天然的追求。也有時，這個問題的潛台詞是，你一個在外國學電影的人，怎麼會對中國政治有興趣？我會照實說我對政治其實沒有興趣。記得第一次見到林賢治時，他就回答說，「那我們就沒甚麼好談的了。」的確，中國的一切都避不開政治；我於是進一步解釋，我對高層權力鬥爭全無興趣，但我十分關注知識分子為推動社會進步所付出的代價。

## 為甚麼用紀錄片的形式？

我是電影學博士，彭小蓮是著名導演，我們合作拍攝以胡風案為中心的紀錄片《紅日風暴》時，覺得紀錄片的形式理所當然。反而受訪者們不時會問到紀錄片長處在哪？我當時並不

能回答，最近才有比較完善的思考：首先，紀錄片可以用影像有效地還原一個時代；其次，紀錄片可以讓觀眾見到受訪者的生活環境、感受到他們的情感和氣場；第三，紀錄片與個人口述歷史不同，可以容納多重聲音與多種話語。另外，白紙黑字的書寫很多時候並不包含言傳身教的內容。曾深度研究過魯迅和胡風的學者錢理群，對於《紅日風暴》中的大部分內容都很熟悉，但是他看片後說，他沒想到，印象最深的是詩人阿壘；而這正是文字沒能帶來的感動。

從2003至2007年間，我和小蓮訪問了幾乎所有在世的胡風分子和部分已故分子的家屬，但受訪對象中，除了參加過審訊胡風分子的法官王文正，大部分都是在1955年肅清反革命運動中的受害者。錢理群認為，歷史不該只是從受害者的角度來書寫。當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時，心裏有所觸動。一方面，我不希望我們的影片太過片面；另一方面，我又覺得作為獨立紀錄片人，我的基本立場還是要站在知識分子一邊，何況四平八穩的紀錄片連BBC都拍不出呢！不過新的問題隨之而來。

## 你說的是哪些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並非鐵板一塊，具體到王實味和胡風的案件中，我們發現大多數知識分子為了自保「政治前途」，都參與過對其他知識分子的批判。這種政治壓力下的人格分裂，會被冠以「文人相輕」、「宗派主義」等各種結論，只有如賈植芳、曾彥修這樣的思考者，認識到屈服於政治的文人身上五四傳統仍舊會不時抬頭，並以自身經歷，解說五四後的幾代精英知識分子，如何淪陷到政治的巨輪之下。

以前我以為文人不懂政治，但日本漢學家竹內實通過搜集、整理、編輯、出版一套毛澤東的「首版」著作（譬如《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最早發表的版本），來呈現政治家思想和話語的形成；中國史學家高華通過解讀公開發表過的各種文獻，把政治家的邏輯和手段解釋得條理分明。如果說這兩位研究者「旁觀者清」，那麼是否王實味、胡風、王凡西三位多少有些「當局者迷」呢？抑或他們三人其實了解政治，但不被收買，而選擇對抗？

我從2008年開始，把這三位1925年北大文預科班同學，相互比較、研究和考量，看到這三位起點相同、道路與命運不同、但都初衷不改的主人公，代表了中國大多數五四後的知識分子面對革命做出的選擇——一則加入中國共產並留在黨內，二則不入黨而做黨的「同路人」，三則成為共產黨的反對派。這三人都按照自己的信念堅持到生命最後，並沒有因外部壓力而改弦易轍，用王實味的話說，有着至剛至硬的骨頭。我覺得比較他們三人的命運，會打破一個神話：文人為了保持人格完整，信念越堅定、犧牲就越大。王實味死於1947年，近20年才開始被認真研究；胡風受難於1955年，但從80年代起有機會重寫自己的歷史；王凡西於1930年被開除出黨，卻得以在他鄉流放的過程中，反思中國的歷史，並且以自己的記憶悼念王實味，並且促成胡風妻子梅志寫的胡風傳記被翻譯成英文出版。如此說來，歷史有很多縫隙留給知識分子，命運並不完全遵從哪怕是最高領袖的邏輯。

魏時煜



魏時煜博士與我相識十多年了。因上海導演彭小蓮的介紹，我為她們當時正在製作中的紀錄片《紅日風暴》做了點諮詢工作。這部影片2009年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映時，魏時煜請我去觀看，我在劇場中，見證了觀眾的熱烈反應。此後我們常在午餐、茶敘之間，聊到中國現代作家的命運的話題，並且關注到延安時期的經歷對於他們的改變。

早在1998年，韋君宜的《思痛錄》就以現身的親歷，描述了當年衝破重重藩籬、遠赴陝北高原的那一批批年輕知識分子、文化人投身革命後的苦悶及遭遇，以其坎坷一生後晚年的省思，展現了所謂「兩頭真」的覺悟之道。三年後，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出版，以延安整風運動為中心所引發的新史學熱潮，令人矚目至今。

當時魏時煜在拍攝與胡風相關的人和事，我遂建議她利用手中攝影機、錄音機趕快去「搶救資料」，抓緊時間訪問碩果僅存的延安文化人。因專業的關係，我更關注的是延安作家群中的丁玲、王實味、蕭軍、周立波、何其芳、周揚等人。我希望她能拍攝作家傳記記錄片系列，題目就叫做：「視頻：中國現代作家們」。但魏時煜的視野更為前瞻，她想拍攝的是「文人与革命」，她更為關注的是知識分子面對革命大潮的不同選

擇。她是個行動派，說幹就幹，帶着她的助手，按照我們商量的名單，開始訪問延安老文化人：曾彥修、何方、李銳、灰娃等，甚至遠赴日本，拜訪了對中國文人有獨到研究的漢學家竹內實、吉田富夫、長堀祐造等人。接着，又因這些受訪者的介紹與建議，她繼續訪問了一些在中國大陸鮮為人知、在香港素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甚至遠赴美國，拍攝了李敦白這樣的美籍中國共產黨員。這些受訪者大多是近代歷史的見證者，有不少人在接受過訪問之後已先後去世。

作為在海外攻讀過文學和電影理論，又有志於以記錄片來重構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歷史的學者，魏時煜不僅比從事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研究者更具現代性的觸覺，且更有開拓性的視角。正是在歷史材料的梳理中，她抓住了王實味這個典型，從一個貌似「偶然」的人際關係——「北大三人行」的組合的歸宿，顛覆官方修史的主流話語權，揭開了大歷史現場中的個性不同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及其各各不同的結局。

— 王實味、胡風和王凡西這三個來自不同省份的平民子弟，於1925年秋考入北京大學，被分在文預科一個小班中。王實味、胡風這二位的名字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大案」人物，大家耳熟能詳，王凡西則鮮為人所知。當時北大以自由、民主為標榜，是早期中共在學界最主要的兩個「根據地」之一，另一間大學則是上海大學。陳獨秀、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均出自北大，連毛澤東都在北大圖書館工作過。王實味和王凡西都是在北大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胡風則在日本時參加了日共。後來王實味被打成「托派」，王凡西則是堅定的「托派」；胡風

與他們二位似非同路人，但批判胡風集團的時候，也說其成員中不乏國民黨特務和托派分子。

王實味其實並沒有在組織上參加過托派。眾所周知，他是因為1942年所寫的一篇散文〈野百合花〉成為延安整風的重點對像，其最大的、不可洗刷的罪名是「托派反革命」。他的這篇文章與丁玲寫的〈三八節有感〉其實不過犯了知識分子的老毛病，發發牢騷，對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不公平有意見，罪不致於殺頭。丁玲因與毛澤東較有來往，且文名甚大，不像王實味落得那樣的下場。但王實味後來何以成為「托派」，很多人說是康生所為，但是書中顯示出一條更為複雜的綫索。

本書附錄中首次全文披露的王實味的小說〈三代〉和他翻譯的〈列寧遺囑〉，就是由已故日本漢學家竹內實先生生前交給魏博士的。從王實味轉譯的這篇〈列寧遺囑〉裏，我們才知道斯大林「矯旨」：將列寧對斯大林的批判及否定全部抹去，將列寧對托洛斯基的讚譽也改成了批判，這是蘇共黨內一件訟案。結果王實味卻因此成了第一個在中國被殺的「托派分子」，這個冤案直到1991年才獲平反。

托派這個名詞，長期以來是中國政治語境中一個極為「有害」及敏感的反革命名號。它的原名是「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據該執委會在1931年5月5日於上海致托洛斯基的信所言：「四個分別存在的中國反對派現在已經統一了。」而這個統一大會是在當年的5月1日於上海召開的，從四個反對派團

體選出了17名代表，加上四名列席代表，代表了483名成員通過了共同政綱和其他決議案，選出了陳獨秀為書記處書記，組織部主任陳亦謀、宣傳部主任鄭超麟等。機關報定名為《火花》（見王凡西《雙山回憶錄》）。這483名成員中並不包括王實味，王凡西就證實他沒有參加托派組織。

王實味是1926年1月由陳清晨介紹加入中共的。這位陳清晨就是寫信給魯迅的那個代表托派的陳仲山，魯迅於病中委托馮雪峰回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而他的北大同學中的「革命同志」王凡西，在後來留學蘇聯時就參加了托派，當時的中國留蘇學生有四百多人，其中約一半參加了「托派」，包括蔣經國。回到主題，「托派」與中國現代文學史確有千絲萬縷之關係，從另一個意義而言，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過程的人和事，又與中共黨史糾纏在一起。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確實「繞不開」托派。我之前讀《陳獨秀晚年文集》、《鄭超麟回憶錄》及王凡西的《雙山回憶錄》，才了解以前新史學研究中忽略了這個派別在中國政治進程中的存在及其作用。托派由陳獨秀、鄭超麟到王凡西，這三人代表了三個不同時期的托派的領軍人物，本身就是一個十分值得重視的研究課題。

本書由作者獨自策劃，進行了大量的田野調查，訪問眾多當事者或已故人物的親屬，爬梳散落於文學界、歷史檔案及海外圖書館的資料，尤其是關於托派的原始材料、文字、人事等，彌足珍貴。因作者身處海外，可以不受意識形態的困擾，自由思考、獨立寫作，其切入角度之新穎，表現手段又契合現代影象的特徵，故能發掘真像，還原史實，皆屬可圈可點，是一部值得一讀的好書。

經多年的辛勤努力，魏博士不僅在幾年前拍出了一部高水準的獨立電影《紅日風暴》，今年又有這麼一部沉甸甸的力作奉獻給中文讀者。謹此向作者表示祝賀，期待她「厚積薄發」，再有同一類型的題材推出，在這條崎嶇的探索小道上繼續前進吧！不畏艱險、不怕孤獨地翻過那一個個山坳，穿越那條長長的時光墜道，追蹤着那一個個漸至湮沒的腳印，我相信她將看到先驅、先行者回眸的微笑。

石在，火種是不會滅的！

孫立川  
香港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  
寫於香港穆穆書齋  
2016年端午時節

作者序

野百合花芬芳綿長

我最先看到的關於王實味的文字，是收入戴晴的《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一書中的〈王實味與《野百合花》〉。從寫作的角度來說，這是一篇非常動人的紀實文字，讓我看到一個與眾不同的生命歷程。我立刻找到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原文，以及他早年的小說。閱讀之間，我被字裏行間的真摯與他生命的熱力所感動，當時就有衝動想要拍攝王實味的紀錄片。那時是2008年。今年是王實味誕生110周年，我很高興不但可以出這本書，還能完成一部關於王實味的紀錄片。

## 尋找新的材料

2008年時，溫濟澤編的《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1993）、朱鴻召編的《王實味文存》（1998）、黃昌勇編著的《王實味：野百合花》（1999）和《王實味傳》（2000），以及張均的《王實味全傳》（2000）都已出版。2000年之後，關於王實味的論文、文章也有發表，但是新材料很少，總體上也沒有超越以上幾位作者的論述。可以說從2000年至今，王實味的研究似乎撞到了南牆，雖然有興趣的人仍舊很多，但因為材料發掘之難而無法繼續。

相比較胡風和王凡西，王實味的材料最少：照片只有一張；除了發表的文章之外，沒有留下書信和日記，更不要說自傳了。上面提到的兩部王實味的傳記，以西方人物傳記的標準而言，跳過了太多時間點、也缺少可靠的細節。因此在我心目中，王實味不可能有真正的「傳記」，但是他的意義卻很值得再深入探討。

因為研究年份不同，我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有機會納入到上面提到的幾位學者們未用的重要材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首版的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對延安整風的論述有一個更加廣闊的黨史背景，因此對於王實味事件的意義提出了不同以往的問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蕭軍《延安日記》中，包括了從1942年5月25日到12月18日之間，蕭軍寫到王實味的十篇日記，從一個事件中人的角度，對於延安批判王實味的情況有生動而充滿情緒的描述。當同時期《解放日報》上關於王實味的文章都極盡批判、醜化之能的時候，蕭軍的文字讓我感受到作為一個真實的人的王實味。利用香港各大學圖書館的資源，我還讀到40年代延安《解放日報》、《中國青年》等報刊上的相關文章，陳學昭、舒湮、趙超構等人寫的關於延安的報導，讀到王實味的北大同學好友王凡西在香港發表和未發表的關於王實味的文字，並且找到了王實味30年代的翻譯過的西方文學作品，閱讀了他的「譯者序」和其他人的序文。

在尋找新材料的過程中，最大的驚喜，莫過於2010年我到京都訪問日本漢學家竹內實的時候，從他那裏獲得的1930年《展開》雜誌的複印件。這本當年被作為王實味的反革命證據的「托派雜誌」中，有三個與他相關的材料：一是他的中篇小說〈三代〉，二是他從英文轉譯的〈列寧遺囑〉，三是一則支那書店即將出版王實味小說集《三個落伍兵》的廣告。這些材料從未收入過王實味的各種文存。這些材料不僅延伸了我對王實味事件的理解，還加深了我對王實味的性格和他的所謂「人性論」的認識。



## 發現新的視點

與以往的王實味研究者不同，我在比較文化和文學理論領域受過完整和系統的訓練，並且有十年以上製作歷史紀錄片的經驗。文學理論要求我追本溯源，比較文化幫助我東西貫通，而這兩點對於審視五四前後湧現的知識分子都非常重要：他們接受了西方民主、科學的啓蒙，大多通曉最少一門外文、翻譯過西方文哲作品，是中國知識分子中人性和心靈最為開放的一代；從知識結構來說，他們遠比50年代高校文理分家之後的幾代人淵博，既有有強烈的邏輯思維、理論分析能力，又有很強的創作力，能寫出十分感性、詩意的文字。如果不能認識到他們的這兩個方面，並且同時考量，我們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他們的行為與文字。

作為一個紀錄片導演，我並不執着於單一的視點，反而崇尚眾聲喧嘩中浮現出的多重真理。以此理由，我說服極少接受訪問的王旭楓先生（王實味的兒子）、薄平女士（王實味的學生和1939年在延安的妻子），解答了我的很多問題。在訪問與王實味同時期在延安的知識分子幹部時，我邀請曾彥修（已故）、王懷安（已故）、高向明、黎辛、李銳、何方、灰娃、韓書田等人從他們個人的角度，分享他們對於延安整風前後的記憶。除了高向明和黎辛，其餘老人大多沒有專門撰文寫王實味的文章，因此沒有被問道過是否記得王實味之人與文，但他們的確有自己的記憶。在訪問研究王實味問題成績卓著的宋金壽、戴晴、黃昌勇等人時，我會着重他們為甚麼會做王實味研究。同樣在訪問研究延安魯藝的王培元，以及魯迅研究專家林

賢治、朱正和錢理群時，我會詢問他們如何看待王實味和魯迅、王實味和其他延安作家的關係。

此外，在搜索英文文獻的時候，我發現由於整風中王實味最大的罪名是「托派反革命」，他的案件引起了一些第四國際（托派）和其他西方學者的注意。美國女教授戈德曼（Merle Goldman）早在她1967年研究40、50代中共整風的英文專著中，就提到王實味事件。而英國教授班國瑞（Gregor Benton）則在1975年，率先把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藝術家〉兩篇雜文翻譯成英文，並在2015年把這兩篇散文收入英國出版的《中國托派文獻》。80、90年代，則有更多漢學家研究了共產黨不同時期的整風，但王實味的案件並沒有被細緻研究。通過班國瑞的介紹，我於2015年初，在美國鳳凰城訪問了被稱為「毛澤東最信任的美國人」的美國籍中共黨員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了解到他對「整風」和「思想改造」的切身體會：他用了六年時間在單身監禁中，完成了自己思想改造。他的講述讓我從另一個角度，看到「改造失敗」之王實味的意義！

對於才華橫溢、人性充沛的王實味，對於他那代知識分子的動盪人生和多舛命運，對於個人面對強權時如何支撐信念，我在好奇中閱讀、研究、交談、追問，漸漸就形成了這本書。作為一個紀錄片作者，我比其他研究者更加重視影像，因此在整個研究過程中都十分注意圖片和影像資料的搜集。本書中的一百六十多幅圖片中，除了部分剪報、書影是圖書館找到的以外，照片大多來自受訪者的家庭相簿。比如延安文藝座談會與

會者的合影，幾位受訪者家裏都有比已經出版的書籍中更為清晰的照片。另外，我還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國家資料館、香港電影資料館等地方，找到了延安 30、40 年代的影像。這些影像裏包含着有別於文字的信息，能夠讓我這個後輩的人，更加直接地感受到那個時代的人的風貌。30、40 年代是一個木刻盛行的時代，部分由於魯迅先生的推動、部分由於印刷方便，很多書刊都用木刻作品為封面，因此木刻也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左翼藝術。和出版社商量之後，決定把我搜集到的部分照片、木刻、書影，與文字一同印出，以幫助今天的讀者「看到」當年的景象。

多年來王旭楓一直關注着所有關於王實味的研究，他最為欣賞、認為最深入研究是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我2010年就曾聯繫過高華，但他因為患病不能接受訪問。後來我應王旭楓的請求，再次聯繫高華，病中的高華答應接受訪問。我立刻從香港直飛南京，拍攝了可能是他生前接受的最後一次訪問。那是2011年9月，同年12月高華去世。我要首先感謝高華，和我分享了他對於王實味問題的思考。我還要感謝王旭楓先生，從2011年春天第一次見面起，一直給予我的鼓勵。我2016年春天再度訪問他的時候，他剛剛參加了在王實味家鄉潢川舉辦的王實味研究會議，並且正在編輯《王實味、劉瑩紀念110週年文集》。他對王實味問題的思考，已經超越了幾年前和我的討論。

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得到了很多前輩的鼓勵、後輩的幫助，我必須在此致謝。天地圖書的總編、出版過很多近代歷史的孫立川先生，不但介紹李銳、何方、灰娃等老人給我訪問，幾年來還多次在茶敘時，鼓勵我搶救歷史。過去的十多年裏，我拍攝了六十多位老人和學者，始終沒有放棄對於知識分子歷史的研究。李歐梵教授告訴我他在美國做學生時，曾經給美國教授戈德曼做過助手，很早就接觸到王實味的文字。2015年胡

風事件 60 周年之際，我請李教授作為嘉賓來參加紀錄片《從五四到新中國》的放映時，他提出王實味值得認真研究，並且鼓勵我做好我的研究。我從朱正、錢理群兩位先生的文章中學到很多歷史研究的方法，也都和他們做過不止一次對話，特別謝謝他們對我各種問題的解答。黃煜教授在百忙之中還讀了我的書稿、幫我背書，讓我十分感動。

在拍攝的過程中，很多受訪者都十分支持我的工作，並且把他們的同事、朋友介紹給我訪問。李銳先生拿出五個上午解答我們的問題，除了留我們吃午飯，還把住在同一棟大樓裏的王懷安先生找來一起講述搶救運動的情況。何方先生和我成了往年交，不但解答我的各種問題，還打電話給很少接受訪問的曾彥修先生，請他接受我的訪問。曾彥修還送書給我，讓我對他從延安往後的故事都有所了解。2015年曾彥修先生去世後，何方先生寫了一篇紀念文章，裏面寫到兩人近幾年來在歷史的研究、反思方面還不斷交流，很多思考和理解都令我十分佩服。俄羅斯文學專家、翻譯家藍英年先生介紹了他的老師韓書田接受我們的採訪。從2010年12月第一次在廈門的丁玲研究會議上見到黎辛先生之後，他一直很關注我的工作，在北京又接受了我們的訪問，並把他的圖片、文字材料都和我們分享。幾位丁玲研究學者還介紹我去看望了丁玲的丈夫陳明先生，他也把他的書送給我。蕭軍的兒子蕭燕先生也很關注我的研究，我們曾經兩次在美國見面，他除了給我蕭軍的圖片，還把他本人拍攝的周海嬰、張仃等人的錄像與我分享。王實味的學生高向明和薄平，通過他們的描述，讓我感受到王實味的音容笑貌。2011年我首次拍攝薄平時，她說很希望能有一位有水平的

學者，把王實味寫得再深入一些；2016年4月底我去看望98歲的薄平時，她說一直期待着我的著作的發表和紀錄片的完成。其實這些年，我一直都以她的期待鼓勵自己，不能放棄、還要做好我的工作。

在我採訪、拍攝的八年中，助手黃韻宜、董然多次一同前往，既參加拍攝，也幫助整理訪談稿。「北大三人行」第一稿的編寫，是我和黃韻宜在廣州花城出版社編輯、著名作家林賢治先生的鼓勵和督促之下，用了近一年的時間進行的。林先生提出不少修改意見，還介紹了幾家出版社給我們，雖然沒有談成，但是這個過程也督促我們重新組織材料、深入思考內容。從2015年起，我的研究助理戚苗苗在我重寫本書的過程中，做了大量的文件整理、校對、參考書目搜尋等大量工作；對於她提出的很多問題，我也認真思考、做了不少補充。黃韻宜和戚苗苗都是1980年代末出生的年輕人，我相信她們的參與和意見，能夠讓書中內容更好地傳遞給年輕讀者。

最後還要感謝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社長朱國斌教授鼓勵我重新組織，擴充幾年前的書稿，也要感謝總編輯陳家揚先生提出的建設性意見，以及責任編輯陳明慧女士的辛勤、耐心、細緻的工作。

還有很多朋友，都以各種方式給我提供信息，鼓勵我完成此書，我在此一併致謝！

# 目錄

總序		vii
前言		xi
作者序	野百合花芬芳綿長	xvii
鳴謝		xxiii
第一章	北大戀愛風波	1
第二章	海上賣文生涯	39
第三章	紅星照耀延安	85
第四章	歌頌抑或暴露	133
第五章	兩篇惹禍雜文	179
第六章	由座談而批判	219
第七章	從自由到沉寂	269
第八章	中外記者穿梭	313
第九章	命斷塵埃不落	355
第十章	思想改造之難	397

## 附錄

中篇小說〈三代〉王實味	426
譯文〈列寧遺囑〉王實味	443

第一章

北大戀愛風波





1906年4月5日（陰曆3月12日），王思禕（字書翰，筆名實味）出生在河南古城潢川，父親王言炳（字籽渭<sup>1</sup>）是光緒十七年（1891）開封鄉試中考中第十三名的舉人。如果在早些年，憑此謀一官半職絕無問題，但當年時局混亂、列強割據，王言炳選擇教書為業。雖然薪俸原本可以養活一家老少，但經不住他樂善好施，三子思禕出生時，家境已十分拮据。思禕自小隨父親學習國文，8歲起入新式學校，中學時就經老師介紹，閱讀了《新青年》、《向導》等進步刊物。關於王實味早年的情況，黃昌勇<sup>2</sup>的《王實味傳》中有描述。魯迅研究專家、詩人、編輯林賢治<sup>3</sup>，這樣解說當時的社會氛圍。

林賢治：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成立，當時有種共和的空氣，一下子冒出那麼多的報刊、新學校，洋學生也多起來。自由戀愛、衝破家庭的束縛，新文化都是開放的。加上當時北洋政府是個弱政府，無暇他顧。所以這些人講甚麼沒人管。家庭也攔不住這些學生，你要戀愛就戀愛。當時那種空氣，你看文學作品看得出來。

- 1 「王言炳『字籽渭』」，見黃昌勇《王實味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3頁。王實味妻子劉瑩則說是「籽渭」，見劉瑩〈沉痛的訴說，無限的思念〉一文，收入溫濟澤編《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年），142頁。
- 2 黃昌勇（1966-），現任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早年主要研究中國新文學、近現代文學史、現代知識分子等問題，近年轉向文化理論與文化產業研究。他編輯了《王實味：野百合花》，並撰寫了《王實味傳》。
- 3 林賢治（1948-），著名詩人、作家、編輯，代表作有詩集《駱駝和星》和《夢想或憂傷》、散文集《平民的信使》、評論集《胡風集團案：20世紀中國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和《時代與文學的肖像》、自選集《娜拉：出走或歸來》、傳記《人間魯迅》和《魯迅的最生十年》等，被文學界冠以「民間思想者」的稱號。

那麼《新青年》究竟是一本甚麼樣的雜誌？回溯到一個世紀之前，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誌》創刊，陳獨秀<sup>4</sup>發表創刊詞〈敬告青年〉，對青年提出六點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1916年雜誌更名為《新青年》後基本上由陳獨秀主編，只有1918年出版的第六卷曾經由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等人輪流編輯過。《新青年》雖然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等著名文章，但因銷路不好，幾乎停刊。普通讀者不喜歡看理論文章，《新青年》急需新文學作品。編輯之中的錢玄同、劉半農都去向魯迅和周作人<sup>5</sup>兄弟約稿，因為這兩個人從留日時代就已經開始寫作，思想和文學造詣都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可。但這時的魯迅處於比較消極的狀態，錢玄同來向他約稿時，魯迅記得自己正在鈔一些古碑上的文字。

「你鈔了這些有甚麼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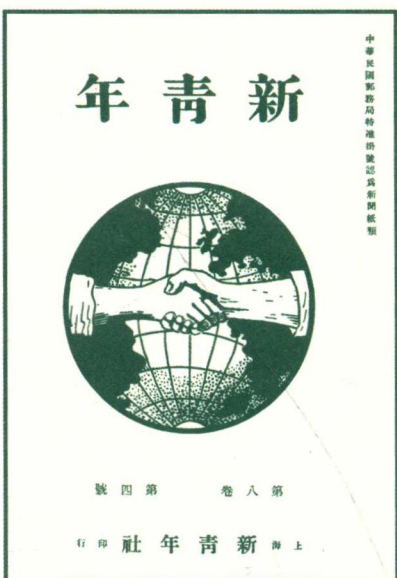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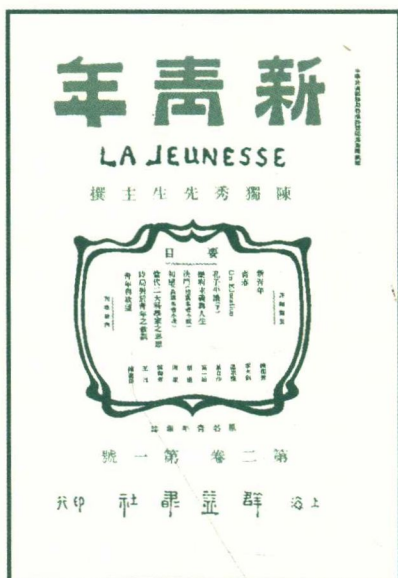
「沒有甚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甚麼意思呢？」

「沒有甚麼意思。」

4 陳獨秀（1879-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號實庵，安徽安慶市人。思想家、政治活動家、語言學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者之一及首任總書記。他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創辦了著名白話文刊物《新青年》。

5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紹興人。現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翻譯家、中國民俗學開拓者，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之一。歷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東方文學系主任，燕京大學新文學系主任等。曾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並任「新潮社」主任編輯。「五四運動」之後，與鄭振鐸、沈雁冰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與魯迅、林語堂等創辦《語絲》週刊，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



上：比較1916年（左）和1919年（右）的《新青年》雜誌封面，可以看出俄國革命之後陳獨秀等人的政治傾向有所變化；下：1918年6月北京大學文科哲學系師生合影，前排右四為蔡元培、右三為陳獨秀、右二為梁漱溟。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sup>6</sup>

此後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狂人日記〉。這不但是他本人的第一篇小說，也開創了白話小說的新風氣。後來因為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的敦促，他又發表了〈孔乙己〉、〈藥〉、〈風波〉等短篇小說。魯迅後來把這些早期創作稱為「革命文學」或者自願遵從「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的文學，這個「前驅者」說的就是對他的小說高度評價的陳獨秀。而陳獨秀後來評價魯迅和周作人給《新青年》的投稿時，表示對魯迅所作的小說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們兩位，都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陳獨秀不斷催稿，魯迅也認真對待，於是接着又發表了〈阿Q正傳〉等小說，還有新詩和雜文。周氏兄弟這樣的作者加盟，無疑對《新青年》擴大影響起了很大作用。

6 魯迅《吶喊自序》，寫於1922年12月3日。

北京大學當時的校長，可能是其歷史上最具有改革精神的校長：蔡元培（1868-1940）。這位早年在德國萊比錫大學等學校研究人文學的現代教育精英，曾在1911年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組成的第三天，就被臨時大總統孫中山<sup>7</sup>任命為教育部長。蔡元培1917年在北大執校後，秉持學術自由，改革北大學科體制、學制設置，創辦科研機構，宣導平民教育，首行男女同校。他採取「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方針，一上任就聘請陳獨秀做北大的文科學長，同年聘請美國歸來的胡適為文學教授。這兩人因一起編輯《新青年》、共同推動白話運動，而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1918年，蔡元培又聘李大釗<sup>8</sup>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後任經濟、歷史等系教授。李大釗不僅參與編輯《新青年》，和陳獨秀創辦《每週評論》，還在中國率先翻譯推介馬列主義文章。周作人、魯迅分別於1918年和1920年受聘於北京大學，任文學教授和講師。著名新聞人、《新民報》主編趙超構，曾經這樣小結蔡元培：

蔡先生和中國文化界的關係，實在太深了。北京大學之成為中國現代化教育的標本，是在他做北大校長的時代。北京大

7 孫中山（1866-1925），原名孫文，號逸仙，生於廣東香山，少時在檀香山讀書。清末民初醫師、政治家、革命家，是中華民國及中國國民黨之創始人。1905年，在日本東京組成中國同盟會，確定「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政綱，提出三民主義學說，提倡以武裝革命推翻滿清統治以建立中華民國，後又提倡用武力推翻中華民國北洋政府。1911年12月29日，被十七省代表在南京推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職，建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1919年，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1925年3月12日病逝。中國國民黨尊其為國父，中國共產黨尊其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

8 李大釗（1889-1927），字守常，河北樂亭人，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之一，為共產國際的成員及其在中國的代理人。作為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在國共第一次合作、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主張推翻北洋政府，1927年被捕後遭軍閥張作霖控制的北洋政府處決。

學之成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便是他在那裏經營的結果。中國最有規模的學術研究機關，也是在他主持之下成立的。如果說，文化界是一片園地，蔡先生便是中國文化園地的播種者。他無時無刻不幹着播種的工作，他所播的文化種子，有的已經開花，結實，成熟，收成了，有的剛剛發露萌芽。他的努力，可以說一點也沒有虛擲。<sup>9</sup>

1919年1月，中國作為戰勝國在巴黎參加和平會議，希望收回戰敗國德國在中國的權益。但是中國外交失敗，英、美、法、日、意等國於4月30日簽訂《凡爾賽和約》，決定把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送日本。北京的大學生們獲悉後，於5月3日晚在北大舉行大會，定出救國的四條辦法：（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在和約上簽字；（三）通電各省於5月7日國恥紀念日，舉行遊行示威；（四）定於5月4日（星期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之大示威。5月4日下午1點，北京大學等13所院校的學生3,000餘人，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提出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合約簽字」等口號。示威中有12個學生被逮捕。此後一個多月，各地學生開始聲援北京學生，更多的學生被捕。從6月5日起，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總人數大約有六七萬人。

9 趙超構（1910-92），筆名林放，浙江溫州人，中國著名新聞編輯，社會活動家和雜文家。1930年代進入報界工作，先後就職於《南京朝報》和《重慶新民報》，期間寫有大量時事評論。1944年訪問延安，寫有著名的長篇通訊《延安一月》。1946年創刊《上海新民報》，以副總主筆的名義兼任總編輯。1949年之後擔任過新民晚報社社長，一至五屆全國人大代表；1953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擔任過民盟中央參議會常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此段文字引自趙超構〈念蔡元培先生〉，見《趙超構文集》（上海：文匯出版社，1999年），第一卷，589頁。

1919年6月11日，時任北大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因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被捕，《新青年》也因此停刊五個月。此後陳獨秀辭去北大職務，前往上海；在其後的兩年多時間裏積極籌備、創立了中國共產黨，被選為黨的第一任總書記。6月底，中國的代表最終沒有在凡爾賽合約上簽字。7月，孫中山致電政府，要求釋放被逮捕的學生。不久後，被捕的學生陸續返校，受到同學們的歡迎。各地大中學校紛紛成立地方學生會，全國學生會也成立，為以後30年間持續不斷的愛國運動做好了準備。蔡元培則於1923年辭去北大校長職務，但是當時的北大業已成為民主思潮、新文化運動的匯聚地。

因為家境困難，1923年秋，王實味考入官辦的河南省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學校全部課程用英文教授，其英文此後有了迅速提高，不過終因家貧退學<sup>10</sup>。1924年，王實味憑着優異的英文，以榜首成績考中郵務生一職。當時以第二名成績考中郵務生的是開封二中肄業的孟昭瓚。兩人接觸後很快成為朋友，因為王實味和孟昭瓚分別被派駐馬店和許昌分局負責掛號業務，兩人時常利用工作之便通信，信中無所不談。在這個半中半洋的郵務局中，最高級的經理是洋人，工作語言是英文，有點像今天中國的外企。郵務生是個白領職位，待遇還算優厚，他倆每月收入30銀元，在當時可以養活一家人。王實味除寄4元回家給父親，自己生活費用去6元，還有20元餘錢存下來備讀書

10 關於王實味讀書的情況，黃昌勇和劉瑩說法不同，因黃昌勇在1992年專程到王實味家鄉訪問其仍居住在潢川的親屬，而劉瑩主要憑記憶，筆者主要依據黃昌勇的版本。但《王實味傳》直接抄錄劉瑩回憶的部分，筆者將只註明劉瑩文章的頁數。

之用<sup>11</sup>。不過除了薪酬，郵局的體制以及作為郵務生面對的生活現實，都令他感到憤怒。支撐着王實味在郵務工作一年的理想，就是報考他一直嚮往的北京大學；而孟昭瓚的心願則是報考南京的東南大學<sup>12</sup>。

1925年3月12日，曾經號召「聯俄容共、扶助工農」，並且接受共產國際<sup>13</sup>領導，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孫中山去世。孫中山本人曾介紹陳獨秀、李大釗等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但他去世後國民黨內部出現分裂，左派汪精衛在共產國際代表加拉罕、鮑羅廷的支持下，被選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繼續執行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但是國民黨元老、右派的戴季陶、林森等人召開「西山會議」，反對汪精衛左傾，宣佈分共，即把共產黨員清除出國民黨。1925年8月，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暴徒刺殺，汪精衛和蔣介石親自審理案情，國民黨右派領袖胡漢民被認為嫌疑最大，一度被拘留，後胡被派往蘇聯考察。此後，國共繼續分裂。

11 黃昌勇《王實味傳》，19頁。

12 孟昭瓚《往事故人——悲劇人物王實味》，見《中外月刊》（台北：1978年第6期），72頁。

13 共產國際（或第三國際），1919年3月在列寧領導下成立，總部設於蘇聯莫斯科。當時俄國無產階級已經革命成功，建立了蘇維埃政府。第三國際拋棄改良主義，號召世界革命。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從成立起就得到部分經濟資助，主要決策也來自於共產國際代表。但因這些代表不了解中國國情，在中共剛剛成立時就同時接受國民黨為其成員，並指示共產黨員加入規模較大的國民黨。第三國際1919至1926年的主要領導人是季諾維也夫，1926至1928年的領導人為布哈林，1934年之後是保加利亞人季米特洛夫，因為當時共產國家不多，第三國際許多活動及決議都需要蘇聯支持，故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對第三國際有重大影響力。1943年5月15日，蘇聯為拉攏西方，聯合對抗納粹德國，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作出〈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5月22日，向全世界公佈了這個決定。6月10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正式宣告解散共產國際。



到了1925年8月，19歲的王實味入讀北大時，李大釗仍舊是北京大學的圖書館館長，周作人和魯迅兄弟也都還在北大執教，並且和林語堂、錢玄同、孫伏園等人在編輯同人文學刊物《語絲》。當時在北大作講師的魯迅，已經寫出了像〈阿Q正傳〉這樣的白話小說佳作，並已經出版了《中國小說史略》。1917年就曾經在北大任職的胡適<sup>14</sup>，1922年起任北大教務長兼代理文科學長，創辦《努力週報》，1924年又與陳西澧<sup>15</sup>、徐志摩<sup>16</sup>等創辦了《現代評論》週刊。可以說《語絲》和《現代評論》是北大大學生最為重視和歡迎的兩種雜誌。同時，徐志摩編輯的《晨報副鐫》，也成為文學青年們嚮往的發表園地<sup>17</sup>。

王實味進入北大文預科一年級後，被編入一個只有二十來人的小班，其中有兩位同學特別值得注意。一位是張光人（1902-85，筆名胡風），當時23歲，已經在湖南發表過文章，

- 14 胡適（1891-1962），原名嗣糜，字希疆，後改名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提倡文學革命，與陳獨秀同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歷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等職。胡適思想開放、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對文、學、史、考據、教育、倫理、紅學都有深入研究。主張少談主義、先疑後信、科學佐證，提出「盡信書不如無書」。
- 15 陳西澧（1896-1970），名陳源，此為《現代評論》週刊「聞話」專欄撰稿時使用的筆名。早年入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學政治經濟，獲博士學位。1922年回國，在北京大學執教。1925到1927年期間曾與魯迅有過激烈的論爭，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爭議頗大的人物。
- 16 徐志摩（1897-1931），浙江海甯人，原名章垿，字櫛森。中國著名新月派現代詩人、散文家，曾留學英國。1924年與胡適、陳西澧等創辦《現代詩評》週刊，曾任北京大學教授。1926年在北京主編《晨報》副刊，與聞一多、朱湘等人開展新詩格律化運動，影響到新詩藝術的發展。同年移居上海，和胡適、聞一多等人創立新月書店、辦《新月》雜誌。代表作有《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遊》、《落葉》等。1931年因飛機失事遇難。
- 17 倪墨炎〈王實味去延安前的文學活動〉，見《倪墨炎書話》（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149頁。



左上：1925年時的魯迅；右上：1925年前後的李大釗；下：20年代在北京大學任教授的周作人曾在李大釗被害之後多年照顧他的子女。

第二年轉入清華大學；胡風後來成為魯迅晚年最信任的弟子之一，通過編輯雜誌而推動新文學運動；到1955年時，成為毛澤東親自主持的「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的中心人物。另一位是王文元（1907-2002，又名王凡西），曾經被中國共產黨派往蘇聯學習，但後來成為與中國共產黨勢如水火的「托派」的領導人之一。他們三個人的名字，同時出現在8月26日的《北大日刊》之中，因此我們可以確認他們同班同學的身份。王凡西記得這個小班的同學經常一起上課，因此比較接近。

胡風在自己回憶錄裏面提到，他在北大時，曾經選修過魯迅的小說課，王實味和王凡西有沒有選修過這門課卻不得而知。胡風在1926年就轉入清華大學學習，因此與王實味、王凡西後來的關係比較疏遠，甚至在他回憶早年生活的文字中，幾乎找不到這兩個同學的名字。但是這兩位同學，卻在後來都關注着在30年代成為文壇名人的胡風。胡風先生的好友、作家賈植芳<sup>18</sup>，是李大釗女婿賈芝的弟弟，他告訴我們，當時毛澤東也在北大，不過其身份既非學生也非教員。

.....  
賈植芳：北京大學李大釗做圖書館館長，毛澤東沒有飯吃，校長問李大釗，圖書館還有位置麼？李大釗說還有個

18 賈植芳（1915-2008），著名作家、翻譯家、學者，「七月派」重要小說家，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奠基人之一。青年時參加一二九運動被捕，後赴東京，在日本大學學習，並開始從事創作和翻譯。曾任《時事新報》、文藝週刊《青光》主編。建國後歷任震旦大學、中文系主任，復旦大學教授、圖書館館長，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一屆副會長等職。1955年，受胡風案牽連入獄，監禁勞改24年，著有《獄裏獄外》、《歷史的背影》、《近代中國經濟社會》、《賈植芳小說選》、《外來思潮和理論對中國現代文學影響》，譯有《俄國文研究》等。

助理館員的位置，一個月八塊錢。毛澤東去了之後，要往上進，教授來看書，他就想跟人家教授交談。教授看一個小館員，看不起他。你對比毛澤東年譜和魯迅年譜，都提到魯迅在北京大學教書的時候，毛澤東去看過周作人。那時魯迅是講師，周作人是教授。

---

不論王實味是否上過魯迅的小說史課，魯迅對他的影響明晰可見。進入北大後，王實味根據自己仍記憶猶新的郵局工作的體驗，創作了書信體小說〈休息〉，其中對於洋人經理和華人僱員之間的科層等級，以及底層郵差的苦況，有充分細緻的描寫：

郵局中最可憐的要算郵差了，在這赤日炎炎的火熱天氣，他們挑着八九十磅重的郵件，一日夜要走二百里的路程，稍一延誤，還要受罰款的處分；但每月七塊半錢的薪水，在這米珠薪桂的時候，已經連維持他們個人底生活也不充足呀！他們如再有妻子兒女呢——幸而他們多半是單身窮漢。寫到這裏，我忽想起一個叫黃得元的郵差底故事來。他是個蠢笨而老實的大漢；據他底夥伴們說，他是他們中食量最大的，每頓要吃飽的話，要得三碗麵條還得饅頭二斤。因為他很少吃飽過，所以常常「誤班」。關於填寫單冊呈報郵差誤班的事情，是歸封發處那位姓金的揀信生辦理，他是個狡猾的北京人，每月十五元的薪金，一個老婆和兩個孩子都賴他養活，在拮据的生活之下，他總想着敲詐旁的同事以至可憐的郵差們。郵差們誤班了，他底條件是給他買一盒煙捲，便可以填上不誤；但是，黃郵差連飯都沒得飽吃，哪有錢給這位先生

買煙捲呢？他沒幹兩月便另尋生命之路去了。罰款倒有好幾元，還是局長尹君給墊出的。郵差們在這重重壓迫的生活之掙扎中，庸愚的便隱忍着吃盡人間的辛苦，狡黠的便作出種種不法的事情來，像為人私運藥丸鴉片等事。啊！這不是這鬼魅社會虐待勞動者逼出的罪惡嗎！<sup>19</sup>

看到這段文字，今日的我們仍能夠感受到王實味對於底層人民深深的同情，這種同情並非首先來自意識形態的覺悟，而是來自對於人民苦難生活的親身體察。〈休息〉創作的時間是1925年12月，但是並沒有能夠立即發表，而是延遲到1930年4月才由徐志摩把它作為「新文藝叢書」<sup>20</sup>的第八種出版，所以它雖然是王實味首次有記錄的創作，但並不是他首先發表的作品。

魯迅研究家倪墨炎提出，〈休息〉有自傳色彩，由「假託名為『秋涵』的人物給『實薇』的十一封信中」，表現18歲的秋涵在「救國無門、救民無路、個人前途又很渺茫困境」中投河自殺，這也是王實味當時「思想境界的寫照」<sup>21</sup>。但是讀過與王實味一同做過郵務工作的孟昭瓚的回憶，就會知道秋涵的故事裏也有孟昭瓚的經歷和遭遇，而且這書信體本身，也很可能是基於他和孟昭瓚兩人的通信。〈休息〉這樣書信體的小

19 王實味〈休息〉，見朱鴻召《王實味文存》（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22頁。

20 當時中國的出版人已經意識到叢書的好處，很多讀者也是通過叢書來認識新的作家和文學。這些叢書每一本均為獨立作品，而「新文藝叢書」其中有些是翻譯作品，有些則是文學創作。

21 倪墨炎〈王實味到延安前的文學活動〉，154-5頁。

說當時雖非絕無僅有，但也不是很常見<sup>22</sup>，王實味借虛擬人物之筆，寫出現實中「郵局人員薪金制度和差別，真是奇特得令人驚異」，洋人擔任的郵務長、高等華人擔任的郵務官們，可以拿到上千兩官銀，而「牛馬般累死累活的雜差們，一月僅能賺八塊錢」<sup>23</sup>。倪墨炎覺得〈休息〉藝術價值不高，因為它缺少形象的思維，像是11篇「不高明的社會評論」，充滿「詛咒和怨恨的語言」，讀來「令人感到拖沓而生厭」<sup>24</sup>。我認為這篇紀實作品的價值在於別處。王實味描述的這個洋人開的郵局，可以說是當時中國社會中一個極致的標本，其中人員貧富差距之大、體制內剝削之巨都是超越了很多其他機構的，而他本人因為家業中道衰落，才有機會深刻地體會了貧窮，並由此真心地同情低下階層人民。

.....  
林賢治：我覺得他小說裏面，有深刻的人性，就是對處於底層的人的那份同情。這種同情心，促使他走向革命。沒有這個人性的基礎，他不可能對平等、社會公正、民主這些東西的追求如此強烈。  
.....

在北大學習期間，王實味結識了幾位一生的摯友，王凡西是其中一位。王凡西回憶說，

22 在賈植芳、俞元桂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中，〈休息〉這篇小說被同時列入「小說」（420頁）和「散文」（175頁）部分，可見它在文體上跨越了傳統的分界。

23 王實味〈休息〉，20頁。

24 倪墨炎〈王實味到延安前的文學活動〉，155頁。

對於文學，特別對於西方文學，他[王實味]和我有同樣興趣。我們都受到當時北京文藝空氣的影響，都喜歡向各種報刊投點稿。在三·一八慘案前後，我們又都從布希米亞式小文人變成為革命的共產主義者。這一些愛好上與思想發展上的共同點，很自然地使他與我之間形成了比較親近的友誼。<sup>25</sup>

在同學中，後來與王實味命運相關的另一位，是他和王凡西都十分敬重的哲學系學長陳清晨<sup>26</sup>，王實味後來一直把這位同鄉的同學尊為大哥。關於陳清晨的文獻，一直很難找到，雖然他的名字出現在北大共產黨人紀念碑上，但是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卻另有原委<sup>27</sup>。陳清晨的長子陳道同<sup>28</sup>轉述了他通過自己的母親所了解到的父親早年的情況，以及陳清晨與王實味的關係。

- 25 王凡西，〈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見《九十年代》（香港：1985年5月），80頁。
- 26 陳清晨（1900–42，又名陳其昌、陳仲山），1922年8月進入北大文預科，1924年轉入哲學系本科，1925年入黨，參加革命活動。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逃往上海，在上海繼續參加共產黨的工作。1929年跟隨陳獨秀轉向托派，並成為托派行動的骨幹人員，參與編輯《花火》、《鬥爭》雜誌，受到陳獨秀的讚賞。1941年因為幫助大哥搜集情報的活動敗露被日軍逮捕，在獄中屢遭毒打，卻未洩露任何黨的機密。1942年慘遭日軍殺害。
- 27 陳清晨在1936年6月，以陳仲山的名字，給魯迅寫了一封信。當時魯迅在生病，由其晚年弟子之一的馮雪峰代筆，回了一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讓陳其昌在文壇上留下罵名。這段「公案」，我們會在王凡西卷中詳述。
- 28 陳道同（1927–2014），陳清晨長子。青年時受到中國托派代表人物鄭超麟等人影響，參加過托派組織，不久後脫離，但在1952年底仍被作為托派分子，被監禁、勞改多年。因托派在中國並沒有正式平反，很少發篇文章和接受訪問。他的〈陳其昌之死〉一文在網上流傳，讓很多人初次了解陳清晨。研究者段躍曾在2006年對他進行過九天訪問，訪問文字以〈陳道同的生命軌跡〉為題，在陳道同2014年去世後在共識網上發表。筆者訪問陳道同的時間是2012年8月，文中引用部分均來自筆者的錄音。

陳道同：我外公開個布店，所以說母親家境還可以。我父母同歲，小時候就定了婚約，結婚時二十四五歲了。開始兩年，我父親一人在北大念書，我母親娘家催着他把婚結了。婚後夫妻倆都到北京去，在北大附近居民家裏借住。母親說剛去北京時很害怕，父親是大學生，她是文盲不識字，有次同學們來看陳清晨大哥，「他的老婆還是小腳欸！」我母親就害怕那些同學，怕父親會不要她。事實證明我父親從沒有厭棄過母親，他說我們都是搞共產主義、反封建思想的人，怎麼可以厭棄舊時代的受害者？！開頭幾年，他們的生活全靠祖父每年寄200元維持。他知道來之不易，讀書很用功。可是到離畢業只剩一年的時候，他完全變了，書不念了，整天跑東跑西幹革命了。

1926年1月，王實味由陳清晨介紹加入共產黨；2月，王實味的短篇小說處女作〈楊五奶奶〉在徐志摩主編的《晨報副鐫》中登出，作者署名「書翰」，僅用了3,000字，就生動地刻畫出中國文學中獨一無二的悍婦楊五奶奶的形象。她既是封建文化的受害者，也是人格扭曲的加害者，在殘害了兒媳之後，被兒媳娘家人處以極刑。倪墨炎評價這篇「人物速寫」描述人物性格有效、「對話也很生動」，「作者採用了不少民間方言，因而和當時文壇流行的學生腔不同，也沒有採用方言土語中詰屈聱牙的句子，文字流暢。這些都說明，20歲的年輕作者在生活素材積累和藝術素養上都已經有了相當的準備」<sup>29</sup>。徐

29 倪墨炎〈王實味到延安前的文學活動〉，155頁。





志摩當時已經是著名詩人、文學大家，給他投稿的王實味，在投稿信中特別說明，楊五奶奶這樣的人物他家鄉就有，並非完全虛構，而作為編輯的徐志摩，也把這個信息在小說篇末作為編者摘要的一部分一起登出，無疑讓讀者對於楊五奶奶的形象產生更深的印象。徐志摩的認可，對於文學新人王實味無疑是很大的鼓勵。根據劉瑩回憶，王實味說那段時間，他無論在政治抱負上、還是在文學理想上，都感覺到從未有過的幸福<sup>30</sup>。

1926年3月18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發動群眾和學生運動，要求北洋政府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時，北洋政府武力鎮壓在天安門前抗議的人群，造成所謂「三一八慘案」。魯迅因為支持學生而被北洋政府通緝，8月前往上海。陳清晨也是在此前後走上革命道路的。

---

陳道同：中國第一代革命家參加革命過程不同，但也許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先接受革命理論然後走上革命的實踐，另一類就是先走上革命實踐，然後再補充革命的理論。我父親屬於後面這種，在革命形勢的推動下，嚮往建立一個沒有壓迫的新世界，帶着這個願望溶入革命大軍。母親勸他要好好念書，他就回答說，「等打倒軍閥，革命成功之後，再念書不遲。」母親就反問他：「軍閥甚麼時候能打倒？」他就說，「快了，快了。」我相信這種心態是革命高潮時候一個挺普遍的心態。

---

30 劉瑩〈沉痛的訴說，無限的思念〉，145頁。

同一時間，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將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清除；5月，又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整理黨務案」，限制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任職的比例。由於和蔣介石的政見分歧，汪精衛離開廣州前往法國。

同年7月，王實味創作了中篇小說〈毀滅的精神〉。小說的前一半，描寫了農民孤兒秦順成長的故事，雖然生活清苦，但是獲得了溫暖的家，有着和諧寧靜的生活。但是到小說後半段，村子裏開始有了兵禍。到了最後四分之一的部分，秦順外出為病兒尋醫時，妻子被軍閥士兵姦殺，幼小的兒子和慈愛的岳母也慘遭殺害。他走出家門去尋兵報仇時，看見了那群殺人殺累了死豬酣睡在一棵大樹下。王實味雖然是以文字描述，但是他的小說幾乎可以當成電影劇本來讀，不但有聲有畫，還有遠景、近景、特寫的場面。

他渾身血液都熾燒起來了！他的雙眼圓瞪着像兩支火炬，他吱吱地咬牙作聲，想將那些野獸們寢皮食肉！但他的行動並不像一般的狂人。他幽手幽腳地走到第一個野獸之前，兩手平托起利刃照準他的脖頸挺切下去，只微微吃喀一聲，那野獸便身首異處了。

哧！……哧！……哧！……他挨次地照樣做下去。

呵，那拴着幾匹馬的大槐樹旁還躺着幾個，——哧！……

哧！……

他做的真藝術極了，那些野獸在被殺前沒一個被驚醒，連半聲微叫都沒有。

不到十分鐘的時間，那些野獸們已被他宰屠淨盡了！他的兩膀似有無上的神力，絲毫也不酸軟！他的動作是那樣穩練而安閒，就像他平時割麥一樣。他白色的衫褲已全成紅色，他完成了他那偉大的毀滅的工作！<sup>31</sup>

軍閥混戰、百姓遭殃，王實味所描述的情景是他有生以來不斷重複的現實夢魘。即便在今天，我們也可以看到王實味文字中的生動畫面，感受到他語言的節奏與力量。這篇小說的結尾，王實味註明「十五年七月，北大四齋」，也就是1926年7月在學生宿舍寫成，但是小說本身要到一年多以後才能發表。

1926年7月9日，孫中山的弟子蔣介石帶領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完成總理遺訓。這場戰爭從形式上統一了中國，結束了多年來，中國各種軍閥混戰的局面，作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也由此迅速上升。但不久後，國民黨開始武力清共。

1926年夏秋之際，新學年開始時，王實味所在的北大黨支部，吸收了兩位與他一生命運都不可分割、同是湖南籍的女同學：李芬<sup>32</sup>和劉瑩。後來成為他妻子的劉瑩回憶說：

31 王實味〈毀滅的精神〉，見朱鴻召編選《王實味文存》（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83頁。

32 李芬（1906-28），詳細事跡參看劉讓平、李謨壁、鍾繩祖編寫的〈李芬〉，收入王效挺、江長仁、黃文一主編，《北大英烈》第一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135-47頁。

我是1926年10月20日認識王實味的，因為那天是我入黨的日子，而在這以前實味已於1月入黨。我們在支部會上經常見面。我對他的印象只是他瘦瘦高高的，工作很熱情，容易激動。確切的說，只是一張熟面孔而已。我們從未說過話，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sup>33</sup>

在王實味研究中，首位去訪問劉瑩的記者作家戴晴<sup>34</sup>，在1988年第5期《文匯月刊》上發表了長文〈王實味與《野百合花》〉，這是文革後第一篇讓王實味重新回到公眾視野中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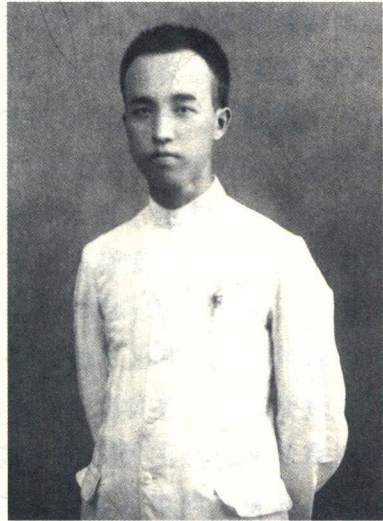
---

戴晴：劉瑩是1926年的時候，在北大，李芬介紹她入黨的。然後這個黨就派她做這個做那個。劉瑩應該說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共產黨員。她甚至於把共產黨的事業當成她心裏最聖潔的一個事業來看的。她認為王實味是個在性格上有缺點的共產黨員。在觀點上，劉瑩都覺得無所謂；因為她們那代人所受的教育，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觀點。

---

33 劉瑩〈沉痛的訴說，無限的思念〉，145頁。

34 戴晴（1941—），原名傅小慶、傅凝，祖籍江西臨川，生於重慶，自由作家。生父傅大慶1945年被日本憲兵殺害，之後成為中共元老葉劍英的養女。1982—89年在《光明日報》做記者，所主持的《學者答問錄》專欄訪問過包括方勵之、嚴家其、金觀濤等持不同政見者在內的很多學者。1989年公開對三峽水電站的環境影響、移民政策等方面提出異議；六四事件後，因為支持不同政見者，在7月14日被捕，在秦城監獄關押至次年1月21日。1992年獲得國際報業聯合會自由金筆獎，紀實文學作品有《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儲安平與黨天下》、《走出現代迷信》、《當代女性系列》、《學者答問錄》、《長江長江》、《紅色警報：大興安嶺火災直擊報導》、《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我的入獄》等。



上：王實味1925年進入北大時的文預科同班同學王凡西（左）和張光人（右，即後來的著名文人胡風）；下：1928年時的劉瑩（右二），她是在北大黨支部與王實味相識的。

在北大的學生活動中，李芬和劉瑩都相當積極，兩人的名字也常常一起出現在《北大日刊》中。李芬來京之前，在家鄉湖南寶慶就是個出名的進步學生，愛蓮女校的同學記得她「身材修長，眉清目秀，不苟言笑，十分老成」，經常穿藍布旗袍，說話「聲音清脆，口若懸河，滔滔不絕」<sup>35</sup>。她與表哥結婚後，在1926年3月產子，不久表哥病故。公婆要求她在家守節，她卻忍痛拋子到北大讀書<sup>36</sup>。根據劉瑩的回憶，李芬有一次和政治系女生劉尊一結伴上街搞宣傳時，被兩個奉系<sup>37</sup>密探攔住。劉尊一頭髮是黃色，曾被密探記錄了特徵。李芬當時可以擺脫敵人，但因不放心同伴而一同前往偵緝隊。兩人在審問中機智辯論，敵人沒能從她們身上搜出證據，就放了她們。李芬勇敢而智慧的脫險故事轟動了全校，不僅讓劉瑩佩服，也引來王實味向李芬表達傾慕的信。據劉瑩回憶這件事發生在1927年初，而王實味主要表達的是希望李芬能夠「幫助」他<sup>38</sup>。戀愛本來在青年學生中很正常，但是因為李芬另有苦衷，不願戀愛，加上校外的白色恐怖正在不斷加劇，王實味的初戀就釀成一場風波。

1927年4月6日，北洋政府駐守北京的軍閥張作霖派軍警突然搜查蘇聯大使館，發現大量軍火及策劃進行顛覆中華民國的活動證據。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通緝，而躲入東郊民巷俄國兵營的李大釗，全家被捕。李大釗當時仍舊是北京大學教授、

35 劉讓平等編〈李芬〉，137頁。

36 同上，140-1頁。

37 奉系是民國軍閥派系之一，建立於奉天（今瀋陽），屬於北洋系，先後以張作霖和其子張學良為首，並一度成為中國境內最大的軍政府。

38 劉瑩〈沉痛的訴說，無限的思念〉，137-8頁。

圖書館館長，他的被捕當然在北大引起很大反響。與他相識的很多社會名流都開始活動，希望北洋政府能夠釋放他。當時，共產黨面臨的打擊很大。在上海，周恩來領導的工人糾察隊與蔣介石部隊發生了直接衝突，史稱「四一二政變」。次日，上海總工會召開工人大會，聲討蔣介石。會後，十萬多工人、學生到寶山路國民黨26軍第二師周風歧司令部請願。士兵向人群掃射，當場打死一百多人，傷者不計其數，史稱「寶山路血案」。接着，蔣介石下令解散上海市特別臨時政府、上海總工會，和一切共產黨組織，搜捕共產黨員及支持者，逮捕千餘人，並將首要人員當場殺害。至15日，有三百多人死亡，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蹤。7月，上海中共黨組織負責人陳延年<sup>39</sup>、趙世炎<sup>40</sup>等遇害。4月17日，蔣介石與一批右派國民黨中央委員在南京召開政治會議，公開發佈清黨通電，並發出秘字一號命令，通緝共產黨的首要分子197人：首要為鮑羅廷、陳獨秀，其次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澤東、恽代英、周恩來、劉少奇、張國燾等人。一些非共產黨的左派人士，如沈雁冰（即茅盾）、柳亞子、鄧演達、章伯鈞等，也

39 陳延年（1898-1927），又名陳遐延，安徽安慶人，陳獨秀長子，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1917年考入震旦大學攻讀法律，1919年底赴法國勤工儉學。初信無政府主義，1921年後轉向馬克思主義，1922年6月與趙世炎、周恩來等一起創建中國少年共產黨。1922年秋加入法國共產黨，不久後轉入中共。1924年秋回國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次年參與組織省港大罷工。1927年四一二事變後，奉命前往上海工作，5月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927年6月26日，被國民政府逮捕，拒絕招降，8日後被亂刀砍殺。

40 趙世炎（1901-27），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赴法國留學；1922年由胡志明介紹加入法國共產黨；1923年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共產主義大學學習。次年回國，任中共北京區委委員兼地委委員長。1926年，被派往上海與周恩來領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配合國民革命軍北伐。1927年四一二事變後，留在上海從事秘密活動。7月2日，趙世炎在虹口北四川路志安坊109號住所被捕；19日在上海楓林橋被處決。



在通緝之列。之後，在其他地方也陸續開始實施清黨。4月15日，廣州全城大搜捕。在廈門、福州、寧波、南京、杭州、長沙等地，大力緝捕、殺害中共黨員。此後國共分裂已成定局。

北大校內，王實味從年初開始的對於李芬的追求，到此時也還沒有結果。王凡西在回憶文章中，解釋了當時同學黨員之間的關係。

一般同學與特殊的黨員同學，對李芬有普遍的好感，而王實味竟愛上了她。為了表達愛意，他給李芬寫了信。可是受信人並無意思。在當時北京的革命黨人中，清教徒式的作風是相當有力的。同志中談情說愛，縱非有背黨紀，至少被看作消極行為，甚至被看作資產階級的浪漫行為。李芬是否受着這種風氣影響，不得而知。總之她沒有理睬，沒有回信；但是王實味卻不肯甘休，再接再厲。一連給對方據說五、六封信。這使得李芬非常不快或不安了，終於把這件事向組織公開。

劉瑩也證實，李芬因為心中不安，無奈中想到托自己的同鄉、支部書記段純向王實味代為說明婉拒。王凡西回憶：

北大支部書記段某，也是湖南人，而且據許多人說，他對李芬也有意思。王實味苦苦的片面追求，既然要他來處理，他便小題大做起來。這是1927年春天，李大釗等已遭逮捕，卻尚未遇害。白色恐怖籠罩了北京，我們的工作進行得非常謹慎和隱秘。可是，這位書記要解決「王思禕事件」，卻在北

京爛漫胡同的湖南會館召集了一次北京東城部委和北大支幹會的聯席會議，出席與列席者達十餘人之多，會議幾乎開了一個整天。

這樣的集會，在白色恐怖那麼嚴重的情況下是很危險的，有可能全體被捕。但是段純不管這些，在會上「氣勢洶洶」地發了言：

他強調王實味之所以入黨，只為了更方便地追求李芬，根本不是來參加革命的。又說在此白色恐怖極端嚴重的時候，在此黨的領導人遭遇大難，鬥爭萬分緊張與異常困難之際，身為黨員的王實味非但不化悲憤為力量，以行動答覆鎮壓，卻拼命追求女同志，幹些無恥勾當，實在荒唐之至。他主張會議通過決定，給王實味以嚴厲的黨紀處分，縱然不開除黨籍，也該「留黨察看」。其他到會的人都發了言。大家都批評王實味。

王凡西回憶說，李芬並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是在座的陳清晨以大哥的身份責備這個小弟弟不該為了女孩子胡鬧。

但是誰都不支持段書記的「卑鄙動機論」，沒有一個人主張把王實味開除或給以嚴重警告。我不主張把主要屬於私人性質的事情，提高到黨和革命的平面來考慮。段書記頗不以我們的「自由主義」的看法為然，但他居於一人的少數，只好服從多數意見。結果給了王實味一個正式批評，要他不再給李芬寫信。列席會議的王實味始終不曾說一句話，靜聽大家

對他的批評。等到批評做出了結論，他表示接受，「案子」便告結束。<sup>41</sup>

當晚，情緒激動的王實味來到王凡西的寓所，說他沒法不愛李芬，不過他會克制自己，不會再給她寫信。王實味認為段純對戀愛的看法是封建的，處理這件事情的態度是官僚的。這起「戀愛風波」雖然最終不了了之，但是王凡西在幾十年之後回望這個事件的時候，認識到這是王實味在黨內受到的第一次打壓，並且感嘆說：「自我檢討，徹底認罪」的那套辦法，當時是連蘇聯共黨內部都不曾實行呢」。

王凡西對於王實味的戀愛風波記憶深刻，但是並沒有在文章中全部寫出。王實味事件發生若干年後，他還對在英國的好友、漢學家班國瑞<sup>42</sup>講述了這件事的原委。

---

班國瑞：那時整個黨的風氣是，個人感情爭端也歸黨管，組織讓王實味停止追求李芬，但他其實拒絕了，所以王實味被開除出黨。1927年，蔣介石的白色恐怖開始後，整個黨組織都被打散了，像王實味這樣的人，就有很多游離到共產黨組織之外。

---

41 以上四段引文都出自王凡西〈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80-1頁。

42 班國瑞 (Gregor Benton, 1943-)，英國教授，前第四國際 (托洛斯基派) 成員。1975年幫助王實味好友王凡西移居英國，並讓王凡西住在他家裏，開始翻譯王凡西的《雙山回憶錄》。他最早把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家》兩文翻譯成英文，2015年又再次把這兩篇雜文收入其編著的《中國托派基本文獻》。

劉瑩在文章中寫到，段純後來仍舊想辦法把王實味開除出黨，而這其實是李芬所不願意看到的，李芬告訴她「段純把事情弄砸了」<sup>43</sup>。倪墨炎的說法，因為對支書不滿，王實味不再過組織生活，也可以說是「脫黨」的狀態。當時社會動蕩，脫黨的人只要找到組織，或組成三人以上的小組，重新過組織生活，就可以被重新接納。

當各方試圖營救李大釗時，拘捕他的張作霖感到很大壓力，於是給包括張學良、張宗昌、孫傳芳在內的六位前方將領發電報徵詢意見，除閻錫山沒有回覆，其餘五位都主張立即正法。於是在4月28日，李大釗等20名國民黨左派黨員和共產黨員被以「和蘇俄裏通外國」為罪名絞刑處決，李大釗時年38歲。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釗的北大同事周作人，立刻把他的子女藏在自己家中，後來很多年都一直資助他們生活費。

---

陳道同：母親告訴我，李大釗死後，常常有人頭掛城牆，偏偏那個時候我生下來了，我陽曆生日5月25日。四一二以後，母親就問父親，「怎麼說的好好的，有希望了，怎麼那麼多人被殺呀，到底怎麼回事啊？」父親講，「路線錯了，我們走錯道了！我們要重來。」重新走甚麼道路，母親也不清楚了。

---

43 劉瑩〈沉痛的訴說，無限的思念〉，139頁。

李大釗被害後，李芬和寶慶同學、同鄉一起集資，「認領」了與李大釗同時被絞殺的烈士謝伯俞的遺體，並把他安葬<sup>44</sup>。這以後不久，王凡西離開北京去武漢工作，與王實味天各一方，要三年以後，才會再次見面。

當時還是小學生、後來和王實味同時期在延安的李銳<sup>45</sup>，對於這個時期愈演愈烈的剿共行動，有自己的記憶。

---

李銳：1927年，我小學畢業，湖南有個馬日事變，殺共產黨。殺人的時候，要插上一個標，寫上他的名字，推在街上跑。一有這樣的行動發生時就吹號，我們就到街上看，有次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學生被推着去殺頭，印象很深。我當時已經知道日本人要滅亡我們，另外就對蔣介石殺共產黨反感。由於我父親的好朋友是共產黨，我母親對共產黨也有好感，我六年級的時候就讀過有名的左翼作家蔣光慈的〈鴨綠江上〉，看過一些進步小說，看魯迅的書。高中二年級時，我寫過一篇小說叫〈走〉，寫的就是大革命的時候，人力車夫的兒子參加工會、參加革命的故事。

---

44 劉讓平等編〈李芬〉，143頁。

45 李銳（1917-），生於北京，祖籍湖南平江。1934年考入國立武漢大學，次年參加「一二九運動」，為武漢秘密學聯負責人。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在湖南、延安和中國東北從事青年和新聞工作。1945年後到東北，先後任高崗、陳雲的秘書。1949-52年任《新湖南報》主編、湖南省委宣傳部長。1952年調北京，主管水電。1958年任水利部副部長，毛澤東兼職秘書。1959年廬山會議被定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撤銷職務、開除黨籍、下放北大荒勞動。「文革」期間在秦城監獄單身監禁長達八年（1967-75）。1979年平反後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1982-84年由陳雲推薦，任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局長、常務副部長。中共十二、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離職後主管《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的編纂，長年呼籲民主憲政。

所謂馬日事變，緣起於國民革命軍第35軍軍長何鍵，因其和軍中不少要員都是大地主出身，對共產黨的土改恨之入骨，調動33團團長許克祥，於5月21日晚，發動「鏟共行動」，在長沙殺死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和革命群眾達百餘人。其後半個月在湖南各地共屠殺了萬餘人。說到自己發起馬日事變的動機，許克祥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一位叫張春生的農民對他講的話：

我與我的東家，相處幾十年，素來相安無事，如今農民協會的一班地痞流氓，橫行無忌，要我發動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餓死，未免太殘酷了！我不能做，中國固有道德，是講人道的，農人要吃飯，地主也應該使他有生路。我們做佃農的只要勤儉，將來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產黨這種流血的土地改革，我們農人是絕對不同意的。現在正是春耕時候，田間工作忙得很，偏要在這個時候，成立甚麼農民協會和赤衛隊，整天整晚叫我們農人去開會，不到會或到會稍遲一點的，就誣為反動派，要受處罰，甚至於挨打和罰跪，共產黨這種作法，實在大多數農民的內心厭惡極了！<sup>46</sup>

這段話真實與否有待考證，但是在農村裏面積極投身革命的大多不是老實巴交的農民。

.....  
賈植芳：中國主要是農業國家，北方人大部分都是農民。農民需要土地，共產黨在農村搞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

46 許克祥，《湖南馬日劇本回憶錄》，中央文物供應社，1956年。

地、財產分給農民，農民擁護它。但是農民分兩種，一種是本分農民，就是規規矩矩的，家裏有幾畝地種；一種是農村二流子，遊手好閒，當時參加革命的農民都是二流子。有土地的農民，家裏有兩間房子、有家庭，人家沒時間革命，農民很現實的。軍隊是流動的，本分農民不願意參加，二流子跟的上。你看魯迅〈阿Q正傳〉，辛亥革命，阿Q最積極。共產黨的隊伍基本上是農民，參加革命的大半是農村的二流子、流氓。

---

到了1927年夏天，前文提到的北大同學幾乎全都未能完成學業，就在混亂的時局中各奔東西。王凡西到武漢之後，因為撰文批評汪精衛而被國民政府拘留，稍後由共產黨安排轉入蘇聯的中山大學學習，從此踏上了通往共產黨反對派的道路。李芬和劉瑩一度被黨支部派往天津工作，後來李芬因父親去世回到家鄉湖南照顧弟弟，劉瑩則被派往不同的地方工作。王實味也因交不起學費再度退學，未能從北大畢業。1927年初，王實味到了南京；至於他在南京做甚麼，他的好友孟昭瓚和妻子劉瑩卻有兩種說法。劉瑩說他在國民黨黨部機關當了一名小職員，當值期間忍不住批評政府辦事人員的腐敗。任職三個月左右，有好心的同事見他言語鋒利，怕他出事，介紹他到山東泰安教書。一年合約結束時，因為他思想激進，學校最終不敢留他，他被解聘後就又回到了南京<sup>47</sup>。按照劉瑩的說法，如果學期開學是9月，那麼如果王實味在泰安教書一年，再回到南京，應該就是1928年夏天了。

---

47 劉瑩〈沉痛的訴說，無限的思念〉，145-6頁。

孟昭瓚則回憶王實味1927年剛剛到南京時，曾經考慮過轉入中央大學。因為沒有地方住，就與孟昭瓚和其同學、室友梁燮一同住在簡陋的民居中，三人共同生活、經濟上不分你我：

我和梁兄輪流擔任家教，王思禕寫稿賣稿費，當時我記得他的稿費收入，比我和梁兄兩個人的都多，這樣很快樂的過着大概有一年之久。中間我勸他準備考試，插入中大，繼續完成學業。他說他曾經考慮過，大學畢業也沒有多大用，徒浪費時間，倒不如致力於讀書寫作工作，自己可以看自己願意看的書，還可以寫自己所願意寫的文章。<sup>48</sup>

如果王實味真的和孟昭瓚在南京住過一年，而孟昭瓚又特別記得和王實味的分別是在「中秋夜話」之後幾個月，那麼這一年不太可能在1928年夏天之後，因為那之後約半年左右王實味已經移居上海了。如果劉瑩記憶準確，那麼王實味在南京的時間除了1927年初幾個月，就還有1928年夏天後的半年；如果孟昭瓚記憶準確，那麼王實味在泰安的時間則肯定沒有一年。

我們確切知道的是，1927年10至11月，王實味一年前寫的小說〈毀滅的精神〉終於在《現代評論》的第148-152期上發表。《現代評論》由胡適、陳西滢等人創刊於1924年12月的北京，前期由王世傑主編；1927年7月雜誌移至上海後，由丁西林主編。王凡西回憶說，當時不論《語絲》還是《現代評論》都沒有稿酬，所以生活拮据的投稿者寧可投到有稿酬的

48 孟昭瓚〈往事故人——悲劇人物王實味〉，74-5頁。



《晨報》，不過稿酬也十分少<sup>49</sup>。王實味明知《現代評論》沒有稿酬，卻仍然寫信到編輯部去索取稿酬。

---

宋金壽<sup>50</sup>：《現代評論》從來不給稿費，你發表文章，他們給你一本雜誌就完了。但王實味管他們要30塊稿費。30塊不少呢！當時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一個月8塊現洋；北大學生的伙食費大概一個月4塊錢。編輯部專門討論了一下，給不給？最後決定還是給他30塊，因為他的文字實在寫得太刺激了。

---

值得注意的是，王實味這段時間曾經與魯迅通信，很多學者都注意到1928年10月19日魯迅日記中這樣的記載：

晴。上午得語堂信。得張永成信。得史濟行、徐挽瀾、王實味信，午後復。復陳翔冰、雷鏡波信。寄茅塵信。寄淑卿《奔流》。寄紫佩、羨蒙《語絲》。寄還王實味小說稿。晚得吳祖藩信。

從這則日記中，可以看到，魯迅在王實味寄信的當天，就回了信；其小說稿是隨信寄的、還是之前寄的，無從得知，但是也是在這一天，魯迅寄回小說稿，並沒有在《語絲》或者其他

---

49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一個中國革命者的回顧和反思》增訂本（香港：士林圖書服務社，1994年），29頁。

50 宋金壽（1935-），北京科技大學教授，黨史研究專家。1980年前後，在幫助整理延安老幹部李維漢的材料時，最早接觸到王實味的材料，他把這些材料分享給戴晴、黃昌勇等研究者，並且為王實味恢復名譽做出重要貢獻和努力。

新華書店北京總店  
 電話二八四號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廿二日



# 絲語

第十四期 第四卷

#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我們所要的一個善後會議

國會問題

清算條件的法律性質

怎樣用呢？

這回連面子都不顧了！

十一月初三小號

批評與罵人

在北大第二院的一回音樂會

民衆的戲劇

胡適行嚴先生關於斯達案之談話

(七) (總) (略)

周鯉生

高一涵

王世杰

吳稚暉

徐志摩

鄒建夫

西林

曹光榮

西澹

現代評論

每星期六日出版  
 第一卷 第二期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發行所

北京德內門外西便門外  
 定報處

北京國立京大學第一院現代評論社  
 通訂處  
 北京國立京大學第一院現代評論社

本報每份定價五分，每月一元  
 半年六元，全年十二元  
 廣告費另議

三、本報每份定價五分，每月一元  
 半年六元，全年十二元  
 廣告費另議



上：《現代評論》封面、《語絲》雜誌；下：蜀群木刻作品〈禮教吃人〉，表現了魯迅作品對封建傳統的強烈抨擊。

雜誌上幫他發表。倪墨炎曾經猜想，王實味給魯迅寄小說稿，可能是受了其北大學弟張天翼的影響<sup>51</sup>，因為張天翼一度 and 魯迅通信，而且後來還和魯迅一起在左翼作家聯盟工作。但是魯迅日記中，1929年3月9日才第一次收到張天翼的信，所以這個猜想並不成立<sup>52</sup>。不過這一兩年間，王實味與北大學弟張天翼的確交往頻密。兩人都給魯迅寫過信、投過稿，試圖接近魯迅。結果王實味的小說稿被魯迅寄還，張天翼的小說後來卻在魯迅、郁達夫合編的《奔流》上發表。

根據劉瑩的回憶，1928年底王實味曾在南京同學曹孟君家小住時，她見到了王實味。劉瑩在北大時期雖說和王實味同一個支部，但她對王實味的了解僅僅來自李芬，因為李芬曾把不能接受王實味追求的煩惱向劉瑩傾訴過。經過同學曹孟君的撮合，劉瑩與王實味才有了第一次深入的談話。她告訴王實味，1928年李芬已經被殺害。劉瑩回憶自己敘述李芬去世經過時，那強烈的畫面讓王實味多年之後仍然無法釋懷。

1927年冬，李芬因父親病危而回到家中，到家時老人已去世三天。她母親早已過世，於是只好帶着8歲的弟弟到民生小學教書，她以教師身份為掩護，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努力為黨工作。由於叛徒的出賣，有一天敵軍警包圍了學校抓她，幸好這時她出去聯繫工作去了。得訊後便逃到姑母家。後來被她二伯父及堂兄以姑母家不安全為由，騙到二伯父家。他們先是勸她自首，她堅決不從，於是她的二伯父及堂兄將她

51 倪墨炎〈王實味到延安前的文學活動〉，152頁。

52 黃昌勇《王實味傳》，47頁。

捆送敵人縣政府。敵人嚴刑拷打她，她始終未露出黨的半點秘密。就義前李芬把自己的三套衣褲都穿在身上，每套衣服與褲子都密密地縫在一起，以免受到敵人的侮辱。就義時視死如歸，高呼「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萬歲！」<sup>53</sup>

劉瑩記得王實味聽到李芬的犧牲，「目光驟然變了，好像有一團火在燃燒。」王實味「一方面痛失一位心中十分崇拜的好同志，另一方面又切齒憤恨國民黨的殘暴，恨不得親自去跟他們拼。恨不得馬上找到黨組織，為烈士報仇。」<sup>54</sup>

林賢治：從對李芬的態度，可以看到王實味人性深處的東西。他最先在同一個支部，認識李芬，追求她。他愛了人，有可能纏住她，那種追求的專注性，跟革命者追求革命的徹底性，恐怕有一致的地方。王實味聽到李芬去世的消息，他就決定入黨，這讓我感到他內心的那種純淨。革命這個東西，除了一個人的理念之外，跟這個人的情感、生命結合在一塊。他覺得一個如此純淨、如此美好的人，獻身於一個美好的事業，然後犧牲了；他就希望以自己的生命延續李芬的生命，而且放在一個組織裏面。這一點是非常感動我的地方。

53 劉瑩〈沉痛的訴說，無限的思念〉，142頁。劉瑩回憶與劉讓平等編寫的〈李芬〉之中的表述有很多差異，〈李芬〉中說李芬是1927年冬避難回家時，驚遇父親過世三天，參加了葬禮。當時李芬23歲，她的弟弟應該是10歲。對於李芬被家人綁送到邵陽警備司令部、在獄中經拷打也未洩密，以及犧牲前把三套衣服縫在一起這些基本事實，劉瑩的記憶和〈李芬〉一文並沒有太大出入。

54 劉瑩〈沉痛的訴說，無限的思念〉，146頁。

王實味的兒子王旭楓<sup>55</sup>回憶劉瑩和王實味的形象，讓他們在我心目中都更加清晰起來。王旭楓認為，他父母的結合，與兩人心中懷着對李芬的真摯感情分不開。

---

王旭楓：我覺得我父親和母親更多的是同仇敵愾，李芬的死對他們來說，可以說是撕心裂肺，但正是因為對李芬共同的熱愛，才拉近了他們的距離；另外再加上他們的同學曹孟君給我母親說，實味這個人如何如何好，他們兩個才走到一起的。

---

我們知道1929年1月，王實味在《創造月刊》上發表了〈陳老四的故事〉。倪墨炎認為這篇小說從文字到立意都非常好，選取的人物陳老四是一個仇視富人的小木匠鋪老闆。因為大木匠鋪不屑於做最便宜的白皮棺材，而亂世中死人很多，陳老四靠做白皮棺材，生意一路向好。小說既是寫實，又有多重諷刺的意味。他甚至反觀王實味當時的狀態，覺得他寄稿子給魯迅，但也寄稿子給與魯迅論戰的創造社、新月社的刊物，可謂亂世之中的立足之道<sup>56</sup>。其實後來的情況也證明，王實的定位是獨立知識分子和作家。

55 2010年5月，筆者經過很多周折，終於找到了王實味的兒子王旭楓，並立刻到武漢去訪問他。2016年5月，再次訪問時，他正在和學生們編輯他父母110周年紀念文集。

56 倪墨炎〈王實味去延安前的文學活動〉，152頁。

第二章  
海上賣文生涯



20年代的上海文壇十分繁榮與自由。五四運動之後，新文學團體不斷成立，而每個團體各自創辦的期刊，也成為不同派別文學的發祥地。除了前文提到由北京遷到上海的《語絲》和《現代評論》所代表的魯迅和現代評論派，在上海成立的文學社團中最为著名的還有創造社、新月社、太陽社等。「創造社」於1920年由留日學生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張資平、田漢等人所組成，他們回國後，於1922年5月開始刊行《創造季刊》，後又刊行《創造週報》，積極創作和推動新文學，郭沫若和郁達夫<sup>1</sup>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新月社」則是在1923年由胡適、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等人創建的。1926年初徐志摩在《晨報》副刊上創辦了「詩鐫」、「劇刊」等版面，10月辭職後，於1927年在上海和友人成立了新月書店，1928年3月又和羅隆基、胡適、梁實秋等創立了《新月》月刊。1927年才成立的「太陽社」，由錢杏邨（阿英）、蔣光慈、楊邨人發起，主要作者包括杜國庠、夏衍、婁適夷、殷夫等人，1928年1月開始出版《太陽月刊》，因其政治傾向性較強，7月就被政府停刊。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新月社」同人，「創造社」和「太陽社」主要成員都是左翼作家，後來都漸漸歸從於中國共產黨領導。

1 郁達夫（1896-1945），生於浙江富陽，在杭府中學與徐志摩為同班摯友。因參加學潮被之江大學預科開除，1913年隨兄長赴日本留學。1921年首部短篇小說集《沉淪》出版，刻畫了主人公因孤獨、性壓抑及對中國的矛盾情結，人物心理結構複雜，內容香豔豪放，轟動當時中國文壇。抗戰初曾擔任《福建民報》副刊主編。1938年攜眷至武漢，任政治部設計委員、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常務理事，曾赴徐州勞軍，在各前線參訪。同年底攜眷前往南洋宣傳抗戰。1940年創建新加坡南洋學會。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組織「星洲華僑義勇軍」抗日。新加坡失守後，避難至蘇門塔臘，但日軍已發現其身份。1945年日本投降後不久，神秘失蹤、遇害。

# 創造月刊

第一卷 第一期



上海創造社出版部發行

# 太陽月刊

一月號



上海春野書店

1928



上：《創造月刊》封面、《太陽月刊》封面；下：魯迅(右五)和青年木刻家們。



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後，大批共產黨員被剿殺，共產黨勢力受挫，一切活動轉入地下。當時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瞿秋白<sup>2</sup>，已經意識到隱蔽的鬥爭——也就是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性，於是在文藝界開始積極爭取有影響力的左翼作家，而這個作家群中的佼佼者，正是當時在青年人心目中威信極高的魯迅。兒童文學作家梅志<sup>3</sup>，當時還是個女學生，她對魯迅的認識很具代表性。

梅志：當時的環境非常惡劣，白色恐怖很厲害，國民黨的反動、賣國青年人受不了。魯迅的每篇文章都有所指，青年人也非常關注。很多人都說，參加革命就因為看了魯迅的書。在那樣艱苦的情況下，甚麼都可以丟掉，魯迅的書還是要保存，「青年的精神領袖」，可以這麼說！同時也就可以看出為甚麼國民黨這麼害怕魯迅——這一點是我們今天沒法想像的。我們那個時代，只要有魯迅的東西出來，國民黨就暗地裏起了哄了，到處都要注意了，有些青年不小心拿着書，被抓到巡捕房的事情都是有的。但這樣就更顯出魯迅的號召力。他的書出了，雜誌上有他的文章，我都感興趣，都到書攤上去買的。

2. 瞿秋白（1899-1935），生於江蘇常州，散文作家，文學評論家。他曾兩度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27年7月-1928年7月；1930年9月-1931年1月），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在上海工作期間，與魯迅相互欣賞，是最早看到「雜文」重要性的文人之一。1935年在福建長汀被南京國民政府逮捕並槍決。
3. 梅志（1914-2004），兒童文學作家，青年時代是魯迅的忠實讀者和追隨者。1934年她在左聯工作期間，結識胡風，後與胡風先生結婚，從此開始了她充滿動盪的生活。筆者2003年夏天在北京第一次拜訪梅志先生，2004年夏天，梅志最後一次住進了協和醫院，留下了她最後的影像。

梅志第一次見到魯迅先生，是在一個木刻展上，她記得自己一直跟着先生的步子，卻沒有上前說話。1933年，魯迅在《魯迅自選集》自序中說，

我作小說，是開手於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的。這一種運動，現在固然已經成為文學史上的陳述了，但在那時，卻無疑地是一個革命的運動。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是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sup>4</sup>

這些小說除了抨擊封建社會，也開創了白話小說的風氣和「革命文學」的原型。

鄧騰克<sup>5</sup>：魯迅是現代中國文學研究者公認的偉大作家。在30年代，他比較集中開始寫一種叫做「雜文」的諷刺性散文，通常都比較短，但他寫出了上千篇。他的很多雜文都是批評國民黨政府濫用權力、造成社會不公。這些雜文讓魯迅獲得了更大的影響力。

1929年2月，劉瑩被組織派到上海，在同德產科學校沒有找到聯繫人，卻偶然認識了南洋醫大的一位女生，並從此在南

4 魯迅「序言」，見《魯迅自選集》（上海：天馬書店，1933年），1頁。

5 鄧騰克（Kirk Denton, 1955-），加拿大漢學家，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長期主編《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學術期刊。他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專家，是最早出版關於胡風專著的西方學者。

洋醫大過組織生活<sup>6</sup>。3月，王實味就來到上海，一方面因為上海已經取代北京，成為新文化、新文學的中心地帶，移居上海有助於他繼續創作、賣文為生；另一方面，他應該是希望與劉瑩繼續交往。王實味到上海之後，雖然想好了要再次入黨，但還是希望先掙一筆錢給生活困難的父親養老，然後再徹底獻身革命。除了賣文，王實味也沒有別的經濟來源。10月，他又在《新月》上發表了小說〈小長兒與罐頭荔枝〉。這篇小說，仍舊是承襲他之前關注下層人民的內容，這篇小說結構和造詣也得到了倪墨炎的盛讚，認為其人物生動、兒童的視點寫的尤其好，開放式的結局也很有創意<sup>7</sup>。

---

黃昌勇：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新月派的，這是和左翼對立的一個文學流派，或者說是政治流派，魯迅和新月派有過很多論爭。但我發現還有一批人介於這兩者之間，王實味就是一個代表。他1929年到上海，作為一個從事翻譯、搞文學的人，政治上沒有很明顯的區分。在文學界，他和兩邊都有締交，但也應該說他是獨立的。

---

由於小說的稿酬有限，王實味同時開始了文學翻譯工作。1929年10月7日，他在《珊拿的邪教徒》的譯者序中寫道：

6 劉瑩〈沉痛的訴說，無限的思念〉，146-7頁。

7 倪墨炎〈王實味去延安前的文學活動〉，153頁。

是兩個月以前的事了吧，為了要想法子弄飯吃，譯者開始譯這本書。所根據的是Modern Library（現代圖書館）的英譯本。像許多譯書的人一樣，我所會的外國文也是只有英文一獨門，但為了要吃飯，卻又不能不譯書——因為此外找不出吃飯的法子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這段文字解釋了王實味翻譯工作的最初動機，但是兩個月能翻譯完這樣一部長篇小說，也是十分辛勞的。如果說在「譯者序」的第一段，他寫了自己的境遇，第二段則話鋒一轉。

譯者所以譯這本書……也因為自己很喜歡它；喜歡它描寫的入微和想像的豐富，尤其喜歡篇中那種蓬勃的人性之熱與力。不幸的是，在已經譯了十分之八九的時候，有一個朋友告我說，這書在三年前已經郭沫若先生根據德文原本譯過了，書是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名是《異端》。我當時很懊喪，因為覺得郭先生是譯者界的名人，他的譯本又是從德文原本譯出，自己此刻根據英譯本翻譯的東西，怕無論如何是趕不上他的……誰知看過郭譯本以後，倒鼓起我不少勇氣來，於是毅然譯完，此刻並要拿它出版了。<sup>8</sup>

接着他就引用了三段英文，指出了郭沫若<sup>9</sup>在短短幾段文字中出現的三個比較嚴重的翻譯錯誤。在這段文字中看得出王實味

8 以上兩段引自王實味「譯者序」，見霍布門著《珊拿的邪教徒》，（上海：中華書局，1930），1頁。

9 郭沫若（1892-1978），中國新詩的奠基人之一、中國歷史劇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國唯物史觀史學的先鋒、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和社會活動家，甲骨學四堂之一，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認真、執着的性格，以及他完全不「世故」的一面。王實味雖未留過洋，英文水準卻頗高。《珊拿的邪教徒》收入徐志摩編輯的「新文藝叢書」，1930年4月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如前文提到，王實味的小說《休息》也在這套叢書中出版，而這套叢書的另外幾種創作還包括丁玲的短篇小說集《一個女人》和徐志摩本人的小說散文合集《輪盤》等名家作品<sup>10</sup>，可見徐志摩對於王實味這部作品的重視。第二年，徐志摩遭遇空難去世，這套叢書就沒有繼續出版。

此時王實味還不知道，他的北大同學之中，老大哥陳清晨和好友王凡西都已經在上海了。陳清晨之子陳道同回憶，父親當時「不得不拋下學業，帶着母親，抱着剛出生的我，躲進北京西部山區。1928年他南下上海，開始了另一樣的生活。」王凡西1927至1929年在蘇聯學習時，正值斯大林清洗聯共黨內的托洛斯基分子，而這兩人都一度是列寧的接班人人選，當時托洛斯基不論從威望、政績、到理論水平都相當不俗，對野心勃勃的斯大林構成極大挑戰。王凡西留蘇期間，認真閱讀斯大林為首的中央派和托洛斯基為首的反對派的材料，特別為托洛斯基對於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預言所信服，加入了托派。當時中國留蘇學生加入托派者不在少數，400人中有一半是托派，其中包括蔣介石的長子蔣經國<sup>11</sup>。王凡西1929年春天回國後，在周恩來手下任上海組織部幹事，和惲代英等人一起做工人工作。他隱瞞了自己在蘇聯的托派關係，認為並不影響革命。

10 賈植芳《中國現代文學總目錄》，175和420頁。

11 班國瑞《中國托派基本文獻》中提到，蔣經國極其不滿蔣介石殺共產黨，在蘇聯期間還發表了公開聲明。

此時，被罷黜後苦悶、寂寞、無所作為的陳獨秀，在反思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時，對過去的同志們提出了很多疑問。後來通過從蘇聯留學歸來、拜會過托洛斯基的劉仁靜<sup>12</sup>，陳獨秀看到一些托派的文章，才明白中共冠以自己「機會主義」的罪名是為了洗刷斯大林代表的共產國際在指揮中國革命中所犯的錯誤。在組織部例會上，陳獨秀等人對於中國大革命失敗原因的疑問，也由組織部的武扶經、恽代英反映出來，周恩來只回答說中央常委正在考慮。不久後，陳獨秀被開除黨籍。一個月後，也就是12月10日，陳獨秀發表了〈告全黨同志書〉，第一次公開了中共和共產國際、國民黨在國共合作問題上的許多矛盾，既承擔了自己的責任，也號召大家做自我批評：

列寧在聯共第十次大會上曾經說過，「黨內有了根本不同的政治意見，而又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解決，小組織才是正當的」。他當年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派運動，就建築在這個理論之上的。現在我們黨的危機也不容許在黨內有別的方法

12 劉仁靜（1902-87），湖北應城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之一，著名托洛斯基主義者。1918年7月入北京大學物理系預科，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轉入北大哲學系，並加入少年中國學會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他是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之一，1921年作為北京代表出席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最年輕的與會代表。同年12月，和鄧中夏創辦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的機關刊物《先驅》。1922年9月，隨陳獨秀赴蘇俄出席在彼得格勒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並代表中共發言，此後留在當地參觀學習，1923年4月回國。1926年秋，前往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三年後學習期滿，離開蘇聯，前往土耳其見托洛斯基。回國後，即被中共開除黨籍。1930年1月1日，劉仁靜創建了托派組織「十月社」。1931年5月，十月社併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由陳獨秀領導。劉後來被趕出了托派組織，1935年被國民黨逮捕，1937年出獄。1948年發表反共文章〈評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50年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1951年在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翻譯了《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等著作。在文革期間被捕，1966-78年間被關押。1986年底，任人民出版社特約翻譯、國務院參事。



左上：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於1929年轉向托派；右上：參加過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的劉仁靜也在留蘇時轉向托派；下：王凡西（左一）和陳清晨（右一）在上海參加托派小組的活動。

(即黨內合法的公開爭辯) 來解決了。我們每個黨員都負有拯救黨的責任，應該回復到布爾什維克精神與政治路線，一致強固的團結起來，毫不隱諱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領導的國際反對派即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之下，堅決的，不可調和的，不中途妥協的和國際的及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者奮鬥到底。不但反對斯大林的及類似斯大林的機會主義，並且要反對季諾維也夫等的妥協態度，不怕所謂「軼出黨的範圍」，不惜犧牲一切，以拯救黨拯救中國革命。<sup>13</sup>

由於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並且是最早的總書記，他本人這樣公開宣佈轉向托派，在黨內引起極大震動。王凡西記得，周恩來起初以輕蔑的態度，「嘴角帶着微笑」說：「好吧，就讓老機會主義向托派去找出路吧！」王凡西分析，如果陳獨秀承認他的「錯誤」，配合斯大林並幫助共產國際掩飾他們的錯誤，他還是有機會繼續作領導，但受傷的陳獨秀仍舊是「雄獅」，他拒絕作替罪羊，緊跟着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這是一份有81位老黨員簽名的集體文件，簽名者中包括陳清晨。陳獨秀的這兩個文件，在共產黨內引起極大的震動，以他當時在黨內外的威望，很多黨員「很苦悶地猶豫着，決不定該跟『老頭子』走好？還是跟『新中央』走好？」<sup>14</sup>。王凡西因為目睹蘇聯共產黨的分裂與鬥爭，在大小會議中都基本保持沉默，得以安然地在上海組織部工作到1930年初春。

13 引自《馬克思主義文庫》網絡版，因為〈告全黨同志書〉一文於多種現代史資料書刊都有引用，但不同版本互有出入，所引版本以1930年4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的查獲件（上報蔣介石的手抄本）為主，參閱其他版本校訂而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henduxiu/marxist.org-chinese-chen-19291210.htm>

14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157-8頁。



在王凡西因病住院期間，莫斯科的托派中國留學生，因為一個叫趙言輕的留蘇黨員自首，而全體在宿舍被捕。令斯大林震驚的是，留蘇中國學生中，托派人數居然佔了一半。在東大搜捕完畢的第二天，空空的宿舍讓趙言輕感到無限淒涼，他懸樑自盡。二百多個中國托派學生中，只有10人因徹底改變而被送回中國，兩人成功從西伯利亞偷越國境，其餘的人全部下落不明。王凡西回憶說，就在這時候，

周恩來發現名單中有我的名字，找我談了一次話。他的態度很友善，大意說：他滿意我幾個月來的工作，所以希望我為了自己的「革命前途」，作一書面聲明，放棄托派意見，在《紅旗》上登載；這樣，他可以保證我依舊留在黨內工作。我沒有說甚麼話，就只答應寫聲明。

王凡西的聲明當然很令組織失望，因為他既要「保留自己的異見」，又「願意繼續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路線下為革命服務」，這當然是不可能的<sup>15</sup>。

從學生時代就開始做職業革命家的王凡西，就此結束了和中國共產黨五年多的工作關係，因為生病，加上妻子快要分娩，也只好賣文為生。他翻譯了列寧的老師普列漢諾夫的《從唯心論到唯物論》，居然賣到120元，相當於為黨工作時五個月的生活費。這本書後來由一位托派書店老闆出版，王實味看到後，就請書店轉交了一封信給王凡西。王凡西回憶：

15 同上，167頁。

得信當晚我就去看他。他住在靠近華界的、法租界菜市路的一條小弄堂裏。弄堂很髒，房子很舊，他那個亭子間尤其破敗淒隘。四壁空空，一燈如豆，充分顯出房主人的淒涼光景。我意外地發現他已有愛人，而這位愛人非他，正是李芬的好友，我們北大黨支部裏的另一位女同志劉瑩。他們讓我坐在一隻破舊衣箱上，開始了三個老同學一夕談。大動亂中三年離別後的重敘，真有「相對如夢寐」的滋味。<sup>16</sup>

此幾個月前，也就是1930年1月，王實味和劉瑩結為夫妻。當時他還沒有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或開始尋找黨組織，但聽說了黨內出現了兩種路線，急於瞭解實情。王凡西詳細地給他講了革命中的兩條路線以及兩個派別各自對局勢的估計，但他沒有向王實味公開自己的托派身份以及自己被開除出黨的事。除了「急於想弄清楚黨內分成二派的政治歧見」，王實味當時還急於解決「瀕臨絕境的生活」<sup>17</sup>。王實味對王凡西說，正在聯繫一家大書店，希望能給徐志摩主編的一套叢書做翻譯。但即便是與徐志摩這樣的名人交往，王實味也絕不容忍自己不被尊重。王凡西在1951年寫的一篇短文中回憶說，

王實味與徐志摩原不相識，不知是誰介紹，又彷彿是他自薦的。總之，他跟徐志摩約好了會面的日子。到了日期，他準時來到了徐志摩的家，也記不得為甚麼，徐志摩竟爽了約。第二天，王實味再去拜訪，這回卻早了一點，他不知道徐志

16 王凡西〈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81頁。

17 劉瑩回憶王實味是在街上遇到王凡西的（見劉瑩〈沉痛的訴說，無限的思念〉，146-7頁），但這個說法無法證實。關於這個時期的回憶，劉瑩應該是聽王實味轉述，而王凡西回憶的細節是憑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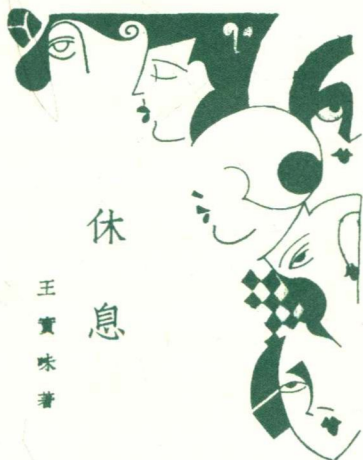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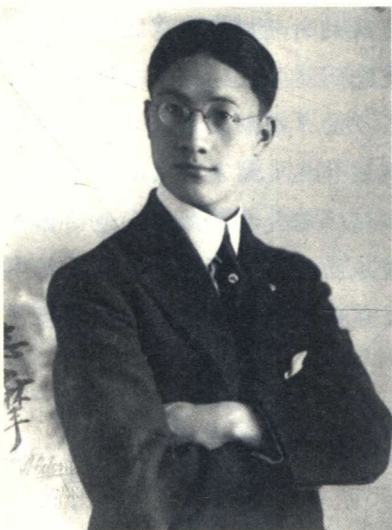
摩起身晏。一進門，娘姨對他說：「大少爺還不曾起身」，請他稍等一下。王實味無名火起三千丈，掉頭就走，回得家來，結結實實地寫了一封信，將這位「大少爺」罵了一個狗血噴頭。徐志摩接讀來信，自知理虧，當即摸到王實味的地方去，着實道了歉。最後總算講好了，請王實味「幫忙」，翻譯哈代的《土人還鄉》。

不過這時候，王實味窮到「連買書的本錢都沒有」；當時王凡西雖然也過着「家無隔宿糧」的日子，他終究還是憑着比較多的社會關係，想辦法幫王實味買了哈代的原著<sup>18</sup>。

王凡西和王實味的交往大約有一年時間，見面的次數不多。王實味雖然同意托派的很多政治主張，但是懷疑反對派另起爐灶能否成事，因此希望大家始終留在共產黨內，「即便被開除也不要另立門戶」，可見他對於時局的看法還是相當準確。王凡西還記得王實味後來不斷受到批判的「人性論」：

我們每見必談，每談必爭的一個問題是他後來因之出名的「人性論」。他深深相信：不論一般的政治也好，或特殊的革命政治也好，人性都起着很大作用。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太強調客觀，太看重物質，以為改變了客觀的物質條件，人性就能夠變好。他認為未必。依他之見，改變人性這項工作是獨立的，如果說它不比改變社會的物質環境更重要，至少

18 王凡西本人在讀北大期間，與教授中的徐志摩因同鄉關係，比較接近，但後來並無連繫。此處王實味與徐志摩的交往，王凡西是聽王實味本人說的，但他未必知道此前王實味與徐志摩的通信。王凡西這段回憶最初寫於1951年，後來他自己在1985年的文章中，又援引了他1951年的文字。見〈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81頁。



休息

王實味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左上：徐志摩發表、出版了王實味多部作品；右上：王實味的《休息》作為徐志摩主編的「新文藝叢書」中的一種在1930年出版；下：王實味通過翻譯托洛斯基的自傳，了解到托洛斯基的歷史，圖為1919年時的列寧和托洛斯基（中間戴圓眼睛敬禮者）。

是同樣重要，要同時進行。王實味這套理論，往往伴以大量感慨和牢騷。革命失敗了，得勝的新朝權貴們露出來的「人性」竟比北洋老軍閥的更醜更惡，這使他悲憤；而更使他痛心疾首的，則因他眼見為數不少的「老朋友們」，一見氣候轉變，立即改轅易轍，甚至認賊作父，賣友求榮。每當他談到這些「軟骨頭的無恥之徒」時，總是要情緒激動地問你：「如果這次革命不是失敗而是成功，這些傢夥不也成了新政權裏的領袖或幹部了嗎？有了這些官兒，革命政府即使有最好制度，還能不變質墮落嗎？」<sup>19</sup>

王實味的這一番說辭，孟昭瓚也有類似記載，說明他對這一套理論是堅信不疑的<sup>20</sup>。王實味當年擔憂好的體制會被不好的人性腐化，在今天看來，還真是有預見性！當時著名的「先知」們——托洛斯基、陳獨秀，甚至是魯迅，都只能抨擊時局中的混亂、醜惡，卻不能看清未來中國的方向，更加無法扭轉歷史的齒輪。

由於王實味常提到生計困難，王凡西在約集友人一起翻譯托洛斯基的《自傳》時，也請王實味翻譯了〈紐約〉與〈集中營內〉兩章。托洛斯基的自傳一共有45章，即使在不看上下文的情況下，王實味在翻譯這兩章時，至少會瞭解到兩件事可能讓他同情托洛斯基：一，這位革命家對自己在紐約的緊張活動，對孩子們在搬遷中需要不斷地學習新語言，都有過動人描述；二，托洛斯基被關在德國集中營時，英國大使館曾對彼

19 王凡西〈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81-82頁。

20 孟昭瓚〈往事故人——悲劇人物王實味〉，76頁。

得格勒誣告他，說他「領取德國大使館的津貼，準備回來推翻臨時政府」。對此，列寧曾在1917年4月6日的《真理報》上為他辯駁：「托洛斯基在1905年曾擔任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主席，幾十年來無私地獻身於革命的一位革命家，我們能夠相信，哪怕是一瞬間相信他會同德國資助的計畫有聯繫的消息嗎？須知這是對一個革命家的公然的、聞所未聞的惡毒誹謗！」這次翻譯，可能讓王實味較為深刻地瞭解了托洛斯基，不過這也將成為王實味之後在延安被批判的主要罪行之一。

---

黃昌勇：嚴格意義上的托派組織王實味肯定沒有參加，因為劉瑩也好、他也好，在北京都是黨員，中共和托派當時勢如水火的關係他們是知道的，不會冒這個風險。30年代在上海，王實味是把自己作為一個自由文人來定位的，靠寫作、靠翻譯來生存。除了托派，他當時還跟很多其他文學派別的人都有聯繫，比如他跟胡適和徐志摩有聯繫，跟胡風和馮雪峰也有聯繫。

---

當時中國反對派的內部，也分化成幾個不斷論爭的群體。王凡西證實，王實味既沒有參加他本人所屬的「十月派」，也沒有參加陳清晨所屬的「無產者」社<sup>21</sup>或者其他的托派小團體。

這裏我們要簡述一下魯迅方面的情況。1929年5月，一位叫艾格涅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 1892-1950）的美

21 王凡西〈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82頁。

國女作家來到上海。她出生於美國一個貧窮的家庭，母親在她16歲時，因為辛勞、病痛、營養不良去世，此後父親就拿出母親一個破手提皮箱中所餘的錢去喝「悼亡酒解愁」。姐姐生子後死去，她成了這一家的「大孩子」，承擔起撫養小外甥和弟弟們的責任。但不久後，母親的命運讓她感到的怨恨，使她離家開始過打雜工和流浪的生活，同時她想盡辦法讓自己能夠受教育<sup>22</sup>。史沫特萊20歲到紐約之後，認識了從印度流亡到紐約的一些革命者，從此深信只有推翻英國統治，印度才能獲得獨立。但是1918年，因為這些人際關係，史沫特萊因觸犯「美國中立法」而第一次坐監六個月，這才讓她有了一段穩定的、不愁吃穿的日子，可以閱讀和寫作。一戰開始後，她獲特赦出獄，發現17歲的小弟弟已經被送到一戰的歐洲戰場上去當炮灰，而大弟弟則因做工時發生意外而喪命<sup>23</sup>。

1919年，她以清潔工身份隨「美國一波蘭」號前往歐洲，不久後開始和印度社會活動家維雲德拉納什喬托巴底亞亞同居，幫助他在柏林為印度裔勞工爭取權益。維雲比她年長近20歲，雖然人品極好，但在歐洲根本沒有辦法實現政治抱負，於是史沫特萊繼續過着窮困潦倒的生活，幾次頻臨精神崩潰，自殺未遂。她見證了一戰和二戰期間德國人困苦的生活，以及希特勒在德國人氣的上升。史沫特萊於1928年結束和維雲的感情，並於同年經過蘇聯來到中國。她從東北入境，感到自己進入了「中世紀」，當時整個東北已經在少帥張學良的絕對控制之下。1929年她來到哈爾濱時，剛好目睹東北「易幟」、

22 史沫特萊《史沫特萊文集》第一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5），5頁。

23 同上，7-8頁。

升起國民黨旗。接着她從瀋陽到大連，經過天津、北京等地，一路接觸了各式各樣、各個階層的人物，其中有官員、學生、學者、工人等等。她與中國留學歐洲的如胡適、徐志摩這樣的人物，有過近距離的接觸，並通過中國社會學之父陳翰笙的作品，對中國農民和工人的處境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她還曾經跟隨新西蘭人路易埃黎（Rewi Alley, 1897-1987）去探訪過外國人在中國設立的工廠，親身去瞭解勞工情況。

當史沫特萊在上海這個擁有 340 萬人口的城市安頓下來時，上海還處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之中，她接觸到的進步青年人中，所讀的關於中國大革命的書，封面和前面幾章不是「福音」就是「論語」。那時候她已經以記者的身份工作，對於自己周圍的環境和自己的言行變得謹慎，並且開始建立自己的人際網絡和消息來源。她注意到「國民黨官方發表殲滅紅軍的數字達 50 萬，」而且「共匪殘部」始終在「追殲中」；「紅軍總司令朱德、共產黨總書記毛澤東多次報導已被擊斃，一個月後又懸賞通緝他們。」<sup>24</sup> 史沫特萊的早年生活以及對貧苦階層的深深同情，讓她堅定地選擇支持中國共產黨，因為中國有百分之八十是農民，而「中國共產黨是當時唯一給了農民希望的政黨」。

1929 年底，史沫特萊第一次見到了魯迅，兩人通過德語進行了良好的交談，並從此成為朋友。在史沫特萊的眼中，魯迅就是當時中國的輿論領袖，是中國的「伏爾泰」，而不是當時

24 同上，68 頁。





左上：寫成名作《大地的女兒》時的史沫特萊；右上：史沫特萊在魯迅50歲生日時為魯迅拍攝的照片；下：1933年，英國戲劇家蕭伯納（後左一）來滬時，與史沫特萊（前左一）、宋慶齡（後左二）、蔡元培（前中）、林語堂（後右一）、魯迅（前右一）合影。

很多人說的「中國的高爾基」<sup>25</sup>。有一段時間，史沫特萊和魯迅、茅盾<sup>26</sup>過往從密，「共同收集出版了一本德國民間藝人凱綏珂勒惠支夫人版畫集」，「一起為歐美新聞界寫稿，對中國知識分子遭受的政治迫害發出抨擊的呼聲。」三個人會在一家餐館用餐後談幾個小時，三個人誰也不是共產黨員，「然而我們三人無不認為幫助和支持為解放窮困大眾而戰鬥、而犧牲的人們是無上光榮的事。」<sup>27</sup>1930年初，史沫特萊幫助魯迅和年輕的共產黨員馮雪峰<sup>28</sup>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魯迅傳》的作者朱正<sup>29</sup>解說了為甚麼從來以獨立的面貌屹立於中國文壇的魯迅，會成為共產黨領導下的左聯的名義主席。

25 同上，73頁。

26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鴻，字雁冰，浙江嘉興桐鄉人，作家及文學評論家。茅盾於1928年發表首部小說《蝕》（《幻滅》、《動搖》、《追求》三部曲）。著名的作品有代表作《子夜》、《農村三部曲》（《春蠶》、《秋收》、《殘冬》）、《林家鋪子》，除此之外，茅盾亦著有《西洋文學通論》。

27 同上，77頁。

28 馮雪峰（1903-76），浙江義烏人，詩人、文藝評論家。1927年李大釗遇害之後入黨，遭到通緝，避難北大時與王凡西有交往。1929年到上海，漸與魯迅相熟，1930年為共產黨牽線請魯迅主持左聯。在黨和魯迅發生矛盾時，常常和胡風站在魯迅一邊，是魯迅晚年最信任的弟子之一。參加過長征，坐過國民黨監獄。1949年後，歷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等職，組織了魯迅著作的整理出版。1954年因未積極參加《紅樓夢》批判，被解除《文藝報》主編職務，次年因「胡風事件」遭到批判。1956年馮雪峰主持編注新版《魯迅全集》。1957年被劃為右派、次年被開除黨籍，直到1961年才被摘去右派帽子。文革開始後，又就被打成「叛徒」，1969-71年間下放五七幹校勞動，回京後開始校訂《魯迅日記》。1976年因肺癌去世，1979年平反。

29 朱正（1931-），《魯迅傳》的作者朱正，在50年代就和馮雪峰有書信往來。1957年被劃為右派，後來寫出《反右鬥爭始末》，再增補為《反右鬥爭全史》。他的著作史料翔實豐富，考證認真細緻。朋友出書講史，他經常能夠寫出幾大頁的勘誤表。我們曾經兩次訪問他，請他分享對魯迅其人、胡風事件、反右事件的看法。

---

朱正：魯迅是中國 21 世紀最重要的作家，影響了整整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文學家。就是因為他有這麼高的地位，共產黨才看上他。20 年代黨內的年輕文化人，像太陽社的錢杏邨、創造社的成仿吾和郭沫若，在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時候把魯迅作為主要的攻擊對象，說他是「封建餘孽」、「雙重反革命」，是「法西斯弟子」，猛烈地攻擊他。那為甚麼後來停止攻擊了，而且讓他來作左聯領袖呢？是當時共產黨的領導人李立三停止了創造社、太陽社對魯迅的攻擊，因為他看到魯迅一直以來那種反抗現存勢力、要求變更的態度，覺得可以把魯迅收為共產黨所用，而且尊他為左翼作家的領袖。

---

1930 年 3 月左聯成立大會上，魯迅作了題為〈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講話，第一次提出了文藝要為「工農大眾」服務的方向，並且指出左翼文藝家一定要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事實上，創造社和太陽社在 1929 年都受到國民黨的破壞而瓦解了，此時兩社的成員基本全部轉入左聯。

---

林賢治：第一，左聯當時來說還是文學團體，不是政治團體。當然它的政治傾向跟魯迅的政治目標是一致的。第二，之前郭沫若他們這幫人跟魯迅展開過論爭，後來共產黨做工作了，希望他們團結魯迅，把魯迅作為一個統戰對象來看。魯迅也不是甚麼聖人，既然你妥協了，而且重新確定了一個目標的話，那他也就原諒了，畢竟他們是青年；但魯迅對這些人是非常清楚的，他認為他們還是不

行。我覺得魯迅身上有一種救國思想在作祟：於改革中國社會有利，他願意為你所用。這裏面還有一個東西就是，一個人對抗一個政府，畢竟還是單弱的。即使魯迅非常強大，我覺得在意識和潛意識裏，他仍舊希望把個人的力量通過一個組織來放大。

---

馮雪峰後來回憶魯迅時，說他願意「帶領着一批年輕的戰士在衝鋒陷陣，」是因為他們「還比較底純潔，相當勇猛，很有些所謂乳犢不畏虎的氣概。」但這些年輕黨員缺乏理論修養和實踐經驗，工作並不那麼容易。

一向不加入任何文學或政治社團的魯迅，突然和曾經激烈論爭過的左翼作家如郭沫若、田漢<sup>30</sup>等人聯盟，在文壇引起了不小的波動，令其他文學、政治團體也對此產生了猜疑。原本屬於創造社、但並非最為核心的成員的詩人王獨清<sup>31</sup>，1930年獨自轉向托派，其後他遭到「過去共事的朋友和變節的後輩」聯合討伐，但他仍堅持要「努力無產階級文學」，並「極力克服自我，極力去獲得無產階級的意識」，稱「只要我不死，

30 田漢（1898-1968），湖南長沙人，是中國話劇作家、戲曲作家、電影劇本作家、小說家、詩人，也是創造社主要成員之一、歌詞作家、文藝批評家、社會活動家、文藝工作領導者、中國現代戲劇的奠基人。為聶耳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填詞。

31 王獨清（1898-1940）陝西蒲城人，16歲開始寫筆記式雜文和政論文章，後被《泰鏡日報》聘為總編輯。1915年離家到上海，後東渡日本留學，兩年後返滬任《救國日報》編輯。1920-25年赴法國留學，研究和考察歐洲古典建築藝術。1926年去廣州，加入創造社，曾主編《創造月刊》，成為該社後期主要詩人之一，著有詩集《聖母像前》、《埃及人》、《威尼市》等。1929年9月任上海藝術大學教務長，1930年主編《開展》月刊。1937年回到故鄉，1940年病逝。

我一定總還是走在鬥爭的路上」<sup>32</sup>。他成立了展開社，在《展開》雜誌1930年5月之後發行的創刊號上發表了兩篇文章攻擊左聯：一篇是余慕陶的〈請看新唐吉珂德的狂舞〉<sup>33</sup>，其中指出，就在兩年前，創造社的李初梨還在《文化批判》上發表文章，把魯迅比作和風車作戰的唐吉珂德，現在魯迅和創造社員們「聯盟」起來，這很可質疑；另一篇是凌豐的〈「左翼作家聯盟」做的是甚麼事情？〉，文中他則逐條挑戰左聯的綱領和目標，並作了這樣結尾：

末了，左翼作家們與魯迅、田漢、蔣光慈的撮合結果可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好像一個處女被登徒子強姦了，她還告訴這位登徒子說：「謝謝先生！你不但把我的性欲問題解決了，並且還教會了我向來所不曾學過的解決性欲的方法」！<sup>34</sup>

巧合的是，就在余慕陶和凌豐對左聯的成立出言不遜的同一期《展開》雜誌上，王實味也發表了兩篇作品：一篇是中篇小說〈三代〉，另一篇是他翻譯的〈列寧遺囑〉。由於《展開》雜誌在國內沒有再次發表過，所以王實味雖有「在托派雜誌上發表文章」的罪名，今天的讀者卻未能見到這些文章的原貌<sup>35</sup>。

32 王獨清〈我文學生活的回顧〉，見《王獨清自選集》（上海：樂華圖書公司，1933年），3-5頁。

33 余慕陶的〈請看新唐吉珂德的狂舞〉，見《展開》（1930創刊號），5-23頁。

34 凌豐〈「左翼作家聯盟」做的是甚麼事情？〉，見《展開》（1930創刊號），76頁。

35 我在2010年訪問住在京都的日本漢學家竹內實（1923-2013）先生時，竹內先生把他三十年中國文學的研究筆記送給我，其中就有發表了王實味的小說和譯文的《展開》雜誌的複印件，王實味小說〈三代〉和〈列寧遺囑〉譯文全文見本書附錄。

〈三代〉從一個父親的角度，追述其長子夫婦、次子接連為革命犧牲，妻子也因悲痛過度而去世，留在他身邊的小女兒似乎也不快樂。小說最後用三兒子被處死前的信作結：

最後，我告訴父親：妹妹雖然較我小好幾歲，但她底思想也早已受了XXXX的洗禮，為了心性較柔，為了不忍背離父親，她還在你底身畔。不過，長久下去，悶苦悲哀和憤恨也許會使她斷喪而死，如果父親是愛她的話，你應當伴着她去做澈底毀滅這現社會的工作！去做重新建立新人類社會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工作！

這封信是我一整天中屢輟屢續，忍着創疼寫成的，想說的話還多，但也無力寫下去了。永訣了，我最親愛的父親！<sup>36</sup>

這篇小說的立意和王實味本人對革命的追求與對父親的親情都十分一致，小說本身也沒有甚麼「派別」，文中「XXXX」是進步青年都能夠猜得出的「馬列主義」。然而，敢於在1930年國民黨的嚴密監視下發表這樣的小說，不論是作者還是編輯都是需要一些膽識的。

也是在這期《展開》中，王實味還用「蒼滄」的筆名從英文轉譯了〈列寧遺囑〉。在翻譯這樣一篇短短的文獻時，王實味也忍不住在譯文中加入了自己的按語<sup>37</sup>，相當激烈地評論斯大林對托洛斯基的壓制：

36 王實味〈三代〉，見《展開》（1930創刊號），105-6頁。

37 按語也叫「編者按」，是報刊上常用的一種長短不拘、自由靈活的評論形式，也稱「按語」，後簡稱為「按」。是編者對編發文章的提示、說明、補充、批註、評價等。



其實一個革命者一生決不能不做錯誤，我們不能拿一個人底過去來衡量現在，說他做過錯誤便永遠不會正確。只有黨的官僚為鞏固自己的統治，不把反對派綱領公佈給全體黨員公開討論，隨便加以誣讒，說它是所謂托洛斯基主義，說他是「反黨」，——堅持自己的錯誤並用殘暴的手段壓迫反對派，才是真正的無恥！<sup>38</sup>

關於這篇英文版〈列寧遺囑〉的來歷，翻譯了很多托洛斯基作品的施用勤先生給我們做了解說。

施用勤：王實味翻譯的英文版〈列寧遺囑〉，在《先知三部曲》裏有交代。當時，反對派領導人之一的拉科夫斯基，在法國見了一個美國記者叫伊斯特曼<sup>39</sup>，把列寧遺囑的原件交給他。伊斯特曼就在外國報刊上發表了〈列寧遺囑〉。有人說列寧遺囑是托洛斯基寫的，有人說是斯大林他們擬定的稿，他簽的字。但我覺得托洛斯基不會簽字，肯定是列寧自己寫的。遺囑發表以後，因為當時反對派在黨內鬥爭中處在非常不利的地位，斯大林就以把他們開除出黨來威脅，托洛斯基被迫寫了一份材料說伊斯特曼的〈列寧遺囑〉是造謠。

38 蒼滄（王實味）譯〈列寧遺囑〉，見《展開》（1930創刊號），封底頁。

39 麥克斯·伊斯特曼（Max F. Eastman, 1883-1969）美國文學、哲學、社會學作家，詩人以及社會積極活動分子。1911年加入美國一個社會主義政黨。1912年起任《群眾》雜誌編輯，1918年任《解放者》雜誌編輯。他於1921年加入美國工人黨（共產黨），此後來到了俄國，於1922年秋成為共產國際代表，在商業領域頗有成就。



據王凡西推測，可能是陳清晨介紹王實味認識了《展開》的編輯王獨清。而後來王實味在延安的多次交代中，的確沒有提到王凡西、陳清晨和王獨清以外的托派關係。

在這期《展開》雜誌的廣告頁中，我們還看到一則支那書店出版、王實味作的小說《三個落伍兵》的廣告，「實價大洋四角」：

這裏包含了六個短篇：第一篇是寫一僱農因階級的毒恨與性的壓迫，托殺了他的僱主和僱主的姨太太——誘惑他而且愛他的女人。第二篇寫一木匠的階級自覺地力量，巧妙地插進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生活背景。第三篇是寫無產階級意識與小資產階級感情的矛盾。第四篇寫三年前首都發生的一件事實，戰鬥意識及鮮明。第五篇寫一無產階級的孩子的心與其表現力。末篇是寫軍閥蹂躪下的農村。

這個集子的內容是異於一般所謂普羅文學的東西的。牠的所以異的地方不在於作者的鮮明的階級意識與漂亮而生動的文章，乃在於牠的取材與煽動性的有力描寫。牠是真正革命的東西。<sup>40</sup>

根據這則廣告的描述，我猜想，第二篇有可能是〈陳老四的故事〉，而第五篇有可能是〈小長兒和荔枝罐頭〉，而末篇可能是〈毀滅的精神〉。所以這個集子裏至少還有三篇我們不能讀到的創作，包括一篇叫〈三個落伍兵〉的小說，可見王實味的小說創作到了這個時間點上，已經可以出《休息》以後的第二

40 王實味《三個落伍兵》廣告，見《展開》（1930創刊號），8頁。

個集子了。而〈三代〉則是此後更新的一篇小說，也是我們目前能夠讀到的王實味的最後一篇小說。

1931年1月，王實味、劉瑩夫婦曾一度為了解決生計，而離開上海，遠赴東北教書。

1930年3月成立的左聯，從一成立就引起國民黨的注意，經歷了很多挫折，其中最令魯迅痛心的就是1931年2月所謂「左聯五烈士」在上海龍華被國民黨特務秘密殺害的事件。這五個人當中，有魯迅相熟的殷夫和柔石，也有和他只有一面之緣的馮鏗，和剛被選去參加蘇維埃代表大會的胡也頻，以及編輯過《中國青年》等雜誌的李偉森。兩年後魯迅寫了〈為了忘卻的紀念〉：

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紀念，而在這30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sup>41</sup>

胡也頻的死，激勵了他的妻子丁玲開始加入共產黨的工作。丁玲1904年出生，初登文壇的四篇小說都在葉聖陶主編的《小說月報》上以刊首位置發表，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記〉更令她成

41 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本篇最初發表於1933年4月1日《現代》第二卷第六期。見《南腔北調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1頁。

Five Young Writers Butchered by the Kuomintang, February 7, 1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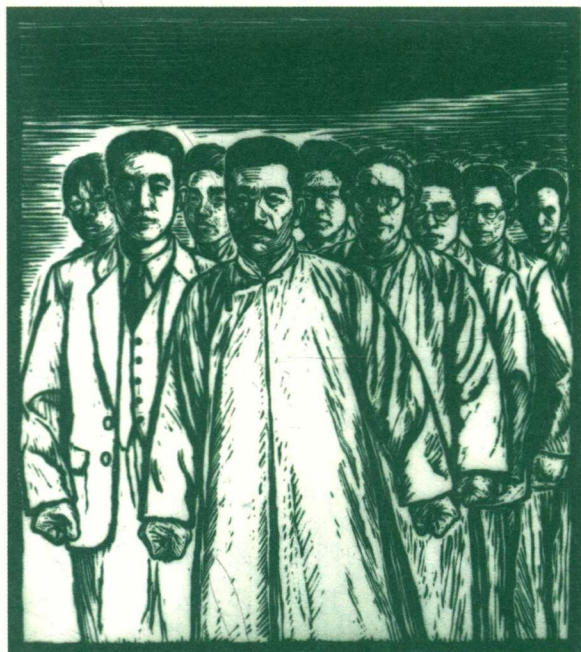


LI SU-KUNG (1907-31)    HU YEH-PIN (1904-31)    ZOU SHIH (1901-31)    LI WEI-SEN (1903-31)    YIN FU (1909-31)  
 In Lunghai, over the mass graves in which more than 10,000 of our revolutionary dead have been buried since 1927, we will one day  
 hold a monument of commemoration. We will carve the names of our hero dead in stone to last 10,000 years. (Left Wing Writers League)

...ing is circulating the way literature, both books  
 and magazines. It is proposed to open a "nationalist"  
 ... where the tastes of youth shall be "ignited"  
 ... the great what is good for them." It is an  
 ... large sums of money to publish "nationalist"  
 ... magazines, and these magazines continue to exist,  
 ... that keeps their reading public down  
 ... In the columns of this is brought in Yunker  
 ... to give statements and representative of the

...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examples of Kuo-min-  
 ... "exchange" was executed in the town of China on  
 April 3, 1931. A "Cultural Development Society" was  
 formed, with Chiang Kai-shek as president, and Chang  
 Hsueh-liang, the northern dictator and monarch ad-  
 ... as vice-president. On the disconcert were tea  
 ... a foreign woman lawyer and associate of  
 the professors of Shanghai, Mrs. Chang Hsueh-liang  
 the monarch's widow and mistress wife of Chang Hsueh-

... students avoided one of these spies, and this was a  
 ... of methods employed by the Kuomintang. It is  
 ... a man named Kwan, was a student from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receiving \$200 a month from the  
 Peking branch Kuomintang. Kwan accompanied the  
 students to Nanking where later student investigation  
 proved that Chen Kuei, the Kuomintang lieutenant  
 of Chang Hsueh-liang, gave him an additional \$200 to  
 ... other students. The only other last Kwan was



上：1931年2月7日，左翼青年作家馮鏗、胡也頻、柔石、李偉森、殷夫被害，史沫特萊在英文報紙上登出消息；下：陳煙橋木刻作品《魯迅和他的戰友們》，其中人物形象都以真人為依據，包括他身後的「左聯五烈士」。

為五四後小資產階級新女性中的代表人物。丁玲在胡也頻犧牲後，經左聯共產黨人馮雪峰和潘漢年建議，以一位不太「紅」的青年女作家的公眾形象，主編左聯的機關雜誌《北斗》，並開始和魯迅接觸。

在此前後，瞿秋白也加入了左聯，給了魯迅很大的幫助和精神上的鼓舞。這位早期共產黨領導人除了具有卓越的翻譯才能，在反對「第三種人」、「自由人」、「民族主義」等論戰中，也顯示出超凡的論戰能力。和當時的很多共產黨人不同，瞿秋白自己曾經這樣表述：

雖然人家看見我參加過幾次大的辯論，有時候彷彿很激烈，其實我是很怕爭論的。我向來覺得對方說的話「也對」，「也有幾分理由」，「站在對方的觀點上他當然是對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畢竟做了「調和派」的領袖。假使我激烈的辯論，那麼，不是認為「既然站在布林塞維克的隊伍裏就不應當調和」，因此勉強着自己，就是沒有拋開「體面」立刻承認錯誤的勇氣，或者是對方的話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發」。<sup>42</sup>

當很多文壇中人為後期的魯迅放棄了小說創作而可惜，諷刺他已經變成了「雜感專家」。瞿秋白卻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論述了魯迅雜文的價值。

42 瞿秋白《多餘的話》，見《餓鄉紀程》（長沙：嶽麓書社，2000年），337頁。

誰要是想一想這將近 20 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這種文體發生的原因。急遽的劇烈的社會鬥爭，使作家不能夠從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溶鑄到創作裏去，表現在具體的形象和典型裏；同時，殘酷的強暴的壓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採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幫助他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於社會的觀察，他的熱烈的對於民眾鬥爭的同情。不但這樣，這裏反映着「五四」以來中國的思想鬥爭的歷史。雜感這種文體，將要因為魯迅而變成文藝性的論文的代名詞。自然，這不能夠代替創作，然而它的特點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應社會上的日常事變。<sup>43</sup>

馮雪峰回憶，當時魯迅就對瞿秋白的理解十分感激，現在看來瞿秋白當時對雜文這種新興文體的預言也十分正確。

與此同時，陳獨秀之轉向帶來的餘波未平，江西蘇區內正在進行「肅AB團」<sup>44</sup>運動，也即共產黨內的自我清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的作者高華認為，「肅AB團」前後歷經兩個階段，而第一階段，也就是1930年春至1931年1月，正好是「陳獨秀轉向托派和被開除黨籍之後的第二年」。高華

43 何凝（瞿秋白筆名）編選《魯迅雜感錄》（上海：青光書局，1933年），2頁。

44 據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件始末》（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一書對AB團由來的描述，AB團最早是蔣介石、陳果夫於1926年底在北伐軍總部駐地南昌策劃成立的一個反共的國民黨右派組織。取名「AB團」，為英文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之意。「AB團」成立後，在蔣介石的慫恿和段錫朋等人的操縱下，篡奪了國民黨江西省的黨政大權，排擠了共產黨人和革命「左」派，肆無忌憚地在江西各地幹了許多反革命勾當。但在中共江西省委和南昌黨組織領導下的1927年的「四一二暴動」中（也就是「四一二政變」之前），「AB團」被一舉摧毀、解體，「壽命僅三個月」。「AB團」分子也作鳥獸散，銷聲匿跡了。



中國文壇最負盛譽之女作家丁玲女士，於五月十四日突告失蹤，或傳被捕遇害，粉疑不一。  
Miss Ting Ling, noted Chinese woman writer, whose whereabouts have been unknown since May 14 and whose exact fate still remains to be told.

## 新 事 將

大美晚報云、中國共產黨學前進女作家丁玲女士、最近忽告失蹤、中國評壇接下期、將有長文發表、據該報云、五月十四日、丁女士與潘梓年君、同在公共租界該便衣隊架去、(略)據中國評壇報云、前丁女士之友、以丁女士之地址報告他人、謂住于崑山路、故五月十四日派人至其住所、至則見丁與潘梓年君同讀一稿、于是二人同時被捕、架上汽車、疾馳而去、內仍有人看守、未幾

、又有一年青著作家、名訪、女士、(譯音)即折回、而偵者已尾隨、乃逃上三才樓、偵者將門圍閉、遂被執、後事如何、不得而知、(略)翌日報上有關於紀載、謂崑山路出一神跡慘死案、并謂屍身上有共產黨文件標出、自丁潘二人失蹤後、各方極力偵查、今距出事已逾二星期而已、等語、

### 外報記載

## 女作家丁玲被捕

### 潘梓年亦同時失蹤 各方現正極力偵查

左上：在上海與魯迅交往的共產黨領導人瞿秋白；右上：20年代業已成名的女作家丁玲；下：1935年丁玲被國民黨政府逮捕的時候，上海的英文報紙率先發出消息，此處中文報紙稱消息來源是「外報記載」。

注意到，對於陳獨秀的處理，「當時中央雖已愈益強調思想統一，但黨內仍然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時期民主傳統的痕跡」。也就是說，「不同意見仍然可在黨內爭論，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則擁有最終裁判權，未聞有將持不同意見的黨內同志予以肉體消滅的事例。而到了1930年，毛卻將『打倒機會主義領導』的概念與肉體消滅結合起來」。<sup>45</sup>

將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轉變成一個對敵鬥爭的概念，中間需要過渡和轉換，毛澤東輕而易舉就找到了這個仲介環節。他宣佈，黨內機會主義領導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分子，從而將對敵鬥爭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消滅地富反革命，與黨內鬥爭的概念「打倒機會主義領導」順利地銜接起來，一舉獲得了鎮壓的正當性，所謂「鎮壓有據，消滅有理」。1930年春，在蘇區內已流傳國民黨AB團進行滲透破壞、其組織已被陸續破獲的消息，根據地的對敵警惕氣氛空前高漲，在這樣的形勢下，毛完全可以用「鎮壓反革命」來要求紅軍和根據地的黨組織、蘇維埃政權全力支持和服從鎮壓「AB團」的政策。<sup>46</sup>

AB就是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也就是反蘇聯、反共產黨的意思。國民黨中有AB團，共產黨打AB團就理所當然。因為這個事件發生較早，只有老共產黨員才知道這件事，後來若干年這件事即便在黨內也並不廣為人知。

45 「打倒機會主義領導」的概念出現在1927年八七會議前後，當時也只是宣佈改變陳獨秀的路線，並中止其在中央的領導職務。

46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13-14頁。

李銳：國共第一次合作，讓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後來蔣介石搞清黨，段錫朋<sup>47</sup>和幾個人在江西搞了一個AB團，目的就是趕走國民黨裏的共產黨人，搞了幾個月。後來共產黨人在蘇區內部搞肅反，從打AB團開始，一直到陝北，審高崗<sup>48</sup>、劉志丹<sup>49</sup>，打「社會民主黨」、「改組派」等等，各種各樣的肅反，自己殺了自己人多少？我編《中共組織史資料》時統計了，殺了10萬。賀龍<sup>50</sup>就講過，湘西洪湖

- 47 段錫朋（1896-1948），江西永新人。1916年入讀北京大學政法學科，1918年創辦《國民》雜誌，1919年五四運動時當選中國學生聯合會首任主席，後出國在幾個歐美國大學遊學。1930年起任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次長、南京國立中央大學代理校長、中央訓練團教育委員會主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於1927年1月發起成立AB團，其目的是打擊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黨員。
- 48 高崗（1905-54），原名高崇德，陝西橫山人。1922年因參加進步活動被小學開除，1927年1月入西安中山軍事學校學習，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至1931年，在國民黨西北地方部隊中秘密發動武裝起義，為陝甘紅軍、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1935年10月在陝北紅軍十五軍團肅反時被捕，後釋放。1949年10月之後，任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11月至1954年4月任黨委書記，1952年11月至1954年8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之後，被指控和饒漱石進行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後來自殺。
- 49 劉志丹（1903-36），陝西保安人，中國工農紅軍高級將領，西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人之一。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入黃埔軍官學校。「九一八」事變後，組織了西北反帝同盟軍，任副總指揮及參謀長，後反帝同盟軍改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支隊，任總指揮。1934年5月任中共陝甘邊軍事委員會主席，後兼任軍政幹部學校校長。在肅反中被逮捕，不久獲釋。此後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後方辦事處副主任、紅軍北路軍總指揮兼第28軍軍長、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警備司令等職。1936年在戰鬥中犧牲。
- 50 賀龍（1896-1969），湖南省桑植縣人。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14年參加中華革命黨，曾任討袁護國軍指揮、湘西護國軍營長、靖國軍團長等。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第一師師長、第20軍軍長。1927年8月1日，他擔任南昌起義總指揮，此後回到湘西，組建紅二軍團，任軍團長，並開闢洪湖蘇區。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0師師長、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參加百團大戰。



蘇區，毛澤東第一師範時候的同學夏曦<sup>51</sup>當政時，洪湖蘇區殺到最後只剩下四個黨員。謝覺哉<sup>52</sup>回憶錄裏面說，他當時是被國民黨俘虜了，不然也被殺掉了。當時把這些人抓起來之後，用刑很厲害！肅反這種事情，從江西開始，比斯大林更早、更厲害。

這件事情，人脈廣泛的魯迅先生也有耳聞，還詢問過革命隊伍裏有那麼多反革命怎麼辦？不過後來事情的發展他未能跟進<sup>53</sup>。和魯迅從1929年交往的史沫特萊，1934年的《紅軍在前進》一書就已經由紐約先鋒新聞出版。書中描寫了從1928至1931年間，中華蘇維埃在江西的情況，裏面還寫到紅軍內部自相殘殺的反AB團事件。她的主要資訊來源是從江西逃往上海，在她的隱蔽下受到保護的兩位紅軍指揮官<sup>54</sup>。

51 夏曦（1901-36），湖南益陽人。1920年10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參加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受到列寧接見。1922至1923年，任湖南學聯幹事部主任，主編《湖南學生聯合會週刊》。次年任中共湘區委員會委員，出席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7年，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後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後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32年，任湘鄂西蘇區中央局書記，兼任肅反委員會書記，在此任上，以抓所謂改組派、托派、AB團、第三黨、取消派為名，殺害了大批紅軍將士。

52 謝覺哉（1884-1971），湖南寧鄉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時期被選為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常委、工人部部長，主編《湖南民報》；後在上海負責編輯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和《上海報》。1931年深秋任湘鄂西蘇維埃政府機關報《工農日報》主編。1933年進入中央蘇區，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秘書。1933年，在中央蘇區起草了中國紅色革命政權最早的《勞動法》、《土地法》等法令和條例。1939年2月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1945年11月，負責起草《憲法草案大綱》。1949年後，曾任內務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等職。

53 日本慶應大學的長堀祐造教授曾經撰文寫過魯迅與AB團、魯迅與托派等文章。

54 見Ruth Price的*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年），243頁；或者Janice R.和Stephen R. MacKinnon著*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157頁。

托派統一大會是在1931年5月1日召開的，由陳獨秀致開會詞，王凡西回憶那次大會結束了一年多以來，中國托派中幾個小派別對峙的局面。在統一大會召開後不到一個月內，因為叛徒出賣，除了陳獨秀外，正式中委便無一倖免地被國民黨逮捕，被逮捕的有王凡西、鄭超麟夫婦、樓國華等人。王凡西此次入獄後，就再也沒有見過王實味。此後不久，因劉瑩懷孕，王實味夫婦於1931年7月又從東北回到上海，這次劉瑩也沒有主動接上黨的關係。

---

王旭楓：我母親說自己脫黨，是因為在當時黨經常組織的飛行集會<sup>55</sup>上，她看到劉尊一等三個女孩當場被捕，無一例外先被強姦、然後被警官特務霸佔，就算被強迫，最後結果還是變節。這件事我母親不知道給朋友們說了多少遍。她說犧牲了沒關係，流血都有思想準備。但唯獨作為女人，被國民黨警官特務強姦，她覺得最不能接受。我母親還說，「你爸說現在黨中央的這些領導，根本不配當領導！甚麼示威遊行？分明是擺好隊伍讓敵人抓！」他跟我母親說，「你不要去，你去不是革命，而是犯錯誤，是幫敵人忙。把自己同志這麼送到敵人的屠刀下，太冷血了！」我父親這個說辭，不是說一遍就拉倒，而是總在那吹風。

---

55 飛行集會指提前約好時間地點，大家突然集合、發傳單、喊口號，然後迅速散去的示威方式。

王實味夫婦返滬兩個月後，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開始大舉進犯東北。當時的東北軍副司令張學良曾發表中、英文演說，表明了他抗日的決心。但後來他因不滿南京政府只給他抗敵的命令，而沒有派出任何救援部隊，張學良的部隊沒有誓死抵抗。半年之內，日本的關東軍就佔領了東北三省。

李銳：「九一八」是1931年，我上初中三年級。那時日本首相叫田中，給天皇有個奏摺，內容就是怎樣佔領中國、滅亡中國。我父親原來在東京早稻田大學留學，和宋教仁、黃興都是同學，他跟母親講，日本一定要滅亡中國的。為甚麼呢？他講日本的小學教科書上，怎麼宣傳中國呢？橘子很好吃，日本沒有，在哪裏啊？在中國。我在中學讀到〈田中奏摺〉，受到的震動很大，愛國主義的思想一下就很厲害了。

事實上，早在1929年，南京的《時事月報》上就發表了日本首相田中給天皇的奏摺，上面寫着：「如果要征服世界，我們必須首先征服中國。為了征服中國我們首先要佔領滿洲和蒙古。如果我們成功地佔領了中國，亞洲和南海諸國就會向我們投降。然後整個世界就會知道東方屬於我們。」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國民黨軍隊北調，共產黨趁此機會於1931年11月7日，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是在斯大林領導的蘇共支持下，中國大陸建立的臨時割據政權，首都設在江西瑞金。此時已經距陳獨秀被開除出黨兩年了。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以毛澤東等63人的中央執行委員，作為本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閉會後的最高政權機關；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立人民委員會，處理日常政務，發佈一切法令和決議案，毛澤東兼任人民委員會主席。1931年12月1日，毛澤東、項英、張國燾聯名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佈告〉，也開始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長達45年的領導地位：「從現在起，中國疆域內有不同的兩國，一個是中華民國，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另一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剝削與壓迫下廣大工農兵的國家。」

同年11月在上海，王實味和劉瑩的女兒出生，為了紀念亡友李芬，取名「念芬」，後來才改名「勁楓」。當時夫婦倆又是一貧如洗，陳清晨傾其所有，到當舖裏換得20塊銀元，全數送給了他們。

---

王旭楓：陳清晨和我父親沒有血緣關係，只有朋友情、同志情。他能那麼做，我父母內心深處是非常感動的。他們從不脫口，對陳清晨在感情上那種深厚，是任何政治力量都無法改變的。我父親對他的態度，我是從我母親講故事中間知道的，是把他當作兄長來尊敬。

陳道同：王實味對我父親感情很深。1931年淞滬抗戰前後，我們兩家關係很好。王實味和劉瑩當年在上海結婚是租房子住，他們在上海生活了沒兩年，走的時候大部分家具都送給我父親了。當時我父親有間單人房，裏面有床、桌子。我們很窮，小孩都睡在一張沒有前後擋板的床上，

就是床蹬鋪上床鋪。王實味送的家具裏有張大鐵床，大概一米寬、兩米長，一條條鐵皮蹦着的，比較新式。還有個寫字枱很漂亮的！藤條編的、墨綠色，中間一共五個抽屜。開始我父親搬到亭子間裏自己用的，一直到抗戰父親搬回來住才帶回來。還有一個可以折疊的小圓桌、有個小鐵床，我都記得很清楚。這些東西在我們家用了幾十年，寫字枱我父親、我、我兒子都用過，用到90年代。

---

1932年春天，王實味和劉瑩托陳清晨介紹王實味加入左聯。陳清晨說：「我不能辦這件事了，我已不做黨的工作。」劉瑩回憶，這個回答讓他們懷疑陳清晨的政治面貌，並且通過搬家而有意地切斷了與陳的交往。<sup>56</sup>

---

王旭楓：我父親在「誰正確誰不正確」，該走哪一步，他理性多一些，所以他各方面都多聽：他不拒絕和黨員交往，也不拒絕和托派分子交往。他最初和陳清晨碰面時，還猜想陳清晨可能是在上海擔任更重要的工作了。我估計他跟陳清晨提出了自己的疑問，陳清晨應該也會很坦然地告訴他。他知道了以後，回家也未必直接跟我母親講。後來我母親跟父親商量避開陳清晨，他們的辦法，就是突然搬到朋友家裏去，這個朋友是當時住在南京的童文煥。她們從小同學，童文煥的愛人在南京大學天文系當主任。他們到了南京之後，這個事情就基本解決了。

---

56 劉瑩〈沉痛的訴說，無限的思念〉，152頁。

劉瑩回憶當時他們已經和陳清晨、王凡西斷絕了來往，但是王凡西卻記得1932年在獄中時，王實味曾經探望過他。

1931年5月我被國民黨拘捕，最後割斷了我與他之間的來往。1932年春天，我已被判刑而囚禁在上海漕河涇的監獄裏，一天下午，獄吏把一包食物和兩本書交給我，說是有人來探監，沒有允許接見，留下了這些東西給我。兩本書都是英文的，一本便是我給王實味購買的《還鄉記》，另一本是法國福樓拜的名著《薩蘭波》。從書，我猜出了前來探監的人。他那時已經將書翻譯完畢，特意送來給老朋友在獄中消愁解悶。<sup>57</sup>

前文提到，王實味翻譯《還鄉記》時，是王凡西幫他買了《還鄉記》的原文書，可見兩位老同學友情深厚。但是劉瑩與王凡西並不熟悉。

---

王旭楓：因為我母親和王凡西，從北大時期一直到後來，也不十分很接近。關於王凡西的一切她都是聽我父親說的，知道這個人和我父親有一段交往。在上海那個時期呢，還幫王凡西翻譯了資料。後來在她的申訴、在她的文章裏，我母親談的也就是這些。

---

在上海期間，王實味翻譯成果頗豐富，完成的長篇作品包括《珊拿的邪教徒》、《薩芙》、《資產家》、《奇異的插曲》，

57 王凡西〈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82頁。



徒教邪的拿珊

著門布靈  
譯味實王



集全學文界世

家 產 資

著經華斯爾高  
譯味實王

行印局書華中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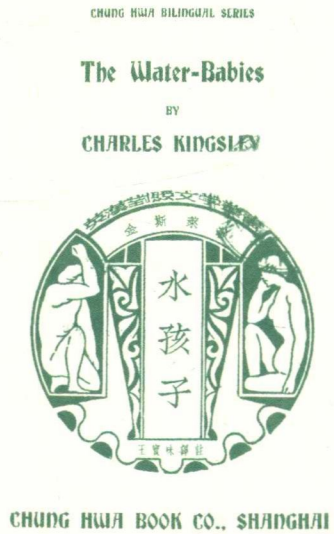


集全學文界世

曲 插 的 異 奇

著爾尼奧  
譯味實王

行印局書華中海上



CHUNG HWA BILINGUAL SERIES

The Water-Babies

BY

CHARLES KINGSLEY

CHUNG HWA BOOK CO., SHANGHAI

王實味翻譯作品書影

還譯註中英對照簡寫版的《水孩子》等書，根據倪墨炎的統計，翻譯了近百萬字<sup>58</sup>。這些翻譯著作從1930年起到1937年，陸陸續續出版。當時王實味帶上已經收到的稿費，加上夫婦倆在東北教書攢下的錢，終於帶着450塊銀元回到河南老家，給父親奉送了贍養費。

1932年冬回到上海後，王實味去中華書局交譯稿並準備續簽合同時，發現前一篇譯稿中有一小段文字被改動了。他因此和人激烈爭執，最後合約也沒有續成。性急的王實味為此大口地吐血，一家人的生活也再次陷入絕境。1933年初他曾經為了生活，替當時在上海兼課的女作家丁玲批改作文本，最終還是因體力不支而放棄了。後來劉瑩的父親出錢讓王實味到杭州療養<sup>59</sup>。在杭州療養的王實味曾經把一張自己站在一個花園中的照片寄回家，照片背後寫着：「楓兒兩周歲生日，爸爸時養病痾西湖。明年杜鵑花開時，當與吾瑩及楓兒相聚於西子湖畔也」<sup>60</sup>。這張照片，是現存王實味唯一的影像，它保留了王實味27歲時的模樣。

1931年史沫特萊初遇女作家丁玲，不久後，丁玲就被史沫特萊的翻譯馮達追求，兩人的戀愛讓史沫特萊有種不祥的預感。果然在1933年5月14日，丁玲因第二任丈夫馮達的出賣，被國民黨特務綁架到了南京。17日，上海的英文報紙《大美晚

58 倪墨炎〈王實味去延安前的文學活動〉，158頁。

59 劉瑩〈沉痛的訴說，無限的思念〉，154-6頁。

60 王勁楓〈我的爸爸王實味〉，見溫濟澤編《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年），165頁。





王實味唯一留存於世的照片拍攝於1933年，時年27歲。

報》首先發表了〈丁玲女士失蹤〉的消息，後來的幾個月裏不斷地有報刊追蹤丁玲的下落。有一段時間，盛傳丁玲已死，魯迅還做了一首小詩《悼丁君》記念她：「如盤夜氣壓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瑤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丁玲先前在左聯中任黨團書記，她被捕後，由周揚接任。1908年出生的周揚又名周起應，也曾經在日本留學，當時還主編《文學月報》，在發表魯迅、茅盾等左翼作家作品的同時，也將蘇聯文學理論介紹到了中國。



第三章

紅星照耀延安



1933年6月，王實味的北大老同學胡風從日本回到上海，經過周揚的安排，成為左聯的宣傳部部長，也從此開始了和周揚幾十年的恩恩怨怨。有一天，周揚帶着魯迅，來到胡風寄居的虹口區施高塔路四達里的友人家裏，從此胡風開始了與魯迅的親密交往。胡風與魯迅的關係，筆者會在《胡風：詩人理想與政治風暴》一卷中詳細記述。

---

**林賢治：**胡風當宣傳部長期間，跟魯迅在左聯內部往來得比較密切一點。有甚麼事都大概跟魯迅通報一下。周揚中斷了這種聯繫，他發行左聯的內部刊物，向魯迅要了捐款，還放出一些空氣，說魯迅沒寫東西、甚至懶啊。魯迅在書信裏面說周揚這種人，「一言帥」，把一個文學團體衙門化。在當時來說，魯迅是不能接受這種東西的。周揚自己深居簡出、高高在上，指揮小嘍囉幫他幹這幹那，魯迅就看不慣他這套。

---

1934年10月，胡風和妻子梅志的長子曉谷出生了。這時候蕭軍和蕭紅也從東北淪陷區來到上海。蕭軍原名劉鴻霖，1907年生於東北，早年於張學良下屬的講武堂習武，後成為「東北作家群」的代表人物。蕭紅原名張乃瑩，1911年生於黑龍江省呼蘭，也是東北作家群的代表人物，1933年與蕭軍自費出版作品合集《跋涉》。為了給這對青年作家介紹一些上海朋友，魯迅專門發了邀請，藉着給胡風兒子曉谷慶祝滿月為由，請他們吃飯。最後胡風夫婦因為沒有收到信而缺席了，但是蕭

軍和蕭紅卻永遠記得這個美好的夜晚。魯迅的兒子，1929年出生的周海嬰，清晰地記得與這一對戀人作家的第一次見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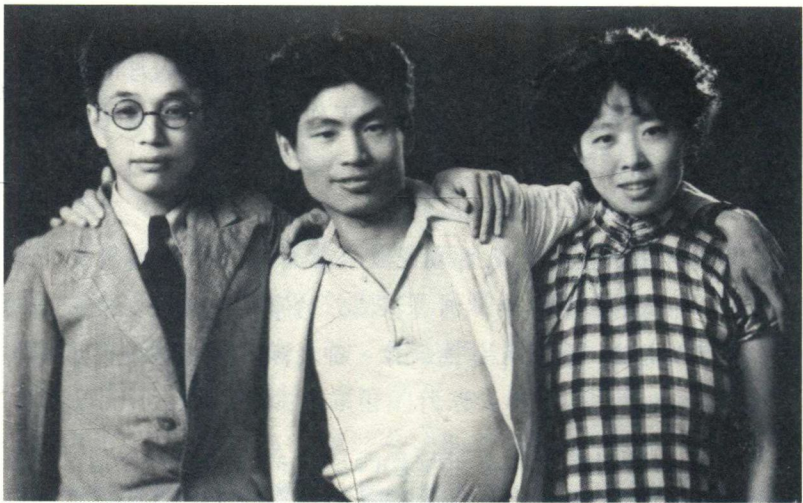
**海嬰：**我應該是在5、6歲，第一次見到蕭軍、蕭紅。蕭紅兩個大辮子，我很有興趣，拽着。但是給我印象更深的是蕭軍，因為他是在我上海所見到的文人裏面最威武、最強壯的。別人說話小聲小氣，大先生如何如何——因為大家叫我父親「大先生」；蕭軍該說甚麼，有話就談，樓上常常談得非常高興，哈哈哈哈哈，聲音很大。小時候，蕭軍、蕭紅常到我們家，有時候父親帶他們看電影，我也陪着去。

---

魯迅幫助二蕭出版了他們各自的長篇小說處女作《八月的鄉村》<sup>1</sup>和《生死場》，還給他們作了序。他們的書出版後，立刻受到讀者歡迎，但是周揚寫了一個書評，對《八月的鄉村》中的缺點多有指摘。當時也在左翼工作、受過魯迅栽培的年輕作家徐懋庸回憶說：

魯迅對此很生氣，他對我說：「你看過一個美國電影片子麼？那時將白種人在非洲『探險』的事情。白種人用暴力征服黑人之後，把黑人作為奴隸，卻從黑人中挑選一個順民做

1 《八月的鄉村》乃蕭軍的長篇小說，也是其早期代表作，最早版本由上海容光書局於1935年8月出版。內容描述一支抗日游擊隊與敵偽軍隊、漢奸地主的激烈戰鬥，並描寫了隊伍內部的各種思想矛盾與鬥爭，表現了東北人民不甘當亡國奴、誓死保衛家鄉、爭取民族解放自由的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



上：蕭軍《八月的鄉村》及蕭紅《生死場》；下：青年作家黃源、蕭軍、蕭紅（左起）。

這些奴隸的總管。這總管，每當白人主子來查看的時候，就用鞭子打自己的同胞特別起勁，以表示對主子的忠誠。現在我們的人，對一個新出的作家的很有意義的作品，百般挑剔，而對於資產階級作家，卻很客氣，這不是同那奴隸總管一樣的麼？」<sup>2</sup>

---

林賢治：當時在中國人中流傳着一個說法：與其做外國人的奴隸，不如做本國人的奴隸。但魯迅的思想非常明確，就是我們要爭的就是人的地位，不要專制，不管是外國人還是本國人的奴隸，我們都不做。這就是人的解放思想。中國當時非常可怕，幾乎沒有人這樣想，共產黨沒有，國民黨也沒有。

---

蕭軍、蕭紅在與魯迅交往的一年多時間裏，也和魯迅信任的胡風相熟，此後與胡風一直保持着朋友關係。

1935年7月6日，華北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經協商之後，正式簽定了《何梅協定》。根據協定，中國在河北省和察哈爾省的主權大部分喪失，並禁止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活動。

---

2 徐懋庸（1911-77），浙江上虞人。早年參加大革命運動，後到上海與魯迅相識，受到魯迅先生的栽培，其早年雜文風酷似魯迅。1933年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任常委、宣傳部長、書記。1938年赴延安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教科長，晉魯冀魯豫邊區文聯主任、冀察熱遼聯大校長等職。建國後，任中共武漢大學黨委書記、副校長，中南文化部副部長、教育部副部長等職。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文革後不久去世。此處引自〈我和魯迅關係始末〉，見《徐懋庸回憶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85頁。



曾彥修<sup>3</sup>：因為民國以來都是軍閥內戰，國民黨北伐時，表面上統一了，成立了南京政府，各地方派別口頭上也要擁護，蔣介石當時有相當高的威信。但是《何梅協定》讓蔣介石在北京、河北、察哈爾的幾個師、省黨部、市黨部、縣黨部全部撤掉，在北平的憲兵第三團也要撤掉。蔣介石政府受到的侮辱很大，但是中國的人民感到的侮辱更大，國家雖然沒有亡，但是已經比亡國奴還要難受。蔣介石誓師北伐的時候，在國內是很有聲望的。但是這個協定以後，全國關心時事的人都對蔣介石徹頭徹尾地失望、而且傷心了。所以此後沒幾天，我們就喊出口號「打倒蔣介石」了。

1935年10月，經過四年長征、步行了二萬五千里的中國工農紅軍，終於到達陝北，和劉志丹的部隊匯合，有了自己新的根據地。11月下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回到陝北，傳達了共產國際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在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新精神下，來自蘇聯的蕭三寫信給周揚，建議解散左翼作家聯盟。但因為左聯此前受到國民黨嚴重的破壞，周揚當時隱蔽起來了，蕭三想到通過史沫特萊轉信給周揚。當年幫助促成左聯成立的史沫特萊，當然和左聯主席魯迅私交較好，把信給了魯迅。她是否知道此前周揚和魯迅之間的諸多過節，我

3 曾彥修（1919-2015），生於四川宜賓，媒體人、雜文家。1937年到延安學習，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調任中央政治研究室，1943年再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1949年南下，出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並參與創辦《南方日報》，為該報社首任總編輯，撰寫了《南方日報》創刊詞〈新的中國，新的廣東〉。後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社長、總編輯等職務，被譽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具影響力的報人和出版人之一」。

們無從得知。但是早在1934年，周揚等人就排擠胡風，說他是「內奸」，讓胡風憤然辭去左聯職務。魯迅此時見到史沫特萊轉來的信，讓許廣平抄錄後，於1935年12月上旬把信交給茅盾，由他轉交周揚。周揚手下的幹事徐懋庸，回憶自己兩次把魯迅的意見轉達給周揚：一是不希望解散左聯，二是解散也要發個宣言，不能讓敵人覺得是「潰散」。1935年底，左聯最終還是在沒有發聲名下就自動解散，魯迅感到很痛惜，從此沒有再參加過共產黨的組織。

與此同時在北京，為了抗議《何梅協定》，中共地下黨策動了「北平大中學校抗日救國學生聯合會」組織的抗日救國運動。12月9日，學生在中南海新華門前向國民政府請願。何應欽的代表和學生進行對話，但拒絕打開西直門讓清華、燕京學生進城。學生隨即開始大規模遊行，隊伍經過各學校時，不斷有學生衝破封鎖加入隊伍，人數擴大到六七千人。隊伍行進至西單和東長安街時遭到軍警木棍、鞭子、水龍、大刀的攻擊，百餘人受傷，三十多人被捕。被阻擋在西直門外的清華、燕京兩校學生，輾轉赴阜成門、西便門，但因所有城門關閉未能進城，便向圍觀市民控訴日軍在東北的暴行，指責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

---

李銳：我當時在武漢大學讀書。我的好友文立針當時在北京輔仁大學，參加「一二九」之後給我寫了封長信，把北京的情況都告訴我。我把這封信抄下來，貼在文學院的門口，因為武漢大學校長辦公室都在文學院裏面。我把大字報貼在牆上，下面放一把菜刀，意思就是誰把它撕掉就是

漢奸！這對全校的影響很大，大家都罷課了，然後遊行示威。遊行第一天，國民黨把長江封住了，不許過江；我們就在江邊露宿，那是冬天啊！國民黨還不錯，過兩天就讓過了。我把床單撕開寫了兩條橫幅，「國立武漢大學」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遊行到漢口，國民黨公安局長蔡孟堅就跑到我們遊行隊伍的最前面，跟我們一起遊行，他是保護我們，怕我們去衝日本租界，發生慘案。

---

當時王實味正在開封女中教授英文，他的女兒剛剛4歲，他的兒子只有半歲，那段時間是他難得全家團聚的時期。王實味當年的學生高向明仍然記得一二九運動中學校裏的場景。

---

高向明：我們開封學生支援一二九運動，到火車站去臥軌，還要到南京去請願，當時全國的氣氛就是要抗日、要愛國。王實味在那樣的情況下，表現得比較突出。那時有很多老師都是進步的，但也有國民黨搞特務的人在學校，他們在學生當中就很不受歡迎。學生當中絕大部分都是同情抗日、願意救亡的，當然也有少數人不問政治。

---

高向明記得，王實味推薦給她巴比塞 (Henri Barbusse) 寫斯大林的傳記文學《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這個細節說明王實味並不仇視斯大林。當時在開封女中初中部就讀的學生薄平，清晰地記得王實味的形象。

薄平：我們數學老師很窮，穿個破棉袍，棉褲腳還紮個帶子，完全要養家糊口的樣子，我們就叫他「余老夫子」。歷史老師長着青春痘，我們就叫他「丘陵」。音樂老師穿西裝、信奉基督，我們叫他「洋教徒」。只有王實味，西裝革履，從大城市來的風度，誰也不敢給他起外號。他總是上課前兩分鐘就到教室門口了，從不遲到。上課的時候經常給我們講時事，我們很喜歡聽。

與此同時，12月17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西安定舉行擴大會議，所謂「瓦窯堡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分析當時的軍事、政治局勢，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出席會議的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劉少奇、秦邦憲（博古）、鄧發、李維漢、張浩（林育英）、彭德懷、何克全（凱豐）、吳亮平、楊尚昆、郭洪濤、李德等，都是中共元老級的人物。

1936年4月26日，魯迅的一位美國朋友，記者艾德加·斯諾（Edgar Snow）來到他的住所。那天魯迅全家去看電影，客人撲了空，未能見面。此後不久，斯諾就動身前往延安<sup>4</sup>。1905年生於美國堪薩斯州的斯諾，1928年作環球旅行時抵達中國，1930至1933年間擔任美國「統一新聞協會」駐遠東記者、駐北平代表。1933年9月就在美國出版了《遠東前線》。

4 轉引自朱正〈魯迅的三個美國朋友〉，見《魯迅的人脈》（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193頁。

斯諾曾在1933年來上海，與魯迅見過面，討論過翻譯魯迅的小說，後來他翻譯了一本新文學的合集《活的中國》，其中包括魯迅的〈藥〉和〈孔乙己〉，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茅盾的〈泥濘〉，丁玲的〈水〉等著名作家的小说。斯諾曾這樣寫下對魯迅的印象：「我會見魯迅時，他已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學者、導師和偉大作家了。他身材不高，膚色淺黑，目光炯炯，眉毛潮潤。他當時五十多歲，正患着醫不好的肺病，看樣子不久於人世了。」<sup>5</sup>他記得自己問魯迅：「你們已經進行了第二次革命或者說國民革命了，難道你覺得閒雜人等有過去那麼多的阿Q嗎？」魯迅大笑着回答：「更糟了，他們現在還在管理國家哩。」<sup>6</sup>魯迅對斯諾的印象顯然也很好，他曾經在1935年1月8日致友人鄭振鐸的信中說：「S君是明白的。有幾個外國人之愛中國，遠勝於有些同胞自己，這真是叫人傷心。」<sup>7</sup>魯迅說的「S君」就是他稱為「施樂」的斯諾。

1934年起，斯諾兼任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1935年一二九運動發生時，他和妻子海倫（Helen Snow）從學生那裏瞭解到事件前後，由此十分同情中國學生和中國抗日情況；他們和一位叫黃華<sup>8</sup>的學生與保持了一生的友誼，後來黃華還陪同斯諾一起去延安，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黃華曾任中國外

5 埃德加·斯諾著《斯諾文集》第一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年），159頁。

6 同上，158頁。

7 轉引自朱正《魯迅的人脈》，193頁。

8 黃華（1913–2010），河北磁縣人，燕京大學畢業，外交家。曾任燕京大學學生會主席，一二九運動的學生聯合會總交際。1936年1月，在燕京大學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6月，陪同斯諾赴延安採訪毛澤東。後留在延安，曾擔任翻譯、秘書等工作。1949年後，歷任中共第十至十二屆中央委員，第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



左上：埃德加·斯諾；右上：斯諾拍攝的毛澤東；下：1935年到達延安的中國工農紅軍在聽毛澤東演講。

交部部長。1935年底中國工農紅軍結束長征到達陝北時，不要說外國人，就是在中國境內也很少有人了解紅軍的情況，他們剛剛完成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已經到達了距離陝西省延安市50公里的保安鎮。此時共產黨希望有位名聲不太「左」的外國記者來報導長征，於是與共產黨聯繫密切的史沫特萊，就介紹斯諾去了保安。

史沫特萊曾經在1936年5月31日，帶着她十分信任的一位美國醫生來給魯迅看病，醫生說魯迅「恐怕過不了年」，史沫特萊忍不住流下了眼淚。見證了這一幕的茅盾寫道：

醫生先走了。我同史沫特萊商量，我們只能把大夫說的住院詳細檢查的話告訴魯迅，其他的話只能悄悄的告訴許廣平。於是我就這樣對魯迅說了，可是魯迅不信，他說你們騙我，大夫一定說得很嚴重，我看見史沫特萊哭了。<sup>9</sup>

斯諾於1936年6月到達保安之後，一共停留了四個月，其間毛澤東用了十天時間把自己的人生故事講給他聽，於是斯諾就成為第一位報導中國紅軍的外國記者。斯諾在邊區還採訪過彭德懷、徐海東、左權、聶榮臻等紅軍領導人，是最早深度報導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記者。他的採訪在上海的英文報紙《大美晚報》、美國的《生活》和《亞洲》雜誌上連同70幅照片一起發表。他給毛澤東拍照時，把自己的軍帽給毛澤東戴上，於是

9 茅盾〈我和魯迅的接觸〉，見《茅盾全集》第三十五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68頁。

有了這張全世界著名的毛澤東肖像。斯諾的成績令史沫特萊十分嫉妒，她本人也在1936年10月到達西安，並在西安遇到剛剛離開保安的斯諾，和被共產黨營救、正在往延安路上的丁玲。

早在1935年底，在上海的黨內作家周立波發表〈關於「國防文學」〉一文，提出「國防文學」口號。朱正說，「這口號來源是巴黎的《救國時報》，也是共產黨辦的報紙。」

林賢治：這個「國防文學」就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決議，反對法西斯、統一戰線。斯大林非常壞的就是：他既支持蔣介石，也支持共產黨，因為他要保護蘇聯的利益。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他不信任，他認為中國離開蔣介石不行的；但日本人如果吞併了中國，那對蘇聯是很大的危險。所以他希望國共合作，去頂住日本人，他好能騰出手來對付希特勒。魯迅對當時共產國際的很多做法，都不認同。

接下來，胡風寫了〈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甚麼？〉其中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於是在1936年夏天，兩個口號的論爭達到高潮。大多數進步知識分子都支持魯迅等人的口號，而不是周揚代表黨提出的口號。8月，周揚部下的徐懋庸，情急之中給魯迅寫信攻擊胡風，不料這次魯迅親自回信，就是著名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sup>10</sup>。這封公開信捍衛了胡風等人的耿直，批評了周揚等人扯虎皮拉大

10 這封信最初也是馮雪峰起草的，但是從現存的文件原稿中，我們可以看到，魯迅做了很多的改動，因此可以說，這封信是完全可以代表魯迅的思想和意圖。



旗的行為方式。徐懋庸在1972年寫〈我和魯迅的關係始末〉時，記述了這封公開信發表以後的事：

魯迅答覆我的文章發表後，周揚他們認為我給他們惹了大禍，就開了一個會批評我，除了周揚以及原「左聯」常委會的幾個人以外，還有夏衍。他們批評我「個人行動」、「無組織無紀律」、「破壞了」他們「同魯迅的團結」，而他們自己卻毫無檢討。我很不服，駁斥了他們。我說，信雖然是我自己想寫的，可以說是個人行動，但其基本內容，不是你們經常向我灌了又灌的那一套麼，不過我把它捅了出去而已。你們與魯迅的「團結」，這幾年不是由我去做的麼？魯迅的文章裏所揭露的事情，絕大部分是你們所幹而我不知道的，難道你們本來同魯迅很團結，而有我這信才破壞的麼？<sup>11</sup>

徐懋庸後來又發表了〈還答魯迅先生〉，但是魯迅沒有再理會。兩個月後，10月19日，在上海的徐懋庸接到電話，說魯迅先生去世了，感到自己的悲痛「異於一般人」，於是寫了輓聯道：「敵乎友乎？余惟自問，知我罪我，公已無言。」<sup>12</sup>魯迅的兒子周海嬰清晰地記得那天的情景。

海嬰：我父親去世那天印象是非常深的。那天我在樓上睡，帶我的許媽就跟我說，「弟弟你今天不要上學了」。我腦子一動，甚麼事情不要上學啦？她說你不要下去。我在幾天前曾經有個幻覺，就是突然在空中，遙遠地有一個

11 徐懋庸〈我和魯迅的關係始末〉，90-1頁。

12 同上，93頁。



左上：魯迅先生50歲像；右上：1936年10月，魯迅去世後的海嬰；下：魯迅喪儀。

聲音告訴我「你爸爸要死了」，一次一次說了三遍。第三遍我聽準確了，這聲音就沒了。然後我回家以後告訴許媽，我說「爸爸要死了」。「瞎說，小孩子，哪有這個事情！」那天許媽叫我不要到樓下去，我心裏頭就有個不祥之兆。我就自己趕緊穿衣服，下去進到我父親的臥室。抬頭一看，我媽媽站在那，旁邊還有一些人。媽媽看見我來了就拉着我，沒有讓我撲到床上。呆了一段時間，別人都是一步一步輕輕地悄悄地上來，站在我父親床邊，也沒有靠近。突然聽見底下有非常大的腳步聲，蕭軍大的靴子就噹噹噹。上來一看我父親躺在床上，他一下子就撲到床沿。我記得很清楚，蕭軍戴了一頂帽子，撲過去以後這個帽子就咕嚕咕嚕滾到床邊上。然後蕭軍就叫：「魯迅先生！你醒醒你醒醒！」大哭。跟一頭熊似的這麼大聲喊我父親。這個印象刻到我的心裏頭，好像刻到石頭裏頭一樣，永遠不會磨滅。

---

魯迅先生的去世對很多人來說都是晴天霹靂。當時在上海的魯迅的朋友們，包括巴金、胡風、蕭軍、沙汀、日本作家鹿地互等人全都參加了治喪委員會。胡風和巴金等人一起抬出先生的棺木，主持了喪儀，蕭軍也在喪儀上講了話。魯迅的送葬過程中，蕭軍是16位抬棺者之一，遊行給魯迅送葬時有一萬多人參加，蕭軍是總指揮。當時蕭紅正在日本，寫了信給蕭軍：

關於周先生的死，21日的報上，我就渺渺茫茫知道一點，但我不相信自己是對的，我派去問了那唯一的熟人，她說：

「你是不懂日文的，你看錯了。」我很希望我是看錯，所以很安心的回來了，雖然去的時候是留着眼淚。

昨夜，我是不能不哭了。我看到一張中國報上清清楚楚登着他的照片，而且那麼痛苦的一刻。可惜我的哭聲不能和你們的哭聲混在一道。<sup>13</sup>

1936年11月，中國的留日學生開了悼念魯迅的大會，蕭紅是大會主席。賈植芳參加了那個大會。魯迅去世的噩耗，史沫特萊、斯諾、丁玲三人是在西安聽到的，三個人都十分難過。當時史沫特萊雖然不在上海，仍然被魯迅的親友列入治喪委員會名單，可見大家都十分珍視她和魯迅的友誼。

11月，丁玲率先到蘇區首府保安。對於著名女作家的到來，中共的最高領導人都非常重視，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都出席了她的歡迎會。毛澤東問，「丁玲，你打算做甚麼呀？」丁玲不假思索地說：「當紅軍。」於是1936年11月24日，她隨前方總政治部楊尚昆等北上，寫了七八篇通訊、散記、速寫。12月底，毛澤東用電報發來一首《臨江仙》：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捲孤城。  
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  
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  
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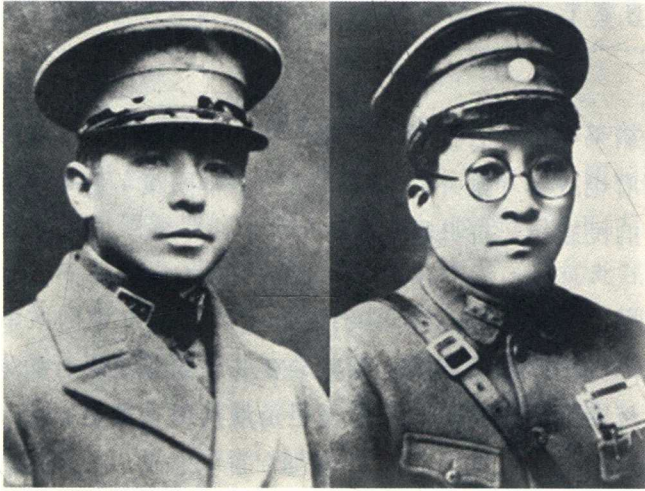
13 蕭紅，《蕭紅全集》（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1272頁。

後來丁玲回到延安，毛澤東又送她手書，她一直珍藏。在延安受到威脅的時候，還特地交給在上海時的老友胡風幫她保存了好幾年。

1936年12月12日，國民黨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和西北軍領袖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扣押了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介石。有三天之久，沒有人知道蔣介石的生死下落。當時仍舊留在西安的史沫特萊，以張學良總部的英語播音員的身份，成為唯一能夠通過英文電台向外界通報消息的人。自從蔣介石「背叛革命」以來，國共雙方的戰爭已經持續十年之久，然而國內抗日的氣氛已經到達了高潮，各方面幾乎一致對蔣介石表示稱頌和同情，要求恢復蔣的自由。當時在臨潼讀中學的何方，目睹了西北軍所建築的工事。

---

何方：西安事變就發生在我們臨潼，駐在附近的東北軍105師是張學良的嫡系部隊，楊虎城的西北軍駐在西安，臨潼到西安不到30公里。蔣介石和張學良拜過把子，比較信任張學良，不大信任楊虎城。蔣介石被抓以後軟禁在臨潼的驪山腳下。張學良和楊虎城聯繫中共領導人，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趕快主持開會。會上有兩種意見，一種就是組織人民公審，然後把老蔣殺了，主張殺蔣的毛澤東、張國燾等人都很氣憤，打了十年仗，共產黨人被老蔣殺那麼多。但張聞天說不行，不但不能殺蔣介石，還應該以南京政府為正統，我們只能「參加」抗戰。因為共產國際那時和中共失去聯繫，共產黨要自己做決定。張聞天就派周恩來到西安去，和張學良一起和平解決西安事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

## 对西安事变变通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南京孔庸之、孙哲生、冯焕章、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杨虎城、王鼎芳、孙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诚，实居诸前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履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陝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出抗日救亡方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上：張學良（左）和楊虎城（右）；下：中國共產黨〈對西安事變通電〉。

變。沒有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就沒抗戰，可能也就沒有共產黨了。

---

談判的結果，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張，國民政府也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使中國建立了形式上的民族統一抗日戰線。

史沫特萊從本質上來說，還是一位作家，她的政治敏感度在政黨眼中一直有問題。她曾經在共產國際缺乏合適人手的時候，被委任作為其代表工作，但是最後似乎總是出錯。在西安事變的過程中，她的錯誤比較大。簡單來說，從宋慶齡給王明的一封信中，我們得知，蔣介石被釋放時，有一些條件是經過雙方協商需要嚴格保密的，但是「共產黨人出乎意料地通過西安電台公佈了這些條件，而且英譯稿也經史沫特萊報導出去了」。而且，「史沫特萊小姐以自己的名義公開證實了這些消息的真實性」，令蔣介石對「共產黨人違背諾言和缺乏誠實」非常惱火。宋慶齡表示不明白，為甚麼讓她在西安工作，「她給我們造成了麻煩和困難。」<sup>14</sup>

---

高向明：西安事變把蔣介石抓起來，王實味就高興得不得了。在課堂上，他經常給學生介紹一些進步作品，魯迅、茅盾、丁玲的等等；上海馬海德他們出了個英文刊物，叫

---

14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十五卷，275-7頁，此信寫於1937年1月26日。關於史沫特萊別的問題，朱正在〈魯迅的三個美國朋友〉中有更為詳細的舉例和說明。

《中國呼聲》(*The Voice of China*)，他就介紹我們訂閱。另外他還常讓我們看鄒韜奮<sup>15</sup>他們編的雜誌。

---

高向明提到的美籍黎巴嫩裔醫生馬海德<sup>16</sup>，在1933年還未畢業的時候就到了上海，他經常給英文刊物《中國呼聲》投稿，但並非這個雜誌的創辦人或編輯。他於1936年6月陪伴斯諾到達延安後，決定留下來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從此在中國度過一生。當史沫特萊1937年2月到達延安時，他第一個去歡迎她。此後，馬海德多年以來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國際面孔。筆者2015年1月在美國鳳凰城，訪問到中國共產黨的另一位美籍黨員李敦白<sup>17</sup>時，他還清楚地記得馬海德。

15 鄒韜奮 (1895-1944)，原名恩潤，記者、出版家。1922年年受黃炎培之聘，擔任中華職業教育社編輯部主任，主編《教育與職業》月刊和編譯《職業教育叢書》。1926年10月接辦《生活》週刊，取「韜奮」為筆名。九一八後力主抗戰救國，使《生活》週刊成為宣傳抗日救亡、反對國民黨不抵抗政策的大眾喉舌。1932年7月創辦生活書店。1933年1月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為執行委員；同年7月迫於壓力到歐洲各國和蘇聯「考察」。1935年8月回國，11月在上海創辦《大眾生活》週刊。1936年6月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生活日報星期增刊》，8月返滬後改出《生活星期刊》，同時擔任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11月22日被捕，1937年7月31日獲釋後即在上海創辦《抗戰》三日刊。

16 馬海德 (Shafick George Hatem, 1910-88)，黎巴嫩阿拉伯裔美國人，醫生。1933年來中國，在上海廣慈醫院和來斯特醫院工作。1936年，經宋慶齡介紹，同艾德加·斯諾前往陝甘寧邊區採訪中國共產黨總部，後為中共事蹟感動，決定留在陝北。1937年，他改用中文名馬海德，並加入中國共產黨，任陝甘寧邊區衛生部顧問。抗戰期間馬海德參與籌建八路軍醫院，解放後一直留在中國。

17 李敦白 (Sidney Rittenberg, 1921-)，美國籍中國共產黨員，1944-79年居住在中國。1946年曾在延安工作，為中共領導人做過翻譯。1949-55年間，因牽涉蘇聯間諜案，被單獨關押六年。出獄後在北京之聲廣播電台做英文編輯；文革起始時因支持文革而成了公眾視野中著名的國際人士，但不久後再次入獄達十年。1979年返美參加促進兩國貿易工作，1993年出版了自傳。



李敦白：他是個了不起的人！我覺得在中國，應該沒有第二個外國人像他一樣，有那麼多朋友。在中國，人們真的愛戴他，他可以和任何人交談，也可以給任何人治病。從中央政治局委員，到一個普通餐廳的服務員，都可以是他的病人。我特別喜歡他。

李敦白到達延安，是幾年以後的事情了。作為一位國際人士，他和馬海德一樣，在延安和高層領導人有過長時間近距離接觸。

1937年初史沫特萊從西安到延安，一路上受到左權<sup>18</sup>、彭德懷和賀龍的關照，進延安前丁玲受黨委派前來迎接她，她在人群中看到在上海就認識的丁玲，感到很高興。史沫特萊一到延安就受到毛澤東和朱德的接見。在到達延安的第二天，延安黨政機關就為她舉行歡迎大會。史沫特萊去延安的最初目的是像斯諾一樣，寫一部關於中國紅軍的書。在延安，她多次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和彭德懷等人交談，每天勤奮地工作。她與朱德總司令的接觸最為頻繁，並征得朱德的同意，開始撰寫朱德的生平。她這個選擇也是源於她相信農民出身的朱德的故事，是那個時代中國最有代表性的故事。她還教會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們跳舞，周末舞會從那個時候開始，成了中國領導人持續了幾十年的娛樂。史沫特萊是個性情中人，處世並不像馬海德那樣理性、謹慎，幾乎所有領導人的妻子都不喜歡她。

18 左權（1905-42），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到蘇聯學習。回國後參加長征。1936年擔任紅一軍團代理軍團長。抗日戰爭爆發後擔任八路軍副參謀長。1942年5月，日軍對太行八路軍發動掃蕩時陣亡。



上：在延安的史沫特萊；下：中國共產黨首位美國籍黨員馬海德醫生。

史沫特萊和埃德加·斯諾不同，她不止是記者、作家，而且是一個活動家，她力圖改變周圍的環境。在美國的時候，她就曾經認識女權運動先驅瑪格麗特·桑額（Margaret Sanger, 1879–1966），並支持過桑額的節育運動<sup>19</sup>。根據與她同時在延安的海倫·斯諾（Helen Snow, 1907–97）的記述，她們都注意到幾乎全部外來的女性都害怕懷孕，並因此仇恨她們的丈夫。史沫特萊曾經試圖發起一場節育運動，還給桑額寫信，希望能夠獲得捐贈兩百個子宮托，並親自幫助一些婦女安放<sup>20</sup>。但是當時延安貧窮落後、又在戰爭時期，男人有太多的問題要考慮，沒有特別照顧女性的痛苦，史沫特萊的想法和行動沒有影響到太多的人。倒是她發起的滅鼠運動，一開始被嘲笑是美國人太講究，但後來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她用自己的國際關係為延安爭取援助，後來到中國服務的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印度醫生柯棣華都受到過她的影響。

前文提到，海倫是 *Red Star Over China*（《西行漫記》）一書的作者埃德加·斯諾的妻子，她出身於美國猶他州，受過大學教育，並由做律師的父親安排，在美國駐上海領事館找到工作。她1931年到上海後不久，就遇到埃德加，次年兩人結婚。後來兩人都在燕京大學任教。海倫和丈夫一樣同情中國學生，並且自己也想寫一部關於延安的書。她在史沫特萊到達之後三

19 桑額早年當過護士，深知懷孕和生產對下層婦女身體和精神的傷害，1912年開始傳播節育知識，1913年創建報紙《女性之反叛》，1914年創立全美節育同盟，1917–38年任《節育評論》雜誌主編，1927年協助組織了於日內瓦召開的第一次世界人口大會。桑額寫有多部關於節育、婚姻的著作，如《婦女與新種族》（*Women and the New Race*, 1923）、《婚姻中的幸福》（*Happiness in Marriage*, 1927）等。史沫特萊從母親和姐姐的遭遇，對於婚姻和生育一直很抗拒。

20 Nym Wales (Ed.), *My Yanan Notebooks* [M], Madison CT: Author 1961, 171頁。



在延安的海倫斯諾和朱德的夫人康克清。

個多月，於1937年4月30日到達延安。海倫到來時，在延安的馬海德、李德、史沫特萊已經不說話了。海倫較有時十分「怪異」的史沫特萊顯然更容易親近，她在公共場合表現出的靦腆，讓她獲得大部分長征老大姐的喜愛。海倫花了很多時間對中共領導們進行訪問，同時也認真地訪問了延安的婦女，傾聽了她們的故事。她發現她們很團結，從長征到後來，這都是她們的生存之道。

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不到一個月，史沫特萊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未獲批准。陸定一<sup>21</sup>來通知她時，她嚎啕大哭。馬海德被派來和她談話多次，也不能減輕她的悲傷。他們都對她說，她留在黨外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而她也的確在此之後仍舊為中國共產黨爭取利益。當時她本人完全不清楚共產國際和共產黨高層對於她的看法。最後，她幾乎是被毛澤東命令離開延安，那可能是她人生中另一個黑暗的時刻，她在延安已經沒有朋友。上海發生了八一三事變後，日軍佔領了上海，中國開始了全面抗戰。史沫特萊和海倫一起離開了延安。根據海倫的記述，多虧得到一位紅軍的軍官郭順華的照顧，史沫特萊的精神才慢慢恢復正常<sup>22</sup>。後來，她們在西安分手，海倫回

21 陸定一（1906—96），江蘇無錫人。1922年入讀上海南洋大學電機工程科。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起擔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共青團駐少共國際代表。後又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參與長征。抗日戰爭期間，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職務，領導《新華日報》華北版的工作。1942年4月延安整風運動期間，他負責編輯《解放日報》的「學習」副刊，同年8月，擔任該報總編輯。建國後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書記處書記、文化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間受林彪、「四人幫」迫害。

22 Helen Foster Snow, *My China Years* (London: Harrap Ltd., 1984), 278–92頁。



上：木刻：《抗戰》；下：延安鳥瞰。

到丈夫埃德加身邊，繼續在中國輾轉生活；而史沫特萊則開始隨八路軍轉往各地，與士兵共同生活和作戰，開始了長達半年的軍旅生活。

---

薄平：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9月一開學，王實味穿了中山裝來上課了，我們就把門窗關上說，「王老師，給我們講時事」。他就啪地把課本往講台上一摔：「現在是甚麼時候了，我們的民族、國家處在危亡之中，現在念ABC還有甚麼用？馬上要國破家亡了，有良心的中國人，覺悟的青年，應該全民抗爭，全民抗戰。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常看報紙。」

高向明：王實味創作過一個叫做《要落的太陽》的劇本，太陽旗就是日本國旗，就是說他們注定要在戰爭中失敗。這是抗戰形勢已經非常嚴峻的時候，他和學生在一塊，參加學校成立的抗日救亡會，他編了這個劇，跟學生一塊演，他當導演。

---

那時，王實味已經決定和家人一道去延安了。但是他的妻子劉瑩有了身孕，吃了兩次打胎藥都沒有效果。夫妻倆只好約定，劉瑩先帶孩子回老家，打胎之後，等身體恢復了再去延安<sup>23</sup>。他到火車站送別妻兒時，吻別了一雙兒女之後，走到車門口，又回過頭來擁抱了他們。6歲的女兒發現爸爸要離開，哭喊着

---

23 劉瑩〈沉痛的訴說，無限的思念〉，158頁。

拖住了他。劉瑩拉住女兒，王實味才一步一回頭地下了車。這一幕永遠刻在了女兒的記憶裏<sup>24</sup>。

也是在七七事變以後不久，剛滿 19 歲的曾彥修就從老家四川前往延安。當時正式進入延安的機構之前，要先在招待所通過政治審查，然後由組織分配到各個機關。那時延安主要有兩所大學來接收這些全國各地來的學生。1936年6月成立的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1937年4月改稱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抗大一期學生因為西安事變後抗日形勢的改變而提前畢業，很快就成為新組建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骨幹。1937年9月開學的陝北公學，則是培養幹部的學校。

曾彥修：去延安時我們對共產黨知之甚少，因為30年代公開的報刊說到共產黨的報導，不是「共匪」就是「赤匪」。我們所知的無非來自於左翼文學，知道它的傾向：一要抗日，二要反蔣，三要擁護蘇聯。當時的進步分子把南京政府叫「法西斯政府」，我聽到有人這麼叫，不用介紹，我們就生死同行了。延安當時有抗大，偏以軍事，畢業以後可以到前方去打仗；還有陝北公學，偏以政治，畢業以後到前方去發動民眾。抗大的校長是林彪<sup>25</sup>，陝北

24 王勁楓〈我的爸爸王實味〉，164頁。

25 林彪（1907-71），湖北黃岡人，政治家、軍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勳，曾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部長、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的中共二號人物，曾作為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接班人被破天荒地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及1970年憲法草案，但在第三次廬山會議上，因權力鬥爭與毛澤東關係破裂而失勢。中國官方稱，1971年林彪試圖發動政變，失敗後攜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出逃蘇聯，所乘256號專機墜毀於蒙古境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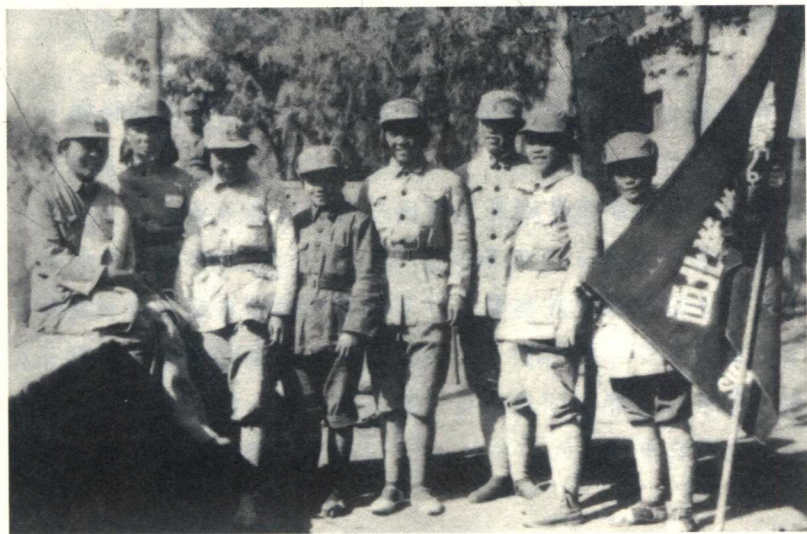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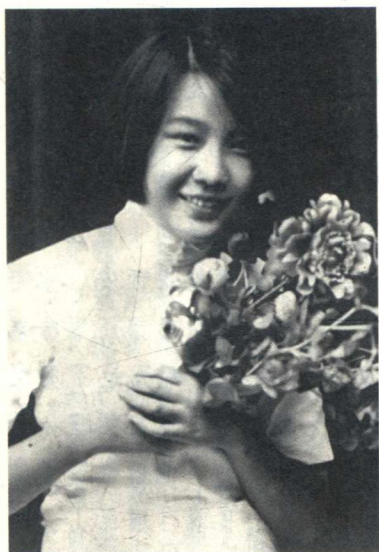


公學校長是成仿吾<sup>26</sup>——20年代大作家、創造社創始人之一。我們到延安之前，先在招待所一住幾個月，寫自傳、填表、回答問題、談話，然後根據這些分配。我那房間四個人，兩個分到抗大，兩人到陝北公學，甚麼原因我不清楚。

1937年9月22日，以延安抗大二期部分學員為主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在丁玲主任和吳奚如<sup>27</sup>副主任的帶領下，徒步從延安出發，開赴山西抗日前線。

薄平：王實味讓我們看報，我有天看見報縫裏，「丁玲領導的八路軍戰地服務團在山西招收團員，無論男女老幼職業，都可以參加革命」。看見這個消息，我那個高興啊！王實味成天叫我們抗戰，怎麼抗啊？這不就可以實現了嘛！我約同班同學潘秀榮，和她一塊走。她當時17歲，比

- 26 成仿吾（1897-1984），原名成瀨，湖南新化縣人，教育家、革命家、文學家。早年留學日本，1921年回國後與郭沫若、郁達夫發起創造社，編輯過《創造季刊》、《創造週報》、《創造日》及《洪水》等新文學刊物。1925年赴廣東大學任教兼黃埔軍校教官。國民黨開始清共後避難日本，發表〈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引起與魯迅的論爭。1928年在巴黎加入中國共產黨，三年後自德國回到上海，被派到鄂豫皖蘇區工作。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7年任陝北公學校長；次年倡議成立延安魯迅藝術學院。1939起歷任華北聯合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山東大學等大學的校長、黨委書記等職。
- 27 吳奚如（1906-85），原名吳席儒，湖北北京山城關人。1925年入黃埔軍官學校（第四期）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秋軍校畢業後參加北伐戰爭。1927年四一二事變以後，任討蔣運動委員會常委、《討蔣週刊》主編。1928年冬被捕，1932年秋出獄，後到上海，以文學活動為掩護從事地下工作。1933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曾在《文藝月刊》、《作家》、《文學季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小說和雜文。



上：王實味在開封女中教英文時，初中部學生薄平（左）和高中部學生高向明（右）；  
下：丁玲（左一）率領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在太原。

我還小兩歲，她媽媽要把她嫁給個有錢人作小老婆，她說她要跑。我跟她說，咱們去找丁玲吧！我們決定先坐火車到潼關。結果一進車廂就看見王實味了！王實味看見我們一愣：「你們上哪去啊？」我們找丁玲去啊。「你們有介紹信沒有？」我們說沒有介紹信，不管年齡職業都可以。「你們這樣走，家裏知道不？」簡單說了幾句，我們就去了另外一個車廂。我們倆到山西去，他可能去西安，也可能去蘭州，或者到哪個地方去吧？我心裏很希望王實味能到我們車廂來，說幾句鼓勵的話，但是到天亮也不見蹤影。我就賭氣跟潘秀容說，咱們下火車別跟他打招呼。後來我們到潼關了，下車從他們窗子底下過，他就從窗子伸個頭出來，「你們路上小心啊！」我心裏說「廢話！」然後說了句「噯」就走了。

---

無獨有偶，王實味的學生高向明也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程。

---

高向明：當時學校要遷到西川，河南的一個山區，我們不願意再上學了，就離開學校。我姑姑在西安，是個地下黨，當然那時候我不知道。我就從西安到延安了。我和作家柳青<sup>28</sup>一塊去的，柳青是我姑姑的學生，那是我第一次出遠門，當時17歲，我姑姑不放心我一個人出遠門，就找他跟我作伴。

---

28 柳青（1916-78），原名劉蘊華，陝西省吳堡縣人。當代著名小說家。他早年從事革命活動，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創業史》。

薄平和潘秀榮到了潼關之後，又經過了幾天周折的旅行，終於在一個大車站與平津學生流亡團匯合了。

薄平：我跟潘秀榮下車就看見前面一個女生。追去一看，也說開封話，是北倉女中的孫岩。她說你們兩個怎麼在這兒啊？我說我們來找丁玲的抗戰服務團。她說，「就你們兩個人啊，真了不起！」她領着我們就往前走，鑽過七、八個車廂，到頭一看，一隊隊的男女青年在那玩呢，平津流亡同學在開封組織的團體。大家見我們兩個女學生來都特別注目。我們沒有學過〈五月的鮮花〉，也跟着唱。旁邊人說，「嘿，兩個金嗓子啊！」就歡迎我倆唱歌，我們就唱了〈漁光曲〉。後來火車開動了，潘秀榮靠着我呼呼就睡着了，我睡不着。到太原已經是晚上了，我們剛剛下火車，緊急警報就拉響了，日本飛機已經到了上空了！太原車站我們不熟悉，怎麼躲飛機？沒有受過訓練啊！我們團長就說，遠離鐵路往底下跑。那時也不害怕，帶着行李從鐵路修得很高的坡上往下滾。炸了有十分鐘，機關槍掃着「嘟嘟嘟嘟」，炸彈下來震耳欲聾。但那時心裏覺得很刺激！後來學生排隊點名，一個都不少！一輛卡車把我們拉到一個辦事處，一大摞的軍裝就扛來了。學生裝不穿了，軍帽一戴，真是開心啊！那天晚上吃的是小芥菜，還有肉，小米飯那個香啊！

薄平到延安被分配到陝北公學，在那裏，她意外地與王實味重逢了。

薄平：在陝北公學我是八隊，有天我們在廣場上正步走，不遠處的七隊那兒有人講話。我聽這人的聲音怎麼這麼像王實味啊！當時在隊伍裏面也沒法張望，後來回去我就打聽，七隊隊長是誰啊？結果就是王實味。一個禮拜天，吃了早飯他約我談話。他說，「你那時在火車上說要找丁玲戰地服務團，那是在白區啊！我怎麼敢跟你說我是從西安找八路軍辦事處到延安來呢？」他說你要諒解我。我們倆談話，他很傷心，他給家裏寫信也沒有回信。他身體不好，只能吃小米，又要當隊長，又要軍事訓練，鬍子拉碴的樣子今非昔比。我說王老師，不管怎麼說，我走這一步是你給我定的，沒有你，我可能都回家去嫁人了。

在陝北公學的打靶訓練中，19歲的薄平和她的隊長、北京來的大學生王健，感到了初戀的心跳。

薄平：我正在那打靶，王健就趴到我旁邊地下了，告訴我說，槍托就擱在肩膀這兒，子彈出來有個後坐力，你心裏要有準備。他一扶我的手，我就感覺身上麻嗖嗖的，有生以來第一次。他一天到晚工作忙得很，戴個近視眼鏡，臉上、耳朵上都是灰，可是我就覺得他可愛。陝北公學我們這一期要結業了，有一部分同學要上前線了。有天晚上，王健找我，說薄平我明天要上前線。我今天晚上告訴你，我對你印象非常好，想跟你交個朋友。我說我對你印象也好，我說你看你工作多辛勞，吃飯的時候菜都讓給別人，我們同學都覺得你很好。他說咱們通信好不好？我說好。我說你來信我一定給你寫回信。

就在那個月光映照着積雪的夜晚，薄平和王健訂下了盟約。

薄平：我問他你上甚麼地方去知道不？他說不知道。是坐車還是步行去？不知道。第二天我們就唱着〈畢業上前線〉，是呂驥寫的曲詞，「這個時候啊，同學們，該我們走上前線。我們沒有甚麼牽念，總還有一點點留戀。」我們站了兩排，一排是歡送的，另一排是要上前線的。我的眼淚就往地上掉，王健就背上背包，打上綁腿，雄赳赳氣昂昂地走了。沒多久就在前線犧牲了，當時我並不知道，我還在等。

根據朱鴻召的研究，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出發時9萬餘人，最後到達陝北的倖存者只有4,000人，其中女紅軍50人，比例為80:1。到1937年底至1938年初，男女比例上升為30:1；到1941年，達到18:1。當時在延安男女比例是18:1，要結婚幹部必須達到「二五八團」，即25歲、八年黨齡、團職幹部<sup>29</sup>。很多達到這個標準的單身幹部，都把新來延安的女生作為追求對象。女學生中有個說法：老幹部可敬而不可愛。

薄平：我們到延安時因為好奇，常去找那些長征幹部講故事。有一個叫王飛的，年紀很輕，臉紅紅白白的，個子不太高，我們到延河邊去洗衣裳，就經過他的小破屋。有一天我去洗衣裳，想喝點水，就到他屋裏去，結果他就拉着

29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243頁。

我的手說，薄平啊，你趕快入黨做我的老婆呀！我說那咱們還沒談戀愛呢！他說甚麼戀愛，老婆就是老婆嘛。我說你懂不懂談戀愛啊！就跑了。那時我意識到，到延安你要結婚，如果人家是長征幹部，是黨員，你就必須得入黨。

---

薄平講的這段插曲並不是她獨有的經歷。在延安，有個著名的案件，就牽涉到一位戰功赫赫、形象英武的26歲團長黃克功，與陝北公學16歲的女生劉茜戀愛，兩人一度談婚論嫁，但後來劉茜改變主意，希望只和他做朋友。他自尊受傷，試圖說服劉茜未果，在爭執中用手槍打死了劉茜。這個事件，雖然很多延安的研究都提及，但是朱鴻召的研究比較詳細地歸納了各種近年開放的檔案，裏面有幾個事實是非常驚人的。首先，劉茜只有16歲，而邊區規定的女性的最低結婚年齡為18歲。用今天的話來說，黃克功向未成年少女逼婚，很有問題。但是他本人被問到這一點時答，「她的身體已完全發育了，不像是16歲的人。」<sup>30</sup>其次，一個28歲的男人和一個16歲的少女爭吵的結果，是少女胸部、頭部各中一槍，左手指、左腳腕、右膝蓋和下腿都有傷痕，而整個審問都沒有問及這些傷痕。黃克功的表述是：「余觀劉眨眼無情，乃故意損功名譽，當時則氣氛填胸，乃拔手槍與擊之，一槍未擊斃，故加一槍，以免對方作對。」而經過多次審查後的判決書上寫：「10月5日晚帶備勃朗寧手槍，威脅恫嚇，竟以打敵人的槍彈對準革命青年分子劉茜的肋下開槍，劉倒地未死，尚呼求救，黃復對劉頭部再加一槍，劉既斃命。」按照法醫紀錄，第一槍在「左肋背後」、

30 黃克功案公審記錄，陝西省檔案館存，全宗號015-0543。

「彈未出」；第二槍在「左耳後」、「彈穿腦門」<sup>31</sup>；兩槍均從身後打，如果她撲地時右膝跌傷，那麼左手指、左腳腕傷從何來？更加令人震驚的是，黃克功殺人後，只告訴當晚值班人員他與女友發生爭執，擦槍之後安然入睡。當他後來寫第一份陳述報告時，還控訴劉茜「玩弄革命軍人，隨處濫找愛者」，使他「受痛苦與刺激過大」，拔槍恫嚇時，「竟失火而斃命耶」<sup>32</sup>。雖然事後很多人為黃克功求情，認為抗戰中需要這樣優秀的指揮官，但考慮到事件的影響惡劣，1937年10月10日，毛澤東還是親自指示，槍斃了黃克功。應該說毛澤東還是顧全了大局，因為如果這件事不這樣處理，整個陝北公學乃至其他學校的學生都會憤憤不平、無法學習，甚至離開延安。

黃克功案發生的時候，史沫特萊已經離開了延安，但是另有一位女作家正在以記者身份訪問延安。這位女作家就是曾經在上海與魯迅和茅盾交往、後來在法國獲得文學博士的陳學昭。她在1937年7月到八路軍辦事處，向責任人董必武提出去延安，接着又讀到斯諾的《西行漫記》，更堅定了去延安的決心。這時，「黃炎培、孫起孟約陳為《國訊》寫反映陝北情況的稿件，並頒發記者證書。」<sup>33</sup>於是8月4日陳學昭就到達了延安，11月底開始撰寫長篇系列通訊《延安訪問記》，直到1938年夏末才返回重慶。黃克功案件發生時，在延安的她當然有所了解，也在寫到延安的〈戀愛與婚姻〉時，從女性的角度比較含蓄地批評性別的不平等：

31 劉茜驗傷證明，陝西省檔案館存，全宗號015-0543。

32 黃克功陳述報告（一），陝西省檔案館存，全宗號015-0543。

33 毛策〈陳學昭年譜簡編〉，見《浙江師大學報》1991年第1期，38頁。



一個女子怎麼不接受男子的愛！沒有半首失戀的詩，沒有一頁痛苦的日記，他忽然想起他是有槍的，一粒子彈，穿過女子的心胸，她倒下了……及至他回復到理智的人的知覺，特別是以為革命者的知覺，已經來不及了！<sup>34</sup>

讀陳學昭的文字，雖然大體上讚揚延安、對毛澤東等領導人印象良好，但寫到對延安的體驗時，由於她的小資產階級家庭背景、在法國受過高等教育、有過比較曲折的婚戀經驗、加上熟悉左翼文學、同情革命，讓她的視點和觀察顯得非常寶貴和獨特，給今天的我們很多豐富的、男性作家不會寫到的細節。

陳學昭的《延安訪問記》後來「在《國訊》發表了部分篇目後，即遭到國民黨當局查禁」，但是1940年7月全書由香港的北極書店出版。書中第八章〈戀愛與婚姻〉很長，文字比較散漫，有些類似日記式的隨筆，不能全文引用，但在這裏我想把讀後印象比較深的觀點和感受與讀者分享。首先，陳學昭到延安之前，就是一位十分關注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與境遇的作家。她注意到延安的男女平等，的確做到同工同酬外，但也抹殺了男女體力上的差別，因此做女人還是吃虧的。在《延安訪問記》中，她寫道：

我們，中國女子的鬥爭，是兩方面並進的：在民族，社會的利益方面，我們女子的利益就是勞動者的利益，友好勞動者得者解放，我們女子也方能得者解放，在目前，這方面，我們所要做的，當然是積極參加抗戰中的前後方各種工作，以

34 陳學昭〈兩性與戀愛〉，見《延安訪問記》（香港：北極書店，1940年），183頁。



長征的我們於延安攝影



上：留法歸國的女博士陳學昭(左)早在1937年就初次到延安；延安情殺案的女主人公劉茜(右)只有16歲；下：情殺案的男主人公黃克功(後排正中黑衣者)是個戰功赫赫的長征幹部。

求民族解放，國家獨立，民權獨立，民生改善；在兩性方面，我們要同這些謀民族解放的共同友人，但確實統治慣了的，背上負着重重歷史的，封建的歧視女子的惡習慣，這樣的男子鬥爭。這個雙方並進的鬥爭是同樣的堅苦。<sup>35</sup>

今天細讀陳學昭的文字，可以發現在擁護共產黨的大方向之下，她保留、記錄了自己的觀察。不過總體上，她認為邊區「婦女的地位比中國任何地方提高了些」，因為「革命的理論是要男女平等的，也正是在實際上人們所努力想做到的。」她注意到，「在客觀方面，法律上，教育上，經濟上」，可以說「女子是受到平等待遇的。」

其次，陳學昭表明，小資產階級家庭中嬌生慣養的小姐來到這裏，開始的確會感到種種生活上的不適應，譬如說每個人都自己去擔水這一條，她本人就做不到。如果青年女性被老幹部追求，除了組織上會安排她入黨、結婚之外，生活上也會有勤務兵來幫忙照顧，日子起碼過得好一些。然而這樣的婚姻能否幸福，她除了用隱晦、蜻蜓點水的文字提到的黃克功、劉茜的故事，還直接、淺白地講到一個大老粗的首長，因為原是女學生的妻子懷了孕，就把她轟出家門，還說「我要找個比你還洋的洋包子！」可見這樣的故事對她是有所刺激的，她寫道：

在一個朋友那裏，我曾看到一份陝甘寧邊區婚姻條例草案（在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中想已通過），一共22條，可說是很民主的婚姻法，對於女子，可說是夠人道的。只不過對於離婚，沒有一點鼓勵的限制——我是絕對贊成離婚的，不過從

35 同上，183-5頁。

優生方面的立場，又覺得可以鼓勵離婚的減少，例如每次離婚，要隔多少時間才能結婚，不過法律是給聰明人用的——當時我曾問到朋友關於離婚的實施態度，朋友說對於離婚，法院當然先問雙方意見，然後第一調解，調解不成則准離。<sup>36</sup>

這是法律。後來邊區修正的法律中，規定妻子懷孕期間不准離婚。婦女在延安的問題，從延安時代一直到後來很多年都沒有受到過足夠的重視。近年來，才有學者認真研究文獻，並且通過口述歷史的挖掘，重新記錄、考量婦女遇到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中的絕大部分，今天的婦女仍舊要面對。比如今天的職業女性仍舊被家庭牽絆，和男性在社會上不平等地競爭。

在上海以影評和劇作揚名的舒湮<sup>37</sup>，受在國統區辦雜誌的鄒韜奮所委託，以記者、作家的身份訪問延安。在1937年冬去延安時，寫到他記錄訪問陝北公學時，還有學生帶他去看延河岸上「一處亂石灘」，告訴他那就是「情殺悲劇中劉茜濺血的所在。」<sup>38</sup>舒湮在1938年初就在漢口的《抗戰三日刊》上面連載〈邊區實錄〉。不過他在延安見到的毛澤東、張聞天、朱德

36 同上，183-5頁。

37 舒湮（1914-99），原名冒效庸，現代劇作家。1934年畢業於上海國立暨南大學，30年代上海著名影評家、劇作家，曾任上海《晨報·每日電影》編輯，編寫過《正氣歌》、《精忠報國》、《梅花夢》等大量抗戰話劇，著有〈電影攝影論〉、〈電影化裝術〉、〈中國電影的本質問題〉等專論，劇著有話劇《董小宛》。紅軍長征到達陝北未久，他受鄒韜奮等委託往延安採訪，後出版《戰鬥中的陝北》、《萬里風雲》等報告文學，是國內最早系統報導共產黨與紅軍領袖、將領的作品，引起極大震動。1942年在重慶任《新民晚報》副刊「電影與戲劇」編委。

38 舒湮〈延安行〉，見《戰鬥中的陝北》（上海：每日譯報發行，1939年3月30日），附錄38頁。

等領導人，以及他在延安所見所聞，都讓他感到鼓舞。作為較早進入延安的記者，他這樣介紹邊區：

中共為使兩黨長期親密的合作，曾宣示不但目前要與國民黨共同抗戰，而且在抗戰勝利之後也願與國民黨共同建國。無疑的，共產黨是國內的第二大政黨，並且是代表工農利益的政黨。在抗敵與建國的過程中，在精誠團結一致禦侮的偉大的任務之下，我們不能漠視一個擁有數十萬黨員在國內僅次於國民黨的政黨底主張，我們更不能忽略佔全國人口最多成數的工農大眾的利益。邊區目前是在中共領導下的過渡時期的行政區域。我們研究邊區便是藉以明瞭中共對於建國的主張與政策。同時，邊區施政的優劣，也便是中共對於國民表現他們自己的工作良機。未來的中國所將採取的政制，在程度上我深信是不同於目前的，那末，現在的邊區政制也將和各省的政制一樣的供給我們於改革政制時一個有力的參考。<sup>39</sup>

前文提到斯諾的 *Red Star Over China*，在1937年10月於倫敦出版之後，1938年1月在美國再次出版，成為全世界的暢銷書之一。英文書名的寓意，就是陝北就像照耀黑暗中國的一顆紅星。1938年2月在上海出版做了少量增刪的中文譯本，更名為《西行漫記》，立刻引起了轟動。很多中國年輕人通過美國記者的眼光，看到了年輕共產黨的蓬勃朝氣，開始嚮往延安。陳學昭舒湮雖然比斯諾晚一年多到延安，但因為他們的《延安訪問記》和《延安行》刊出時，斯諾的《西行漫記》中譯本剛

39 舒湮〈序——戰鬥中的陝北〉，見《民國叢書》第五編（上海書店，1945年）3-4頁。

剛在上海出版，所以他們的文章仍是許多人讀到的最早的關於延安的文字。

在《延安行》一書結束前時，舒湮引用了一位抗大青年在他離開前寫給他的小詩：

我們終日裏

跳躍，

歡呼，

奔跑。

沒有愁苦，

也沒有浮華的夢想。

在我們底

熱烈的胸膛裏，

祇記住

——緊張的學習！

舉着偉大的拳頭，

我們要掀起革命的洪流，

從這城池

改變大地的質量。

……

朋友，

我告訴你呀！

「我愛，

我愛延安，

我愛這座自由的城！」

最後，舒湮寫道：「他真寫出了我的願望。」<sup>40</sup>

40 舒湮《延安行》，52-4頁。

延安之外，上海被日軍佔領後不久，在各方的呼籲和斡旋之下，從1932年即入獄的陳獨秀被特赦。11月，林語堂主編的《宇宙風》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陳獨秀撰文〈我對於魯迅之認識〉，紀念魯迅：「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於魯迅先生。」在提到創造社和太陽社與魯迅的關係時說：

在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有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後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班無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33層天以上，彷彿魯迅先生從前是個狗，後來是個神。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說道魯迅、胡風與周揚等人的兩個口號之爭，陳獨秀從自己聽到的討論中想到：

魯迅對於他所接近的政黨之聯合戰線政策，並不根本反對，他所反對的乃是對於土豪、劣紳、政客、奸商都一概聯合，以此懷恨而終。在現時全國軍人血戰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濟敵人以食糧和秘密推銷大批日貨來認購救國公債的怪現象，由此看來，魯迅先生的意見，未必全無理由吧！<sup>41</sup>

可以說這是對兩個口號的一個重要補充。陳獨秀最後總結魯迅「保持着一點獨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輕易隨聲附和，是值得我們欽佩的」。這個讚歎也反映出他本人對於獨立思考的注重，印證了他自身的做人原則。

41 以上兩段引自陳獨秀〈我對於魯迅之認識〉，見《宇宙風》第52期，1937年1月21日。

上海被日軍佔領後，胡風在上海創辦了《七月》雜誌，用魯迅題寫的兩個字作為書名，為抗戰而呼喊。隨着戰事的推移，胡風全家從上海到達武漢、重慶等地，都一直繼續出版《七月》。在戰火中誕生的《七月》，一掃過去文藝雜誌中自戀、悲觀的氣息，以自由詩和小說為主，由胡風主編，推出了一批新的作家。《七月》的第一期於1937年9月11日出版，作者有胡風在上海的朋友蕭軍、蕭紅、曹白、彭柏山、艾青、李樺、力群等已經有些名氣的作家，還有用「高荒」作筆名的胡風本人。這一期《七月》作者中名人聚集，反映的又都是現實的生活與鬥爭，所以讀者反應熱烈，很快銷售一空，進步的年輕人立刻注意到這個刊物。在《七月》第一期上，因為《大堰河，我的保姆》成名的詩人艾青，發表了《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饑饉的大地  
朝向陰暗的天  
深處乞援的  
顛抖着的兩臂。  
中國，  
我的在沒有燈光的晚上所寫的無力的詩句  
能給你些許的溫暖麼？

從上海隨着難民西行的潮流一到武漢，胡風就通過左聯的老友、時任周恩來政治秘書的吳奚如，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很親切地肯定了胡風的工作，給胡風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後胡風一直通過他的領導為共產黨工作。1938年初，毛澤東還把自己寫的一篇〈論魯迅〉通過周恩來交給胡風，胡風在



國統區冒着危險發表了這篇署名「大漠」的文字。1938年7月7日，胡風收到左聯老戰友劉雪葦的來信，裏面寫着：「《七月》12、13期均已收到，並如數分送了。毛主席的回信說，他座談會的記錄已看了，很喜歡，希望以後新的經常給他一份。並表示感謝。我想，這是你的光榮，《七月》的光榮，以後希望你一定經常給他一份。」<sup>42</sup>當時在延安的很多青年都知道胡風，不但讀過《七月》，還給《七月》投過稿。1936年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黎辛，1937年來到了延安，那之前就讀過胡風先生的書。

---

黎辛：我喜歡讀他翻譯的日本短篇小說。後來就喜歡他的《密雲期風習小記》裏邊的那些文章，那些是他在雜誌上發表的、評青年作家、指導青年作家寫作的文章。《七月》是1937年出的，很多人都帶去延安，抗大有、魯藝有，哪個單位都有，因為去延安的多數是愛好文藝的人。《七月》編得好、發表的作品也好。1938年賀敬之已經在《七月》上發表詩了，他也有《七月》。

---

1938年1月，史沫特萊到了漢口，以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和中國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身份，一面救護傷患和難民，一面報導中國抗戰，並向世界性組織呼籲救援。在漢口，史沫特萊多次訪問美國大使館，接觸約翰·大衛斯、佛蘭克多恩、史迪威和陳納德等後來影響美國制定對華政策的重要人

---

42 劉雪葦給胡風的信，引自《曉風胡風創辦《七月》和《希望》》，見《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3期），190頁。



# 七月



左上：留法歸國的詩人艾青在胡風的雜誌上發表了很多詩篇；右上：胡風以魯迅題寫的兩個字作為《七月》雜誌的標題，繼承魯迅遺志推動新文學運動；下：胡風在魯迅去世三周年的紀念大會上講話。

物。史沫特萊以極大的熱情為中國紅十字會募捐，不僅從美英大使館、標準石油公司、國民黨的高級官員那裏捐得款項，還從財政部長宋子文、行政院長孔祥熙手中都捐得巨額支票。1938年3月，包括白求恩、柯棣華在內的印度援華醫療隊來華，也是她奔走呼籲的結果。之後，她又為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寫了一系列文章，後由《曼徹斯特衛報》轉載，詳細報導了中國新四軍的處境和對藥品的需求。到了春天，可觀的援助從英國和美國紅十字會陸續到來。在這些活動之餘，她還在美國紐約的先鋒新聞社發表了《中國在反擊：一位隨八路軍美國女性的敘述》一書。

第四章

歌頌抑或暴露



中華民族萬歲

在延安，1938年2月，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揚聯名發表〈魯迅藝術學院創立緣起〉，指出「藝術是宣傳、發動與組織群眾的最有力的武器，培養抗戰的藝術工作幹部已是不容稍緩的工作，因此創立魯迅藝術學院」。據胡喬木<sup>1</sup>回憶，1938年4月10日，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大會在延安舉行，毛澤東在成立典禮上，講了「藝術的作用和使命」：

他把經過長征到達陝北的原蘇區文化工作者稱作「山頂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稱作「亭子間的人」，說：「亭子間的人弄出來的東西有時不大好吃，山頂上的人弄出來的東西有時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間的人以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頂上的人也有擺老粗架子的，動不動，『老子兩萬五千里』。」他要求這兩部分人都不要以過去的工作為滿足，都「應該把自大注意出去一點」。「作風應該是統一戰線。統一戰線同時是藝術的指導方向」。<sup>2</sup>

- 1 胡喬木（1912-92），原名胡鼎新，出生於江蘇鹽城。1930-32年就讀於清華大學，1933年插班就讀於浙江大學，1935年被浙江大學開除。從1941年2月起至1969年間任毛澤東的秘書。1945年參與起草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8年後任新華通訊社社長。建國後，歷任新華社社長、新聞總署署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秘書長，中共中央副秘書長等職。參與起草了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年）。1977年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顧問、名譽院長，中共中央副秘書長，毛澤東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1980年當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當選為中共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 2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252頁；原引自〈在魯迅藝術學院開學典禮上的講話〉，見《新中畫報》第432期，1938年4月30日出版。

由此可見，毛澤東已經注意到「山頂上的人」和「亭子間的人」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此處通過風趣的講話點明問題，提出大家不要忘記統一戰線的大業。魯藝第一期設戲劇系、音樂系、美術系等三個學系；從第二期起增設文學系，共四個學系；附設文藝工作團、實驗劇團、歌舞團、美術工作團。經過了在陝北公學的短訓之後，會唱歌的薄平被分配到實驗劇團。

1938年3月，在兩個口號論爭中因信惹禍的徐懋庸，帶着林伯渠的介紹信也來到延安。在毛澤東等人代表黨中央和邊區政府舉行的宴會上，他見到了初次到延安的蕭軍，以及已經帶着戰地服務團返回延安的丁玲。張國燾作歡迎詞的時候，誇獎了徐懋庸翻譯的《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即法國巴比塞著《斯大林傳》）。接下來請新來的人發言時，徐懋庸特別說到延安人與人的關係與上海不同。他記得丁玲報告了戰地服務團工作的經過。「然後是蕭軍發言，主要意思是不同意延安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方針，說是把文藝的水平降低了。最後康生<sup>3</sup>作了長篇講話，闡述黨的文藝政策，中間針對蕭軍的發言，不指名地批評了一通，蕭軍竟聽不下去，中途退席。」<sup>4</sup>當時共產黨還沒有甚麼「文藝政策」，這裏徐懋庸記憶有誤，但當時蕭軍的確到了延安。毛澤東聽丁玲說了蕭軍和魯迅的關係，

3 康生（1898-1975），原名張宗可，字少卿，山東諸城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年主要領導人之一，曾經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務。與林彪、江青均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員之一。

4 徐懋庸〈我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觸〉，見《徐懋庸回憶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99頁。

「曾親自到招待所看望他」<sup>5</sup>；後來還想要約見他，但是蕭軍考慮到毛澤東工作忙，謝絕了：這是當時一到延安就急於見到毛澤東的知識分子們所不能理解的。

1938年5月5日，即馬克思誕辰120周年紀念日，延安成立了馬列學院。校址設在延安城北七八里的藍家坪，黨中央負責人之張聞天兼任院長。王實味因為英文好，受到張聞天的賞識，被吸收到馬列學院下屬的編譯部。忙碌的工作讓王實味沒能繼續小說創作，他以一貫的勤奮，專注地翻譯馬列著作。

林賢治：王實味作為一個文學青年起步，完全可以走作家的道路，但他沒有，而是做了馬列著作的翻譯家。我覺得他這種選擇，第一，固然是組織需要；第二，還是當時他自己認為，中國需要這個東西。

宋金壽：馬列學院是延安的最高學府，王實味是進編譯部的第三人。第一個是何錫麟，解放後當過北京師範大學的黨委書記。第二個是柯柏年<sup>6</sup>。後來有十幾個人，還包括陳

- 5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256頁。
- 6 柯柏年（1904—85），原名李春蕃，生於廣東潮安。1924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夏到廣州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政治教官，編輯中共兩廣區委機關刊物《人民週刊》。大革命失敗後到上海，從此改名。抗日戰爭爆發後到延安，任馬列學院西方革命史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國際問題研究室主任。1944年中央軍委成立外事組，任高級聯絡官，以翻譯身份接待中外記者團和美軍延安觀察組。1949年12月任外交部首任美澳司司長，出席過日內瓦會議、中美大使級會談，並在許多國家任駐外大使，文革期間被召回國。1973年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1981年聘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組評議委員。譯有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等。

伯達<sup>7</sup>。編譯部的主任本來是張聞天，但他實際上還忙中央的工作，根本就無法照顧這裏，準備讓陳伯達當主任。但陳伯達根本翻不了東西。王實味看不起他，在陳伯達眼裏王實味就是敵人。

曾彥修：王實味高高瘦瘦、很嚴肅。我當時剛19歲，王實味恐怕30多了，我們都是晚輩，見到他都規規矩矩的、微微地頷首表示打個招呼就過去了。知道他是老革命，知道他個性很強，當時也確實無法和他交談，因為他無論哪方面都比我們高得太多了。我們在延安看到了很多馬列學院同志們翻譯的書，王實味、柯柏年、何錫麟三個同志，當時講翻譯水平都不錯，但我們覺得王實味的翻譯文字比較好。

王實味的學生高向明，這時候也被分配到了馬列學院學習。

高向明：我跟王實味比較熟不是因為我是他的學生，我們開封女中有幾十個人去了延安！我跟他一個單位，聽報告都在一起，所以常見面。王實味翻譯馬列主義著作有稿費，他就買肉，沒有鍋，拿個大鑊子，在炭火上煮得挺爛

7 陳伯達（1904—89），福建惠安人。1924年到上海，任《廈聲報》駐上海記者，同時在上海大學文學系學習。1925年春回廈門，加入中國國民黨，隨即赴廣州入讀中山大學文學院。1926年，任國民黨汕頭市黨部秘書，後來任國民革命軍獨立團團長張貞的秘書。1927年3月，何應欽在福建清共，張貞秘密送陳伯達赴上海。1927年4月下旬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返回中國，在北平中國大學任教，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傳部部長。1937年去延安。先後在陝北公學、中共中央黨校當教員，馬列學院副院長。1939年春，調到主席辦公室，成為毛澤東的秘書。



乎。他一個人住窯洞，我們住集體宿舍，有時候就去看看他，周末去吃過幾次紅燒肉。後來運動當中讓我們交代，這也是跟王實味關係當中的一點。

---

劉瑩回憶初到延安的王實味，給家裏的信寫得很密。但戰火很快就讓他們和幫忙轉信的人失去了聯繫<sup>8</sup>。薄平回憶後來王實味的家書全被退回，他疑心自己已經家破人亡，經常會掉淚。在寂寞、擔憂的一年多時間裏，王實味對偶然來訪的薄平好感越來越強了，還在1938年動員她入了黨。

---

薄平：到王實味窯洞去吃紅燒肉，他就說，「薄平，將來我給你寫一本書，你很不簡單啊！延安來了這麼多人，有幾個像你這樣，槍林彈雨跑着來的啊！」就這樣一點一點對我表示好感了。當時我覺得我們不合適，王實味比我大12歲。他身體不好，甚麼愛好也沒有，一天到晚就趴桌子上譯書。我呢，喜歡音樂，而且覺得延安那個地方根本不適合結婚。那時候在延安，別人不認識的不敢說真話。但我到了王實味那兒，可以無所不談，確實是有種「家」的感覺。他約我到河邊散步，說了他對我的想法。他說我的性格、能力、資歷各方面都有很大可塑性。「我想跟你結合，我要培養你，你要有系統地讀書，另外你要跟我學英語。你學唱歌，畢竟藝術生命很難說的。」這次談話之後我仍在猶豫，他寫了一封信給我，我覺得這封信起了很

8 劉瑩〈沉痛的訴說，無限的思念〉，158頁。



上：愛好音樂的薄平從實驗劇團轉到了魯藝音樂系，志向是做一位女指揮；  
下：坐落在橋兒溝的魯迅藝術學院入口。

大作用。信裏頭講，純粹的愛情，一見鍾情，兩個人我看你美、你看我美，是緣分；再有一種就是理性的、為了共同事業和理想，開始可能沒有愛情，後來能創造出愛情，就舉例說孫中山和宋慶齡。他說，你要很理智地考慮這個問題，你跟我相處半年、一年，我會是世界上最懂得怎麼來愛你的人。

---

此時雖是國共合作期間，但國民黨還是想辦法攔截去延安的青年。日本人佔領西安之後，生於1922年的何方，因自己的中學搬遷，參加了馮文彬為主任、胡喬木為副主任的青年訓練班。一群年輕人唱着歌走到半路，被國民黨的部隊攔住了。

---

何方：「你們到哪去？」我們說，到延安去參加八路軍。「你們小孩參加八路軍能幹甚麼？你們打不了仗，還是留下來建國吧！」於是把我們抓回去，經常訓話，勸我們不要誤入迷途。這樣搞了一陣以後，我們一看好像出也出不去，有人看着，於是大家一商量，就翻牆跑了。那時共產黨在西安有兩個公開機構：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和八路軍辦事處。我們先跑到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受到熱烈的招待，把我們誇獎一番。然後是到八路軍辦事處，一些人決定回家，繼續上學去；我們三個人覺得回去多丟人啊，下決心要去自由的延安。

---

當時去延安，路費必不可少，何方因為從西安去，比較近，只花了20元。

何方：田家英<sup>9</sup>和曾彥修他們說我參加革命好像很便宜，他們從四川到延安花了50塊錢。參加革命要自己花錢才能參加，所以說咱們的成分就不可能是純粹的貧下中農、無產階級、沒錢的人。去延安的一般來說都是有些錢的人，你總得湊個幾十塊錢吧。

賈植芳：知識分子參加革命都是帶着理想去的。因為過去念書人，家裏都有點經濟能力，家裏都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這些人多少讀過馬列主義書，認為蘇聯革命成功了，為了救國、追求光明投靠到延安。那時候延安就是中國的耶路撒冷。

賈植芳的哥哥賈芝已經到了延安，抗戰過程中，賈植芳把自己的嫂子、烈士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和她的弟弟李光華以及兒子護送到了延安，但是他自己沒有留下。他的朋友、作家何滿子也是在1938年秋天到了延安。

何滿子：武漢失守以前，大家都嚮往延安，因為國民黨一塌糊塗。那些貪官污吏，當然跟現在比起來也不覺得多麼厲害了，但是當時看起來就覺得很不像話了。我們覺得延

9 田家英（1922-66），原名曾正昌，四川省成都市雙流縣人，毛澤東五大秘書之一。中學時參加抗日救亡運動，開始接近中國共產黨，並以「田家英」為筆名發表文章。1938年赴延安入陝北公學學習，同年加入共產黨。1941年被選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室，後又調往中共中央宣傳部。1946年被毛澤東聘為其子毛岸英的家庭教師。1948年被胡喬木推薦成為毛澤東的日常秘書。1954年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1966年5月被列入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一黨，遭到迫害，22日被勒令停職反省，23日含冤自殺而死。

安是個新天地，一種新氣象啦，抗日戰爭時共產黨是大叫抗戰、鼓吹民主的。我8月底到了武漢，武漢有八路軍辦事處，我把介紹信給他們看，要到延安，正好是9月1日，我去的目的就是到陝北公學去學習。

---

1938年5至8月間，全國各地知識分子奔赴延安者，據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統計，達2,288人之多，全年共計萬餘人。可以說，在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之後，北京和上海相繼淪陷，延安成為新的文化中心。魯藝文學系成立後，文學系主任空缺，院長周揚曾經寫信請胡風來主持，胡風的妻子梅志也因為每日為家務煩惱，聽說延安有保育院而動過去延安的心，但是考慮到之前與周揚的不愉快，胡風最終還是謝絕了。不過，魯藝第二期開學時，詩人何其芳已經和作家沙汀、卞之琳結伴到達了。

---

王培元<sup>10</sup>：1936年9月，何其芳的散文《畫夢錄》和曹禺的戲劇《日出》、蘆焚的小說《谷》一起獲得了《大公報》文藝獎金，影響很大。何其芳是一個唯美主義的詩人和作家。他的詩集《寓言》當時在文壇已經有了名氣，是京派作家群裏很重要的成員。他當時覺得，共產黨領導着一群八路軍在前線抗日，自己在後方，好像道德上有點不安。他覺得應該到前線去，跟他們一起戰鬥。所以後來他和沙

10 王培元（1955-），山東青島人，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現任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編輯室主任，致力於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文化史研究，著有《抗戰時期的延安魯藝》、《荒野上的薔薇》等書。

汀、卞之琳三個一起，到了延安。去延安路上，他還說，我要保持批評的權利。

---

到延安後，何其芳就寫了散文〈我歌唱延安〉，表達了他心裏的感動。三個新來者提出要見毛澤東，很快就見到了。他們記得毛澤東的頭髮理得不整齊，但人卻很精神。

---

王培元：何其芳就提出，我要寫延安，我想上前線去。毛澤東說，延安有甚麼好寫的呢？延安不過是三座山，不過也還是有一點兒可寫的吧；又說，知識分子、作家，應該到前線去。這次會見很愉快，他們提出要穿八路軍軍服，很快就穿上了。尤其是何其芳，很高興，覺得自己是這個隊伍中的一員了。他後來的夫人牟決鳴是魯藝的學生，她說沒見過何其芳之前，想像《畫夢錄》的作者，應該是一個穿着長袍、瘦瘦的、比較有浪漫氣質的。沒想到見了何其芳呢，穿着軍裝、黑黑的、胖胖的，跟她的想像完全不一樣。何其芳到了魯藝以後做了文學系主任，沙汀和卞之琳都一起在那教書。當時魯藝的學制是三三制，就是在學校學習三個月、到前線實習三個月、回到學校再學三個月就畢業了。後來賀龍正好回到了延安，他們就想跟賀龍一起到前線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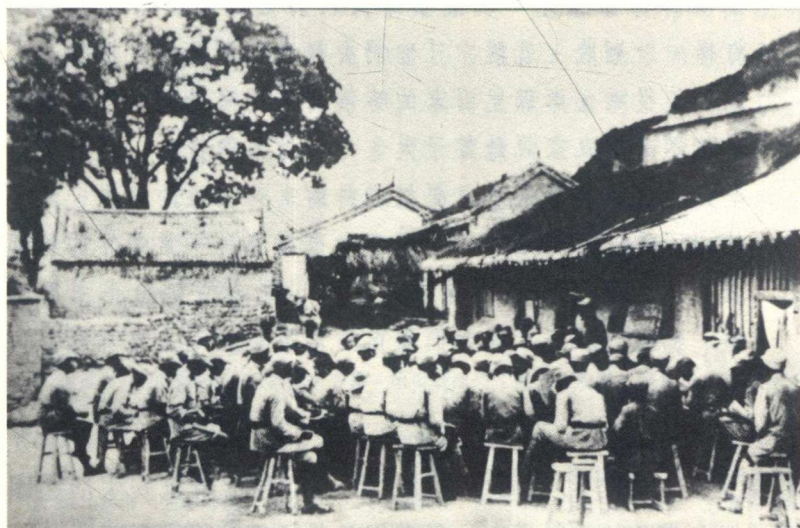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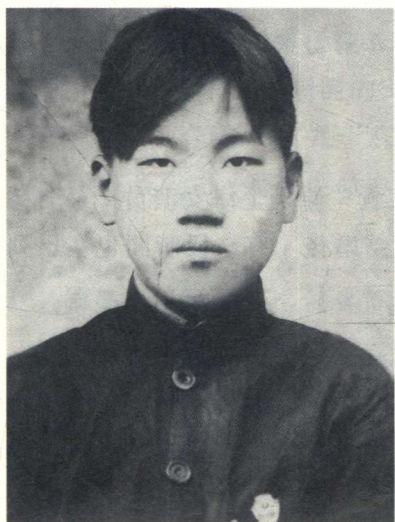
---

當時延安的氣氛是輕鬆活躍的。在何方的回憶中，初到延安的時候，物質條件雖然艱苦，生活卻有一番新鮮活潑的氣象。

何方：我們抗大旁邊有個溝原來叫「大貶溝」，後來改成「文化溝」了。禮拜天我們都到文化溝或新市場轉一轉，和誰見了面可以打、也可以不打招呼，確實比較平等。毛主席來做報告都騎馬，周恩來也騎馬；老頭騎馬怕掉下來，像吳玉章<sup>11</sup>來做報告就騎毛驢。大部分人都是步行，走十幾里很正常。生活很艱苦，沒多少吃的，穿的就是自己帶的，最後實在不行了，公家才給發一套棉衣。襯衣也沒有，大家大鋪睡覺都是光着睡的。日本人飛機經常來轟炸，動不動半夜三更要起來「跑飛機」：夏天好辦，冬天冷啊！大家願意看甚麼、學甚麼都行。我在延安學了很多「黃色歌曲」，〈何日君再來〉、〈桃花江〉、〈夜半歌聲〉甚麼的，沒人管，精神上非常舒暢。

曾彥修：1938年7月1號那天，大概延安第一次紀念建黨17周年，黨校開紀念大會，請馬列學院的所有學員去參加，同時中午、晚上會餐。黨校在延安城東十幾二十里，馬列學院在北門外七八里路。我們天不亮就出發，到那裏殺豬宰羊，大吃一頓。中午開會時，還有幾個美共青年參加。康生當主席，張聞天作報告，晚上演京戲《打漁殺家》。江青演女兒蕭桂英，演得很好。那時江青二十七八歲吧，

11 吳玉章（1878-1966），1903年留學日本，1905年參加了中國同盟會。1911年歸國後回到四川，參加了保路運動。武昌起義後，他參加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工作，曾任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1922-24年任成都高等師範學校（四川大學前身）校長。1925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11月，南昌起義失敗後，赴蘇聯，在東方大學等校學習、任教。1935年11月，中國共產黨的派遣吳玉章往法國巴黎負責《救國時報》工作。1938年4月返回中國，抵重慶。1939年11月，吳玉章到延安，任延安憲政促進會會長、陝甘寧邊區新文字協會會長、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陝甘寧邊區政府文化委員會主任等職。



上：學生時代（左）和1939年在延安（右）的何方；下：延安的露天課堂。



很漂亮。那時就知道，江青不但會演電影，還會演京戲。康生當時是黨校校長，動員江青出來演蕭桂英，康生自己指揮樂隊。

---

早在1937年就到達延安的江青，原是上海女演員，藝名藍蘋<sup>12</sup>。1938年秋天，她和毛澤東結婚後，有一段時間也在馬列學院學習。

---

高向明：我當時跟江青一個宿舍，炕上住五個人，地下搭個鋪住一個。她要挑最好的位置，中間的位置兩邊擠，她要把邊。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六個人在一起住了大概半年。江青住那兒，就擺主席夫人的架子，每天衛生也不打掃，一到晚上就說：「你們去打洗腳水吧。」禮拜一早晨，她從毛主席那兒回來的時候騎馬到河邊，過了河她就不騎了，怕人家說她架子大。毛主席來做報告，她就趕快坐到最前頭。本來坐位要按班排的，一個班的人坐一起，但她不受任何約束。她穿衣裳也很講究，平常都穿的幹部服，有次穿了件兔毛線織的毛衣，說老百姓給毛主席送的，她穿上正好。在我們面前經常炫耀在毛主席那兒如何如何。

---

毛澤東夫人也要和普通學員睡大炕，可見當時延安生活之困難。但在當時的情勢之下，很多知識分子仍舊陸續到達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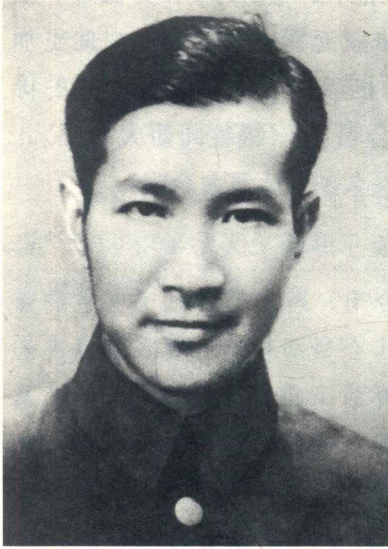
---

12 藍蘋，即江青（1914-91），本名李雲鶴，毛澤東的第四任妻子（毛為其第三任丈夫），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作為四人幫成員之一而知名。曾從事戲劇和電影表演；1938年去延安，後與中共領袖毛澤東結婚。

1938年11月，著名作曲家、指揮家冼星海<sup>13</sup>和男低音歌唱家杜矢甲<sup>14</sup>到延安魯藝任教。本來就充滿歌聲的延安從此更加熱鬧。當時還在實驗劇團的薄平也參加了上百人大合唱的排練：〈生產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犧牲同盟大合唱〉，當然還有最成功、藝術生命力最長久的〈黃河大合唱〉。

薄平：四個聲部唱〈黃河大合唱〉時，我自己唱，也聽着別的聲部，那和諧、那種美！合唱那種魅力啊，讓我完全陶醉其中。杜矢甲是上海音專的，晚會上經常表演〈暴風雨要來了〉，特別能夠表現男低音的渾厚。有天半路上碰到他，我說，「杜老師，我在實驗劇團，但我不願意唱京劇，每天吊嗓子啊啊吶吶這樣叫，這跟唱歌有關係沒有啊？」他說不但沒關係，而且唱壞了。他說你調來魯藝音樂系，第三期馬上開始了。我馬上就申請調去了。學期一開始，冼星海開指揮、音樂欣賞課。我覺得指揮那個棒子可吸引人啦！後來我問他，女生能不能學指揮啊？他說，「太能了！將來我們魯藝出個女指揮家。」就鼓勵我。

- 13 冼星海（1905-45），祖籍廣東番禺，出生於澳門，近代作曲家、鋼琴家，〈黃河大合唱〉最廣為人知。
- 14 杜矢甲（1915.3-）北京市人，回族，男低音歌唱家、作曲家。1934年入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學聲樂，師從蘇聯歌唱家蘇石林。1937年投入抗日歌詠活動，先後參加上海、湖南、武漢等地的演劇團體。1938年起，在延安魯藝音樂系任教，並曾於1941年在延安魯藝舉行獨唱音樂會，演唱了蘇聯紅軍歌曲〈我們是紅色戰士〉、〈穿過海洋、穿過海浪〉以及歐美作曲家的浪漫曲、歌劇選曲等。1949年調中央實驗歌劇院。1952年調中央民族歌舞團任創作室主任、音樂指導。創作歌曲三十餘首，代表曲目有〈淮河船夫曲〉（1938）、〈蒙古馬〉（1940）、〈七枝花〉（1942）、〈八路軍新四軍歌〉（1941）、〈河裏水〉（1940）等自己創作的歌曲以及改編歌曲〈天下黃河幾千幾道灣〉（1979）等。



左上：著名留法作曲家冼星海；右上：《黄河大合唱》詞作者光未然；下：冼星海指揮排練《黄河大合唱》。

薄平後來在鄭州的中學做音樂老師，退休後還參加過老年合唱團，做過指揮。我們採訪薄平時，她在一位歌唱家的鋼琴伴奏中，為我們高歌了一曲〈延安頌〉。這首歌由魯藝文學系學生莫耶<sup>15</sup>填詞、朝鮮作曲家鄭律成<sup>16</sup>譜曲，抒情和戰鬥氣息並存，在當時被認為是延安精神的象徵。歌詞的第一段是：

夕陽輝耀着山頭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邊的流螢。  
春風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結成了堅固的圍屏。  
哦，延安！  
你這莊嚴雄偉的古城，  
到處傳遍了抗戰的歌聲。

1938年入冬一場大雪之後，沙汀和何其芳帶着魯藝師生，包括〈延安頌〉的詞作者莫耶，跟隨賀龍的部隊一起出發上前線了。戰場上的生活沒有想像中浪漫，勝利凱旋、攻克城

- 15 莫耶（1918—86），原名陳淑媛，福建安溪縣人。1932年隨父居廈門，就讀女中期間開始發表作品。1934年秋前往上海，在《女子月刊》社任校對、編輯、主編。抗戰爆發後，投身抗日宣傳和救濟難民工作。1937年10月赴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更名莫耶。1938年春進入魯藝戲劇系，夏天轉入文學系，創作了〈延安頌〉等歌曲。1938年冬隨八路军120師奔赴華北抗日前線，期間創作了大量文藝作品。1941年因小說《麗萍的煩惱》受到批判，1943年由於家庭出身又受審查。1944年春，在賀龍等領導的關懷下，調任晉綏軍區《戰鬥報》編輯、記者，1949年後任西北軍區《人民軍隊報》主編、總編輯，1950年入黨。1955年轉業到《甘肅日報》社任副總編輯，1956年刊發鐵路職工張凌虛被官僚主義逼得精神失常的事件，引起極大反響。1957年被錯劃右派。1962年臨時主持《甘肅日報》，1965年「四清」運動中因歷史舊帳再受批判，文革中受到嚴厲批判並下放農場勞改。1979年冤案平反，重新開始創作。
- 16 鄭律成（1918—76），朝鮮族作曲家，原名鄭富恩，生於韓國光州，1950年後歸化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籍。

市的情景都沒有出現，部隊被敵軍追趕着，不斷地夜行軍。官兵對這些新來者有些不滿。

---

王培元：我們還得保護他們，伺候他們，對不對？他們不就是戴着眼鏡的知識分子嘛！何其芳他們這些魯藝師生，也很苦悶。他們本來到前線去，是要跟八路軍指戰員打成一片的，要寫戰爭、寫八路軍指戰員抗日的事蹟，結果淨是被別人保護了。天上有飛機轟炸，周圍還有日軍、偽軍追擊，哪有時間、精力去採訪？沒有。

---

原定前方實習的三個月期限很快到了。但是賀龍等人並不贊成魯藝師生馬上離開，還是希望他們能寫些報導，做一些節目演出來鼓舞士氣。可大部分師生覺得和八路軍官兵很難交流，加上在前線的魯藝女生被單身的八路軍指戰員追求，造成男生的不滿，雙方發生了矛盾。何其芳等人給魯藝院長周揚發電報，希望返校。最後，雙方達成妥協，一部分願意留在前線的學生，譬如莫耶等人，繼續留在部隊。而沙汀和何其芳則帶着其他學生踏上了回延安的路程。對於自己在前方數月只寫出一篇報告文學，何其芳感到很不滿意，不過回到延安後他心情舒暢了很多，很快又開始寫詩了。

---

王培元：當時延安有很多窯洞裏辦的沙龍。何其芳寫了詩以後，往往會在沙龍裏朗誦他的詩。這之前，何其芳還悄悄地到延河邊兒上，對着延河水，先把自己的詩朗誦一遍。他在延安寫了很多夜歌，因為他晚上經常失眠。他的

學生馮木回憶，說記得何其芳的夜歌很多，絕對不止後來收入詩集的那麼幾首。

---

何其芳白天忙碌地處理着工作中的各種事物，對生活充滿了熱愛。一個晴朗的早晨，一隊早操的士兵，一群被鐘聲叫醒的學生，都能讓他感到歌唱的衝動。就是這時候，他寫下那首著名的〈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

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  
我歌唱早晨，  
我歌唱希望，  
我歌唱那些屬於未來的事物  
我歌唱正在生長的力量。

我的歌呵，  
你飛吧，  
飛到年輕人的心中  
去找你停留的地方。

所有使我像草一樣顫抖過的  
快樂或者好的思想，  
都變成聲音飛到四方八面去吧，  
不管它像一陣微風  
或者一片陽光。

輕輕地從我琴弦上  
失掉了成年的憂傷，  
我重新變得年輕了，  
我的血流得很快，  
對於生活我又充滿了夢想，充滿了渴望。

1939年2月的一天，王實味和薄平兩人各自獲得單位領導的批准，結婚了。王實味在窯洞裏擺了一對紅蠟燭，給這個簡單的儀式增添一些喜慶。

---

薄平：結婚以後，我們爬山、看野百合花；然後上街去吃館子、改善生活。延安最有名的兩道菜是三不沾和扁豆泥。三不沾就是不沾口、不沾筷子、不沾盤子，是糖做的雞蛋，很甜很好吃；扁豆泥也是甜的，每一次進城都要吃這兩樣。這是婚姻生活剛開始。後來轉入學習，他對我實行「封閉式的養護」，把我關在屋子，一個禮拜就見一次，訂讀書計畫、看書，然後寫心得。星期天給我一本書，這個禮拜要看完。我後來能寫點東西，都是在王實味那兒喝了點墨水。我現在90多歲了，回想起來，覺得我人生裏邊，最有尊嚴的時候就是跟王實味相處那時候。我一生坎坷，他對我的好，我真是終身難忘。

---

應該在此補充的是，王實味和薄平的婚姻有個特殊背景，就是由於當時戰亂中很多夫妻分離，在延安只要兩廂情願，男女雙方各自獲得單位的批准，就可以「結婚」。此後婚姻維持多久，則視乎個人。

在日軍開始越來越頻繁地轟炸延安時，國民黨也開始對解放區進行物資和人員流動的封鎖。延安的經濟陷入了極大的困難，幾乎不能維持供給制，基本衣食成了大問題。面對困境，1939年1月初，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在陝甘寧邊區第一屆會議

上講話時，正式提出了「發展生產，自力更生」的口號，號召邊區人民群眾和部隊、機關、學校全體人員開展必要的生產。

何方：陝北一百多萬老百姓，要養差不多十萬脫產幹部，負擔太重，有人希望把毛澤東打死。毛澤東聽到了，發現農民負擔太重，於是提倡「自力更生」，就是大家都生產。我1939年就開始參加勞動，自己開荒種地。那時我16歲，吃一大碗小米飯，然後就去開荒，非常用勁，當時人家給我評成勞動英雄。不過我從16歲得了胃病，得了70多年了。

魯藝校長周揚的女兒周密回憶，

周密：我記得在延安，有一陣大家都有定額要勞動，就給我媽媽發一大堆羊毛。晚上點着燈，我就幫她捲，用根棍兒捲成一個一個羊毛卷兒。然後第二天她就紡，紡好以後就織出來一件戰士穿的開衫毛衣，染成一個草綠色的。我媽媽手快，一天能織出一件毛衣來。我爸爸的定額他基本上完不成，都是我媽媽一個人承擔兩個人的工作。

並不是所有來延安的人都能適應這裏的生活，1938年9月進入陝北公學學習的何滿子，1939年5月就離開了延安，他說主要有三個原因。



---

何滿子：一是我喜歡讀書，那邊沒書，圖書館幾本《列寧選集》我老早看過了。二是吃黃米飯，沒有肉，最好也就是青菜加點豆腐，大便拉不出來。我們去合作社吃頓包子、吃頓麵，馬上有人來打游擊，就是我付錢他吃，但這些人還去報告說我過資產階級生活。比較蔣管區，延安政策、生活上比較自由，貪官污吏沒看到。裏面各種政治活動看得清清楚楚，一發表意見，就有人來批判。譬如我們學院每月有一塊錢津貼、一塊錢清潔費，但又動員你上交。我跟黃華講，不發就不發，何必又要發、又要交。結果有人報告上去，大家開會批判我對組織不信任。第三呢，我和一個女朋友一道去的，她後來跟了抗大分校的一個老首長，這對我有點刺激。最後國民黨封鎖、糧食不夠，每天幾個鐘頭要去開荒，我吃不消。當時確實是來去自由，打個報告，我就和黃華兩個一道出來了。

---

何滿子說的這些問題其實在延安一直持續着，但同時，也還是有年輕人不斷地到達延安。在臨潼出生的詩人灰娃，1939年底跟着馮文彬和胡喬木領導的安吳青年訓練班到延安時，只有12歲。

---

灰娃：我剛去，延安新成立了澤東青年幹部學校，有前方回來的青年人，也有大後方來的青年人，編了高級班、中級班、藝術班，我們兒童班一共有十來個孩子。老師上課講革命理論，我問的都是最淺顯的問題：甚麼叫國民黨、共產黨？後來慢慢知道共產黨是一個組織，目標就是在全



灰娃（上圖：圓排右側女孩；下圖：前排左一）所在的兒童藝術學園的孩子們。

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中國首先要將日本人打跑，之後就能建設新的中國。

---

我問當時還是孩子的灰娃，能否吃飽？

---

灰娃：有時吃不飽、有時能吃飽。新鮮糧食入國庫供應前方了，我們就吃放了好幾年的小米，開始沒有菜。我們用兩個木桶架在毛驢身上，把延河的水拖回來，拿個大鍋煮黑豆，十個人圍一圈吃飯，中間很小一盆鹽水黑豆就是菜了。後來自己種番茄、蘿蔔、黃瓜、老玉米，生活就改善了。穿西服去延安的人，冬天就把舊西服領子塞好多棉花，像大元寶似的沒樣子，暖和就行。有個人天氣冷了還只有單衣，出操時冷得沒辦法，把紅緞被子披出來做操，大家都笑。現在回想，生活那麼苦，每天卻很樂觀、不知憂愁，我想是因為有理想，除去中央領導的年紀大點，周圍沒見過甚麼老人，而且我是小孩，大家都保護我、照顧我。

---

與灰娃差不多同時到延安的，還有左聯盟員、經受過牢獄之災、曾為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和參贊卡爾遜作翻譯的周立波。

---

王培元：周立波老家是湖南益陽人，他和周揚是堂叔侄關係。他到延安前，魯藝文學系的學生已經傳開了，說要來一個周老師，參加過飛行集會，巡捕追捕時，他還動過刀

子。有學生回憶說，有天在窯洞裏看見了新來的老師，個子很高，拿着一本書在那兒讀英文詩。周老師給他們上名著選讀，讀的是歐美19世紀的文學作品，莫泊桑、托爾斯泰。他的名著選讀課是魯藝的名師名課。他給文學系學生講課，魯藝全校學生都來聽，名氣傳到校外，延安很多文化人，從好遠的地方趕來聽他的課。很多學生都回憶過他講課的情景，課堂討論很精彩，最精彩的就是《安娜卡列尼娜》，討論托爾斯泰的思想、藝術、宗教，討論托爾斯泰和農奴制的關係、對農奴制的批判，談過很多問題。有些學生也很有水平，在周立波的指導下，居然把課堂討論寫成文章，在《解放日報》發表。

---

1939年，抗戰進入了相持階段，共產黨開始有意識地保護自己的知識分子力量。在1938年8月考入抗大的黎辛，經過一段在前方的日子，回到了延安。

---

黎辛：我是抗大第四期學生，1939年我在太行解放區、在前線。毛澤東的方針是留一部分人在敵後打日本、一部分人回延安。我1939年末回到延安。我原來是抗大的，學習以軍事為主，我想打仗，不想幹普通工作。調我回延安，我考了魯藝文學系的第三期。當時正在貫徹中央的教育改革，強調教育正規化。

---

當時周揚到魯藝當校長不久，其他延安的大學也紛紛進入了所謂正規化、專門化教學的時期。

---

王培元：國民黨封鎖延安，日本也封鎖，延安不像抗戰初期有大量的知識青年湧入了。延安辦了抗大、陝北公學、魯藝這些學校，是為了培訓不同戰線的幹部。後來沒有生源了，教育部發佈文件讓延安各個學校延長學制，轉入正規化。周揚的中國新文學史論是名課。很多作家回憶，周揚講話時，目光炯炯、滔滔不絕、旁徵博引。延安當時有種演講的風氣，毛澤東這些人都經常演講。

周密：我父親（周揚）那時候當魯藝院長，窯洞就是辦公室。魯藝經常有人來，我也搞不清哪些是學生、哪些是教員，反正跟他爭論一些問題，很自然、很平等。兩個人一邊支着個桌子，吵的時候都站在桌子兩邊，現在想都是30來歲的年輕人。那個時候的人之間很平等，誰也沒甚麼官架子。

---

1939年底，毛澤東已經意識到知識分子和延安各部門、尤其是和軍隊官兵的矛盾，於是發佈了一個黨內指示，叫《大量吸收知識分子》。

---

朱正：這個指示就說，沒有大量知識分子參加，我們的事業就不能取得勝利。資產階級政黨——就是國民黨——正在拼命和我們爭奪知識分子。國民黨爭取知識分子太容易了，你要做官，我給你做官；你要錢，可以給錢。共產黨沒官給人做，也沒錢可以給人家。用甚麼辦法爭奪知識分子？就是以魯迅為中介。毛澤東知道，魯迅在中國知識分



左上：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周揚；右上：周揚的女兒周密和兒子；下：周立波在給學生講課。

子心目中有很崇高的地位，現在他們看到，共產黨的領袖也這麼讚美魯迅，那麼我們和共產黨就有一個共同點了。所以毛澤東讚美魯迅，最初完全是爭奪知識分子的一種策略手段。

---

這個指示發佈後，雖然大生產已經開始，但指示中有些政策，譬如給作家充分的時間創作、不必參加日常公務，要各部門理解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尊重知識分子等等，的確對知識分子是很有吸引力的。

---

何方：我17歲抗大畢業時成績好，當了政治助教，不用開荒了。馬列主義著作念得幾乎會背，小冊子念完念《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空想共產黨的科學發展》、《法蘭西內戰》這些都非常熟。學生冷不防問你個問題怎麼辦？我好面子，弄得很緊張，自己看書寫了好多筆記。後來有次周恩來問我，你《紅樓夢》那麼熟，在哪念的？我說在延安啊！《紅樓夢》詩詞都會背。他們當場考我說，《桃花行》，我就全背出來。其實是抬大糞的時候學的，上山下山不方便讀，一到平地上就邊走邊讀。這樣把那時講的五大名著——《貴族之家》、《父與子》、《前夜》、《羅亭》、《安娜卡列尼娜》都看了。因為書少人多，每個人只有一個禮拜，休息時也硬睜着眼奮讀。當助教以後勞動少，《今日新聞》由我來看，我們連長不識字、指導員沒興趣，於是就我給大家做時事報告。

---

薄平轉到魯藝音樂系學習之後，因為學習緊張，路途遙遠，周末也不願意到王實味那裏去了。

薄平：實驗劇團半小時就到馬列學院，但是從魯藝所在的橋兒溝走路要一個多小時。我剛到魯藝來不及跟他說，他到實驗劇團找不到我，跑到橋兒溝來，禮拜六要接我上他那裏去。我覺得結婚以後，他好像限制我的自由。有時我想去外頭打飯，在窯洞外面唱個〈馬賽曲〉，他看見有人看我，就不讓我出門。我感覺他把我圈起來。後來功課太忙我就不想去他那兒，躲着他。有天傍晚下雨，我鑽到農民挖的小洞裏避雨，他到處找我找不到，後來聽見狼叫，我害怕了才出來。他就說我們的感情沒有前途，不向組織彙報、向群眾聲明，我們悄悄地就分開了。我心裏煩惱，回去就發燒了，一燒就是七天，嘴唇起泡、痔瘡也犯了。這時魯藝第三期已經結業了，我被分到邊區中學當音樂教員，離開了延安。所以我們一年的婚姻，實際相聚的時間也就是星期六，有50天左右。

這時薄平的同學高向明也從馬列學院畢業，被分到富縣工作。

高向明：富縣離延安還有90公里，不像延安那麼紅，國民黨查得也就沒那麼嚴。王實味說他離家好久，想再給家裏寫信，但是從延安發信太扎眼，就托我在富縣發。這樣前後幫他寄了七、八封信，都沒有回信，也不知道他家裏收到沒有，或是被國民黨郵局扣下了。



1940年春，王實味和劉瑩的北大同學曹孟君，催促劉瑩經重慶去延安，還寄了130元的路費。結果劉瑩帶着孩子經由水路到湖北常德，因為宜昌失守，水路不通，只好從陸路到了湖南沅陵，但因為盤纏所剩無幾，只好暫時留在沅陵中學教書。王旭楓回憶，劉瑩是一位進步、熱心的老師，學生都十分尊敬她，她後來也一直以教書為業。戰爭的緣故，他們母子三人要到1947年秋天才回到家鄉，但最終也未能和王實味團圓<sup>17</sup>。

在抗戰初期，延安的文學活動和文學社團一直由邊區文協代為領導，但是當延安地區作家隊伍日漸壯大時，他們就成立了「陝甘寧邊區文藝界抗敵聯合會」，簡稱文聯<sup>18</sup>。文聯作為邊區文化協會（簡稱文協）的一個子單位，並沒有獨立活動的職權。於是在1939年5月，成立八個月後，由邊區文協主辦的文藝刊物《文藝突擊》發佈了這樣一條啟事：

邊區文藝界抗戰聯合會為與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取得密切的聯繫起見，於5月14日下午在文協召開全體大會，決定改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簡稱文抗），選舉成仿吾、周揚、蕭三、丁玲、艾思奇、柯仲平、沙可夫、嚴文井、趙毅敏、陳學昭、張振亞等為理事。<sup>19</sup>

「文抗」成立後不久，新當選的理事會推舉周揚、蕭三、沙可夫三人為常務理事；半年後又進一步擴大理事會，選舉丁玲、

17 劉瑩〈沉痛的訴說，無限的思念〉，159頁。

18 程鴻彬〈延安「文抗」創建始末以及相關問題〉，見《新文學史料》（2008年第4期），163頁。

19 同上，164頁。

蕭三、周揚、周文、曹葆華等五人為常務理事，分別負責組織部、出版部、研究部、總務部。簡言之，「文抗」更像是作家們自己的文學社團，而不是一個黨領導的行政組織。

1940年6月，魯迅晚年珍視的作家蕭軍二次來到延安。1937年上海淪陷後，蕭軍離開上海先到武漢，後來一度想上前線，1938年3月首次達延安。因為歡迎會上聽到的關於文藝和政治的說法不合心意，他很快離開延安。兩年後，已經有家小的蕭軍返回延安，並且一住就是五年。在延安期間，他一直處在想要創作、又無法靜心創作的狀態，每天唯一能夠堅持的就是寫日記，讓我們今天有了90萬字的《延安日記》。它不僅完整記錄了蕭軍在延安的思想和活動，還生動地勾畫出延安文人、政治家的肖像。同時，從他的日記中我們還看到世界大事，雖然延安的報紙會登，但在延安並沒有引起太大的影響；譬如蘇聯德國之間戰爭的爆發，譬如1940年夏天，托洛斯基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的人暗殺。

1940年8月21日，流亡多年，當時居住在墨西哥的托洛斯基被暗殺。兇手拉蒙莫卡德受斯大林派遣，潛伏在托洛斯基身邊很久，獲得了他的信任。一個雨天，他把一把鑿冰的斧子藏在雨衣裏，進入了托洛斯基的書房，拿出一篇文章請他看，托洛斯基不太情願，但還是坐下來。莫卡德趁他看文章的時候，用斧子向他腦後猛擊，但托洛斯基沒有倒下，大叫着同他搏鬥。托洛斯基的保鏢衝進來幾乎殺死了莫卡德，但是被托洛斯基制止了。他被送往醫院搶救，但因腦部嚴重損傷，一天後死亡。至此，斯大林終於消滅了列寧遺囑中提到的六位政治局委員中的其他五位，也就是曾經一度和他分庭抗禮的所有政敵。

在此之前，曾經幫助斯大林排擠托洛斯基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於1936年8月被槍斃；而布哈林和李可夫則以「右派和托洛斯基聯盟陰謀集團」的罪名於1938年3月14日被槍決。托洛斯基生前一直不停地寫作，死前未來得及整理完成的手稿「斯大林傳」<sup>20</sup>後來翻譯成英文出版。雖然延安在1937年就已經視托洛斯基分子為「托匪」，但是大部分人都只是記得延安的報紙登過托洛斯基的死訊，並沒有更多的信息可以真正了解事情的真相。

最為可貴的是，蕭軍的《延安日記》給研究王實味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材料。大多數對王實味的記載，都沒有蕭軍的文字那麼生動和貼切。作為一個倔強、獨行的人，他與王實味的性格有相似之處，但是後來令他能夠為王實味辯護，是因為他受魯迅影響至深，有着知識分子的真正秉性。

---

戴晴：到延安時，共產黨人的來源實際上是兩部分。一批人是農民起義領袖，「老子打了天下、就要坐天下」，權利歸我了，我們就排交椅、分權、然後享受權力。另一批人是理想主義者，他們本來家裏沒有問題，也無所謂打天下。當時延安不是有人說，你能坐火車來，幹嘛還要革命？理想主義者覺得社會不公，實現共產主義是他的理想。

賈植芳：傳統中國文人，沒有思想、沒有自己的人格。靠考狀元、舉人，弄個一官半職。但是五四以後的現代知識

---

20 托洛斯基死前未完成的手稿「斯大林傳」，後來被 Charles Malamuth 翻譯成英文於 1941 年出版，書名為 *Stalin: An Appraisal of the Man and His Influence*，但部分章節內容乃 Charles Malamuth 所撰或整理，並非托洛斯基所寫。

分子，和士大夫不同，他們靠自己的技術和能力，醫生、演員、作家、教授，這些都是自由職業者，有選擇的。知識分子有腦筋，你的一言一行，知識分子可以客觀地批判，不會盲目服從。

---

當時在延安，有個性的知識分子並不少，在延安有「四大怪」或者「三大怪」人的說法。除了行動不受約束、說毛澤東只能是他大哥的蕭軍，還有飲食挑剔的著名留法作曲家冼星海，寫出過像〈二月裏來〉這樣的名曲的詩人、戲劇家塞克，「四大怪」還包括王實味。

---

黃昌勇：冼星海和王實味的外形更有文人氣質，塞克和蕭軍卻是彪悍的北方漢子。四個人一致的地方就是性格都很倔強，這跟他們的成長環境，也就是五四以來的大時代有關。五四講個性解放，塑造出了一批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這四個人是典型。他們帶着理想去到延安，但實際生活中卻有很多方面不適應。

灰娃：蕭軍很神氣，帶個貝雷帽，每天唱歌，也用俄文唱。他夫人王德芬很漂亮，我不記得延安「八大美女」是誰了，但肯定有王德芬。我們那時看見她就想，要是長大以後能像她那麼好看就好了。蕭軍經常要約毛澤東，他說魯迅如果是他的父輩，毛澤東就只能是他大哥。老塞克鷹鉤鼻、眼窩很深，跟政治格格不入，每天陰沉着臉，好像對甚麼都不滿。他從來不找毛主席談話，還得毛主席找他。他是我們兒童藝術團的藝術總監，我們唱〈國際歌〉

時分四個聲部，他從來沒滿意過，總說我們唱得味道不足。那是個大藝術家！

---

灰娃不記得「四大怪」的說法，但是她所記得的文抗的三位「怪人」包括戲劇家塞克、男低音杜矢甲和著名畫家張仃。

---

灰娃：張仃頭髮像普希金，穿夾克、皮靴子，老是很嚴肅。杜矢甲穿一件披風，是張仃給他拿毛毯做的，像19世紀的外國人似的；他老是嘻嘻哈哈的、單純得跟孩子一樣。塞克是俄羅斯農民穿的高加索襯衫，繡花領子、寬寬大大，腰裏繫根帶子，手裏拿個手杖，是他在山裏找的樹枝自己做的。當時說他們怪，其實就是有藝術家氣質。

---

1941年初，受共產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也就是新四軍，在和國民黨部隊一連串的摩擦之後，終於在安徽受到圍剿，9,000人的軍隊只有2,000人逃生，史稱「皖南事變」。這件事的發生，與毛澤東沒有做出及時反應有關，但共產黨的宣傳中，通常把這個事件定性為國民黨破壞統一戰線的行為。當時聚集在臨都重慶的胡風等文化界名流，為了抗議國民政府，從重慶出走香港；經常在《七月》雜誌上發表文章的艾青等人，則在事件後選擇去了延安。艾青從1941年3月一直在延安停留至1945年9月。因為艾青當時已經是著名詩人，在他抵達延安次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和宣傳部部長凱豐便找他談話，徵詢他對在延安工作及生活的意向。當時有兩個單位可供



上：蕭軍在延安的窯洞裏；下：蕭軍和夫人王德芬及女兒蕭耘。

艾青任職，一是魯迅藝術學院（魯藝），二是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文抗），艾青選擇了丁玲領導的文抗。當時文抗的作家已經有了一個活動場所。

灰娃：蕭軍去募捐了一點錢，把半山裏一個破房子佈置成「作家俱樂部」。張竹設計了一個大火炬，中間有把大鑰匙，意思是我們藝術家、文化人，像普羅米修士給人間盜火，把光明帶給人間。牆上有很多壁燈，是他拿農民的籬面切成一半扣在牆上，把油燈的燈光反射出來。用木板做的凳子靠牆，牛毛、羊毛毯子鋪在上頭，就全當沙發了。這是延安最摩登、最時尚的地方。艾青、李又然<sup>21</sup>一到俱樂部，大家很多人圍着，就聽他們說法國如何、法國藝術家甚麼樣。

蕭軍日記中記載，毛澤東後來也給「作家俱樂部」繼續捐款。之後，這也是毛澤東和江青周六經常來跳舞的地方<sup>22</sup>。

住在窯洞裏的知識分子們，像他們當年住在上海亭子間時一樣，出現了兩個意見相左的作家群體，就是魯藝和文抗。「魯藝」派以周揚為首，包括何其芳、周立波等在魯藝文學系

21 李又然（1906-84），原名李家齊，生於上海，作家。1928年留學法國巴黎大學哲學系，期間參加法國共產黨所屬中國支部，1935年加入反帝大同盟。1938年赴延安，任中央軍委編譯處編譯，兼任延安女子大學、延安大學教職，並為《七月》撰稿。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延安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界抗敵協會執委，《谷雨》主編。1945年赴東北，曾任《文藝週刊》、《文藝月刊》、《文藝月報》主編。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從事翻譯，後調中央文學研究所教員，政協土改工作團第二十一團黨委委員。

22 蕭軍《蕭軍日記》上卷中，1942年3月19日記載，毛澤東捐款400元，423頁。

任職的作家；「文抗」派以丁玲為首，還有蕭軍、艾青、白朗、舒群。

王培元：何其芳的〈我歌唱延安〉在延安影響很大：「自由的空氣/寬大的空氣/快活的空氣/我走進這個城後首先就嗅着/呼吸着而且滿意着這種空氣」。周立波也是歌頌派的。魯藝美術系主任蔡若虹回憶，他和周立波住隔壁那段時間，有次蔡若虹說當年在上海見過宋慶齡，「那真是中國很偉大的一位女性」。周立波就急了，「哼！共產黨裏有很多偉人，為甚麼單說她！」蔡若虹當時就很吃驚，他的觀念狹隘到這種程度。後來大作家茅盾來延安，魯藝開歡迎會。歡迎辭之後總要有點兒文藝娛樂節目，就請男低音杜矢甲唱他的保留節目〈跳蚤之歌〉。這首歌諷刺意味很強，杜矢甲唱着唱着，周立波就把茶杯「嘮」甩過去了！他意思是，歡迎茅盾，你唱〈跳蚤之歌〉甚麼意思嘛！就把這個晚會給攪了，周揚也很不高興，大家不歡而散。

在延安的「歌頌光明派」和「批判黑暗派」論爭的同時，一些更年輕的知識分子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李銳從學生時代起參加革命，因在湖南的地下工作暴露了，被中央的組織部長博古<sup>23</sup>調往延安，於1939年最後一天和當時的妻子范元甄一起到

23 博古（1907-46），原名秦邦憲，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江蘇無錫人。早年就讀於蘇州工業專門學校，積極參加學生愛國運動。1925年入上海大學學習，參加五卅運動。同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4月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之後又任中共臨時中央局成員、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和負責人。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1年9月-1935年1月，為中國共產黨實際最高領導人，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1935年在遵義會議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領導職務。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野戰部隊政治部主任。1946年4月8日由重慶返延安彙報工作，因飛機失事在山西興縣遇難。



達。李銳被胡喬木安排在中央青委宣傳部工作，范元甄當時是新華社記者，因此進入了延安的最高學府馬列學院。

李銳：當時青委書記是陳雲，組織部長是李昌，宣傳部長是胡喬木，胡文彬是副書記。宣傳部管兩個刊物，一個是《中國青年》，是鉛印的，那是正式的公開刊物；《中國青年》一直辦到現在，沒有停過。另外還有個內部刊物《青年通信》，是個油印刊物。那時辦《中國青年》的幾個人後來都很有名了，譬如許立群<sup>24</sup>、陳企霞<sup>25</sup>、韋君宜<sup>26</sup>、楊永直，楊永直在文革開始時任上海市委的宣傳部長。胡喬木1940年在《中國青年》上用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的名義，發表過一篇文章〈上蔣委員長書〉，批評國民黨、蔣介石，毛澤東就是看中了這篇文章，要胡喬木去跟他當秘書了。

- 24 許立群（1917-2000），原名楊承棟，筆名楊耳，江蘇南京人，原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193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川東特委青委組織部部長、中央青委科長、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員、遼西省委《勝利報》社社長、遼西省教育廳副廳長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又先後出任青年團北京市委書記，團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宣傳部處長、副部長，曾任《紅旗》雜誌副總編輯。
- 25 陳企霞（1913-88），原名陳延桂，浙江鄞縣人，現代作家。1931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次年至上海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3年至滬西郊區從事工農教育，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兩次被捕。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救亡活動。1940年赴延安，先後在中央青委宣傳部、《解放日報》副刊部工作。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歷任全國文聯、文協秘書長，《文藝報》副主編、主編、中國作協理事。1955年因「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冤案而受到錯誤處理。後任杭州大學教師。1979年糾錯，恢復名譽。歷任中國作家協會浙江分會副主席，《民族文學》雜誌主編。著有評論集、小說等，作品收入《企霞文存》。
- 26 韋君宜（1917-2002），原名魏藎一，生於北京。女作家，清華大學肄業。1936年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到延安，後任新華社《中國青年》雜誌編輯，晉綏《中國青年》分版主編。建國後，歷任《中國青年》總編輯，《文藝學習》主編，作家出版社總編輯，《文藝學習》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總編輯、社長，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中國作協文學期刊工作委員會主任。

除了以上兩個刊物以外，青委的年輕人還辦了一個牆報，叫做《輕騎隊》，在延安有些影響。

李銳：毛澤東提拔的軍幹部都是農民，他們在延安的生活作風、定的制度，我們看不慣。我們辦了個《輕騎隊》的壁報，發表的都是針砭延安的文章，連毛都很有興趣。《輕騎隊》開始時有一期批評蕭軍那種囂張的態度。我還寫了一篇〈想當年〉，批評蕭三，因為他在蘇聯留學、娶了蘇聯太太，到了延安寫文章老回憶他在蘇聯、跟高爾基一起開會甚麼，抬高自己。我記得我那個，李富春<sup>27</sup>看了壁報以後碰見我，「啊呀，李銳啊！你罵蕭三啊！」《輕騎隊》開始的時候、整風以前啊，影響很好。連毛澤東都很有興趣，後來想變成鉛印的，中央都同意了，但博古反對，因為怕變成鉛印了以後國民黨知道了麻煩。

可見博古比較謹慎，不想把共產黨內的批評，變成國民黨可以攻擊共產黨的材料。丁玲曾經在回憶中這樣介紹《輕騎隊》：

那時文化溝口有一個壁報，叫做《輕騎隊》，是住在文化溝裏的青委工作的同志們編的。他們還把每期壁報油印若干份，分送有關單位的負責同志和領導人，讓這些人在窯洞裏也能

27 李富春（1900—75），字任之，湖南長沙人。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早年到法國，積極參加留法學生的革命活動。1925年回國後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參與北伐戰爭。1934年參加長征期間，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紅三軍團政委。到達陝北後，任陝甘寧省委書記，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看到壁報。博古同志也有一份，他經常拿到報社編輯部大家傳看。陳企霞沒有來文藝欄之前，曾經是輕騎隊的編委之一。……《輕騎隊》等的文章，短小精悍，對延安生活，有所批評和針砭。<sup>28</sup>

《輕騎隊》主要代表的是一種年輕人批評的聲音，這些人當時還沒有文抗、魯藝那些作家們的名聲，但也是看魯迅雜文成長的。著名作家們當時不過30、40多歲，而《輕騎隊》的作者們大多數只有20多歲。李銳和丁玲都提到的陳企霞，早年曾經在上海的左聯工作過，到延安之後，開始是在青委工作。陳企霞的長子陳恭懷也給我們講了他父親在延安的故事。

---

陳恭懷：馮文彬、胡喬木領導的青委，當時正需要人，陳企霞就到那兒去報到，以後就安排他編青年字典。他們一些年輕人在那兒搞了個《輕騎隊》，有漫畫、有詩歌，他寫了兩首詩，我後來查到資料，一個就說延安的男人找對象很難，延安的女學生找幹部呢，要求王明的口才、博古的頭腦，反正有一套，這種人到哪兒去找？還有一個他說延安的交通很不發達，說通知早上八點開會，他說這山頭到那山頭，看着很近，走走走半天。他們這些文章主席也看了，但有些部隊幹部認為，諷刺得太厲害，有損共產黨的威信，後來《輕騎隊》就受到批評、自動解散了。

---

28 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見《延安文藝回憶錄》，艾克恩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57頁。

1939年創辦的《中國青年》，也發表過不少關於青年工作的文章，偶然也有一些批評文章，譬如批評圍繞婦女問題的文章。《中國青年》編輯之一的韋君宜，到延安之前曾經在清華大學，經歷過一二九運動。1939年她到延安之後，一面熱情地投入工作，在《中國青年》雜誌做編輯；一面就被婦女問題所困擾。在1940年3月1日出版的《中國青年》雜誌中發表了〈新娜拉們走後怎樣〉，沿用魯迅先生的疑問，討論這些帶着理想到達延安的青年女性所面對的現實。應該說，女青年所面對的嚴酷的生存環境，讓她們對於革命理想不斷質疑，而這種質疑，是一股綿綿不絕的潛流，除了三八節，並沒有經常能夠表達的途徑。韋君宜寫道：

抗戰的洪流把成千上萬的女學生、女教員、女職員……女知識青年們解放出來了。烽火、離亂、流亡，是他們離開了家庭，走出了學校，與秋日一起生活秩序告別。許許多多爹娘的嬌女現在都已孤身奔馳萬里，在抗戰學校中，抗戰團體中，以及後方新的政治文化機關中，自管自生活，自管自工作，再無人可以依賴。新中國有幾萬個新娜拉，她們有比挪威的娜拉更英爽的風貌。<sup>29</sup>

接着，韋君宜談到一系列令她困擾的問題，譬如「日常生活中的男女關係上，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譬如當地婦女加入婦救會之後被保守的老百姓說的種種閒話，但是在她看來最嚴重、

29 韋君宜〈新娜拉們走後怎樣〉，見《中國青年》（第2卷第5期，1940年3月1日），20頁。



### 新娜拉們走後怎樣

李君宜

「我總的說這批女子或真的太革命，太敢幹，太聰明，太聰明！」這批青年們放出來了。烽火，離亂，死亡，使她們離開了校園，省下了學校，而當日一切生活秩序皆亂。她們多深憂愁的婦女們在那些荒涼的鄉里，在抗戰陣線中，在艱難艱苦中，以及後方的歐戰文化復興中，自覺自強，自管自工作，再無人可以依賴。新中國有那幾個新娜拉？（註）她們有比那樣的娜拉更英勇的風貌！

新娜拉們走後，生活的圈子比從前日漸擴大，更新。一個個的，昂貴的，多麼從前不會碰的事。她們勇往直前，披荆斬棘，在那些條件下努力創造自己的道路。『奮鬥在，進到了許多新的困難，這些困難使她們漸漸的出來，進來了，然後接洽。』現在倘若許多人在這些困難裏面苦戰，『單靠自己，其實也是新娜拉們中間的一個，即以平日所見所感，總能挑出那點來和娜拉們比較一個。』

第一個問題是，在平常生活中的男女關係上，理應與舊有的矛盾。

娜拉們走後，生活圈子比從前日漸擴大，更新。一個個的，昂貴的，多麼從前不會碰的事。她們勇往直前，披荆斬棘，在那些條件下努力創造自己的道路。『奮鬥在，進到了許多新的困難，這些困難使她們漸漸的出來，進來了，然後接洽。』現在倘若許多人在這些困難裏面苦戰，『單靠自己，其實也是新娜拉們中間的一個，即以平日所見所感，總能挑出那點來和娜拉們比較一個。』

娜拉們走後，生活圈子比從前日漸擴大，更新。一個個的，昂貴的，多麼從前不會碰的事。她們勇往直前，披荆斬棘，在那些條件下努力創造自己的道路。『奮鬥在，進到了許多新的困難，這些困難使她們漸漸的出來，進來了，然後接洽。』現在倘若許多人在這些困難裏面苦戰，『單靠自己，其實也是新娜拉們中間的一個，即以平日所見所感，總能挑出那點來和娜拉們比較一個。』

娜拉們走後，生活圈子比從前日漸擴大，更新。一個個的，昂貴的，多麼從前不會碰的事。她們勇往直前，披荆斬棘，在那些條件下努力創造自己的道路。『奮鬥在，進到了許多新的困難，這些困難使她們漸漸的出來，進來了，然後接洽。』現在倘若許多人在這些困難裏面苦戰，『單靠自己，其實也是新娜拉們中間的一個，即以平日所見所感，總能挑出那點來和娜拉們比較一個。』

第二卷 第四期

# 中國青年



左上：女作家韋君宜；右上：李銳；下：《中國青年》雜誌封面；韋君宜文章〈新娜拉們走後怎樣〉。

最普遍、也最難解決的問題，是知識女青年在邊區這樣的環境面臨的進退兩難的困境：「許多姊妹單身跑出來」，經過東奔西闖，婚姻問題不可避免。結婚就會面臨生小孩，如果照顧小孩，工作上就會落後，因為不論做「老處女」還是做「主婦」都不是她們的期望。大部分婦女結了婚，就會被丈夫視為內人，而在工作中也會被男性同事另眼相看。

當女青年們出來的時候，總是希望很大。往往以為我這一出來，全世界都要拍手歡迎我。同伴對我，應當像巴金小說裏寫的革命者之間那樣天真、那樣美。我處處同男子一樣，誰也不應當看不起我，我要做與男子相同的工作。但是這些女青年碰了壁了。實際上，女青年們在社會上常常被人輕視、歧視。這不是因為能力，不因為學問，只因為她的性別！有些地方不要女子做負責的工作，有些投效軍隊的女青年被退了回來。於是，新的娜拉們悲憤萬端。<sup>30</sup>

文章結束的時候，韋君宜自謙這文章中只寫到一些「極其片段、極其零碎的東西，」但「新中國的娜拉們因為這些問題處處碰壁，碰得頭青臉腫，以致心灰意冷退回舊巢的，真有不少。」<sup>31</sup>不過這些問題寫出來，還是不能引起足夠的重視，因此韋君宜還在繼續收集資料、並且在不到一年後找到思想比較進步的男同志幫忙。

30 同上，25頁。

31 同上，27頁。

---

李銳：那時候陝甘寧邊區，特別在農村，對婦女還是舊社會的一套，婦女沒有地位。韋君宜收集了很多資料，想要寫一篇文章，批評陝甘寧邊區的婦女工作。她就跟我談說：「我是個女同志，這文章女同志來寫不好。」我說我來寫吧。我在延安寫的文章絕大部分用筆名，但這篇在《中國青年》發表的〈反對對待婦女的不正確態度〉用的是真名。當時延安已有女子大學，王明<sup>32</sup>是校長，還是中央婦委的書記。我的文章發表之後，王明還找我去談過話。

---

李銳的文章中，開門見山就引用了一句王明的話：「對婦女和婦女解放運動的態度，是測量每一個共產黨員和每一個現代公民的文化上、政治覺悟上和革命認識上的尺度。」他提出作為男同志，應該為對待婦女不正確的態度盡三種責任：一、要承認婦女的獨立人格，「要把母親的工作看做神聖的革命工作之一，把妻子看做長時期的各方面的平等而可貴的合作者」；二、要反對任何男子「繼續輕視壓迫婦女，反對他們不以同胞的、同志的態度去對待婦女，特別是反對他們打老婆、「打游

---

32 王明（1904-74），安徽六安人，原名陳紹禹。1926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11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去蘇聯，在莫斯科孫中山大學任教。1929年10月回國後任《紅旗》編輯。1931年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上，在米夫支持下，補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取得中央領導權。在延安擔任女子大學校長，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任，主要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條文。1946年6月，任法制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國共內戰期間，領導該委員會完成了制定全國性的憲法草案。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明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1956年9月「中共八大」後，長期留居蘇聯。

擊」的現象；」；三、「要努力幫助婦女、婦女幹部和婦女運動，擁護婦女的特殊利益，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促進社會公開、家事社會化、和母親兒童的保護等等」<sup>33</sup>。看到這些提議，我感到五四之後的男女平等，原本應該是有男性支持的，但是很多男性享受自己的性別權利，不肯平等對待女性，這個問題從延安時期到後來顯得相當的嚴重，正因為組成中國共產黨的大部分人並非知識分子。

與此同時在蘇聯，斯大林對於托派和所有異己分子的清洗持續了很多年，共產國際對於中國的指示也還一直持續着。延安的青年們積極踴躍地學習、享受着延安的自由空氣，當然不會察覺到中共高層領導內部的鬥爭。1939年二戰爆發前，蘇聯與西歐國家的種種矛盾激化，希特拉卻與斯大林在莫斯科簽訂了一項《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此間兩國紛紛調動兵力，這項條約對兩者來說不過是緩兵之計。

---

宋金壽：王明在中央當權，得力於他的蘇聯老師米夫。米夫捧王明上台時說，王明是百分之百的共產國際路線執行者。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當時是上下級關係，好多決議文件、人員安排，都是共產國際提出，咱們舉手通過。王明1937年回國時，頭銜是共產國際執行主席團委員，地位

33 李銳〈反對對婦女的不正確態度〉，見《中國青年》（第3卷第3期，1941年1月5日），23-4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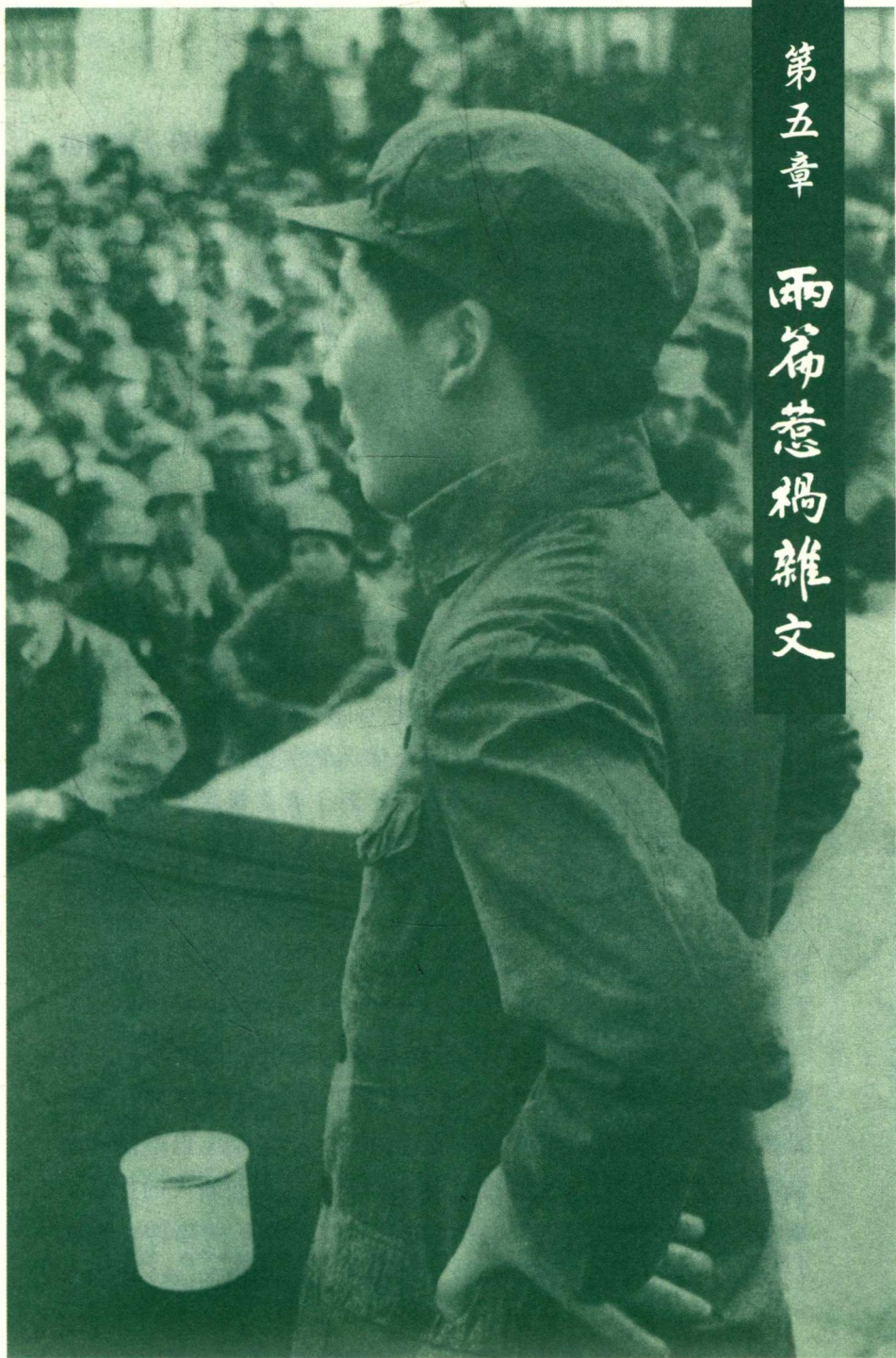
很高。1938年王稼祥<sup>34</sup>從共產國際回國時，帶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諾夫的口頭指示，就是中共應該以毛澤東為首，叫王明不要爭了。11月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了這個指示，以後政治局會議都改由毛澤東主持、在毛的窯洞裏召開。

戴晴：1935年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終於拿到軍事領導權。接着他靠兩股力量提高自己的地位。一是王稼祥傳達第三國際指示，表示支持他、而不是比他職位更高的王明；不論王稼祥是否「假傳聖旨」，他的傳達真正起了作用。二是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第三國際解散、沒能力來管中共了，這時候毛澤東的機會來了。

34 王稼祥（1906-74），原名嘉祥，安徽宣城人。1925年5月領導同學參加反帝愛國運動，9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冬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8年入讀莫斯科紅色教授學院，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1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主編《紅旗》和《實話》雜誌。1931年4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據地，後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在遵義會議上，被選為政治局委員，會後與毛澤東、周恩來一起組成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1937年11月，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38年8月回延安後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負責軍委日常工作。1942年6月與陳雲一起，負責領導中央軍委直屬系統的整風。新中國成立後，成為首任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副部長。

第五章

兩篇惹禍雜文



1941年春，李銳被從青委調任了，因為5月16日，中國共產黨一份真正的報紙——《解放日報》，在延安正式創刊。

李銳：為甚麼要辦《解放日報》呢？毛澤東覺得要有一份有全國影響的報紙，對外宣傳共產黨，特別宣傳「根據地」。最早第一版是「世界要聞」，第二版是「國際新聞」，第三版「國內新聞」是把國民黨統治區跟根據地放在一起報導。第四版上半截「陝甘寧邊區的新聞」，下半截是「文藝副刊」，當時是丁玲主編。我在第三版當編輯，後來就負責報導根據地。

陳恭懷：那時候我父親陳企霞28、29歲，丁玲是33、34歲，兩個人見了面印象都不錯。丁玲當時已經很有名了，但是她沒有架子，問了我父親情況覺得他很適合當編輯，叫他到《解放日報》來。我父親到了青委講希望調動，胡喬木他們不高興，後來磨了幾次，還是放他去《解放日報》了。文藝欄最早就是兩個人，丁玲是主編，我父親是編輯。

負責《解放日報》的博古作風極為審慎，「文藝欄」發表的稿件他幾乎篇篇過目。他多次對丁玲說：「《解放日報》是黨報，「文藝欄」絕不能搞成報屁股、甜點心，也不搞『輕騎隊』。」應該說，「文藝欄」發表過很多名家和新人的作品，對延安所謂「歌頌派」和「暴露派」知識分子的稿件一視同仁。1941年6月17、18、19日，連續發表了周揚的〈文學與生

活漫談》，引發了文抗作家們的不滿，舒群、蕭軍、白朗<sup>1</sup>、羅烽<sup>2</sup>、艾青等五人，根據談話寫成的商榷文章，卻被《解放日報》退稿，只發表在發行量很小的《文藝月報》上，沒有引起迴響。後來「文藝欄」有幾篇小說受了來自中央駐地楊家嶺的批評，但基本風平浪靜。

由文學創作起家的王實味，並沒有直接參與魯藝與文抗的爭論之中，但他一直關注着延安以外的文壇動向。1941年5月，他在《中國文化》上發表了〈文藝民族形式問題上的舊錯誤與新偏向〉，自發地參與文學形式的討論：

去年10月，筆者曾寫過兩篇關於文藝民族形式的文章，它們的內容，除自己底積極意見之外，主要是批評陳伯達、艾思奇兩同志對這個問題的意見，也附帶對郭沫若、光未然、向林冰諸先生底意見略事批判。由於《中國文化》暫時停刊，

- 1 白朗（1912-90），原名劉東蘭，遼寧瀋陽人。1929年與表兄羅烽結婚，1933年秋參加了共產黨的周邊組織反日同盟，並考入《國際協報》當編輯。1933年4月間接任《國際協報》副編輯。編輯過《國際公園》、《體育》、《婦女》、《兒童》等週刊，創辦《文藝》週刊，在羅烽、金劍嘯的「星星劇團」擔任過女主角。1935年5月加入左聯。1941年到延安，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延安《解放日報》編輯、《東北日報》副刊部部長、《東北文藝》副主編。著有散文集《月夜到黎明》、小說集《伊瓦魯河畔》和《為了幸福的明天》，長篇小說《在軌道上前進》等。
- 2 羅烽（1909-91），原名傅乃琦，作家，遼寧瀋陽人。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九一八」事變後，創辦大型文藝週刊《夜哨》、《文藝》；1934年由於叛徒告密被捕，1935年無罪獲釋。同年7月與愛人白朗同赴上海，參加「左聯」，主編半月刊《哨崗》。此間發表了大量的詩歌、小說、劇本，主要有長詩《碑》三部曲、中篇小說《莫雲與韓爾謨少尉》等，長篇小說《滿洲的囚徒》以他自身經歷為基礎，是其代表作之一。1941年皖南事變後，到延安，被選為延安文抗第一任執行主席，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建國後，歷任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長兼秘書長等職；1957年被劃右派，創作中斷；「文革」期間與其夫人白朗同遭迫害。著有短篇小說集《呼蘭河邊》，中篇小說集《糧食》，劇本《台兒莊》、《總動員》等。

及其他原因，迄今尚未發表。最近讀到胡風先生關於這個問題的長文，發現拙文有不少地方意外地與他巧合，如照原樣發表，即令不是掠美，也頗有附驥之嫌，因此把兩文合併刪節，另加對胡先生新偏向的批評，成為此文。<sup>3</sup>

黃昌勇：他看到胡風的文章很吃驚。這兩人原是同學，一個在國統區，一個在解放區，但對文學的觀點相互呼應。王實味的文章跟當時延安主流主張是衝突的，他致命的「錯誤」就在於，他仍舊站在五四的源頭看待文藝；而延安緊接着要求文藝大眾化、民間化，其實是要對五四的精英源頭做出反思的。

1941年7月1日，文抗已經基本取代文協；8月25日，文抗由楊家嶺遷往隔河相望的藍家坪<sup>4</sup>。性格一向豪爽的蕭軍，和文抗的作家十分接近。這段時間，他和毛澤東直言了延安文藝家的苦悶，說他們遇到很多政策性的問題甚至是迫害，於是向毛澤東提出制定文藝政策的需要，以緩解對延安文藝家的限制。蕭軍又介紹了艾青、羅烽、舒群等人與毛澤東直接對話，來表達他們對一個更加寬鬆的文藝環境的需要。8月12日，蕭軍在日記中提到他向毛澤東提議：「制定文藝政策，建立文藝出版社，出版文藝刊物，以至民意的日報，造成輿論。成立革命史料採集會。」但這些談話大都是以「哥們兒」的身份私下

3 王實味〈文藝民族形式問題上的舊錯誤與新偏向〉，見朱鴻召編選《王實味文存》（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107頁。

4 蕭軍《延安日記》上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263頁。

進行的，更重要的是，當時毛澤東的注意力集中在高層的領導權問題上，尚未顧及到文藝範圍。從蕭軍9月19日的日記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知識分子只在泛泛地思考着自己的命運：

十年前的今天，我正在瀋陽小東關的寓所，獨坐在小河沿的公園裏聽着遠近稀疏的槍聲。夜間也是聽着恐怖的槍聲，那時候我還不知道我未來的命運，更想不到今天在延安聽着秋雨，坐在窯洞燈下寫我的日記。誰知道十年後的今天又在甚麼地方，我在做甚麼呢？<sup>5</sup>

此前數月，蕭軍之前的愛人蕭紅到了香港。蕭紅當然也有機會來延安，但是她選擇去香港寫作。1941年2月，一些內地老友在皖南事變後南來香港，蕭紅在歡迎會上講了話。真正有能力關心她的生活和健康的朋友很少。史沫特萊在路經香港時送給蕭紅一件紫色大衣，接她去吃飯，史沫特萊看到蕭紅像鴿子籠一樣的住處之後，安排她去瑪麗醫院治療疾病。後來史沫特萊在《中國革命中的婦女》一書中寫道：

一種新型的中國女性，正在許多方面遠遠地超過美國女性。她們正在戰爭這一殘忍的鐵砧上經受錘煉。一位這樣的婦女曾和我一起生活過一段時間，她的名字叫蕭紅，她的命運十分典型。1931年，當日本人首次侵略滿洲時，她從那裏逃了出來。她不僅逃出了日本人的手心，而且逃出了富有的雙親的手心——她的父母打算將她嫁給一個由他們選定的男人。她每每趕在日軍攻勢之前，先在北京然後在上海、漢口和重

5 蕭軍《延安日記》上卷，287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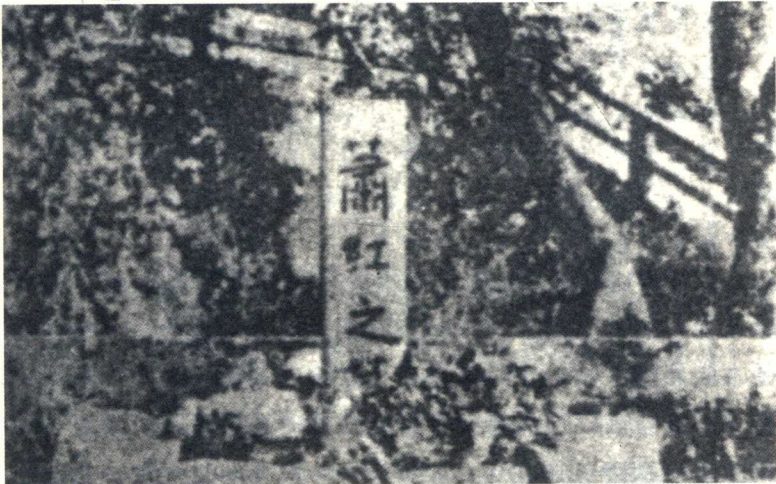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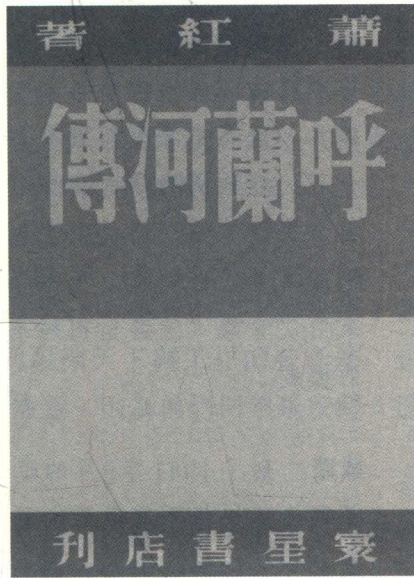
慶生活過一段時間。正是魯迅，將她的第一本小說《生死場》介紹給中國民眾。魯迅說，這本書是中國婦女所寫的最有影響的現代小說之一。在這以後，這個姑娘又出版了三本書，包括她住在我這裏時完成的一本戰爭題材的小說。像大多數中國現代女作家一樣，她生活在貧困之中。她們掙得錢只能使她們的生活維持在苦力階級的經濟水平。<sup>6</sup>

在香港貧病交加的日子裏，蕭紅寫出了以自己的童年記憶為藍本的《呼蘭河傳》，以及《馬伯樂》和其他短篇小說。史沫特萊於1941年5月回了美國，最後一個有能力照顧蕭紅的人走了。幾個月後，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蕭紅也像她尊敬的魯迅一樣，因為被誤診而去世。她死時只有31歲。

此時一度留蘇的張聞天雖然名義上還是中央最高領導，實際上已經沒有實權。同年9月，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擴大會議，矛頭直指中央的高級幹部。

宋金壽：參加這個會議的二十多個人，主要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少數中央委員，毛澤東、任弼時、張聞天、博古等等。這次會議以後，中央又成立高級幹部學習組，範圍擴大到中央委員、中央分局、各省委、各地方黨委的高級幹部等，全國一共300人。組長是毛澤東，副組長是王稼祥。學習內容就是〈六大以來〉這個文件，目的是「研究歷史」、「總結經驗教訓」。這會開了五次，高幹中做過總書記的張聞天、博古都對過去犯的錯誤做出檢討，但是

6 史沫特萊《中國革命中的婦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46頁。



上：抗戰爆發後，蕭紅選擇不去延安而去了香港；蕭紅的代表作《呼蘭河傳》在香港出版；下：1942年1月，蕭紅病逝時年僅31歲，葬在香港淺水灣。



王明根本不服，只承認部分問題，還提出了三點異議。一、他同意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路線是錯誤，但這是博古等人搞的，與他無關；二、他不同意中央現行的「統一戰線」，認為是「兩面戰爭」，一面打日本人，一面對付蔣介石，他強調應該向蔣介石妥協，專心打日本人；三、他認為應該宣佈「新民主主義」是以後的事，現在不要搞。毛澤東帶了任弼時、王稼祥去跟王明談，但是談不通；後來兩次會議，他甚至抱病不參加，但這時他已不能影響毛的權威了。

戴晴：到了1941年9月的這個所謂的九月政治局會議，毛澤東終於把他不喜歡的人都打掉，把他當時喜歡的彭真、劉少奇、任弼時幾個人攏在他周圍，成了「書記處」這個最高領導小組。本來都是他的人，還加一句書記處書記毛澤東最後說了算。這還不夠，他還要大家從「思想上」擁戴他，哪怕說的不對，大家都要說「毛主席說了就得跟着幹」。

從1941年延安重新分配中央書記處的領導權起，毛澤東繼續強化個人權力已經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根據毛澤東秘書胡喬木的回憶，9月10日和29日，當時的總書記張聞天都作了檢討，承認自己以往的錯誤主要是來源於缺乏實踐，因而主動要求去農村調查。1942年1月26日，也就是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第一次做整風動員報告的前幾天，張聞天離開了延安<sup>7</sup>。

7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195頁。

曾彥修：下去的時候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候冬天，大概是打四更的時候，我們走了十多里路到七八點鐘天才亮。這個說法當時很特別的，我們說是秘密走的。因為他帶着那麼大的隊伍，騎着那麼多馬，經過那麼多人家；可是問起來「張聞天到哪裏去了」？當時沒有其他人知道。

作為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張聞天在下鄉調查前把工作交給了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羅邁<sup>8</sup>。隨同張聞天下調工作的曾彥修，也因此沒有見證「整風運動」的揭幕。因為他們回到延安時，已經是1943年5月了。

1942年9月16日後，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下進行了《解放日報》的改版工作，確立了《解放日報》的「黨報」性質，中共內部權利的轉移，我們在這份報紙中也有跡可循。

李銳：最開始報社的社長是博古，總編輯叫楊松，這人跟王明一起從莫斯科回來，思想也和王明比較接近。楊松後來沒多久就病死了。毛澤東就決定要把《解放日報》改版，把中國共產黨的事情放在第一版，國際國內那就是次要的了。劉少奇那篇〈論黨〉很長，一到三版，一次登完。

8 羅邁（1896–1984），又名李維漢。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中共第四屆中央委員和五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1931年去莫斯科學習。1933年回國，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軍委第二野戰縱隊司令員兼政委，中共中央黨校校長、宣傳部副部長、統戰工作部部長，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第一、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二、三、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1951年任首席代表同西藏地方達成〈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著有《回憶與研究》。

因為《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被批評沉悶、缺乏討論。於是10月23日，丁玲發表了〈我們需要雜文〉，其中又以魯迅作例，號召大家多寫雜文，多些討論：

魯迅先生寫雜文時曾經被很多「以己之短輕人所長」的文人們輕視過，曾經被別人罵過是因為寫不出小說才寫雜文的。然而現在呢，魯迅先生的雜文成為中國最偉大的思想書籍，最輝煌的文藝作品，而使人卻步了。一定要寫得出像魯迅先生那樣好的雜文才肯下筆，那就可以先下決心不寫。文章是要在熟練中進步的，而文章不是為着榮譽，只是為着真理。

有趣的是，10月28日，「歌頌派」的周立波仍在抒寫對延安的真摯感情，在「文藝副刊」上發表了長詩《一個早晨的歌者的希望》：

我要強烈的反復我的歌，  
因為我相信我的歌是歌唱真誠的，  
共產主義：真誠，  
毛澤東：真誠，  
那些在毒瓦斯和槍炮彈下衝鋒的人們，  
那些在黃土黃山的山頂魂動着鋤頭的人們，  
那些用一雙赤腳板走過雪山和草地的人們，  
那些在饑餓的寒冷的牢監裏足足關了十年的人們：  
真誠。

這首飽含感情的長詩以一段浪漫的「自擬墓誌」收尾。蕭軍看了這首詩以後非常反感，立刻寫文章批判這首詩，同時批判何其芳的一篇散文，及蕭三的一篇報告文學。與此同時，另外一些青年人也積極踴躍地發表針砭時弊的雜文，此時《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言論氛圍已經非常熱烈。

1942年2月，毛澤東連續發表〈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兩篇演說，標誌着全黨普遍整風的開始。

宋金壽：「整頓三風」就是1942年2月1號毛澤東在中央黨校作的報告，當時報告就叫做〈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學風」就是反對「主觀主義」；「黨風」就是反對「宗派主義」；「文風」就是反對「黨八股」。「整頓三風」要大量地學習文件，一共22個文件，裏邊大部分是毛澤東著作，還有康生的報告，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陳雲的〈應該怎樣做共產黨員〉之類。毛澤東的就是〈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反對自由主義〉、〈農村調查序言和跋〉、〈改造我們的學習〉這些。關於這個，毛去到各個學校都做過報告，但是中央黨校從來沒去過，因為中央黨校歷來就是留蘇學生的世襲領地。

李銳：為甚麼要整風呢？就是要解決毛在黨內的獨一無二的領導地位。但是當時是否全黨有這個覺悟啊？恐怕還沒有。最早在延安宣傳毛澤東，視毛澤東為旗幟的，是張如

心<sup>9</sup>。我記得張如心那個時候在《解放週刊》上，發表過兩篇文章，有一篇文章就叫做〈高舉毛澤東旗幟〉。毛澤東把張如心調去當他的秘書，但張如心也有脾氣，跟毛搞不到一起，又離開。後來毛把胡喬木找去當秘書了。

2月8日，蕭軍參加了宣傳部召開的文化編輯「壓縮會議」，他記得毛澤東講演了如何反對「黨八股」的問題，並且以其人格魅力獲得了參加會議者會心的認同：

他很精彩和很懇切罵了這些用黨八股的人是鬼風，陰風，狗叫……每個聽着的人全是那樣幸福地笑着。他是很好的一個中學教師，有一種能溶解別人感情的能力，這大概就是 he 特殊的地方。他講話是通俗的沒有學究氣，也沒有艱澀或深奧的地方。如果說他是領導者，還莫如說是教育者。以下是他的反對理由：1·空話連篇言之無物。2·裝腔作勢恐嚇人。3·無的放矢，不看對象。4·言語無味，像個癩三。5·甲乙丙丁，開中藥鋪。6·不負責任到處害人。7·流毒全黨妨害革命。8·傳佈出去，禍國殃民。<sup>10</sup>

9 張如心（1908-76），廣東興寧人。1925年因參加學生愛國運動被學校開除。同年夏天加入國民黨，轉至廣東國民政府航空局當宣傳員。1926年2月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參加國民黨留蘇學生黨部領導工作。1930年任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成立研究部部長。1931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8月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紅星》報主編、總政治部團政治委員訓練班主任。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秋天調任中共中央民族委員會秘書。1937年8月起任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政治教育科科長。後歷任軍政學院教育長、中央研究院中國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黨校三部副主任、延安大學副校長等職。1941年3月提出「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表述。1945年4月至6月作為中直、軍直代表團成員參加中共七大。12月任華北聯合大學教務長。1952年10月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黨委委員、中共黨史教研室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間受迫害。主要著作有《論共產黨的群眾路線》、《毛澤東思想與作風》、《哲學概論》、《論我國過渡時期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

10 蕭軍《延安日記》上卷，400-1頁。

李銳：〈反對黨八股〉這報告我去聽了，這個報告在《解放日報》發表時，是第三版一個小新聞，毛澤東看到就生氣了。後來毛主席下命令，由康生傳達，這個報告登在頭版頭條，原文後來又改了。他厲害極了，挖苦知識分子，說知識分子沒甚麼本事，就會讀書，「書又不跑得，你拿着它看就是，那個很容易麼」。他還講說，「殺豬的時候，豬還要叫還要跑，知識分子還比不上殺豬的」。

前文提到過的時任《新民報》主筆的趙超構，幾個月後發表了對毛澤東〈反對黨八股〉的看法，他首先肯定這篇文章中「反八股」這個目標，不僅對於共產黨員適用，對黨外作家也適用。

我以為一切「八股」化的成因，都在乎作者思考作用的萎縮。或者說是頭腦的怠工。頭腦怠工、思考萎縮的結果，是大家都想利用一種最經濟最省力的方法來發表文字，於是乎內容方面，則引用一切現成的理論，可以用不着絲毫分析選擇批判的功夫，形式方面，既然貪圖省力，自然也不能不趨向於「形式主義」、「公式化」了。<sup>11</sup>

同時，趙超構指出毛澤東只揭露「八股」罪狀、而不言明成因，是為了要建立和保護黨對宣傳的統治。

八股文最大的特色就是為聖人立言，用不着自己思考，貧弱的內容，刻板的形式，枯燥無味的情調，簡陋粗率的推理，一切均可以顯示作者思考作用之喪失。……

11 趙超構〈黨八股〉，見《趙超構文集》（上海：上海文匯出版社，1999年）第二卷，217頁；原文發表於1942年7月27日。

所以我的結論——這結論是毛澤東先生極不願說的——是：黨八股的成因在乎思考力之萎縮，而其總因，則是一切政黨所共有的宣傳統制。<sup>12</sup>

值得注意的是，蕭軍描述的情況，是對毛澤東口頭發言的反應，其中有毛澤東本人在現場和聽眾互動的因素；而趙超構描述的則是〈黨八股〉成為文字發表後，有着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的典型反應，也可以說是相當敏銳的一種洞察。

其實在當時延安的艱苦生活中，許多青年人有思想病。1942年2月中，魯藝的美術家華君武、張諤、蔡若虹一起舉辦了諷刺畫展。他們在《解放日報》文藝欄裏發表的「作者自白」中說：

我們已經看到了新社會的魅力和光明，但也看到了部分的醜惡和黑暗，這些醜惡和黑暗是從舊的社會中，舊的思想意識中帶過來的渣滓，它附着在新的社會上而且在腐蝕着新的社會。我們——漫畫工作者——的任務，就必須是：指出他們，埋葬他們。

同一天的文藝副刊中，還刊登了魯迅曾幫助過、關心過的青年木刻家江豐、黃鋼、和力群的文章與討論。幾天後，2月22日《解放日報》的「青年之頁」中，刊登了一篇署名劉辛柏的文章〈碰壁〉，其中寫道：

12 同上。

新從大後方來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騷滿腹，到處發洩的情形，深以為不然地說：「這算得甚麼！我們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人多少氣……」

他的話是對的。延安雖也有着令人生氣的「臉色」，和一些不能盡如人意的事物；可是在一個碰壁多少次，嘗夠人生冷暖的人看來，卻是微乎其微，算不得甚麼的。至於對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學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同了。家庭和學校哺育他們成人，愛和熱向他們細語着人生，教他們描摹單純和美麗的憧憬；現實的醜惡和冷淡於他們是陌生的，無怪乎他們一遇到小小的風浪就要叫嚷，感到從來未有過的不安。

---

林賢治：在延安，大城市來的知識分子，跟當地的老百姓農民不一樣。他們對革命懷有一種羅曼蒂克，現在的現狀是否符合他的革命理想？心目中的延安應該比目前的延安更好。這個，尤其在青年裏面，我覺得很正常。他們把政治理想化，但實際上延安的問題很多。

---

前文提到，王實味1938年5月被分配在馬列學院下屬的編譯室工作；到1941年8月，馬列學院改名中央研究院，下屬九個研究室，王實味在中國文藝研究室任特別研究員。根據朱鴻召的統計，到延安後的三年多時間裏，

他一共翻譯了200萬字的馬列著作，諸如收入解放社出版的「馬恩論叢」中的《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僱傭勞動與資



本》、《價值、價格與利潤》等，18卷本《列寧選集》他譯出的兩卷版中的《甚麼是革命之友》、《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同盟書》、《共青團的人物》等。這些書不僅在延安，在抗日根據地出版，而且還在重慶和淪陷區「孤島」上海印行，在當時就發生不小的影響。<sup>13</sup>

《七月》雜誌的一位作者、胡風的友人劉雪葦<sup>14</sup>回憶，1942年3月初的一個晚上，王實味到他的住處來找他了。他覺得有些「突然」，他只是在1941年8月，曾經想寫《中國現代文學史》時，因為院長張聞天的建議而去找過一次王實味。但是當時王實味「不知甚麼原因不願意對我發表。陸陸續續講的是些『無關宏旨』的事」。後來劉雪葦借調到《解放日報》幾個月，再回到中央研究院時，王實味來找他了：

他是來表示「政見」的。一開始就說，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要由斯大林負責，不是陳獨秀負責。情緒激昂，語氣很重。我立即回答說：「不對！」我對他說，陳是黨的總書記，大家都聽他的。不管斯大林怎樣，黨領導大革命，他領導黨，革命失敗了，他能沒有責任？再說，他的思想是資產階級革命歸資產階級所有，於是，「辦而不包」也好，「包而不

13 朱鴻召〈王實味在延安〉，見《王實味文存》，327頁；溫濟澤《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3頁。

14 劉雪葦（1912-98），原名劉茂隆，貴州朗岱人。1930年赴上海，後加入左翼作家聯盟，被選為左聯第二屆執委；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起，在國統區從事中共地下工作，次年赴延安從事文藝理論研究與寫作，曾經幫助在國統區的胡風把《七月》雜誌帶到延安。1932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論文集《論文學的工農兵方向》、《魯迅散論》等。

辯」也好，都是機會主義，一定不可避免要把革命引向失敗。<sup>15</sup>

劉雪葦分析王實味可能是聽到了關於上層整風的消息，而對革命未來的方向十分關注。劉雪葦記得當天，兩人隨即轉入了對文學的討論，其中王實味又表達了對托洛斯基文學天賦的崇拜，這已經是托洛斯基被當作「反革命」消滅、中國托派在國統區遭到嚴重破壞，勢力殆盡以後了。劉雪葦記得王實味說，

「左聯」提出「普羅文學」<sup>16</sup>的口號是錯誤的，無產階級不可能有自己的文學。並且問我讀過托洛斯基的《文學與革命》沒有？我說，《文學與革命》早讀過了，1936年在上海還發表讀後感批評過。托洛斯基既把無產階級專政的過程想像得那麼短，又把無產階級文學建設和成熟的過程想像的那麼長，便得出這個「不可能有無產階級文學」的錯誤結論。而且，當現在我們來談這個問題的時候，無產階級文學不僅已經成立，而且已經開始成熟起來了，高爾基就是例證。他說：「但是《文學與革命》很有文采。」我說：根本觀點錯了，文采還有甚麼價值？越有文采越害人。他還強辯說：「不管怎麼說，托洛斯基總是個天才，值得崇拜。」我說：「是天才也不是崇拜的理由！」這樣，話不投機，便不歡而去。<sup>17</sup>

15 引自雪葦〈我和王實味〉，見溫濟澤編著《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年），82-3頁。

16 普羅文學：「普羅」是法語普羅列塔利亞的簡稱，意思為「無產階級的」，普羅文學來源於20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強調文學為政治服務，文學是政治經濟的產物，受到普列漢諾夫、老舍等作家推崇，左聯也宣傳他的政治功能。

17 雪葦〈我和王實味〉，84頁。

這次私人談話，因為涉及到政治立場，劉雪葦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就把和王實味談話的內容告訴了研究院秘書長、黨委委員徐健生。兩個星期後，劉雪葦追問徐健生有沒有把他說的情況告訴院黨委書記李言；徐健生說沒有，於是劉雪葦又親自對李言說了一遍。此處可見劉雪葦的黨性是極強，但是不論李言或者徐健生，都沒有做出即時的反應<sup>18</sup>，說明他們並不認為王實味的言論有太大的問題。

當時，主要針對中央高層的「整風運動」已經持續了半年多，但運動還並沒有正式涉及文藝政策。就在這個極為敏感的時刻，《解放日報》刊登了兩篇文章，在延安掀起了一陣前所未有的風浪。第一篇是3月9日丁玲的雜文〈三八節有感〉，其中抨擊了延安婦女在生活中受到的種種不公正待遇：

她們在沒有結婚前都抱着有凌雲的志向，和刻苦的鬥爭生活，她們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幫助」的蜜語之下結婚了，於是她們被逼着做了操勞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們也唯恐有「落後」的危險，她們四方奔走，厚顏的要求托兒所收留她們的孩子，要求刮子宮，寧肯受一切處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險悄悄的去吃着墜胎的藥。而她們聽着這樣的回答：「帶孩子不是工作嗎？你們只貪圖舒服，好高騖遠，你們到底做過一些甚麼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這樣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負責，誰叫你們結婚呢？」於是她們不能免除「落後」的命運。

18 同上，85頁。

.....

灰娃：我記得〈三八節有感〉是丁玲在三八婦女節做的講話，她把這演講寫成了文章。那時我不懂事，但感覺到她很氣憤，說到延安人不平等，講到領導人的愛人，不工作、過着家庭婦女的生活。當時革命青年都得有份工作，嫁給首長就不用工作，她認為不對。講話是在延安文化溝的八路軍大禮堂，我記得去聽的都是女同志。三八節嘛，我們還唱了冼星海寫的〈三八婦女節歌〉，很抒情也很振奮：「冰河在春天裏解凍，萬物在春天裏復生。全世界被壓迫的婦女在三八喊出震人的吼聲。我們像火把，像太陽一樣的光明。武裝起頭腦，武裝起身體，舊日的閨秀變成新時代的英雄」。

.....

丁玲文章中指出的很多問題，是延安當時確實存在的。前文提到，來延安訪問的史沫特萊和海倫·斯諾都注意到延安的婦女受到懷孕的困擾，史沫特萊還試圖發起過一場沒有結果的「避孕運動」。因為美國的女性運動對家庭、女性角色的探討比較早，這兩位美國知識女性對於延安女性的處境是非常同情的，但是她們很難在延安有甚麼影響力。我們訪問薄平時，她就談到她在延安時對結婚的恐懼，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怕懷孕而影響學習和工作；而已經懷了孩子的已婚婦女，也經常想盡辦法流產，周揚的妻子蘇靈揚就曾因為懷孕而大動干戈。

.....

周密：我後來聽我媽媽說，她當時不想要我弟弟。那時思想都特別激進，好多老大姐在長征前都做了絕育手術。我媽媽懷我弟弟的時候，從橋兒溝天主教堂那個講台上往下

跳，跳了好幾次也沒把我弟弟跳下來。後來實在沒辦法，還是把弟弟生下來，生完就做了絕育手術。這都是她老了以後才跟我說的。

---

朱召鴻總結「煉成颯爽英姿以後」的延安婦女有「四怕」，一怕懷孕、二怕生育、三怕帶孩子、四怕棄孩子<sup>19</sup>。青年女性到延安原本是為了自己的自由與理想，但是在延安男女比例嚴重失調的情況下，女性都面臨巨大的結婚壓力。一旦結婚，就可能懷孕，不少不願生育的女性就用劇烈運動、吃藥等辦法嘗試打胎。一旦不得已必須生孩子，從妊期反應的痛苦，到醫療條件的簡陋，都需要忍耐。生下孩子之後，帶孩子又會直接影響到女性的工作學習，使她們變成家庭婦女、落後分子。有時候，為了自己的工作不受影響，延安的幹部們一生了孩子就送給老鄉，但是農村的條件差，老鄉也沒有財力、物力、精力帶好別人的孩子。

---

薄平：我們的魯藝第一期戲劇系有對夫婦，在延安結婚，生了個女孩，就送給老百姓了。我跟王實味一塊上街，吃完飯路過養孩子的這家。我說我們戲劇系的夫婦生的小姑娘就寄養在這裏，咱進去看看她。一看，那個女孩光着膀子躺在木板上，已經都半死不活了，一身的蒼蠅。王實味一看那女人沒事似地在那兒納鞋底，就抓住她的鞋底啪地往地上一扔：「這孩子是你帶的嗎？」這女的嚇得：「是我帶的。」「你為甚麼不管啊？」「她有病。」「有病你為甚

19 朱召鴻《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245-250頁。

麼不給她看啊？」「她爸媽不要她，我又沒錢。」王實味就抱女孩，我說你快放下；他說走，去找她父母去。我說你別吵了，人家送給老百姓都是保密的。

---

現在我們可能很難明白當時延安婦女的處境。因為沒有避孕措施，許多女性珍惜自身獲得的工作機會，不願意生育，但是又很無奈。在戰時，因為人口流失，邊區很重視對人口的保護，因此流產是非法的。從戰略上來講，這樣保護人口並沒有錯，但是剛剛在五四運動中解放了思想、走出家庭、來到延安的新女性們，此時要讓她們回到家庭，完成生兒育女的基本職責、放棄她們的政治工作和經濟獨立，也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制度上為女性考慮，當時不是沒有人想到，趙超構就寫過要男女平等，首先要保護婦女的「母性權」，不要把整個生兒育女這件事，完全天經地義地交由女性來承擔。但是延安除了開設保育院，給領導幹部減輕一些育兒負擔之外，還不能從體制上對婦女有更好的保護。前文中韋君宜的文章、李銳的文章也都提到這些問題。

其實就在丁玲發表〈三八節有感〉的前一天，《解放日報》還發表了曾克的〈救救母親〉和草明的〈創造自己的命運〉兩篇文章，丁玲絕不是唯一寫到有關婦女的諸多問題的作者。曾克的文章中說：「在延安，我們可以說是有一個是自由的幸福的生活。」

一個做了母親的人，她應當是快樂的。然而，我卻看見有許多人，她們天天皺縮眉頭，彷彿在背負一個永遠解脫不掉的

痛苦。因此，我也聽到，有許多人，她們從內心裏傳送出那一致的，迫切的，期待的呼聲：「救救母親啊！」

她們有了孩子，她們便被一根無形的繩索網縛在一個狹小的籠子中了！她們邁動不開腳步，向學習，向工作。去進取她們自己的希望。

為了撫育革命的新一代，她們是願意付出最大的犧牲與忍耐的。因此煩忙與勞累，不能使她們發出一句怨言。只是，她們不願意放棄為革命所應盡的母性外的人性的職責。她們在矛盾中掙扎！<sup>20</sup>

曾克希望延安「應該給有些沒有奶吃的嬰兒多想些法子，更注意孩子們的營養與疾病。並且想法恢復母親們在疲累裏所損失的健康」，並且把「可能的最低限度的優厚的待遇多給她們一些。」

在〈救救母親〉的同一個版面上，草明也在〈創造自己的命運〉一文中，對於那些借革命婚姻攀附老幹部、甘心回到窯洞家庭裏的女性，表示鄙夷。

「我一定以甚麼為我的終生事業」，「我這一輩子一定要幹件甚麼事」，「困難不能阻撓我，我要克服一切困難」，這些偉大的「抱負」，在婦女裏尤其是罕見的。因為缺少創造自己命運的信心和決心，往往把自己一生花費在幾個孩子的撫育上；或因嫁了一個政治家，而放棄了自己的醫學技能，和單純的

20 曾克〈救救母親〉，見《解放日報》1942年3月8日。



上：延安的女學生常常是高級幹部的追求對象；下：丁玲（前排右二）和美國訪客。



為了體面而嫁給一藝術家，這在延安的女同志中，也有渣滓。<sup>21</sup>

從理性上，草明提出「我們應該以較長時間去幹一種工作，以培養我們的專門技能，逐漸的把自己變成了專門的人材，要不然『一輩子幹革命工作』的話會落空的。」但是從自身體驗上，她感到同樣一件事，因為生理條件不同、社會傳統阻礙，女人做起來比男人困難得多。她甚至寫到，「疾病、貧困、文壇上形勢的壓迫，宗派的排擠，牢獄生活的磨折和長期的政治迫害，這些還沒有使我氣餒，唯有撫育孩子這件事，使我極端難受！但也終究在劣勢的、絕少人幫助和同情的條件下，掙扎起來了！」

如果從提出問題的角度來講，應該說草明和曾克都提出了婦女在延安面臨的最重要、最普遍的問題，不過草明更多地鼓勵女性看到自己的可能性。因為當時丁玲的知名度比曾克、草明大得多，文章也寫得比她們犀利得多，〈三八節有感〉成為後來被引用、談論最多的文章。後來丁玲回憶這篇文章的寫作時說：

3月7號，陳企霞派人送信來，一定要我寫一篇紀念三八節的文章。我連夜揮就，把當時我因兩起離婚事件而引起的為婦女同志鳴不平的情緒，一泄無餘地發出來了。這兩宗事件的當事人今仍健在，可能會想的起來的。那時文抗的俱樂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幾個打扮得怪裏怪氣的女同志來參加跳舞。

21 草明〈創造自己的命運〉，見《解放日報》1942年3月8日。

「每星期跳一次舞是衛生的」，說這話的就是江青。我不反對跳舞，但看這些人不順眼，就順便捎了她們幾句。我的確缺少考慮，思想太解放，信筆所之，沒有想到這將觸犯到甚麼地方去。我也沒有想到文章可能產生的影響和對被批評者應有的體諒，更想不到敵人可以用來反對黨的。<sup>22</sup>

當時也在文藝欄當編輯的黎辛，提出丁玲的說法不合理，因為當時排版比較慢，要發的稿子提前幾天就要定下來了。不論如何，丁玲還是有話要說，而且她批評的現象並非偶然。兩年後，趙超構在1944年的3月8日，發表了一篇名為〈當前的娜拉問題〉，似乎是對丁玲〈三八節有感〉的呼應。

今天是國際婦女節。這原是紀念婦女解放運動的日子，在我們今天談起這個來，卻有無限的感慨。因為如事實所示，這幾年來，我們婦女界的口號雖然叫的很響，而社會對於婦女的歧視，卻有每況愈下的趨勢。我們常聽說某機關拒絕女職員，而某些機關則借着裁員的機會排斥女職員。當英美蘇聯的女性都能個個獻身於戰時社會事業的時候，中國婦女卻要被迫退回家庭，女同志的前途，着實未可樂觀也。<sup>23</sup>

和韋君宜一樣，他也以當時流行的稱呼「娜拉」，來指稱當時受了五四運動洗禮的新女性，認為在中國她們的前途還是很茫然。在文章的結尾，他呼籲：「那麼處在娜拉的地位應當怎樣才好呢？我以為，沒有別的辦法，除非娜拉們自動團結，

22 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見艾克恩編《延安文藝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61頁。

23 趙超構《趙超構文集》第二卷，488頁。

認真奮鬥，在整治社會取得轉移風氣的力量。」<sup>24</sup>其實這些說法，也呼應了韋君宜〈新娜拉出走後怎麼辦〉一文中的觀點，道理雖然不錯，不過在延安那樣男女比例失調的地方，女性被分散、孤立在家庭，有些還要承擔繁重的勞動，加上育兒的責任，要女性團結一致，去為自己爭取權益，也並非容易的事。

在〈三八節有感〉發表不到一個星期後的3月13日，王實味發表了他最著名的雜文〈野百合花〉。這篇雜文分為四節、分兩次、相隔十天發表。文章的「前記」十分動情：「在河邊獨步時，一位同志腳上的舊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過這種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愛的生平第一個朋友。想起她，心臟照例震動一下。照例我覺到血液迴圈得更有力。」我第一次讀到這篇文章時，就被這幾句話吸引，後來讀到王凡西描述的王實味的北大戀愛風波，以及劉瑩回憶王實味聽到李芬去世決定重新入黨，就更深刻地體會到他寫文章時的心情。他接着寫道：

李芬同志是北大1926年級文預科學生，同年入黨，1928年春犧牲於她底故鄉——湖南寶慶。她底死不是由於被捕，而是被她底親舅父縛送給當地駐軍的。這說明舊中國底代表者是如何殘忍。同時，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襯衣褲都穿在身上，用針線上下密密縫在一起：因為，當時寶慶青年女共產黨員被捕槍決後，常由軍隊縱使流氓去姦屍！這又說明着舊中國是怎樣一具血腥，醜惡，骯髒，黑暗的社會！從聽到她底噩耗時起，我底血管裏便一直燃燒着最狂烈的熱愛

24 同上。

與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聖潔的女殉道者底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縫在一起的襯衣褲，由自己的親舅父縛送去從容就義！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臟震動，血液迴圈的更有力！（在這歌轉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氣象中，提到這樣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諧，但當前的現實——請閉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與這氣象也不太和諧！）

「前記」之後，王實味首先在「第一節」裏提出「我們的生活裏缺少甚麼？」第二節的標題則是「碰《碰壁》」，回應2月22日劉辛柏的文章〈碰壁〉。前文提到，劉辛柏在〈碰壁〉中寫到一位中年朋友，對延安滿腹牢騷的青年們深不以為然。王實味辯護：「說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導青年不發『牢騷』，說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甚麼』，這絲毫不能解決問題。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須更好一點。」王實味在第二節最後提出：「1938年冬天，我們黨曾大規模的檢查工作，當時黨中央號召同志們要『議論紛紛』，『意見不管正確不正確都儘管提』，我希望這樣的大檢查再來一次，聽聽一般下層青年底『牢騷』。這對我們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處。」

這篇文章發表時，黎辛剛到《解放日報》做編輯不久，另一位和他一起配合丁玲編輯文藝副刊的人，是前文提到過的陳企霞。丁玲因為有關節炎，經常需要去中央醫院看病，從報社到中央醫院太遠，因此她借住在文抗的羅烽家。陳企霞和黎辛看到稿件中認為可以用的，就輪流送到丁玲那裏終審，丁玲認為可以發表的文章，簽字後就給畫版室發排。

---

黎辛：〈野百合花〉前兩節是陳企霞去丁玲那裏拿回來的，不知道是王實味送給她的，還是她請王實味寫的。丁玲只是在稿子前邊寫個「可發，丁玲」。文章12日排版時，陳企霞把稿子擺我桌上，說「你也看看」。我看完了他問我意見，我說「寫得酸一點，也偏一點」，他說「我看寫得蠻好的」。他還問我是不是不發的好，那我也不敢說不發啊。

---

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說，毛看了〈野百合花〉，把報紙摔在椅子上：「這不是馬克思掛帥，這是王實味掛帥。」<sup>25</sup>

---

黎辛：博古14號就來辦公室，拍拍陳企霞肩膀，「嘿老弟，這稿子哪來的？」陳企霞說了丁玲簽字「可發」，沒經過我們。博古就說這個稿子還有兩節，不要發了。陳企霞問為甚麼不發呀？博古沒有答覆就出去了。博古很謹慎，不說毛澤東的意見。

王培元：1976年何其芳寫過一個比較長篇的回憶錄，叫《毛澤東之歌》，他回憶說，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發在《解放日報》上的時候他看了，有些人在場，他就說「哼！甚麼野百合花？我看是毒草。」何其芳曾經在1941年的時候寫過一篇文章，認為魯迅式的雜文已經不適合在延安這個地方寫了，比後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這個觀點還要早的。

---

25 李言〈對中央研究院整風運動的幾點體會〉，見《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184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

有趣的是，〈野百合花〉一篇文章因為篇幅長而分兩次發表，於是出現了兩次之間，王實味的另一篇雜文〈政治家，藝術家〉3月15日在《谷雨》雜誌上發表的情況。這篇文章沒有〈野百合花〉那麼感性，可以說相當平和地講到，政治家是指揮革命的物質力量的，而藝術家是要激發革命的精神力量的：

前者往往是冷靜的沉着的人物，善於進行實際鬥爭去消除骯髒和黑暗，實現純潔和光明；後者卻往往更熱情更敏感，善於揭破骯髒和黑暗，指示純潔和光明，從精神上充實革命的戰鬥力。……中國的革命是特殊艱苦的。社會制度改造一方面之艱苦，大家都了解，而人底靈魂改造一方面尤其艱苦，深懂這道理的人卻不太多。「愈到東方，則社會愈黑暗」，舊中國是一個包膿裹血的，充滿着骯髒與黑暗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生長的中國人，必然要沾染上它們，連我們自己——創造新中國的革命戰士，也不能例外。這是殘酷的真理，只有勇敢地正視它，才能瞭解在改造社會制度的過程中，必須同時更嚴肅更深入地做改造靈魂的工作，以加速前者底成功，並作它成功底保證。

這段文字的最後一句，就是王實味被批判的所謂「人性論」的主旨。文章中，王實味還帶着敬仰，提到了魯迅：「魯迅先生戰鬥了一生，但稍微深刻瞭解先生的人，一定能感覺到他在戰鬥中心裏是頗為寂寞的。他戰鬥，是由於他認識了社會發展規律，相信未來一定比現在光明；他寂寞是由於他看到自己戰侶底靈魂中，同樣有着不少的骯髒和黑暗。」

錢理群：王實味幾乎是直接引用了魯迅的《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這是後來批判王實味的時候很尷尬的地方。他們明明知道王實味的文章背後是魯迅，但他們的批判文章都不敢提魯迅。為甚麼呢？因為毛澤東評價魯迅是聖人，他自己又想當聖人；他說魯迅是文化的發展，他自己又有他的發展。毛澤東的矛盾造成他下邊的人矛盾。他們知道真正對手是魯迅，但是這把火不能燒到魯迅身上去。但實際上誰也知道，王實味的思想來源是魯迅。

〈政治家，藝術家〉當時並沒被很多人看到，它發表後三天，3月18日，作為中共中央宣傳部整頓三風的試點單位，王實味所屬的中央研究院，召開了整風動員大會。中央研究院是當時延安最高學術機構，在其112名成員中，「知識分子出身的佔82%，20至30歲的佔79%，抗戰以後入黨的佔74%」<sup>26</sup>，也就是說，這個單位主要由青年知識分子和新黨員組成。

宋金壽：中央研究院名氣很大、懂洋文的人很多，說句難聽的話就是「池淺王八多」。整風一開始，它就被看作是「教條主義大本營」。「整頓三風」有兩個步驟。第一步學習文件，當時一共有22個要學習；第二步檢查工作，中央文件明確地就是說檢查領導，所以整風開始，矛頭應該說是針對領導。

26 朱鴻召《王實味在延安》，326頁。

黎辛：中央研究院院長張聞天這時去農村調查了，就讓中宣部副部長羅邁代替他管中央研究院，范文瀾<sup>27</sup>是二把手。整風動員會上他們提名15個人作為整風委員會的成員，來負責檢查工作。這15個人都是研究室主任、秘書長等負責人。王實味不同意，說這15個人應該選舉產生。

王實味的提議得到大部分人贊成，表決結果84人贊成、24人反對。大家重新選舉後，原來提名的領導人中有兩位落選，其中一位就是給毛澤東當過秘書的張如心。劉雪葦回憶說那天大會開下來，王實味路上很得意地對他說：「大家都擁護我，只有24票反對！」劉雪葦告訴他：「我是24票之一！」<sup>28</sup>

這幾天，大家的思想都有些波動，各種言論、文章都發表出來，年輕人為了「民主」的推進而興奮，領導則有別的考慮。3月23日，〈野百合花〉的第三節和第四節又在《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刊登出來了。

黎辛：博古又來找到陳企霞說，「老弟我不是說了不要再發王實味的稿子，怎麼又發了？」陳企霞說，「丁玲拿來的，有甚麼問題啊？」博古就說，「我看寫得偏了一點」。博古很憨厚的，說他負責，我們兩個沒有責任。後

27 范文瀾（1893—1969），191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後赴日本留學。1921年回國後在天津、北京等多所大學教授中國文學。1925年發表了對中國最早的文學評論著作《文心雕龍》的注釋書，之後轉向歷史研究。1935年因為支持華北抗日運動遭逮捕，釋放後在1940年奔赴延安，任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等職。

28 雪葦〈我和王實味〉，85頁。



來博古就檢討他發〈野百合花〉，我也準備了檢討，可是沒有讓我們檢討這個問題。

---

〈野百合花〉第三節的標題是「『必然性』『天塌不下來』和『小事情』」，矛頭指向延安言論中那些武斷、不客觀的態度。在第四節「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中，王實味批評了延安這樣一個原本應該十分平等的社會，卻「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也就是說，高級幹部穿洋布、普通人員穿土布，吃飯分大、中、小、特灶等等，完全是一個等級化的社會。文章結尾的一句是：「老是『愛』，請『溫暖』，也許是『小資產階級感情作用』吧？聽候批判。」

---

戴晴：毛澤東在延安整風的文件中，講到「我們是有自由主義的」，還有「我們就是開會不說，會後亂說」。這些大家都同意，於是有了有一種說話的氣氛。這時候王實味很興奮，根本就沒有甚麼克制。像這個「天不能塌下來」就直接指毛澤東，他覺得即使你是毛主席，但是你說的不對，我也可以跟你說說吧。

---

黎辛：其實衣也不止「三色」，灶也不止「五等」。衣分三色，一般幹部是粗布，中級幹部抗戰初期是洋布。40年代國民黨給我們封鎖了，邊區自己織藏青色的羊毛布棉襖。部隊裏的將軍、旅長、師長都穿的是自己做的。毛澤東、朱德這些人還穿邊區自己生產的呢子，春秋天是毛布衣服。

---

# 文藝

期二〇一第

## 野百合花

實味

實味

在許多地方，我們都聽見過「野百合花」這一個名字。這是一首詩，也是一首散文詩。它描寫了野百合花的生長環境，以及它在艱苦環境中所表現出的堅韌不拔的精神。作者通過對野百合花的描寫，寄託了對勞動大眾的同情和讚揚，以及對社會現實的批判。

野百合花，生長在荒涼的山坡，  
在石縫中，在岩隙中，  
在風吹雨打中，  
在烈日曝曬中，  
它依然生長着，  
它依然開着，  
它依然散發着幽香。

野百合花，它不羨慕  
名園麗土的富麗堂皇，  
也不羨慕  
深山窮谷的幽靜孤獨，  
它只願在  
那荒涼的山坡，  
在石縫中，  
在岩隙中，  
在風吹雨打中，  
在烈日曝曬中，  
生長着，  
開着，  
散發着幽香。

野百合花，它不羨慕  
名園麗土的富麗堂皇，  
也不羨慕  
深山窮谷的幽靜孤獨，  
它只願在  
那荒涼的山坡，  
在石縫中，  
在岩隙中，  
在風吹雨打中，  
在烈日曝曬中，  
生長着，  
開着，  
散發着幽香。

野百合花，它不羨慕  
名園麗土的富麗堂皇，  
也不羨慕  
深山窮谷的幽靜孤獨，  
它只願在  
那荒涼的山坡，  
在石縫中，  
在岩隙中，  
在風吹雨打中，  
在烈日曝曬中，  
生長着，  
開着，  
散發着幽香。

野百合花，它不羨慕  
名園麗土的富麗堂皇，  
也不羨慕  
深山窮谷的幽靜孤獨，  
它只願在  
那荒涼的山坡，  
在石縫中，  
在岩隙中，  
在風吹雨打中，  
在烈日曝曬中，  
生長着，  
開着，  
散發着幽香。

# 文藝

期六〇一第

## 野百合花

實味

野百合花，它不羨慕  
名園麗土的富麗堂皇，  
也不羨慕  
深山窮谷的幽靜孤獨，  
它只願在  
那荒涼的山坡，  
在石縫中，  
在岩隙中，  
在風吹雨打中，  
在烈日曝曬中，  
生長着，  
開着，  
散發着幽香。

野百合花，它不羨慕  
名園麗土的富麗堂皇，  
也不羨慕  
深山窮谷的幽靜孤獨，  
它只願在  
那荒涼的山坡，  
在石縫中，  
在岩隙中，  
在風吹雨打中，  
在烈日曝曬中，  
生長着，  
開着，  
散發着幽香。

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在《解放日報》上分兩次發表。

薄平：王實味在中央研究學院是特別研究員，吃中灶，還有一個勤務兵送飯，當時叫「小鬼」。那小鬼棉襖破了，棉絮都露在外頭，他就叫我拿針線給他縫。像陳伯達、艾思奇這些人都不在他眼裏頭，他叫得最親切的就是「洛甫同志」（張聞天）、「炊事員同志」。我們去吃館子，人家給他找錢他不要，說「下個月稿費就來了，你買個煙抽吧」。

戴晴：王實味還說到，我這麼寫，「葡萄並不酸」，「我也是中灶，穿衣服也不差啊」，但是就覺得「咱們家裏的事有不對的地方」，「咱們有黑暗，就必須把這個黑暗給克服了」。他帶着這樣的態度熱情地投入整風，把話也說得很精彩，於是很多人擁戴他。那時候相當一批人都是把毛澤東看成同志的，王實味更是這樣想的。可是沒想到，毛澤東看了〈野百合花〉就拍桌子，「王實味掛帥？還是我們黨掛帥？」

除了〈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藝術家〉，積極參與中央研究院整風工作的王實味，還在整風壁報《矢與的》上發表了幾篇短文，批評研究院負責人羅邁。在3月23日的壁報上，他發表了〈我對羅邁同志在整風檢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其中提出羅邁的家長制作風，壓制了群眾反三風不正的積極性。蕭軍在當日日記中提到，「下午在中央研究院看他們『整頓三風』的壁報，有些人被罵了：羅邁、歐陽山等，但那些文章卻是粗糙的」<sup>29</sup>。

29 蕭軍《延安日記》上卷，426頁。

王實味在中央研究院的同事，之前和他討論過托洛斯基的劉雪葦回憶，就在23或24日傍晚，「開了一次大會，羅邁主持，有外單位的代表參加，地點在北課棚外南側的小廣場上。」劉雪葦記得羅邁讓他首先發言，介紹他和王實味爭論的內容，他「便對大家把爭論的內容情況介紹了。」<sup>30</sup>當時王實味在不在場。

28日，王實味看到同事李宇超<sup>31</sup>、梅洛反駁他的文字，又發表了〈答李宇超、梅洛兩同志〉一文，檢討了自己在整風會議上「發言之尖刻和過頭」：

羅邁同志威勢逼人的家長武斷作風，確使我十分激動，因而聯想到那不斷送了多少同志性命的「比豬還蠢」的領導。我罵了羅邁同志，為了這，我願接受一切批評。我過去在黨內未受過了不得的「委屈」，更未受過羅邁同志給予的「委屈」，梅洛同志的「假定」是錯誤的。

---

宋金壽：王實味在《矢與的》的第二篇文章裏罵羅邁的話，實際上用的是毛澤東的話。毛澤東在批教條主義時，

30 雪葦〈我和王實味〉，85頁。

31 李宇超（1906-68），山東省諸城市人。1924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後加入國民黨，參加了國民革命軍。10月，調中共中央第一期軍訓班學習，同時轉為中共正式黨員。1927年2月任中共英租界滬中部委委員、宣傳部長，參加了周恩來領導的上海工人武裝起義。1937年11月到達延安，但是被監禁一年，釋放後一面工作、一面接受審查，1941年冬調任中央研究院，到1942年2月才恢復黨籍。1947年春參加陝北土改工作團，7月隨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任中共羅麻工委委員兼工作隊長。1968年被林彪反革命集團迫害致死，1979年3月獲得平反。他的情況見李曉光〈懷念父親李宇超〉，見《炎黃春秋》2007年第9期。

舉例說教條主義者根本不懂得敵人，一到節日就組織飛行集會，國民黨已經準備好，一下子就逮捕好多人。毛澤東說這些人「比豬還蠢」。當時反對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把批評與自我批評稱為「忍痛割尾巴」。《矢與的》壁報上還有兩張漫畫。一張畫的是一個人後面拖着一根大尾巴，有四個人保護着這條尾巴，不讓割；這漫畫是諷刺羅邁的。還有一張漫畫呢，一個人坐在椅子上，後背翹起一個尾巴來，上面寫着：「我的尾巴是經過批准的」；這是諷刺政治研究室的張如心。

---

根據羅邁的回憶，中央研究院的整風壁報以其民主的面目轟動了整個延安，有幾期甚至不是貼在研究院牆上，而是貼在布上，掛到延安南門外最熱鬧的地方，參觀者川流不息。范文瀾還約了王震<sup>32</sup>來看，王震看後氣憤地說：「前方的同志在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在後方吃飽飯罵黨。」曾經和王震私交很好的李敦白告訴我們：

---

李敦白：王震是個特立獨行的人。他告訴我，當他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曾在湖南省鐵路公司僱用的一個英國人家裏做過工，倒過尿壺，洗過衣服。王震討厭那家人。英國人養了一隻狗，全家人都很愛這隻狗。為了洩憤，王震把狗殺了，但是自己也不得不從英國人家裏跑掉，後來參加了

---

32 王震（1908-93），湖南省瀏陽人，早年加入共產黨，擔任中國工農紅軍湘東獨立一師團政委、組建湘贛根據地，擔任紅六軍團政治委員，率部長征。抗日戰爭期間，擔任八路軍120師359旅旅長兼政委，組織南泥灣開墾。



上：王震夫婦；下：延安的壁報是出版物之外重要的討論園地。

紅軍。王震說他本來想加入共青團，但因為他反對外國人思想太嚴重，組織上沒有批准。組織的意思是，外國工人是好的，壞的只是外國資本家；但當時王震不接受這個說法，他認為所有外國人都不是好人。

---

王震當晚就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據說當晚，毛澤東就帶着警衛員、提着馬燈，在中央研究院的幾個人陪同下，親自看了壁報。

---

**宋金壽**：第二天早上，大家都知道毛澤東來看大字報了，贊成王實味觀點的人還說毛澤東支持他。羅邁說，「毛澤東說了，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有的放矢」了。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反應。毛澤東認為王實味的文章立場不正確，方法也是「冷放暗箭」，絕對平均的觀念是不對的。他派胡喬木去找過王實味，也通過胡喬木給王實味寫過信表達了這個想法。

---

3月30日，一度紅紅火火的「文藝副刊」停刊，退而恢復成不定期的文藝欄，《解放日報》也再次改版。李銳回憶改版會議是他和毛澤東在延安首次面對面開會，但會議的內容基本和改版無關，大家主要就平均主義思想展開討論。最後毛澤東總結說，以後「歡迎熱罵，不歡迎冷嘲。冷嘲與暗箭這全是小資產階級陰暗心理的表現」。

---

**李銳**：改版座談沒有多少人，在楊家嶺開的。《解放日報》沒有幾個人去，博古、陸定一、副總編輯于廣盛、我

去了。這是在延安第一次跟毛澤東面對面開過會，王震去了，就批評丁玲、蕭軍。毛講話講的不多，後來在《解放日報》發表的講話是另外寫的。毛在會上怎麼講的呢？我記得。那時一般人都用小油燈，一個燈芯。我們《解放日報》有煤油燈。毛也用煤油，但是他喜歡用洋蠟，而洋蠟是進口的、要花錢的。他說：「我點亮根洋蠟，我穿斜紋布，我吊口袋。」斜紋布就是機器織的、進口的，我們一般的幹部穿邊區出的土布；我們的衣服口袋都是一塊布錘在衣服上面的，吊口袋是比較大的布口袋吊在衣服上的。散會之後我就跟胡喬木講，我說我們這些人有意見，不是你吃的好穿的好，你們老幹部，長征受苦受那麼多，我們剛從國民黨區來，你們吃的好一點、穿好一點，我們不跟你追究這些東西。我們有意見是體制問題。

**宋金壽：**王實味說到延安體制中的等級制度，所謂「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實際上是文學的語言。咱們那時候叫軍事共產主義制度。具體說來，就是吃、穿、住等等，全都是公家的。譬如衣服，襯衫一年兩件，外衣一年一件，棉衣兩年一套，這都是有規矩的。上衣啊基本上是兩色，黑色和青灰色。黑色布料好一點的就是斜紋布，那時候生產很少啊，不可能做了給戰士穿的，一般都給幹部穿。戰士多，青灰布手工織的，就給戰士穿。也有少數交換來的呢子，就做給領導人穿。你看毛澤東在作報告的時候，穿打補丁的衣服，那跟現在牛仔褲非得要有窟窿才時髦不一樣。那個時候毛澤東穿破褲子，真的因為物質供應有限。王實味說的「食分五等」實際上就是大中小灶，之間的差別並不是很大。



劉雪葦回憶，大約在3月底中央研究院又開會時，王實味先做了檢查。當他說到「本來保留有某些托派觀點的時候」，當時倚在一根柱子邊的劉雪葦插問一句：「你報告了組織沒有？」這個問題引起了王實味的慌亂。「這點小插曲，卻受到張如心主任的注意。他在發言中說，王實味是『雷公打豆腐，專揀軟的欺。他只敢找潘芳，像站在柱子邊的那個，他就不敢碰。』」劉雪葦還回憶說，「王實味這次檢查，講了很多跟潘芳們平時來往中的談話內容。這成了下一段反對『反黨五人集團』的前奏。」<sup>33</sup>

---

班國瑞：王明試圖照搬蘇聯模式去推行馬克思主義，脫離了中國的實際國情，王實味在他的〈野百合花〉裏，明確批判了從莫斯科回來這批人的思想，他其實非常欣賞毛澤東的初衷和文章。他和丁玲去延安，是因為覺得延安會跟政治高壓的國統區不一樣。但當王實味真的到了延安，他的問題就跟着他一起來了，人們揪住他曾經跟托派的人交往過這一點不放。1942年毛澤東提出「反黨八股」，王實味、丁玲等人就寫了自己對黨的看法，是毛澤東讓他們這麼做的。

---

33 潘芳當時是中央研究院任俄語小組長，齊宗錚之妻，當時住在王實味隔壁的窯洞，和丈夫曾一起拜訪過王實味，吃過飯；後來因此被打成王實味、潘芳、宗錚、陳傳鋼、王汝琪「五人反黨集團」。此處引文見雪葦《我和王實味》，85-6頁。

第六章

由座談而批判



1942年4月初，毛澤東親自召集《解放日報》的人員開會，「談改版問題，批評《解放日報》對黨中央的主張、活動反映太少。」文藝界參加的只有丁玲和周揚。這個會上，包括賀龍、王震在內的八個人發言，七個人的發言都是批評〈野百合花〉和〈三八節有感〉。賀龍說，「丁玲，你是我的老鄉啊，你怎麼寫出這樣的文章？跳舞有甚麼妨礙？值得這樣挖苦？」<sup>1</sup>丁玲在回憶錄中寫到了當時的情景：

最後，毛主席作總結，毛主席說：「〈「三八節」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同王實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毛主席的話保了我，我心裏一直感謝他老人家。文藝整風時期，只有個別單位在壁報上和個別小組的同志對〈「三八節」有感〉有批評。我自己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實味的座談會上，根據自己的認識，作了一次檢查，並且發表在6月16日的《解放日報》上。<sup>2</sup>

黃昌勇：這個幹部學習會上，毛澤東第一次正式提到王實味的思想是有系統的，而丁玲不是，這樣把兩人徹底區分開了。我覺得王實味就是一個獨立的人，不屬於任何流派或黨派，他是共產黨員，可以屬於某個機構，但他天性卻是獨立的。他在北大學習的環境中，獨立知識分子的人格是明顯被提倡的；可他獨立的人格，使他後來和組織總是處於一個對抗的狀態。

1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55頁。

2 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62-3頁。

---

林賢治：〈三八節有感〉是從性別角度去看革命的戀愛，它的威力、覆蓋面不如〈野百合花〉那麼廣。另外呢，就像丁玲說的那樣，毛澤東保她，不保王實味，這就引起丁玲對毛澤東終身感激。

---

1942年4月4日，蕭軍到毛澤東住處的時候，王震也在，「他提到有些人不滿意解放日報那篇〈野百合花〉的文章，很氣憤的樣子。」他對王震說，這篇文章部分是「以槍報槍，以筆報筆」，試圖「糾正」他的意見。「毛解釋因為環境沉悶，所以發現了一些病態的現象」。7日下午，毛澤東給蕭軍去信要求「商量一些問題」。蕭軍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毛說最近他感到這文藝政策的重要，也開始留心這些問題，也要懂得些」<sup>3</sup>。13日，毛澤東寫信給蕭軍，請他就前日「所談關於文藝方針諸問題」替他「搜集各家意見」。27日，蕭軍到毛的住所，又替丁玲說話：「你們在政治上應該更深切地懂得她，她是黨中難得的，他是代表這個世界的女人上十字架受難的人」。毛澤東「似乎也為」他的話「所感動」<sup>4</sup>。

早在1941年8月，蕭軍就向毛澤東建議過制定文藝政策，他在之前的日記中有很多次提到要離開延安，而又常常是為了怕其他文人吃虧而留了下來。他希望自己的「文藝之道」能夠得到黨的支持，常為青年人出謀劃策。但是到了1942年春天，毛澤東才真正對此有了回應，醞釀了對中國的文藝界產生深遠

3 蕭軍《延安日記》上卷，436-8頁。

4 同上，442頁。

影響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後來在另一次私下談話裏，毛澤東找蕭軍商談座談會的程序和辦法，蕭軍暢談了一些過去所不注意的文化人現象，後來他回憶當時毛的「臉色不很好看」，又對他關於政治和文化形勢的估計表示不甚同意。

---

林賢治：1942年之前，蕭軍還跟毛澤東稱兄道弟，給他提建議，但畢竟他們還有隔膜：就是說蕭軍本人對於政治家沒有真正理解，他一不如意就想一走了之。「吸收知識分子」也不是毛澤東的發明，列寧文集裏也有類似內容。但是具體到文藝政策，在王實味之前是沒有的。可以說黨對知識分子的具體政策是圍繞王實味的問題形成的，後來被改造昇華，成為團結、利用、改造三位一體的政策，再後來慢慢形成我們的正統意識形態的重要部分。

---

李銳記得1942年4月間《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不少關於整頓三風的材料，除了毛澤東的〈反對黨內幾種不正確的傾向〉、〈反對自由主義〉等，還有陳雲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和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解放日報》原來由丁玲主編的「文藝」副刊，於1942年4月1日改為綜合副刊，刊登文學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內容，更加強化了共產黨本身的事情。另一方面，中共與早期的共產國際關係淡化，也從平時對馬列主義學習的變化中體現出來。

---

何方：延安整風不是學馬列主義，恰恰在整風之前大家學了一點馬列主義。整風以後把馬列主義出版全部停止了。

學習文件裏邊沒有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獻，列寧也很少，基本上是斯大林的，更多的是毛主席的，還有一些劉少奇等人的。現在說整風是「馬克思主義深入的、普遍的教育運動」，我說根本不是。

---

根據胡喬木的回憶，為了文藝座談會的成功召開，毛澤東事先做了工作。對於以「歌頌派」為主的、聚集在魯藝的教員，毛澤東並沒有太多的擔心，集體進行了一次談話，「內容十分廣泛，包括有『暴露黑暗』與『歌頌光明』，作家與群眾，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幻想與牢騷，『人性』與『人類之愛』，李白與杜甫，《聊齋志異》與今人作品等多方面問題。」<sup>5</sup>

當時在魯藝任職的作家中，毛澤東約見單獨談話的有周揚、何其芳、周立波、曹葆華、陳荒煤、李伯釗（女）、塞克、嚴文井等人。而對於聚集在文抗的「暴露派」作家，毛澤東則採用個別談話的方式，約見的人除了蕭軍以外，還有丁玲、艾青、舒群、羅烽、白朗、于黑丁等人，還請文抗的支部書記劉白羽去代他了解更多黨員作家的意見。受到單獨約見的中央研究院的人員，則有文藝研究室主任歐陽山、研究員草明等人。可以說在座談會召開之前，毛澤東已經對延安知識分子的大體想法、共同傾向有了十分明確的認識。

5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258頁。



上：毛澤東在魯藝對教員講話；下：整風學習。

1942年5月2日星期六，毛澤東和凱豐<sup>6</sup>在楊家嶺親自主持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第一次會議。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朱德、陳雲、任弼時、王稼祥、博古等和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出席者達一百多人。

朱正：延安文藝座談會為甚麼要開？我覺得至少有一條，就是要解決以王實味為代表的傾向。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很有趣的。一方面還是捧魯迅，就是毛澤東說，我們現在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領導的武裝部隊，一支是魯總司令領導的文化軍隊、「拿筆的軍隊」。後來正式發表的時候，就把「魯總司令」這個俏皮話給改掉了。

根據《解放日報》上發表的版本，毛澤東致開幕詞時說：

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鬥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裏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

6 凱豐（1906-55），原名何克全，江西省萍鄉市人，中國共產黨前期領導人之一。1927年加入中國共青團，並被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1930年回國後加入中共。1937年出任中共中央宣傳部代部長，並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抗戰前期隨周恩來在重慶開展統一戰線活動。1940年後調回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再度出任中宣部代部長。



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為了這個目的，有些甚麼問題應該解決的呢？我以為有這樣一些問題，即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在講到「立場」問題的時候，毛澤東說：

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立場。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中是否還有認識不正確或者認識不明確的呢？我看是有的。許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確的立場。<sup>7</sup>

鄧騰克：那時正當抗戰，共產黨本應和國民黨共同抗日。為甚麼在仗打得火熱的時候，毛澤東突然對文藝發生了興趣？這反映了共產黨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視文藝為非常重要的政治議程。毛所重視的文學的功能，一是歌頌，利用文學歌頌一些積極的事物和積極的發展；另一個是揭露，揭露現實社會的不公和很多負面的東西。他認為，隨着中國進入新民主主義階段，揭露的功能就應淡化，而歌頌的重要性逐漸增加，所以他開座談會，就是告訴這些文藝工作者不要再去暴露黑暗，而是來歌功頌德吧。

雖然現在從文獻來看，〈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討論的是關係到未來文藝政策的嚴肅問題，但當時座談會的氣氛倒是自由和

7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見《解放日報》1942年5月19日。

輕鬆的，毛澤東風趣的語言、作家們的各種比喻，引來很多笑聲和討論。毛澤東致辭後，請大家發言，丁玲說，「蕭軍是學炮兵的，你先打頭炮吧！」於是就一直積極建議毛澤東拿出文藝政策的蕭軍，在座談會上第一個發言。時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在1991年到1992年間寫《回憶毛澤東》時，仍然對蕭軍的發言記憶猶新：

蕭軍第一個講話，意思是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獨立」的，魯迅在廣州就不受哪一個黨哪一個組織的指揮。對這樣的意見，我忍不住了，起來反駁他，說文藝界需要有組織，魯迅當年沒受到組織的領導是不足，不是他的光榮。歸根到底，是黨要不要領導文藝，能不能領導文藝的問題。蕭軍就坐在我旁邊，爭論很激烈。他發言內容很多，引起我反駁的，就是這個問題。對於我的發言，毛主席非常高興，開完會，讓我到他那裏吃飯，說是祝賀開展了鬥爭。<sup>8</sup>

作為對第一次座談會的反應，中共中央的機關報《解放日報》率先開了單位座談會，蕭軍、艾青、周揚等到場。蕭軍提出「明確登徵稿啟事，約特約撰稿員。」他日記中也寫到對周揚的觀察：「周揚近來變得老成而恭順，這類人只能示之以利害，不能動之以感情。」<sup>9</sup>

5月13日，延安戲劇界四十餘人談了戲劇運動的方向等問題，胡喬木回憶說，與會者一致認為近一兩年來延安的大戲熱

8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54頁。

9 蕭軍《延安日記》，466頁。

忽視了工農兵的需要。這個座談會既是對5月2日會議的反應，也給毛澤東日後的講話提供了新的材料。有趣的是，第一次座談會的內容在《解放日報》上並沒有正式的報導，蕭軍的〈對於當前文藝諸問題的我見〉後來在5月14日的《解放日報》發表，成為第一篇反映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文章。呼應着毛指出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蕭軍的發言也分為了「立場」、「態度」、「給誰看」、「寫甚麼」、「如何搜集材料」以及「學習」等幾部分。在說到「立場」問題的時候，蕭軍也同意毛澤東指出的，作家一定是站在「階級的立場」創作的這個觀點。但其後，他並沒有說到對於黨性和黨的政策立場，轉而說到了「解放」：「我們——現代的中國人——是需要站在一個甚麼樣立場來創作呢？這是明顯的：第一個是為求得民族的解放；第二個是求得人類的解放。一切是為這「解放」而服務。這解放面雖是較廣義的，但它的集中點，卻應該是最團結和最戰鬥的一方。」<sup>10</sup>而這個結論，恰恰又偏離了毛澤東的主要結論，因為「解放」和民主，並不是毛澤東此刻要解決的問題。

在蕭軍文章的同一版面上，還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就是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署名P. K.的譯者即《解放日報》的負責人博古，其中寫到：

這個作為黨的原則在哪裏呢？不僅在，對於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文學事業不能夠成為榨取個人或集團的共X，它一般地不能成為脫離黨的無產階級事業的個人事業。打倒無黨派的作

10 蕭軍《延安日記》，466頁。

家！打倒超人的作家！文學事業應該成為總的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一個統一的、偉大的、由整個工人階級的全體覺悟的先鋒隊使之運動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文學事業應該成為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一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作的組成部分。

作為會上討論的延伸，5月15日作家嚴文井<sup>11</sup>發表了〈論好作品〉刊登在《解放日報》上，而詩人艾青發表的〈我對於目前文藝上幾個問題的意見〉也佔據了同一天報紙的半個版面。值得一提的是，艾青的文章寫於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前，當時正在和許多文藝家談話的毛澤東曾經去信給艾青：「艾青同志：前日所談有關文藝方針諸問題，請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見。如有所得，希隨時賜知為盼。」在「反面的」三個字下面，毛澤東還着重地畫了三個圈。艾青沒有去收集，或者不大領會甚麼是「反面的」意見，只是把自己的看法寫成〈我對於目前文藝上幾個問題的意見〉一文，毛非常重視地閱讀並給予意見。在座談會召開之後，艾青配合毛澤東的意見對初稿進行修改，在「文藝和政治」的小標題下面，他寫到：

在為人民大眾謀福利、為大多數的勞苦的人類而奮鬥的，這崇高的目的上，文藝和政治，是殊途同歸的。為同一目標而

11 嚴文井（1915-2005），原名嚴文錦，湖北武昌人。1935年到北平圖書館工作，1937年出版散文《山寺暮》。1938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任教。歷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教師，《東北日報》副總編輯，中宣部文藝處處長，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副書記、書記處常務書記，《人民文學》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總編輯。1941年出版第一部童話集《南南和鬍子伯伯》，其後代表作有《一個人的煩惱》、《一個農民的真實故事》、《丁丁的一次奇怪的旅行》等。

進行艱苦鬥爭的時代，文藝應該（甚至有時必須）服從政治，因為後者必須具備了組織和彙集一切力量的能力，才能最後戰勝敵人。但文藝並不就是政治的附庸物，或者是政治的留聲機和播音器。

以上這一段文字我們可以看出，艾青已經做到了「識大體」。此後，作家們都陸續有機會表態。

5月16日，座談會的第二次會議上，周揚發言明確擁護毛澤東的觀點。但接下來吳奚如發言說，「現在不是抗日嗎？不能提出黨員和非黨員作家都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而中共黨員不必要時刻都將自己的無產階級立場和黨的立場掛在門面上，因為這樣會不會更有利於統一戰線？」他說完後，坐在主席台上的朱德站起來批評他：「吳奚如，你是人民軍隊的一名戰士，居然講出這種話來，你完全喪失了無產階級的立場！」然而這樣激烈的爭論並沒有破壞座談會的和諧氣氛，毛澤東以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引出一席話，仍然真切地打動了當時在場的何其芳：

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譬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

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甚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sup>12</sup>

這時，不以為然的蕭軍，針對何其芳所提出的懺悔，說：「我過去沒有，將來沒有，現在也沒有懺悔，因為我沒有意識墮落過。」還說，「人是思考動物，黨員要有自發性。」<sup>13</sup>關於王實味的問題，他「仍然承認他主觀上是站在革命立場上，根據是他是個黨員」；還說，「對於王實味批評的態度是不對的」，「究竟對他是同志還是敵人。」而胡喬木則諷刺蕭軍，說他「把共產黨員全看成木瓜」，「對於王實味，思想錯誤也就是敵人」<sup>14</sup>。接着，艾青、朱德等人發言。朱德不點名地批評了蕭軍：

在大會第一天，有人發言，他不但要做中國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他又說魯迅一直是革命的，並沒有甚麼轉變；他還講自己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依我看，我們每個

12 何其芳〈記延安文藝座談會〉，見艾克思編《延安文藝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74頁。

13 蕭軍《延安日記》上卷，476頁。

14 同上，475-6頁。

作家都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農兵。中國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有工農兵群眾批准。我是一個從舊軍人出身的人，我原來不是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無產階級。我投降無產階級，並不是想來當總司令。我只是替無產階級打仗、拼命、做事。後來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總司令。共產黨、八路軍，就是有功有德，為甚麼不該歌，不該頌呢？<sup>15</sup>

黃昌勇：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表現得最激烈的就是蕭軍，他公開辯論。但是為甚麼這個時候沒把蕭軍作為一個典型來批判？我感覺這裏面因素可能非常地複雜。像蕭軍這種倔強、性格暴烈的人，如果把他作為一個典型來重點批判的話，可能會出現很大的問題；再者，當時蕭軍已經非常有名了，《八月的鄉村》影響很大。這時候選擇甚麼人物來批判，是非常關鍵的。

班國瑞：大部分作家認為，文學應該脫離黨的政治監控，去質問人性最深處的東西，去解答政策無法給出有價值答案的那些問題。為甚麼 1942 年的時候，作家們能夠被允許發表批判性的文字？那是因為當時的言論正好適用於毛澤東發起的反黨八股運動，但是這種狀態僅僅持續了幾周，毛澤東就拉響了批判性言論的警報。那些越界的作家們就成了活靶子，被點名批評。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

15 何其芳〈記延安文藝座談會〉，74頁。

清楚地指明，文藝應該歌功頌德、不應該揭露黑暗。他還認為，個人特徵明顯的文學是資產主義的產物，是帶有托洛斯基思想的。原本與王實味相同陣營的人，都紛紛倒戈，但唯獨王實味拒絕了妥協。

---

1942年5月23日，楊家嶺又開了第三次座談會，這次到會的人比前兩次都多。從毛澤東第一次座談會的致辭，到第三次座談的總結，很多人都注意到裏面與王實味相關的內容，這也應驗了毛之前到中央研究院，挑燈夜看壁報上王實味的文章時說的話：「我們的思想鬥爭有目標了」。

---

朱正：王實味是個雜文家，他說，我們這兒是比外面好，但還應該更好一些，可是這就犯了毛澤東的忌諱。實際上共產黨這個體制，從延安一直到後來，都是盡量地包裝、粉飾自己，只能說好的、不能說壞的。我覺得王實味不算持不同政見者，他在延安的文章，對毛澤東是非常崇拜的。

林賢治：座談會的結論，一大半是針對王實味的。毛澤東搞整風運動，應該說主要為了在黨軍裏面排除異己勢力，樹立他個人在黨內、軍內、老百姓中間的權威地位。他最初還沒來得及想到知識分子問題，如果不是王實味這時挑戰他的權威，這個問題可能會推遲。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中談光明和黑暗、暴露和歌頌的關係，是對延安整個形勢的總結，他不允許你對延安總體評價不好。



從過去一直到現在，我們國家都是「形勢大好」的，大躍進時「形勢大好」，文化大革命也「形勢大好」、「鶯歌燕舞」，今天也是！我們總看國民生產總值、「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現今的社會問題、貧富懸殊指數都不談。

---

會議結束之後，參加會議者合影留念。這張照片到七十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是對延安文藝座談會最重要的記錄之一。劉白羽曾在2002年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60周年的文章〈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中，還回憶到當時散會以後「歡樂」的場景：

第三次會議是5月23日下午舉行的，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做了「結論」，這就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會場移到了中辦樓外的空場，我們剛剛落座，就見一輛大卡車開了進來，裝了一車水靈靈、紅豔豔的西紅柿。大家歡天喜地，一擁而上，一人拿了一個西紅柿大吃起來，鮮紅清涼的漬液順着嘴角流淌，那種歡樂多少年後還是記憶猶新，那是青春的歡樂，是革命的歡樂。<sup>16</sup>

毛主席慢步走來，坐到正中間，攝影師拍下了那張至今很多人熟悉的照片。

---

黃昌勇：當時很多文藝人士都被記錄在了這張重要的照片裏。王實味當時作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藝研究室的特別研

16 劉白羽〈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見《人民論壇》2002年第五期。

究員，比到會的很多人都有名，卻未獲此殊榮。參加會議是要被邀請的，請柬名單由毛澤東欽定，早在召開會議之前，毛澤東就找了大批文藝人士談話。這時信號已經很明顯了，王實味的角色已經轉換了，無論他本人如何表現，他都會被定為另類、典型，和別人區別開來了。

---

蕭軍參加了這次會議，照相的時候不肯站在前排，只在最後一排留下一個比較模糊的身影。他這一天的日記極為簡單，是一封給「喬木同志」的信，其中問道：「關於魯迅先生底『發展』與『轉變』說，各有主張。我是主張前者；昨聽您所主張係後者，於此時甚盼有一明確認識。」他還說，不止是他，別人恐怕也想知道答案。

在文藝座談會召開的5月2日到23日之間，王實味在做甚麼呢？在各種回憶中都似乎沒有記載。

---

**宋金壽：**毛澤東在這個期間曾經派胡喬木去找過王實味，也通過胡喬木給王實味寫過信，表達了毛澤東這樣一個思想，就是寫文章，首要的是政治立場問題，其次是具體問題，第三才是寫作技術技巧。胡喬木說，毛澤東希望你改變的首先是政治立場。無論是共產黨員還是文藝工作者，你首先必須立場正確。

---

王實味顯然沒有對胡喬木的代言和毛澤東的批評有即時反應，更沒有對未得親耳聆聽的講話做出反應。



1942年5月25日，文藝座談會與會者合影。



然而毛澤東本人卻十分重視文藝界對講話的反應。這裏應該指出的是，我們現在在《毛澤東選集》裏面看到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版本，是經過了幾次修改之後確定的。當時，毛澤東的講話由周昆玉等人做速記，據相關當事人回憶，這個記錄稿曾於座談會的當月，即1942年5月被七七出版社印出發行過，現在可以稱之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第一個公開版本<sup>17</sup>。但毛澤東本人更為重視的，則是座談會一年半之後，經過胡喬木整理，和他自己聽取各方意見後，進行了幾次細緻修改之後的版本，這個版本的全文正式發表在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報》上。引言部分這樣寫道：「今天是魯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紀念。我們特發表毛澤東同志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紀念這位中國文化革命最偉大與最英勇的旗手。」由此看出，這個講話的發表日期並非巧合，與其說用這樣一篇文章來紀念魯迅，不如說是讓魯迅的追隨者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共產黨對於魯迅的修正。當月，解放社（延安的出版社）出版了《講話》的單行本，也是我們今天可以參考的比較原始的版本。其中對於王實味一直堅持的「人性論」，毛澤東這樣評價：

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裏就是只有帶着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甚麼超階級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卻說成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脫離人民大眾

17 參見劉金田、吳曉梅：《〈毛澤東選集〉出版的前前後後》（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39頁。

# 毛澤東

##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解放社

# 整風文獻

訂正本

解放社出版

星期四

三期星

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十七日

心如張

### 激底粉王實味派的理論及其反黨活動

——在中央研究院門會上發表的——

# 學習

（一）第

（此處為張如心文章正文，內容涉及對王實味派理論的批判，以及對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討論。文章指出王實味派的理論具有反黨性質，並呼籲黨員加強學習，提高覺悟。）

左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公開發表的第一個版本；右上：解放社出版的《整風文獻》也是共產黨的重要文獻；下：張如心發表的批判王實味的文章。

或者反對人民大眾的，他們的所謂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因此在他們眼中，無產階級的人性就不合於人性。現在延安有些人們所主張的作為所謂文藝理論基礎的「人性論」，就是這樣講，這是完全錯誤的。

關於王實味在〈野百合花〉中的一段對於「愛和熱」的闡述，毛澤東並不同意「文藝的基本出發點是愛，是人類之愛」的觀點，他說，

我們的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愛無產階級，是社會使他們感覺到和無產階級有共同的命運的結果。我們恨日本帝國主義，是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的結果。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至於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後，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

此外，毛澤東還總結了這樣一些當時延安文藝界存在的觀點，並一一進行分析和批評：「從來的文藝作品都是寫光明和黑暗並重，一半對一半」；「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於暴露」；「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我是不歌功頌德的，歌頌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不是立場問題，立場是對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現不好，結果反而起了壞作用」；「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就是重複辯證唯物論的創作方法的錯誤，就要妨害創作情緒」<sup>18</sup>。在總

18 1942年2月26日發表的〈野百合花〉第二部分「碰『碰壁』」中，王實味寫道：說延安「學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學校哺乳他們成人，愛和熱向他們細語着人生……」我認為這多少有些主觀主義。延安青年雖然絕大多數是「學生出身」，「入世未深」，沒有「嘗夠人生冷暖」，但他們也絕大多數是從各種不同的痛苦鬥爭道路走到延安來的，過去的生活不見得有那樣多的「愛和熱」。

結時他指出，需要有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來糾正文藝界中的不正之風。這也就標誌着整風運動已經從高層整風，擴展到了整個延安的普遍整風。

座談會期間，同樣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佟冬<sup>19</sup>，回憶自己對王實味的認識隨着座談會的進行發生了變化，他還具體說到，羅邁5月24日在《解放日報》發表的〈動機與立場〉一文，幫他澄清了很多不明朗的認識：

羅邁同志文章的發表，進一步澄清了人們思想上的懷疑和彷徨，一些同志迅速投入了戰鬥。我們歷史研究室的金燦然同志、陳道同志，也先後在《解放日報》發表了批判王實味的文章。5月29日，《解放日報》還發表了范文瀾同志〈論王實味同志的思想意識〉一文。文章分析了王實味的思想實質，還做了自我批評：「我和旁的好幾位同志（按：指歷史研究室的同志），由於自己的鑒別力和對王實味同志的瞭解不足，在才看到王實味同志的〈野百合花〉一文的時候，還覺得寫的不那麼壞，或者至少動機不那麼壞的。到了後來，隨着整風文件的研究和對王實味同志真象的認識，才發現王實味同志製造這幾棵野花是煞費苦心的。」<sup>20</sup>

19 佟冬（1905-96），字竹生，生於遼寧，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1937年初加入共產黨，1938年被選送到延安學習，後分配到中央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與研究室其他成員共同完成了《中國通史簡編》。引文見佟冬〈漫憶中央研究院的整風運動〉，《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39頁。

20 佟冬〈漫憶中央研究院的整風運動〉，《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39頁。



緊接着，1942年5月27日，時任中央研究院哲學研究員的溫濟澤<sup>21</sup>在日記中記錄了中央研究院召開的「黨的民主與紀律」座談會：

今天有11個同志發言，大家都反省到在整風運動開始時我們所表現的極端民主化的傾向。有好幾個同志說：「我們在動員大會上否決了各研究室主任為當然委員，我們把整風運動看成只是「割大尾巴」（領導方面的尾巴），這些都是極端民主化的表現。但是，也有少數同志說：主任經過選舉才能擔任檢委，這是范副院長（指范文瀾）在動員大會上同意的。因此，否決主任為當然檢委，不能說就是極端民主化傾向——這是一個爭論的問題。<sup>22</sup>

接着溫濟澤還回憶范文瀾在會議上的自我批評，「對於自己在領導方面採取寬大的態度，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評。這種自我批評的精神，使大家很感動。」<sup>23</sup>從這一天起，溫濟澤以十分認真、虔誠的態度，記錄了此後一個月中央研究院開座談會的情況，並在6月28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他的〈鬥爭日記〉，使這一組日記從發表之日起，就成為一個歷史文獻。關於溫濟澤的為人，後來和他共事過多年的李敦白有生動的描述。

21 溫濟澤（1914-99），祖籍廣東梅縣，生在江蘇淮陰。1932年曾在「共舞台」事件中被國民黨特務機關復興社逮捕，1937年出獄。1938年到延安，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幹事、中央研究院哲學研究員、《解放日報》副刊編輯和主編、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編輯部主任。1957年錯劃右派，1960年到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任教，並在人民大學新聞系講授廣播業務課程。著有《人類征服自然的武器》、《征鴻片羽集》、《溫濟澤科普文選》等。

22 溫濟澤〈鬥爭日記〉，見《王實味平反紀實》（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年），185頁。

23 同上。



---

李敦白：溫濟澤和王震正好相反，是一個非常文明、熱心、大方的人。他真心相信共產主義理想，非常民主，即便當他已經是職位很高的領導時，大家都還可以很容易接近他。他坐過國民黨監獄，並因感冒幾乎聾了一隻耳朵。他對科學很感興趣，在科普方面有很多成績。我剛到延安的時候，他是我的鄰居。

---

之前就與王實味有過論爭的研究員李宇超提出，有偏向的人雖然很多，但是與王實味的偏向根本不同，因為王實味的文章、動員大會上的發言<sup>24</sup>，以及動員大會後的個人活動是一貫的，而不是偶然的。這個調子，在李宇超後來的發言中，也被他不斷強化。第二天，座談會繼續了關於民主集中制原則的討論，對於王實味的意見仍舊有贊成有反對，這兩種意見爭論未得解決。

---

林賢治：他們開始批王實味基本就是兩條，一是所謂「極端民主化」，王實味民主、平等的思想跟專制思想天然地對立；另一個罪名就是「絕對平均主義」，這個指的是特權思想。「極端民主化」更多是指在政治範疇、在團體組織裏面的權力問題；而「絕對平均主義」還涉及到個人權利、經濟分配方面的問題。我們可以說前者更多涉及的是「力」，而後者更多涉及的是「利」。

---

24 動員大會上的發言，指的是1942年3月18日的整風動員大會上，王實味提出「羅邁的補充意見，活現了他過去家長制的作風」，而且說「這是比豬還蠢的作風」。此外他還談到整風中應該檢查每個人的骨頭，凡是敢向「大人物」、「上司」提意見的就是至大至剛，否則就是軟骨頭，是歪風邪氣。

高華：王實味指出了共產主義革命的一些矛盾。共產主義革命吸引左翼知識分子的是其平等主義，但近距離觀察後，他發現這個平等主義有問題，直接講，一是特權的問題，二是權力異化的問題。這兩個問題非常敏感，王實味是第一個用明確的語言把它們解釋出來的人，在他之前、之後知識分子提出的問題，都沒有他那麼尖銳，所以選擇他、槍打出頭鳥，是有道理的。過去這兩個問題是個模糊地帶，大家都不會用明確的語言來談論。他直接把矛頭指向供給制，而供給制對中國共產革命非常重要：一方面滿足了革命的臨時性需要；同時它對特權有某種程度的堅固，使平等主義帶上一種不完美。而王實味是一個純粹的完美主義者，他不免會以悲劇性的調子公開表達出來。

5月30日上午，艾思奇<sup>25</sup>傳達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的結論。下午座談會繼續，羅邁最後解答了關於「民主集中制」和「黨的紀律」的一些問題，指出王實味的立場與黨相對立，「不單是思想上的錯誤，還是政治上的嚴重錯誤」。一部分與會者向座談會主席團提出，希望在下次會議能把王實味思想的實質研究得更清楚。主席團採納了建議，第二天印發了王實味在壁報上曾經發表過的文章，作為研究王實味思想的參考材料。

25 艾思奇（1910-66），原名李生萱，雲南騰沖人，蒙古族後裔。早年留學日本，193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35-36年任上海《讀書雜誌》編輯。1937年到延安，歷任抗日軍政大學主任教員、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文委秘書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副校長，中國哲學會副會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著作有《大眾哲學》、《哲學與生活》、《艾思奇文集》，主編有《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等。

1942年的6月，批判王實味成了中央研究院的重頭戲。溫濟澤將這一個月與王實味有關的會議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下來，與此同時，蕭軍的《延安日記》也對會議有另一種記錄。6月1日的座談會上，李言<sup>26</sup>向研究院人員做了報告，說在初讀〈野百合花〉時，大家多沒有看出作者立場有根本的錯誤。經過兩個多月整風文件的學習，才一致認識清楚〈野百合花〉一文存在嚴重的立場和方法錯誤。他還向黨委報告了與王實味六次談話的經過，說明王實味至今還沒有承認他的錯誤。溫濟澤日記，1942年6月1日：

李又常、潘芳、雪華諸同志的發言，向大會提供出許多材料，使大家知道王實味過去曾與托派有過關係，思想上中毒很深，到現在，他還常向人說：「斯大林人性不可愛」；「拉狄克是一個可愛的人」；「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應負責」；「蘇聯對於季諾維埃夫叛國案的審判是可懷疑的」；「托派理論有些地方是正確的」等等。他對黨和目前整風運動的認識也是根本錯誤的：他污蔑黨的領導機關，認為有一部分人已經腐化了；他說整風運動就是「毛主席團結正派人，反對不正派人」。<sup>27</sup>

林賢治：我覺得王實味的人格、性格、人性中間，有非常可愛的地方。托洛斯基那時候已經是敵人了，你公開說托

26 李言（1911-84），曾用名李蘊章，出生於浙江省縉雲縣。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10月，到延安陝北公辦學校學習。1938年3月至1941年3月，先後任延安抗日大學宣傳部長、延安馬列學院保衛委員、中央研究院黨委書記，中央黨校秘書長、中共支部書記等職。1974年4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黨委書記。

27 溫濟澤〈鬥爭日記〉，118頁。

洛斯基、托派成員的人性很可愛，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這裏你可以看到王實味對人性這個東西看得多重要。當時他已經受到批判了，他還這麼說，很少人會這樣做的。

---

溫濟澤回憶6月1日座談會結束前，艾思奇宣讀了王實味反駁齊肅文章<sup>28</sup>的一篇文章〈關於《野百合花》〉。王實味的這篇文章不可能發表，溫濟澤說這篇文章中，王實味「不僅繼續污蔑黨，而且以青年領導者自居，以現代的魯迅自居，號召青年們與他握手。在聽到後面這些肉麻的詞句時，會場中引起一陣一陣的帶着鄙視意味的哄笑。」<sup>29</sup>這一天的會議，已經將王實味的問題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而此後的座談會，已經從整風學習轉成了王實味批鬥大會了。此時仍然有人在私下認為這樣的處理並不妥當，溫濟澤在後來的回憶中也提到了在6月1日當天，王實味的精神狀態：

這幾天王實味稱病沒有參加會議。我找他談過兩三次，希望他能認識自己的錯誤，做個誠懇的檢查。我說：「你千里迢迢來到延安，還不是為了革命，為了抗日救國？你寫文章和說話有了錯誤，是立場問題，觀點和方法不正確，有甚麼不能改正的呢？你去參加大會，作個檢討，會得到同志們的諒解的。」他似乎有點觸動，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涕地說：「我有錯，但是，的確是出於愛黨的好心啊！」<sup>30</sup>

28 齊肅的〈關於《野百合花》〉發表在1942年4月7日的《解放日報》上。

29 溫濟澤〈鬥爭日記〉，188-89頁。

30 溫濟澤〈再談王實味冤案——冤案的始末及教訓〉，見溫濟澤編《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42頁。

---

戴晴：溫濟澤是非常誠實的。他寫的〈鬥爭日記〉今天看來可能很可笑，但都是真實的。那時他真的相信這一套，才使得我們今天可以有這麼一份史料。他自己是個比較識相、性格比較溫和的人。王實味作為一個共產黨員，還保持着他理想主義者的色彩，應該說王實味受到的不僅是政治壓力，還有感情的壓力。溫濟澤拉着他的手讓他改，他會說也許我錯了吧；可是過後又想，我並沒有錯啊。

---

出於對王實味的同情，溫濟澤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李言，但是李言把他的意見向康生匯報後，康生卻批評溫濟澤「溫情主義」。此外康生還說，王實味是托派分子，囑咐他「不要麻痺」。而王實味自己也並沒有採納溫濟澤動情的勸告。

6月2日，休會一天。研究院各人自己閱讀列寧論黨的文章，魯迅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上的講詞，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的結論，以及聯共黨史中關於粉碎反對派陰謀的經驗和教訓等材料。

---

黃昌勇：那天上午，王實味找到黨委，提出退黨的要求，他要走「自己所要走的路」。這裏可以看出雖然王實味沒有參加之前的批鬥大會，可是會上的情況他已經知道得很清楚了。試想，毛澤東派胡喬木給他寫信、找他談話，還有好幾個人去找他談話、勸他接受批評，這些人都是把他當成同志才這樣勸他的，可是他不光不聽、不光不檢討，還要脫離這個組織，那你還能是我們的同志嗎？溫濟澤就

感歎說：「他是一個這樣頑固的人，不願意接受黨對他的教育，他將走上一條多麼危險和不可救藥的道路啊！」

溫濟澤1942年6月2日日記：「休會一天。上午，王實味向黨委提出退出黨的要求，他說他「個人與黨的功利主義之間的矛盾是幾乎無法解決的」。消息靈通的蕭軍，在當天就知道了這件事，並且在日記中寫道：

回來聽說王實味有自動脫黨說，這是黨內一些無知的人以批評為打擊的結果。我思考再三，覺得這時他脫黨是於黨於他全是不利的。

從一個黨員立場看他，他這是不對的事，從一個「人」的立場來看他，那是應該同情。黨方面的處置不當，如果一時要保持黨底尊嚴，任他脫黨，這影響：A，敵方可利用這事宣傳為王實味被開除黨籍，證明共產黨的民主等全是謊言。B，對於一般黨員在心理上會留下這樣一個陰影「啊！不要多言了罷，萬事大吉」。C，對於王實味只有反革命路一條。這是一種各方面的損失。「人到了對於自己的前路完全感到暗淡，所受到大的打擊超過自己禁受得力量時，這時候人會感到情操的破滅……目前不是王實味本身問題，而是黨的影響問題……」<sup>31</sup>

現在看來，我們要佩服蕭軍的幾點估計完全正確。不久後國民黨真的以王實味案件攻擊共產黨的「民主」。第二天早上，蕭

31 蕭軍《延安日記》上卷，487頁。



軍收到通知，「討論王實味文章的會上午不開了，大約毛和他們商議此事如何處理。」<sup>32</sup>、

溫濟澤當天的日記記載：一天的會議之後，王實味提出退黨的事成了大家關注的焦點之一，晚上有幾個人找王實味談話，試圖再度說服他承認錯誤，王實味決定第二天參加自己的「批鬥大會」。這是王實味本人第一次參加大會，當時中央研究院的批鬥大會都是毛澤東親自過問的，黎辛仍然記得開會前會場的情景。

---

黎辛：6月4日，王實味到會的那天，通知9點鐘開會，各機關來了有一千多人，中央研究院的禮堂不夠大了，就在院子裏開會。我在院子裏等了半個小時，院子裏最大的樹也不大，才有兩棵，擋不住人。等不到開會，我就回報社工作了。為甚麼開得晚了呢？因為他們在毛澤東那兒先開小會，大家提出來說王實味要來，如果他誇誇其談，都讓他做了解釋怎麼辦？毛澤東說：「准許插言」。現在有人說，王實味的事情是康生這位當時的社會部長一手辦的，這不對。怎麼批評王實味的小會，都是在毛澤東那裏開的。

---

6月4日，溫濟澤和蕭軍兩人都參加了鬥爭王實味的大會，雖然兩人記載的細節有所不同，但是對比來看，相當有趣。蕭軍描述自己在中央研究院的會場外，看見了「一個搖搖晃晃高身材，白面孔的人由山上走下來。」蕭軍說：「我斷定那就是

32 同上，489頁。

今天要在這大會上做箭垛的人——果然是的。」<sup>33</sup>溫濟澤也在日記中寫道：

今天中央政治研究室和文抗來旁聽的人很多，大禮堂的窗台上也坐滿了人。開會的鈴聲響了，幾百雙眼睛發出來的視線，射在從左面大門走進來的王實味的身上。今天是王實味第一次出席我們的座談會。李宇超和潘芳兩個人首先發言。<sup>34</sup>

兩人談話的具體內容無從得知，但是蕭軍寫道：

第一個和第二個發言的惡劣和陰毒已經使我憎惡了，但我忍耐着。他們從思想、政治、組織上斷定他是「托派」思想，肯定他是托派。用各種證據想證明他是有計劃、有陰謀來進行破壞黨，侮辱黨的托派流浪分子……或者是小資產階級染着托派思想的分子……我憎惡這些不知羞恥的狗們！他們完全不懂自己是甚麼東西……這正是社會上一些犯了罪的人而判別人罪的形象。接着是王實味自己發言，會場輕輕引起了一陣騷動。<sup>35</sup>

溫濟澤回憶，王實味聲音低沉地說：

「我鄭重地嚴肅地撤銷我前天在變態心理下對黨委提出來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幾個朋友的『愛』感動了我。」

33 同上，489頁。

34 溫濟澤《鬥爭日記》，191頁。

35 蕭軍《延安日記》上卷，490頁。

「你的政治生命是由朋友的『愛』決定的麼？」一個同志向他提出質疑。

「我今天認為超階級的『愛』和『恨』是不存在的了，……」他接着說：「剛才，李宇超同志說我是托派，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過去就根本不知道政治（？），……你們看我在《中國文化》上寫的關於民族形式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的統一戰線的立場站得很穩，……哪裏會有托派思想？」

「你不應該說謊！你是常和我談到托派問題的，你到現在還認為蘇聯有托派，說蘇聯的托派不是法西斯匪幫的走狗，而是反法西斯的。」一個同志起來質問。

「你也對我說過同樣的話。」又一個同志起來質問。

「我說過的話我一定承認。是的，我說過：我對托派進行小組組織活動，反對斯大林，是我很痛恨的。現在看到他們與聯共團結在一起反對法西斯（？），我又很感動。」

「你根據甚麼事實說蘇聯還有托匪？說托匪是反法西斯的？」又是一個質問。<sup>36</sup>

接着，王實味在發言中「承認他在1929年，開始與托派來往，替托派翻譯過〈列寧遺囑〉（被托派修改過）以及《托洛斯基自傳》的兩章」，還在托派刊物——也就是《展開》上發表過小說〈三代〉。他說自己「一直到1936年，還與托匪陳其昌通過信。一直到今天，他對陳其昌、王文元（王凡西）等托匪仍念

36 溫濟澤〈鬥爭日記〉，191-2頁。

念不忘，仍覺得他們的『人性』是好的」。王實味的發言繼續着，但是不斷地被他的同志們打斷：

「……我認為托派對立三路線的批評是正確的。（「胡說！」）……看到了「八一宣言」，覺得這和托派國民會議的主張差不多。」（「胡說！」）「……看到了魯迅答托派書，我才站到統一戰線的立場上來。」

……

「你為甚麼說蘇聯清黨時，斯大林同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惡？這種話是你以前說過的。」一個同志起來問。

「我認為蘇聯清黨時，有好些人是可以從敵人爭取為同志的。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sup>37</sup>

這句話在會場上被當成「對於斯大林同志的污衊，又激起全場的義憤」。前文提到，這句「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是列寧的原話。1930年王實味在用蒼滄的名字翻譯〈列寧遺囑〉時，就在譯文中加入了自己的按語，相當激烈地評論斯大林對托洛斯基的壓制。由此看來，王實味在12年來的信念並未改變，而中共的大多數黨員對托洛斯基的瞭解也還沒有達到王實味1930年時的水平。

……  
宋金壽：現實是王實味瞭解一點斯大林的情況。他在延安沒有翻譯過斯大林著作，是因為斯大林著作在延安只有俄

37 同上，192頁。

文版。王實味本身英文水平比較高，列寧、馬克思的文章有英文版，因此他主要翻譯列寧、馬克思的著作。他翻譯的〈列寧遺囑〉貶低斯大林、抬高托洛斯基。現在來看，王實味的觀點是比較前衛的。

---

會場上對王實味的聲討持續着，王實味也為自己辯護着。接下來蕭軍記錄的會場上對王實味的人身攻擊，在溫濟澤日記中卻隻字未提：

接着這個半瘋狂的神經質的人站起來了，他發言還不到幾句，下面就有一些人「打」斷他的話，像一群惡狗似的，伸出嘴巴向他圍攻了，致使這狂熱人不能繼續他的說話，而主席還縱容着不管，這簡直是一種陰謀！一個女人嚷着叫他去自殺，這使我再不能忍受了，我終於發了言：

「主席，這是不行的，應該讓他發言說全了話大家再反駁他……無論甚麼會場全有個秩序呀……」

「這是座談會呀，不是議會呀……」

「他也說話了呀！」

「你這說話就是打斷他們說話呀！……」忽然一群狼似的噪叫聲音響起來了，接着整個會場騷亂了，另外兩個人也同意了我的意見，全會場一些人也同意了我的意見……

蕭軍日記說，因為會場上有些人贊同了他的說法，「那個大眼大耳像個貓頭鷹似的宣傳副部長，」也就是羅邁說：「有人在

搞亂了會場！別人用教訓和侮辱的態度，我們不能接受呀，這是侮辱我們」。蕭軍對此勃然大怒：

這明顯是因為王實味曾在壁報上批評過他，我在文藝座談會上替王說過話，他們是恨在心裏的，今天他們企圖用自己的牙齒把自己的仇人撕碎了，擲出黨外，他們為了假公濟私竟忘了黨的影響，黨的利益，至於同志的愛，為人的品格，批評的精神，方法，立場……早就扔到九霄雲外了。」如果黨內盡隱藏這樣的豺狼，那是悲哀了，好則他們就要被淘汰，我會用眼睛看到的，他們是少數。我是不惜和這類東西為敵，我不怕他們如何多！<sup>38</sup>

溫濟澤記得休會時，他和王實味一路走出來。王實味說：「我的錯誤，只有我自己能清算，別的人，不論哲學學得怎樣好，也不會弄清楚的。」溫濟澤報以一聲「冷笑」<sup>39</sup>，這算是一種決裂態度罷。王實味沒有出席下午的座談會，以後的座談會也沒有再參加過了。今天我看到對於那個場面的文字記錄，還能夠感受到在場的人激動與亢奮的狀態，大部分人都似乎在某種政治的氣氛之下，失去了慣常的理性。

蕭軍在這天的日記中還寫道，他陪着舒群到《解放日報》社，曾經贊成、並親自發表〈野百合花〉的陳企霞此時「居然」和他「唱起高調來了」，讓他感到憤怒：「從今天起，從

38 這段和以上兩段文字都引自蕭軍《延安日記》上卷，490-1頁。

39 溫濟澤〈鬥爭日記〉，見《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193頁。

感情領域中，我開除了他們以及類似的此類『朋友』，可見這個大會對於他的影響<sup>40</sup>。然而這只是蕭軍目睹其他知識分子紛紛倒戈的開始。

黃昌勇：看到批鬥會的這一段，我覺得王實味是很痛苦的，他最痛苦的地方在於沒人能和他對話。所有批判他的人的理論、觀點、邏輯，都沒有辦法和他對話。當時在延安的人，有多少真正瞭解托派思想、知道蘇共黨內那些鬥爭？基本沒人知道，就算知道，也沒人敢公然同意王實味的觀點。

林賢治：蕭軍有俠義性格，在王實味的問題上表現不錯，不是極力地為王實味辯護，但試圖維護王實味的尊嚴與說話的權力，這在當時非常難得。但他無法對王實味的處境，或者之後王實味應該往哪裏去加以考慮。

6月6日，蕭軍對兩天前的座談會寫了3,000字的意見，預備投給《解放日報》。他原本計劃和王震一起去綏德，可是發現王震對他的態度突然變得十分冷淡。

王震又提到王實味的問題，「他簡直不夠一個文化人」他說。我給他解釋了一番，這是對思想戰鬥問題，不是對人底問題。如果思想錯了，即使人死了也要戰鬥。（譬如最近死了的陳獨秀）「你是不是聽說在座談會上我為王實味辯護過？

40 蕭軍《延安日記》上卷，491頁。

你不要錯會了我的意思。關於這事，你可以和毛澤東同志談談，他會為你解釋的……」<sup>41</sup>

可見這個時候，蕭軍還是信任毛澤東的。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晚王實味雖然仍舊睡不好，但延安的跳舞會照常舉行，蕭軍還在舞會上講了話：「過去大家全知道文抗與魯藝之間存着一些疙裏疙瘩的事……從今天起，至少我個人是消除了這些不必要的東西。」他的話引來長久的掌聲，周揚也來示好，「你講得好啊！」可見大家都已意識到矛盾重心的轉移<sup>42</sup>。其實蕭軍當時試圖和毛澤東討論此事，幫王實味解圍，毛的態度雖然很好，但對他說：「這事你不要管，王實味的問題複雜，他不是一般思想意識錯誤，他有托派問題。」作為一貫和黨組織保持着距離的文人，蕭軍此時已經無法對高層領導人繼續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中央研究院對王實味的鬥爭不但繼續着，還吸引着越來越多外單位來參觀、看熱鬧的人。溫濟澤記述6月8日大家就像過節一樣：

從早晨7點鐘起，就不斷地像潮水一樣地湧來了一千多個旁聽者，他們來自70幾個機關（學校在內）。大家圍繞着主席台，坐在操場上。當主席團宣佈「座談會繼續開會」的時候，同志們不禁好笑起來——從來也沒見過這樣盛大的座談會！為着使到會者都能瞭解座談會的內容，主席團首先簡單

41 蕭軍《延安日記》上卷，493頁。

42 同上，494頁。



地報告了兩個禮拜以來開會的經過。接着，李又常和雪葦兩同志發言，又較有系統地敘述了：王實味的托派思想，他與托派的歷史關係，對黨的錯誤看法，對整風運動的錯誤的瞭解，及其在整風運動中的活動等等。<sup>43</sup>

到中午休會的時候，主席團不得不請各機關各學校選派代表繼續參加下午的座談會，並宣佈來賓也可以發言。劉雪葦回憶自己把3月初和王實味的私下討論告訴了大家。大部分在場的人因不瞭解托派主張而聽不懂王實味的話，劉雪葦等於是給大家一個解釋。

6月9日，批判會繼續，首先發言的是一向和王實味有芥蒂的陳伯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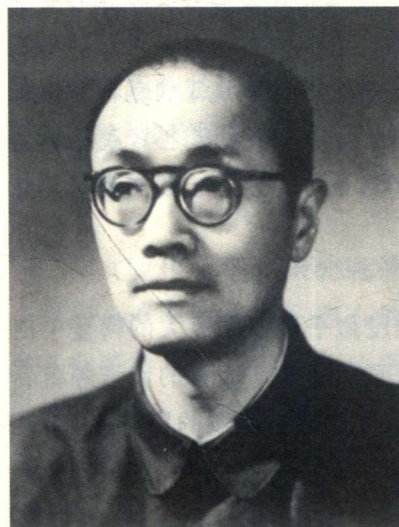
黃昌勇：陳伯達口音太重，請人幫他讀稿子。在中央研究院，王實味反感他、一直不賣他賬，到處諷刺挖苦他。陳伯達怎麼可能放過他呢？他當時位居毛澤東秘書，也可能在毛澤東耳邊說了王實味的壞話。如果王實味性格圓滑，不那麼暴烈、那麼愛恨分明，就不會這樣。

---

跟着陳伯達做「精彩發言」是詩人艾青。

艾青同志說：王實味的文章充滿着陰森氣，當我讀它的時候，就像是走進城隍廟一樣。王實味文章的風格是卑下

43 溫濟澤〈鬥爭日記〉，194頁。



王實味在中央研究院的領導：張聞天（左上）、羅邁（李維漢，右上）、范文瀾（左下）、陳伯達（右下）。

的……他把延安描寫成一團黑暗，他把政治家與藝術家、老幹部與新幹部對立起來，挑撥他們之間的關係，這種立場是反動的，這種手段是毒辣的。這樣的「人」，實在夠不上「人」這個稱號，更不應該稱他為「同志」！<sup>44</sup>

值得一提的是，艾青曾在3月11日的《解放日報》上，發表過一篇〈瞭解作家，尊重作家〉，其中曾強調作家忠於自己感情的重要性：

作家並不是百靈鳥，也不是專門唱歌娛樂人的歌妓。他的竭盡心血的作品，是通過他的心的搏動而完成的。他不能欺瞞他的感情去寫一篇東西，他只知道根據自己的世界觀去看事物，去描寫事物，去批判事物。在他創作的時候，就只求忠實於他的情感，因為不這樣，他的作品就成了虛偽的，沒有生命的。希望作家能把癬疥寫成花朵，把膿包寫成蓓蕾的人，是最沒有出息的人——因為他連看見自己醜陋的勇氣都沒有，更何況要他改呢？

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裏，他的態度似乎發生了巨大的轉變，由此我們也可以間接感受到當時氣氛的緊張。艾青的發言經重新修改，在《解放日報》上發表出來，其中以諷刺的寫法寫道：

王實味和所有的托洛斯基黨徒一樣，是善於以「左」的面貌出現的。托洛斯基者們，永遠拿一切「左」的名詞、術語做胭脂，塗在蒼老的乾癟了的臉皮上；身上穿着紅得發紫的旗

44 同上，195頁。

袍，手上提着柏林製造的手提袋，在光天化日之下，迷惑純潔的青年。<sup>45</sup>

我真的很難想像一個如此怪異的形象，怎麼能迷惑任何青年！

艾青發言之後，溫濟澤提到接下來「有一個同志的發言，引起劇烈的爭論。在他的發言中說：王實味在思想上是托派，這已經肯定了，但是我們還不能肯定地說他在組織上有甚麼問題。」溫濟澤沒有說這位同志是誰，可能是因為好心不要去點別人的名，但對照劉雪葦的回憶，可以推斷「這個同志」有可能正是前一天揭發王實味托派思想的劉雪葦。雖然至此，他已經不止一次向領導反應、向群眾揭發王實味有托派思想，但是作為一個實事求是的共產黨員，他此時表示，有托派思想和他加入托派組織是兩回事<sup>46</sup>。不過在會場上，有六七個人立刻反對，顯然這時的鬥爭局勢已不可挽回，和王實味的矛盾已經上升為敵我矛盾了。

前文提到，王實味教過書的開封女中，有幾十個學生到了延安。當王實味成了眾人批判的焦點時，他的學生可有反應？此時薄平、高向明都已經離開了延安，但是6月9日蕭軍的日記記載，一個叫任琦的王實味的學生來找他，「這是一個倔強的孩子，她對此地一切感到不滿，人與人之間的虛偽，失

45 艾青〈現實不容許歪曲〉，原載1942年6月24日《解放日報》，引自朱鴻召選編《王實味文存》，231頁。

46 在劉雪葦的回憶中，他是「在分組（支部）討論會上說：『王實味的托派思想是毫無疑問存在的，但要上升為政治問題，即組織行動、特務活動問題，還材料不足。』這個發言彙報上去，當然和領導的方向相悖、絕對不歡迎的。」見雪葦〈我和王實味〉，86頁。

望……」蕭軍說自己只能「從大的方面勸解了她」<sup>47</sup>，但其實這樣的勸解是無力的。可見這種殘酷的鬥爭，雖然讓很多人都沉默，但並沒有讓大家心服口服。在公眾場合，很多人雖然沒有發言，但是私下不滿的議論還是有的。

6月10日批鬥大會繼續，重點發言的人是張如心。在王實味要求民主選舉整風委員時，他是原委員中落選的兩人之一，他對王實味思想作了有系統的分析 and 批判。溫濟澤日記寫道：

首先，指出王實味的思想要點：一個是「人性」論，這是他的人生哲學，思想基礎；一個是蛻化論，這是他反黨的思想武器；一個是極端民主主義與平均主義，這是與前兩者密切聯繫着的。其次，分析王實味的活動方法：是以「左」的面貌出現的；是利用青年的弱點來剝削青年的；是挑撥離間的；是兩面派的。並且從他的歷史上看，證明他的思想與活動是一貫的，不是偶然的。<sup>48</sup>

這一天，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及楊家嶺的政治研究室，一致要求開除王實味黨籍，主席團決定交予院黨委會辦理。

6月11日，座談會到了最後一天，到會的人極多，大禮堂的周圍添了一道人牆。第一個發言的是丁玲。她駁斥了王實味「對延安文藝界的侮辱」，也對〈三八節有感〉作了一番異常沉痛的自我批評，她的話給很多在場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47 蕭軍《延安日記》上卷，497頁。

48 溫濟澤《鬥爭日記》，195-6頁。

在整頓三風中，我學習得不夠好，但我自己開始有點恍然大悟，我把過去很多想不通的問題，漸漸都想明白了，大有回頭是岸的感覺。回溯過去的所有的煩悶，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顧慮和錯誤，就像唐三藏站在到達天界的河邊看到自己的軀殼隨水流去的感覺，一種翻然而悟、憬然而懼的感覺。我知道，這最多也不過是正確認識的開端，我應該牢牢抓住這鑰匙一步一步腳踏實地的走下去。前邊還有九九八十一難在等着呢。<sup>49</sup>

除了懺悔自己的錯誤之外，丁玲還提出要「打落水狗」，她說王實味「為人小氣、卑劣、反覆無常、複雜而陰暗，」是「破壞革命的流氓」<sup>50</sup>。和陳伯達、艾青的發言一樣，丁玲此時的批評已經全無思想理論，而是近於侮辱謾罵了。

戴晴：中央研究院的討論會從小會場改到大會場，人山人海，嚇得一個個就這麼聽着，一說起王實味就喊口號要打他。這和後來中國發生的一模一樣，這個模式一次次地重複。所有能拉的人，像丁玲甚麼的，毛澤東都拉過來了。丁玲聰明，她知道自己和王實味一模一樣啊，〈三八節有感〉和〈野百合花〉一起發表、一起受批評的嘛。但是她懂得毛澤東的意思了：我整他，不整你了，你態度好就沒事

49 丁玲的這篇檢查後來發表在1942年6月16日的《解放日報》上；引自丁玲〈文藝界對王實味應有的態度及反省——六月十一日在中央研究院與王實味思想作鬥爭的座談會上的發言〉，見朱鴻召選編《王實味文存》，204頁。

50 同上，201頁。

了。接着她就背叛了一個作家、一個文化人的良知，開始成為黨的吹鼓手——這是她自己選擇的。

高華：對於丁玲也不要批判。我可以理解，在那種高壓下，換一個人未必比她做得好。蕭軍是一個比較硬氣的東北漢子，他不簡單，在這麼困難的情況下還拔刀相助、救護朋友。有沒有用那另當別論，蕭軍特別讓人尊敬。蕭軍是非黨員，之前跟毛澤東一度關係比較密切，同樣的話蕭軍講可以，別人講可能就不行，他有某種特殊性。

黃昌勇：不管是艾青還是丁玲，他們的發言很明確就是與王實味劃清界限了。他們當時作為先鋒知識分子，還是起着重要作用的，他們的批判和自省也是最積極的。在這之前《輕騎隊》也已經在4月12日和13日的《解放日報》上公開作過檢討了；毛澤東也原諒了他們。不過歷史就是，到了1957年，丁玲和艾青又和王實味捆在一起被批判，說他們的雜文是反黨反人民的「毒草」，他們的命運也在某種程度上和王實味相似了。丁玲當時說，「前邊還有九九八十一難在等着」，也讓她說中了。

---

丁玲發言後，羅邁總結了兩個星期的論戰，再次將所有說法上綱上線。溫濟澤記得，范文瀾在會議結束之前做了補充發言：

王實味的反革命反黨의思想和活動，黨委早就知道了，不過我們對王實味始終抱着與人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不放棄



### 文藝界對王實味應有的態度及反省

六月十一日在中央研究院

王實味惡毒侮辱黨的理論上的發言

丁玲

王實味惡毒侮辱黨的理論上的發言，這是一篇極其惡毒的言論。它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對黨造成了極大的損害。這篇文章的發表，是文藝界對黨的理論上的一種挑戰。它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對黨造成了極大的損害。這篇文章的發表，是文藝界對黨的理論上的一種挑戰。

王實味在文章中，對黨的理論進行了極其惡毒的攻擊。他認為，黨的理論是錯誤的，是脫離實際的。他認為，黨的理論是錯誤的，是脫離實際的。他認為，黨的理論是錯誤的，是脫離實際的。他認為，黨的理論是錯誤的，是脫離實際的。

王實味的這種言論，是極其危險的。它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對黨造成了極大的損害。他認為，黨的理論是錯誤的，是脫離實際的。他認為，黨的理論是錯誤的，是脫離實際的。他認為，黨的理論是錯誤的，是脫離實際的。

王實味的這種言論，是極其危險的。它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對黨造成了極大的損害。他認為，黨的理論是錯誤的，是脫離實際的。他認為，黨的理論是錯誤的，是脫離實際的。他認為，黨的理論是錯誤的，是脫離實際的。

王實味的這種言論，是極其危險的。它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對黨造成了極大的損害。他認為，黨的理論是錯誤的，是脫離實際的。他認為，黨的理論是錯誤的，是脫離實際的。他認為，黨的理論是錯誤的，是脫離實際的。

左：1942年6月，丁玲批判王實味的文章；右：1941年在《解放日報》任職時的丁玲。



任何一個機會，醫治他、挽救他，並希望王實味自己能誠心改過，可是王實味不了解我們這種精神，始終不誠意揭發自己的錯誤，多方掩飾自己的錯誤，還說我們主張了他的錯誤（笑聲）。你們看這個人混蛋不混蛋？

值得一提的是，范文瀾是王實味的北大校友，王實味正是拿着他的介紹信到達延安的。可是此時，他也沒法拯救王實味了。接着，他把「黨挽救王實味的經過情形」簡單介紹了一下，說「喬木同志曾和他談過兩次話，寫過兩次信」，兩個多月來「黨委和他談話，有八次之多。我也和他談過兩三次。他總是狡辯，好不認錯。昨天早晨他還對我說：『你在報上發表的文章我讀了，但是我還沒有發現我的錯誤。』」然後，提到「黨委又委託五個同志經常和他談話，幫助他改正錯誤」，但都沒有用。即使《解放日報》上登出若干文章指出他的錯誤，「他還是不反省」！

毛主席曾指示我們：只要一個人，有一點想好，我們都應該與他為善。我們正是這樣，用盡了苦心去挽救王實味，希望把他從茅坑裏救出來，可是他卻想把我們拉到茅坑裏去（笑聲）。剛才羅邁同志說，我們可以聲明：王實味還有最後的機會從反革命的茅坑裏爬出來。我同意這個聲明，並願意盡最後的努力去挽救他。<sup>51</sup>

51 以上兩段來自范文瀾〈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一日座談會上的發言〉，原載1942年6月29日《解放日報》，引自朱鴻召選編《王實味文存》，256-7頁。

溫濟澤回憶，范文瀾講完了話，全場發出笑聲和掌聲，主席團宣佈了這次座談會結束。

此日蕭軍並沒有出席，但是他之前對王實味的捍衛，已經引來了很多不滿。座談會的幾天後，中央研究院派詩人郭小川等人做代表，向蕭軍提出抗議，指責他破壞批判會，要他承認錯誤；蕭軍不但拒絕，簡直是把四名代表給轟出來。中央研究院和其他單位的黨員群眾們，給他送來108個人簽名的抗議書，內容如下：

蕭軍同志：

我們一向認為你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願意向我們的共同敵人奮鬥到底，像你這種熱情，我們一向表示十分敬意！

據許多同志對我們說，你在參加了我們對於托派分子王實味的鬥爭會議之後，你曾對我們的座談會加以誣蔑，認為是「倒尿盆」「狗打架」「假公濟私」，我們認為你這種態度是不正確違反真理的，不管你主觀動機如何。我們這次座談會是清算王實味的托派思想及其反黨活動，我們的鬥爭是有原則的，有根據的，目的是為了教育自己及強固黨，因此不僅黨員應該積極擁護，而且一切黨外人士也應該抱同情的態度，給與積極的幫助，但使我們十分惋惜的，是你所表現的，並不是一個友人應有的態度，因此我們希望你好好地反省一下，改正這種錯誤觀點。此致

敬禮

六月十日

中央研究院全體人員，中央醫院到會代表蘇愛吾等，政治研究室全體人員，中央政治研究室敵偽組，海委全體，世界語協會，邊保政治部全體黨員，中央印刷廠參加大會代表李平呂西良。以下個人簽名108人。<sup>5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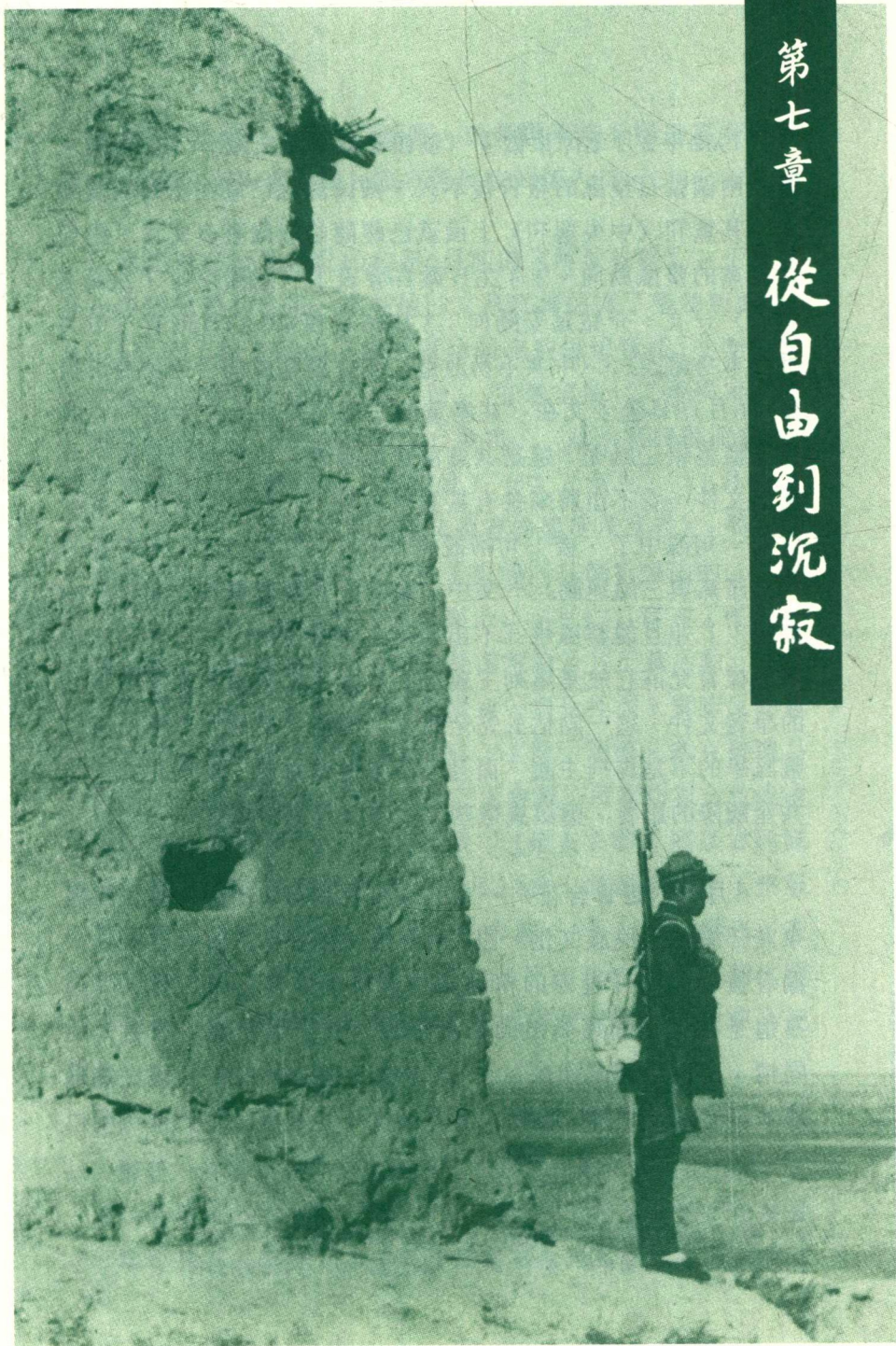
蕭軍說自己用了白天的時間抄錄這封信，抄完怒氣未息，寫了一份書面材料上呈黨中央毛主席<sup>53</sup>，說明事實經過，闡明了自己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他把這份材料取名為〈備忘錄〉，並在10月19日魯迅逝世六周年的紀念會上宣讀，但這篇報告讓他遭到無數批評，並被冠以「同情托派分子王實味」的罪名<sup>53</sup>。

52 蕭軍《延安日記》上卷，501頁。

53 張毓茂〈我所知道的蕭軍先生〉，見《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2期。

第七章

從自由到沉寂



1942年2月毛澤東做了〈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反對黨八股〉兩個號召整風的報告後不久，國民黨就已經注意到這個動向，其黨刊《中央週刊》上面就已經開始陸續發表文章，報告共產黨的整風動向。2月26日微言發表了〈毛澤東的「三風主義」〉一文，介紹延安動向；3月26日和4月23日則有〈中共批評本身錯誤〉、〈中共不易改造〉兩文對整風能否成功提出質疑；6月18日金子文在〈共產黨的三風問題〉一文中說，「共黨怎樣整頓三風呢？這是共黨前途的關鍵。可惜我們看遍了共黨的文件，看不出將來會有甚麼好結果。」在今天看來，金子文前一句說中了，後一句卻說得太早了。6月25日，朱敦春的〈共產黨與三風運動〉一文中，諷刺「共產黨還是一個封建的集團！」並且說整風也「不出馬列主義的範圍」，而「第三國際怎樣會允許它放棄馬列主義呢！」當然朱敦春不能看到整風的學習文件，這一點估計完全錯了。如前文中何方先生所說，整風學的不是馬列主義。而且毛澤東通過整風，要弱化的正是共產國際的影響，應該說這些文章都沒有擊中要害<sup>1</sup>。

6月，〈野百合花〉一文已經在重慶翻印出版，國民黨廣東黨部編的《民族文化》也在8月全文發表了〈野百合花〉，編者按中說：「延安的作品原是難得在本刊上見到的。只因為這是在延安那裏發出的正義呼聲，我們該使他得到更大的同情，所以也轉載過來。」<sup>2</sup>應該說毛澤東的文件，國民黨那邊並沒有真正理解，但是王實味的文章說甚麼，他們卻看明白

1 轉引自盧毅〈國民黨眼中的延安整風〉，見《黨的文獻》2010年第3期。

2 〈讀者、作者、編者〉，見《民族文化》第2卷第7期，1942年8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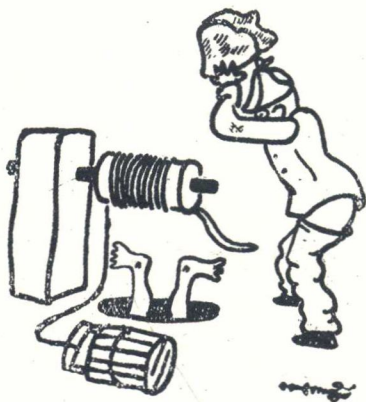
了，〈野百合花〉才擊中了要害。於是蕭軍擔心過的事情發生了，〈野百合花〉成為國民黨宣傳反攻的切入口。

我們現在如果查看1942年6月間的《解放日報》，王實味是出現最頻繁的名字，批判他的文章常常佔據了整個版面：6月9日發表了范文瀾的〈論王實味同志的思想意識〉、李伯釗的〈繼《讀野百合花》有感之後〉，和陳道的〈「藝術家」的「野百合花」〉；6月10日蔡天心發表了〈政治家與藝術家——對於實味同志《政治家，藝術家》一文之意見〉；6月11日發表了丁玲的〈文藝界對王實味應有的態度及反省〉，周文的〈從魯迅的雜文談到實味〉，王子野的〈打倒叭兒狗的「文藝家」〉，和華君武的漫畫〈知識架子〉；6月17日發表了張如心的整版長文〈徹底粉碎王實味的托派理論及其反黨活動〉；6月19日發表了〈延安文藝界舉行座談會，痛斥托派王實味反動思想，建議文抗開除王實味其會籍〉，丁玲、周揚、塞克被選為主席團，主持了從15日到18日的三天會議，所有作家一致表達了對王實味的憤恨；6月20日發表了《延安文藝界座談會通過關於托派王實味事件的決議》；6月22日，邊區文協出了整版的整風壁報「關於托派王實味」的專號；6月24日，發表了艾青的整版長文〈現實不容許歪曲〉；6月28到29日，分兩次發表了溫濟澤的〈鬥爭日記〉。當時的《解放日報》編輯黎辛記得，

---

黎辛：羅邁的發言是6月28日登出的，范文瀾的6月29日，〈鬥爭日記〉也是6月28、29日發的。〈鬥爭日記〉跟發言講的有不一致的。范文瀾發言說，他同意羅邁發言，王實

「爲了整頓三風，還有給你一下石頭的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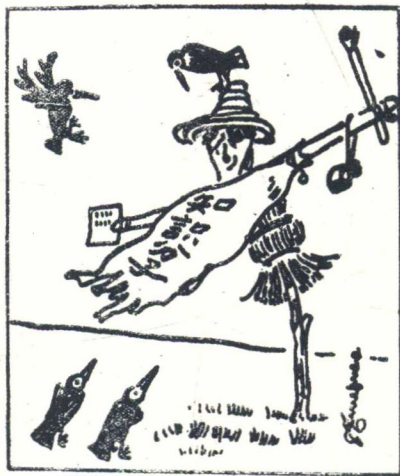
「這一下總算有的放矢了！」



華君武作

知識架子

華君武作



左上：整風期間，華君武發表的漫畫：「為了整頓三風，還有給你一下石頭的必要！」；  
左下：「這一下總算有的放矢了！」；右下：〈知識架子〉

味是托派分子；可是〈鬥爭日記〉寫范文瀾說王實味是托洛斯基分子，羅邁同意他的話。這個稿子是陳企霞和我分開看的，我們倆沒有把三份稿件一起看完；起碼如果我都看完了，也不會出現兩個稿有矛盾的情況。

---

宋金壽曾經幫助羅邁整理過一些整風材料，他知道關於王實味的托派問題，王實味自己早在1941年就已經有過交代，不過到了這時候才被冠以罪名，並對整風運動起到了轉向性的作用。

---

宋金壽：最後拿出王實味的歷史問題，把他打成托派，康生確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羅邁說過，康生的意見對於我們來說是指令性的。王實味確實向中央組織部交代過自己跟托派的關係，但是當時中央組織部並沒有處理這個問題，因為也沒甚麼太本質的問題。但到這時候，圍繞解決整風轉向、克服偏向，就把王實味的歷史問題拿出來。1942年6月19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現在出現了王實味托派反革命，大家要注意，要在學習當中查壞人。甚麼壞人呢？就是「日特」，日本特務；「國特」，國民黨特務；「托派」這樣一些壞人。毛澤東提出來以後，慢慢地，中央黨校就開始查這些壞人。

---

7月的《解放日報》上，對王實味鬥爭的報導仍然繼續着：7月3至4日，陳伯達的長文〈寫在王實味同志文藝的民族形式短論之後〉分兩次發表；7月8日和29日，分兩次發表了周揚的〈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這篇經過毛澤東審



闊的洋洋萬言長文，成為黨內把文藝問題上升至政治問題的範文。周揚還會在此後歷次的政治運動中寫這樣的總結文章。

---

高華：延安文藝座談會一結束，周揚就擔負起宣傳、解釋毛澤東及黨的文藝觀的新使命，從此延安文藝界的氣氛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以周揚為核心的中共文藝統治體系也迅速確立。我們都知道，毛澤東在文藝方面的主要顧問是周揚和胡喬木兩個新朋友，而不是昔日的熟人、魯迅的弟子馮雪峰。周揚和毛澤東建立工作關係，是在他來延安當了邊區教育廳長和魯迅藝術文學院副院長，主持魯藝的工作後。恰恰這時，馮雪峰因為和博古發生了爭執，一氣之下請了兩年長假回老家。他和組織脫離關係那麼久，後果非常嚴重，毛澤東從此對他比較反感，而周揚就在這時和毛日益接近。

---

就在大家紛紛從思想和文章中，一致表示和王實味劃清界限的時候，前文提到的左聯作家吳奚如在7月的《解放日報》上發表的紀實小說〈未了的旅程〉，卻又產生了一些不和諧的聲音。

---

宋金壽：吳奚如參加過黃埔軍官學校，蔣介石叛變以後，是邊區討蔣刊物的編輯。他參加南昌起義被逮捕過，後來到上海寫過小說，中間又成為中央和魯迅的連絡人。到延安以後，他跟丁玲一塊組織西北戰地服務團，丁玲是團長，他是副團長、黨支部書記。那時周恩來來電報要他去

做秘書，以後又到桂林八路軍辦事處和新四軍工作過；皖南事變時他突圍出來，快到重慶時寫了短篇小說〈未了的旅程〉。這個故事說，他碰見黃埔軍校的同班同學，人家現在是國民黨的少將司長，穿得闊氣、手也鮮嫩。他自己跟乞丐一樣，狼狽得不得了。人家還請他吃飯，菜特別好，分開時又給了他50塊錢法幣，就是100塊邊幣。毛澤東一年才48塊，給他100塊不是收買是甚麼？你被國民黨逮捕了，放出來之後到延安來搗亂，這樣他就變成一個「叛徒」加「特務」。

此時，康生為了擴大批判王實味的戰果，又從研究院中揪出一個以王實味為首的「五人反黨集團」。

宋金壽：成全（陳傳綱）<sup>3</sup>、王里（王汝琪）<sup>4</sup>、潘芳、宗錚這四個人與王實味一起被打成「五人反黨集團」。成全、王里是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室主任是毛澤東，但實際上是

- 3 陳傳綱（1912-66），曾用名成全。湖北省武漢市人。1938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第一屆委員會委員。1940年到延安，先後在延安行政學院、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室、延安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籌委會、陝甘寧邊區政府等有關部門擔任組長、秘書、處長等職務。全國解放後，先後在中國政法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工作。後任復旦大學校長、黨委書記，1966年2月調上海市政府任高教局局長，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
- 4 王汝琪（1912-90），又名王里，祖籍江蘇無錫。1930年在復旦大學預科讀書時認識了丈夫陳傳綱，兩人於1934年9月結婚。1938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3月到延安，1941年調任馬列學院學習，同年秋冬調中央政治研究室。1948年任解放區婦聯籌委會代秘書長，次年初任北平市婦聯宣傳部部長。1950年2月王里調任司法部工作，歷任司法部幹部教育司副司長、宣傳司司長、公證律師司司長及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室副主任等職。1957年夏被打成「右派反黨集團」，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文化大革命中繼續受迫害。文革後調回北京，任司法部公證律師司司長。

陳伯達主持，成全就在裏邊研究經濟；他的愛人王里在中央婦女委員會工作。潘芳是國民研究室的，她的愛人宗錚跟王里是復旦大學的同學，就這麼一層關係。潘芳和宗錚住在王實味隔壁的窯洞，所以有時候他們兩夫婦也到王實味那兒聊聊。這五個人吃過一頓年夜飯，都在王里那邊。因為他們都有點津貼，就自己買點東西自己做，叫「打牙祭」。不過有些來往，這時候就變成「五人反黨集團」了。

---

很多當時在延安的人都認識這兩對夫婦。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四人中的潘芳，是在6月4日王實味有參加的批鬥大會中首先發言的，他對王實味的攻擊當時還讓蕭軍強烈地反感，而一個多月以後，他卻和王實味被打成了同一個「集團」。

---

曾彥修：五人反黨集團其中的陳傳鋼、王汝琪夫婦，就住在我隔壁。窯洞很小，我們住的那排窯洞剛好每一個只能住兩個人。他們兩夫婦非常之好，對我也非常之好。陳傳鋼在文革時自殺了，他的性格，我不知道用甚麼形容詞，我覺得他就是要自殺的那種人。王汝琪是王昆倫<sup>5</sup>的妹妹，而王昆倫是老地下黨員。

---

5 王昆倫（1902-85），江蘇無錫人，曾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副主席。1922年參加國民黨。1926年任黃埔軍校潮州分校政治教官，參加北伐戰爭。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秘書長，因不滿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參加反蔣民主運動。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在重慶發起組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1943年與譚平山發起組織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1948年赴美國考察，1949年1月回國。抗戰期間撰寫的《紅樓夢人物論》，是最早試圖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研究《紅樓夢》的一部專著。

李銳：王里去世之前我去看過她。她的堂兄王昆侖，就是國民黨的中央候補委員，1933年的黨員，由周恩來單線聯繫。王里跟我講，她到80年代王昆侖去世的時候，才知道他是共產黨員。康生當時整她的時候，卻說她是王昆侖派到延安來的國民黨特務，康生這個人壞到這個程度！

宋金壽：毛澤東不是整頓三風嗎？1942年2月1日有一個整頓三風的報告，成全沒有去聽。雖然他去聽了2月8日的反對黨八股的報告，這個報告是給中央研究院和中央政治研究室作的。他是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一個成員，8日聽了報告，10日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的意思大致是甚麼呢？就說建議毛澤東除了整頓三風以外，再增加一個整頓人風。所謂人風，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其實毛澤東的「反對宗派主義」已經包括了這個。毛澤東的反對宗派主義裏面，有本地幹部、外來幹部、知識分子、非知識分子，不就都是人與人的關係了嗎？成全根本就不理解。他當時20來歲，根本就沒理解毛澤東整頓三風的意思，才寫了這封信。

黃昌勇：我們現在看歷史，1942年之前一直到1957年，可以看出一個規律：你寫了一篇文章、說一些話，然後上升到思想；思想上有問題怎麼辦，就一定要上升到組織。上升到組織以後還不夠，一定要集團化：即你不是一個人，一定是一幫人、一批人。這是一個模式。王實味「五人反黨集團」，現在看來完全是生造的，完全是強納硬採的，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就納在一起了。

打倒一個人，之後再打倒以這個人為中心的反黨集團，從此也成為政治運動中的慣用手段。在文藝界，13年後1955年，王實味的老同學胡風和他的朋友，以及一些與胡風並不相識的人，一起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稍後，丁玲被打倒時，先由陳企霞「陪綁」，造出一個「丁陳反黨集團」，接着艾青、李又然也成了集團成員；不久之後，我們訪問過的黎辛，也因為丁玲辯護，而被造出另一個反黨集團；李銳則被1959年的廬山事件牽連，作為一個反黨集團的外圍分子被批判。這樣的例子真是屢見不鮮。

除了《中央週刊》繼續有評論文章登出，到了9月，統一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關於〈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獄真象》。這本小書「印了幾千份，據說是中統所印行的小冊子中最为暢銷的一種。」<sup>6</sup>在1957年的時候，這本書又被作為批判材料翻印，因此我們今天還可以看到。在本書的「序」之中，沒有署名的作者寫道：

毛澤東且一再的發表反對黨八股，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文章，上唱下合，滿以為這一號召能把以前所暴露的弱點全部掩蓋住，使青年群眾和下級幹部對中共中央發生一種新的好印象，然而戲法變久了，觀眾也懂得如何作戲法，青年群眾和中共的下級幹部與文化人等，不但不受這新戲法蒙蔽，反而利用了這一次所謂整風運動，暴露出中共內部的許

6 政協江蘇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通內幕》（杭州：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75頁。

多無可救藥的弱點，使中共的愚民政策大受損傷，因此使實際掌握中共大權的毛派人物大起恐慌，決定強力制止這種「傾向」的發展，認為揭穿了「邊區」的黑暗是於黨（中共）無利的，認為反對「騎馬的首長」同情「苦悶的青年」是反黨的活動，認為「只看見黑暗」「不夢想光明」就是小資產階級分子的悲哀，認為批評黨的策略，誠實的自我批判就是「托派」的陰謀，在這種完全主觀主義的不合邏輯的論斷下，造成了延安的「新文字獄」。以王實味這人及他寫的「野百合花」等文作為具體施以打擊的對象，以舉行座談會，思想鬥爭大會公開發表各種攻擊文章為手段，企圖收到殺雞嚇猴的效果，而肅清那種所謂「反黨」傾向的發展，但這一切只能在表面上使人屈服於一時，豈能根本阻止中共內部腐化瓦解的危機！<sup>7</sup>

作者當然特別注意到王實味在整個運動和事件中的特殊位置：

王實味是以硬骨頭自命的，如是在整頓三風的口號下，強調自我批判是必須的，王實味在中央研究院公開討論時提出了：「黨（共黨）的領導骨幹變質了，蛻化了！」「黨內黑暗勢力佔着支配地位！」「黨完成了功利主義的黨！」「黨的領導幹部公然剝削壓迫黨內的群眾！」等口號和具體事實，希望糾正那些錯誤的作風。

7 《關於〈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獄真象》（重慶：統一出版社，1942年），23頁。

至於上文中提到的王實味的口號，因為沒有引文出處，顯然是誇大其詞的，但是這位作者注意到，共產黨在會議中「運用了『一打一拉』的策略，一面對文藝作家表示尊崇與愛護，一面批評文藝作家強調延安的黑暗是不對的」。對於1942年6月一連16天的王實味鬥爭大會，作者也十分清楚：

發言者自何凱豐以下的一般重要人物都曾發言，滔滔不絕，造成對王實味一面倒一窩蜂的攻勢。王實味曾經反駁與申訴，但這是無用的，有計劃有組織的發言人最先替他按上了一頂「托派」的帽子，「托派」在延安是殺無赦的，一切出席而同情王實味的人物都噤若寒蟬，因為「誰同情王實味誰為之辯護，誰也就是托派了。」丁玲等因此也人人自危，最後一天丁玲也不得不被迫在大會上發表她「打落水狗」的意見，以作保全生命的供詞。

如果說以上信息作者通過閱讀《解放日報》就可以看到，那麼作者完全不同於共產黨表述角度也清晰可見。這篇洋洋灑灑的文章結束時，作者作出了不樂觀的估計：

至若王實味的生死問題是很簡單的，按照中共的習慣法，一個同志既被指定為托派，該某即為托匪，托匪即殺無赦，王實味既被誣為有托派思想，又有托派的活動，而且是「不只是有政治目的，而且有組織企圖。」證以近兩個月來未聞有王實味的消息，想已含冤九泉了。<sup>8</sup>

8 以上三段引文均出自《關於〈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獄真象》，33-43頁。

早在1940年就離開延安的薄平，並沒有親歷整風運動，不過1942年她在西安期間，看到了國統區轉發的〈野百合花〉。

---

薄平：我離開延安是因為腿病。有人說薄平你出去得正好！你不出去，在延安整風，你真受不了，不死也得脫層皮。我知道王實味是因為寫〈野百合花〉被打成托派的。當時在西安出了小冊子，我看見了。這篇文章我一看，我想，王實味文字這麼好啊！這篇文章也看不出來甚麼反黨！

---

國統區出版的《關於〈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獄真象》中收入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蕭軍的〈論同志的愛與耐〉、羅烽的〈還是雜文的時代〉等文章，但是為了自身的宣傳需要，國民黨在文字上做了些「編輯」工作。

---

宋金壽：丁玲的〈三八節有感〉，文字大體沒改，但是動小手腳。那篇文章裏說，婦女為了自己的進步，拉下臉皮來，「請求醫生給刮子宮」。「刮子宮」，現在就叫「做人工流產」。到了國民黨這邊，他把這個「刮」字改成甚麼字？「割」。這性質就是兩碼事了。這延安，把婦女的子宮都給割了？對不對？

---

儘管用詞尖銳，但是這本小冊子在當時左翼知識分子中間究竟產生多大的影響，卻還有待研究。



高華：三四十年代軍統出過很多反共的小冊子，蘇聯叛逃人員的口述，王實味、丁玲等人的文章，甚麼〈陝甘寧真相〉、〈延安的陰影〉等等，全是國民黨出的。這些裏面都提過共產黨的「新文字獄」，還有很多類似的詞都用過。但又怎麼樣呢？知識分子還是親共，還是左傾，都認為國民黨造謠，不相信的，看了也沒用的。這是我們人類的問題，一旦形成某種主導性的概念以後，再出甚麼別的東西，我們會自覺地排斥。

現在回顧歷史，可以看到延安整風和《講話》對於延安的文藝社團、以及他們主辦的刊物產生了立竿見影的影響。在1940年4月15日《中國文化》雜誌上刊登的〈記邊區文協代表大會〉一文中提到延安繁榮的出版狀況：

物質條件雖然無比的困難，只要有人作，甚麼都會徹底克服的。《中國文化》已經出版了。《通俗讀物》準備編輯了。《邊區群眾報》就要誕生了。《文藝突擊》準備復刊了。這裏，看不見所謂封閉書店、報館和查禁書籍，這裏看到的，是一切出版物和出版事業的蓬蓬勃勃的建立發展和壯大。1939年，改編了《新中華報》，出現了《軍政雜誌》、《前線畫報》、《中國青年》、《中國婦女》、《延安世界語者》，繼續出了幾期《文藝突擊》。

對於這種相對的出版自由，何其芳曾在1941年元旦〈對於《月報》的一點意見〉一文中寫道：「大後方的都市可以用洋樓、

汽車、百貨商店、電影院向延安驕傲，但說到鉛印刊物，延安卻可以說：『咱們來比比吧！』」

根據學者王克明的統計，整風和《講話》之前，延安文化藝術界陸續創辦過至少21種文藝期刊：《文藝突擊》、《山脈文學》、《戲劇工作》、《文藝戰線》、《大眾文藝》、《中國文藝》、《歌曲月刊》、《歌曲旬刊》、《歌曲半月刊》、《中國文化》、《大眾習作》、《新詩歌》（延安版）、《新詩歌》（綏德版）、《前線畫報》、《文藝月報》、《草葉》、《谷雨》、《詩刊》、《部隊文藝》、《民族音樂》、《民間音樂研究》。到1942年2月整風開始時，延安至少還有八種文藝刊物，但是它們全部在1942年10月1日之前陸續停刊：

1942年4月停辦以圖畫為主的《前線畫報》；1942年4月停辦以文學為主的綜合性刊物《部隊文藝》；1942年5月5日停辦艾青主編的詩歌刊物——延安詩會會刊《詩刊》；1942年8月15日停辦由舒群、丁玲、艾青、蕭軍、何其芳等輪流主持的文學刊物《谷雨》；1942年9月1日停辦以文藝作品和文藝消息為主的延安文藝月會會刊《文藝月報》；1942年9月15日停辦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草葉社編輯出版的文學刊物《草葉》；1942年10月1日停辦邊區音協編輯出版僅半年的綜合性音樂刊物《民族音樂》。還有一份《民間音樂研究》，具體停辦日期尚不清楚。<sup>9</sup>

9 王克明〈延安文藝：從繁榮到沉寂〉，見《炎黃春秋》2013年第三期，79頁。

如王克明總結，這些文藝期刊停辦時，有的略有說明，有的則沒有說明原因。其中1938年創刊、已出版了40多期的《前線畫報》停刊時，1942年4月《解放日報》曾專門發表消息：「八路軍政治部所出的《軍政雜誌》，以及《前線畫報》，自創刊以來為時頗久……近來因寄往前線不便、前方材料亦難收集，加之紙張缺乏，上述兩刊物決定停止出版。」後來出版的如《延安文藝叢書·文藝史料卷》這樣的文獻書，對《谷雨》、《草葉》和《部隊文藝》這三個期刊的停辦，略有說明。譬如刊登了王實味的《政治家，藝術家》和蕭軍一些被《解放日報》退稿的文章的《谷雨》雜誌，是「文抗」的雜誌，原本印數就不是很多，大約1,000本左右，因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被停刊，但是停刊的解釋說：「至1942年8月15日出版了第六期之後，因為其他方面的活動非常緊張，編者們無暇再去顧及刊物的編輯，《谷雨》即終刊。」魯藝校刊《草葉》停刊的解釋則是：「由於戰爭的殘酷和形勢的變化，草葉社的同志以及眾多作者忙於更加緊迫的任務，以至《草葉》第六期以後，再也沒能繼續出下去。」《部隊文藝》停辦的原因則是「由於軍直文藝室和編輯工作人員把主要精力轉向偉大的整風運動，而終刊了。」在《中國革命文藝的搖籃·延安魯藝八年大事紀要》一書中，所記載《草葉》的停刊原因是「《草葉》社召集各系同志開座談會，進行整風。後停刊。」<sup>10</sup>

值得注意的是，改版後的《解放日報》第四版立刻發生「稿荒」，沒有人積極寫稿。9月20日，毛澤東為此開列一個

10 同上，81頁。



# 中國婦女

第一卷 第一期

中國婦女社編  
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出版



目 錄

關於婦女問題	一	可
關於婦女勞動的問題	一	馬
關於婦女勞動的問題	一	馬
關於婦女勞動的問題	一	馬
關於婦女勞動的問題	一	馬
關於婦女勞動的問題	一	馬
關於婦女勞動的問題	一	馬
關於婦女勞動的問題	一	馬
關於婦女勞動的問題	一	馬
關於婦女勞動的問題	一	馬

延安新華書店發行  
另售每册國幣一角



# 中國青年

第二卷 第三期



延安出版的各種雜誌

包括16位延安文化名人在內的名單，給他們每人下達了徵稿任務，還親自在棗園宴請他們，給第四版組稿。王克明統計他「為第四版組稿的字數，是每月14.9萬字」，其中文藝內容不足一半，其中包括：

陳荒煤以文學為主，每月12,000字；江豐以美術為主，每月8,000字；張庚以戲劇為主，每月10,000字；柯仲平以大眾化文藝及文化為主，每月12,000字；王震之以戲劇為主，每月5,000字；周揚以文藝批評為主，每月10,000字；呂驥以音樂為主，每月5,000字。共計62,000字。這件事一直被作為美談來敘述。其實，它說明的是整風改版導致毛澤東自食其果，不得不親自出面組稿。這每月的六七萬字，與整風和《講話》前的「幾十萬字」，顯然不可同日而語。<sup>11</sup>

對於延安文藝期刊從百花齊放，到只剩下一個《解放日報》的綜合副刊，毛澤東總結說：「有一個《解放日報》，就可以組織起整個邊區的政治文化生活。」他還自問自答：「報上登些甚麼呢？譬如我們這裏出了一個申長林，就把他的事蹟登上，有一個陳德發也可以寫進去。」當時大生產運動已經開始，這兩個人都是邊區的勞動英雄。他還說，「應該把報紙拿在自己手裏，作為組織一切工作的一個武器」，「組織群眾和教育群眾的一個武器。」<sup>12</sup>

11 同上，81頁。

12 同上，82頁。

王培元：延安時期就是以1942年的文藝座談會議為界，這之前，毛澤東也很重視文學藝術工作，包括文學藝術的教育工作，毛澤東也是魯藝的發起人之一嘛！但是主管文藝的中央領導是張聞天，就是洛甫，他的觀念、主張是比較開放、開明，所以在他領導下的那個時期，延安在文化、文學上相對比較寬鬆，知識分子比較自主，所以能出來一些作品。當然有些作品是毛澤東、賀龍、王震這些人覺得沒法忍受的。開延安文藝座談會，對文藝界的這種現象進行批評、梳理，進行反思，共產黨已經提出了一個文藝政策來引導作家、藝術家，如何按照黨的要求來進行文藝工作、進行文學創作。

在這個過程中，雖然「暴露派」的作家受到更直接的批評，但是「歌頌派」的作家卻是更加自覺地自我反省。

王培元：何其芳和周立波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都寫了檢討文章。他們反思、反省自己，覺得自己的靈魂裏都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王國。他們在魯藝教的作品都是19世紀資產階級的文學，這些是不適合延安的。他們都反省了自己的文學思想、文學創作。何其芳就覺得不能再寫詩，後來他就開始搞研究、搞批評。1942年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他的詩歌創作出現了一個很長時間的空白，作為一個詩人他就從詩壇上消失了。

文藝可以立刻沉寂，但是再次繁榮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況，對知識分子的整肅還在繼續。

1942年8月到10月間，延安對於王實味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批判一直持續着。1942年10月2日星期五，蕭軍稱之為「多事的一天」。吃過早飯，他在自己的門前看見王實味從山上走下來，手裏拿着一張紙。蕭軍在日記中記錄了他看見王實味「眼睛紅着，充滿着淚水，頭髮蓬蓬，臉色蒼白」，完全是個病人的樣子。當天，蕭軍把王實味托他轉交的信交給了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根據蕭軍的記錄，王實味的信是這樣寫的：

偉大的喬、轉呈偉大的毛主席、轉黨中央：

我要請教你們偉大的偉大的偉大的，人為甚麼定要用「腳底皮」思想呢？為甚麼人在如「象」如「熊」更能解決問題，卻是蠢到非用「狐狸似的小狡猾」不可呢？為甚麼「為工農」的偉大的偉大的那樣多，而工農卻覺自己是「三等革命」「不是人」「沒有出路」呢？為甚麼「頭等革命」是唯物論，而「三等革命」卻必須是唯心論呢？為甚麼說謊的是好幹部，而老實人卻反革命呢？為甚麼那種一方面對着手槍，一方面對着監獄和死亡，學信告訴我，「幹兄與國兄拼命要好，但對自己親兄弟卻以刀槍相向」的可愛，可憐傻到極頂的「心」，偉大的人們卻不懂得用「心」去征服，而定要把他們或逼上梁山或驅入滅亡呢？這是聰明還是愚蠢呢？

為甚麼魯迅臨終時要拉着許廣平底手按在他心上呢？

親愛的同志們，我無論如何不能瘋狂，我知道有些心會為我瘋狂而冷掉，那些心並沒有因為反王實味鬥爭而受了太好

的教育。救救我罷，把我送到一個安靜地方去喲，我要安靜  
安靜呀！不一定到頤和園北戴河或莫干山呀，看看吳滿有<sup>13</sup>  
家裏能有一席之地沒有？我必須離開中央研究院，必須！

反革命王實味頓首百拜千拜萬拜。

一九四二年十月一日<sup>14</sup>

王實味信中提到吳滿有，說明他密切地關注着《解放日報》上  
面的消息。1942年4月30日，延安《解放日報》刊登了莫艾的  
人物通訊《模範農村勞動英雄吳滿有》，得到朱德的稱讚，吳  
滿有被命名為全邊區的「勞動英雄」。

毛澤東當然沒有回應王實味這封來信，並且讓蕭軍不要  
再過問這件事。10月19日，延安舉行了魯迅逝世六周年的紀  
念大會，雖然此前人們對於蕭軍不羈的態度和火爆的脾氣早已  
熟悉，但此時，蕭軍竟當着兩千多人，宣讀了四個月前上交毛  
澤東但未得回應的《備忘錄》，再度發表對於王實味問題的意

13 吳滿有（1893-1959），陝西橫山人，1928年因逃避災荒而移居延安棗園，1934年土地革命後分得一座荒山。他善於經營、吃苦耐勞，1941年在繳納公糧後還有盈餘，購買了不少公債，在延安引起注意。《解放日報》報導發表後，成為1943年春節後，《解放日報》又發表吳滿有給毛澤東的一封信，提出要為毛澤東代耕（當時邊區政府所有人都有耕地或者織布任務），因此成為毛澤東的座上客。同年2月24日後（一說同年8月邊區慶祝軍民大生產勝利慶功大會上），又應戰安塞縣勞動英雄楊朝臣，展開勞動競賽。此事引起中央高層和邊區政府高度重視。朱德電令全邊區部隊積極響應競賽倡議。林伯渠、李鼎銘聯名發出指示，要求開展生產大競賽。吳滿有因此在邊區成為婦孺皆知的人物，擔任過邊區參議員、延安南棗園鄉鄉長等職務，成為大生產運動的典型，毛親筆為他題詞：「天下有名」。1946年春節後，毛澤東特意指定吳滿有擔任毛岸英的農業大學老師，1947年自願加入解放軍後勤部門，1948年5月8日在寶雞市戰鬥中被俘，同年7月20日他在中央社和電台廣播中發表了叛變聲明，但對其是否真的投靠蔣介石仍有爭議。

14 蕭軍《延安日記》上卷，600頁。



見，引來了軒然大波，紀念大會繼而變成了論戰大會。丁玲、周揚、柯仲平、李伯釗、劉白羽五名黨內作家，以及艾青、陳學昭兩位黨外作家輪流到主席台上與蕭軍辯論，從晚上8點到凌晨2點，爭論長達六個小時還沒有收場。主持會議的是德高望重的文人吳玉章，他出面調停，蕭軍覺得可以接受，主動和解說：「我先檢討檢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錯，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們想一想。」但是丁玲不依不饒，「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們一點也沒錯，你是百分之百的錯！告訴你蕭軍，我們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丟掉你一個蕭軍，不過九牛一毛！」<sup>15</sup>

---

戴晴：整風最後，延安沒被抓的就是蕭軍。後來蕭軍到東北去，又是另一個故事了。毛澤東認為蕭軍在別人眼裏，不過是個小說家而已。他想要說瘋話，愛怎麼說就怎麼說，毛澤東對此做出不理睬的姿態。但是王實味不一樣，他太有代表性了，他的話太能說在點子上了，所以必須把他滅了不可。所謂「滅」，就是在精神上的完全毀滅。毛當然最希望王實味可以在精神上全部接受這一套以後，像臣子一樣匍匐在他的面前。可是王實味沒有。

---

1942年時值抗戰最艱苦時期，10月19日，也是在蕭軍和丁玲等作家在魯迅紀念會上激烈對峙的那天上午，西北局高幹會議召開。直到1943年1月14日閉會，會議共持續88天。這是自1942年2月全黨大規模整風以來的又一重要部分，參加會議的一方

15 張毓茂〈我所知道的蕭軍先生〉，見《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2期。

面是西北局的高級幹部，縣團級以上共 266 人與會；另一方面是包括毛澤東、任弼時等的中央領導，以及中央黨校的一些領導和在中央黨校準備參加七大的代表 206 人。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用吳奚如和王實味的例子，對在會的幹部進行了警告，以此，整風運動轉入審幹階段。

宋金壽：毛澤東在這個會上說，「吳奚如和王實味，是以革命者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既然有第一個吳奚如、第二個王實味，那還有沒有第三個吳奚如、第四個王實味？」這句話標誌着「審幹」的開始。所以我說從「整頓三風」、「清理思想」轉變到「審查幹部」，高幹會是個關鍵點。但高幹會後的審幹，還是社會部和保安機關等一些單位的少數人參加，秘密進行。會議的重要內容，是中國共產黨總結自身歷史中的經驗教訓。在清算當中，會議提出了中共面臨的四個抉擇：一，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過去我們的決定都是由共產國際的人起草，然後我們就通過，但後來情況越來越複雜，共產國際的指示也越來越抽象，所以我們要不要獨立？二，中國革命要勝利是從實際出發還是從教條出發？這和前一個問題是聯在一起的。共產國際的決議不一定會符合中國的革命形勢。三，誰是真正的理論家，誰是假馬克思主義的騙子？王明在延安作報告很有派頭，一大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版書，勤務員搬來擺在講台上。翻開來，用俄文滴哩骨碌唸一段，然後解釋一段，有好多青年認為他是理論家，毛澤東充其量是個實踐家。四，就是到底誰來充當共產黨的領袖？王明並不

是不想當共產黨的領袖。從這一點來看，高幹整風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1942年10月22日，王實味找到蕭軍，勸他入黨。

夜間正睡中間，忽然王實味在門外把我驚醒了，他說：「……我來勸說你，請求你……馬上加入共產黨，痛痛快快把自己的錯誤承認過來罷……不要為了個人的自尊，為了革命的利益着想罷……他們明後天就要討論我的黨籍問題了……我倒不怕他們開除黨籍……這樣我也不會離開革命工作的……但是我看到19日解放日報的文章，那後面伏着殺機啊！我倒並不恐怕死……來哀求你……但為了革命也許會犧牲了我……我甘願的，可是叫你轉那封信已經說的明明白白了……我的心是為了黨的啊……我知道你是對的……你那響亮地打了他們的耳光……不過他們拿你沒有辦法，但是為了革命的影響，這樣不成啊，那要垮台……毛澤東是禁受得起這耳光的，我過去錯誤了，不該亂罵人……你是英雄……是硬的……但我要流眼淚，一切為了革命的利益，我們要做人所不能做的罷……」

蕭軍日記中說，談這番對話時，他一直睡在床上，王實味站在窗外，他們就這樣大聲地講着。在當時的環境中，蕭軍也不能確定王實味的行為動機：「我疑心這也是苦肉計，另外也許有人在聽着，但這是無關的。」<sup>16</sup>我倒是從這段文字中感受到王實味對蕭軍的惺惺相惜。

16 蕭軍《延安日記》上卷，622-3頁。

從蕭軍記述的這段文字裏面，我們可以看到，王實味仍舊關注着周圍的情況。而10月19日的報紙，正是發表座談會講話的報紙，他當然看得出裏面針對他的內容，以他的敏感，他也預感到未來文藝的方向，完全不是像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裏面寫的：魯迅的方向。王實味當然也感受到蕭軍所受到的壓力與攻擊，他感覺自己有必要提醒蕭軍，不要和黨作對，而是要承認錯誤。可惜在當時的環境下，這兩個人無法正常對話，雖然他們知道在思想深處，支撐他們的是同一位魯迅。蕭軍說自己只是簡要告訴王實味研究院給他的警告，以及在魯迅紀念會上發生的事情。

歷史有些巧合真是令人唏噓的。前一晚王實味還以黨員的身份勸蕭軍入黨，第二天他就聽到了自己被開除出黨的消息。有份名為〈關於開除王實味黨籍的決定〉說，王實味從1929年參加托派活動以來，始終沒有停止過托派的活動，並指出：「王實味是一個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分子。始終表示對黨仇視，與其他黨員犯了錯誤經過教育因而悔改完全不同，故決定開除其黨籍」。<sup>17</sup>

---

宋金壽：凱豐起草了這個稿子，要通過中央直屬學委楊尚昆等人。王實味知道以後，偷偷地跑到中央組織部去。中央研究院的人第二天發現王實味不在了，還以為他自殺了，在研究院前山後溝找了個遍，沒找到。結果到中午，中央組織部給中央研究院打電話，說王實味在他們那。當時組織部部長是陳雲，王實味是頭天去的，一進組織部就

17 溫濟澤〈再談王實味冤案〉，45頁。

跪下，說一定要見陳雲。我們也不清楚他到底見了陳雲沒有。過了兩天他交了份文件，一份標題是〈中央組織部對王實味同志的錯誤及托派活動嫌疑問題的決定〉。這是王實味自己替中央組織部寫的決定，說他有錯誤，給自己定的是「托派嫌疑」。另一份叫〈王實味同志收到本決定的來信〉，這封信的抬頭寫着，「親愛的陳雲同志，忠於毛澤東為首的中央全體同志」，其中是他對於自己假想的決定所表示的態度，他也全都給寫好了，還寫上了日期。

王實味在自己起草的「決定」中寫道：

關於王實味同志的錯誤及托派嫌疑問題，經過四個月餘的詳細調查研究，黨認為他確實未參加托派組織（他1930-1936與托派某些人有長期關係，已於1941年春向黨做過詳細報告）。黨認為他的〈野百合花〉及〈政治家，藝術家〉在實際上（有）破壞黨的錯誤，其根源在於他的虛無主義傾向及小資產階級病態憂鬱症，而他的狂言亂語，則是有他的神經確實有些異狀，與常人不同，黨甚至認為他寫文章的動機確實是狂熱地關心黨。

但共產黨不是唯心論的，黨雖然原諒他的心跡，但他的思想行為確實嚴重地危害了黨，黨對他的錯誤不能不予以處分。茲決定停止他的黨籍半年。同時要求全黨同志以友愛的同志態度對他，過去與他接近的同志更應該給他以安慰和鼓勵，幫助他能夠早日恢復黨籍。<sup>18</sup>

18 蕭軍《延安日記》上卷，665-6頁。

溫濟澤在四十多年後才看到王實味這份自擬的決定，他「深感文如其人，有些話還是當年和他談話時候用過的詞語和口氣，他對自己錯誤的檢討和對組織的乞求還是真誠的」，同時溫濟澤「也看到他的神經確實有些異狀」<sup>19</sup>。但對王實味的處理，組織當然不會按照他如此天真的設想處理，不會認為他「精心栽下的毒草」〈野百合花〉，是他「狂熱地關心黨」的結果，更不會「要求全黨同志以友愛的同志態度」對待這個「階級敵人」。結果是，他再一次、並且永久地離開了黨組織。

根據凌雲的回憶，「1942年11月以後，王實味處於被隔離狀態。這時，康生正在為進一步處置王實味和『反黨五人集團』的其他成員做準備。11月初他致電當時在重慶的周恩來，說王實味是『托匪』，」還說另外五人，「好似是國民黨特務」，要求提供這些人的材料，但周恩來的覆電中沒有他能用到的材料。這時候王實味雖被隔離，但似乎還有行動的自由。對這個時期毛澤東和康生的關係，高華有很好的總結：

1942年11月，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提出分清「一條心」和「兩條心」，使「文」的一手退隱於「武」的一手之後，從1942年12月至1943年底是整風鎮制的一面大顯身手的時期。康生之前在處理王實味的事情上與毛完全一致的，毛對他非常重用，整風的時候他和康生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和互相依賴，康生以自己的忠誠和「創造性」的工作全力輔助毛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毛則予以康生特殊的信任，提升和擴大康生在中共黨內的影響。在康生遵循毛的意志具體領導

19 溫濟澤〈再談王實味冤案——冤案的始末及教訓〉，46頁。

整風、審幹、搶救的所有重大戰役的緊要關頭，毛澤東都積極支援康生，為康生開展工作創造有利的環境。<sup>20</sup>

12月15日，蕭軍日記記錄，王實味最後一次來找蕭軍。蕭軍讓他去找支部書記，他去了，一會兒書記陪他回來，卻沒有留下來聽他和蕭軍的對話。

「我最近才承認了這黨底進步性，容受性是可驚的，我沒了懷疑！我過去對黨中央的懷疑呀，你想一個黨員對黨中央全懷疑，這還算一個甚麼黨員！我這個做黨員的是不得已啊！我不是這樣的坯子，只配寫寫文章……」

「我過去對這黨是懷疑的，自從有了毛澤東，這黨才有了路，有了光明的方向。對於毛澤東他底政治才能、主張，我是佩服的，只是對他的個人享受慾太大，我老實說感到不滿……如果他能多像列寧那樣……『刻苦自持』就更好了……病人們全沒得吃啊，而他們……」<sup>21</sup>

令人唏噓的是，偌大的一個延安，王實味沒有第二個可以傾訴的對象，在蕭軍面前，他會「激動地流淚」，也會在面對蕭軍冷靜的態度時，慢慢「神智不那麼混亂」了。他說，

他有過三次自殺，但為了不損害黨，個人報復，為革命而戰鬥到底這三個意念救了他。他如今感到安定了。這是一個有肺病的，神經質的，感覺性強的，聰明的人。他到了自己感

20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463-4頁。

21 蕭軍《延安日記》上卷，665-6頁。

到垮台（身體）時就感到安定了。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名士氣很濃，小資產階級急性病。他必須要到群眾中去磕碰，多用體力、實際工作等鍛鍊他，才有幫助。<sup>22</sup>

12月27日，蕭軍給王實味寫信讓他不要再來找他，28日發出信之後，兩人不再來往，王實味此後的情況就沒有蕭軍的記錄了<sup>23</sup>，但是王實味對蕭軍的影響卻無可消除。

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開展吳滿有運動〉，號召全體邊區農民「向吳滿有看齊」，大力開荒生產，提出了「吳滿有方向」。李銳說這篇社論出自他之手，並由毛澤東親自修改。因為當時吳滿有「僱有兩個長工和一個攔羊娃，農忙時還僱短工」，已經屬於富裕農民。這篇社論曾經受到質疑，指「吳滿有方向」是富農方向。但由於當時延安的現狀和革命的需要，吳獲得共產黨高層肯定，也被視為值得提倡的「先富起來」的農民（新富農）的代表<sup>24</sup>。在大生產運動中，農業上的「吳滿有方向」與工業上的「開展趙占魁<sup>25</sup>運動」，

22 同上，666-7頁。

23 同上，671頁。

24 《毛澤東選集》中記載：「因為去年1月初報紙上出現吳滿有的安家計劃，建設廳把他找到，開了三天會，搞清楚了一個吳滿有，才曉得邊區能增加多少萬石，用甚麼辦法增加。」

25 趙占魁（1896-1973），山西省定襄縣人，1938年到延安參加抗日並加入中國共產黨，翌年6月被分配到陝甘寧邊區農具廠當翻砂工、翻砂股股長。在高溫爐旁作業，又無隔熱石棉衣防護，從不叫苦叫累，而且每天都早上班、晚下班，注意節約原材料，常把節約的錢交給合作社興辦集體福利事業，或借給附近農民發展生產。1942年5月，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和陝甘寧邊區總工會派人到邊區農具廠檢查工作，決定對趙占魁予以嘉獎。消息發表後，毛澤東將其推為模範典型。朱德稱讚他是「用革命者態度對待工作的新式運動者」。





一度成為「延安精神」的象徵。從這裏可以看出，知識分子要進步，文人要寫作，就要開始更多關注工農的內容。詩人艾青，在1942年下半年先後創作了《野火》、《風的歌》、《希特勒》、《獻給鄉村的詩》、《悼詞》、《向世界宣布吧》等詩歌，詩風有所變化，但沒有特別被稱頌。1943年2月6日，延安文化界二百多人在青年俱樂部舉辦了歡迎邊區勞動英雄的座談會，此時已經聞名延安的勞動模範吳滿有、趙占魁、黃立德<sup>26</sup>都參加了。艾青不久後創作了詩歌《吳滿有》，為了能夠真正大眾化，他專門去把詩念給吳滿有聽，並且按照農民的語氣、語調作了修改。此詩在3月9日的《解放日報》刊登，成為他這個時期受到稱讚的作品。

實際上，延安的知識分子此前也並不是沒有想到過要和工農結合、向工農學習，譬如魯藝的周立波、小說家葛洛、美術家古元，就曾一起下鄉學習。王培元認為整風後批判魯藝「關門辦學」並不公正，因為事實上「開門辦學」的例子有很多。

---

王培元：他們有四五個人到了一個鎮的鄉政府，都擔任了點兒職務，譬如協理員啊；葛洛最大，當了個副鄉長，就像咱們掛職鍛煉一樣。一開始他們真是受不了，因為他們在老鄉家裏吃飯，今天派這家明天在那家，他們吃飯的那個大粗瓷碗，老鄉用抹布擦一擦就給他們盛飯，那抹布簡直黑得不得了，蒼蠅也很多，他們過了很長時間才適

26 黃立德（1920-80），子長縣玉家灣鎮王家溝人。1935年參加革命並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調入中央黨校任油印科長。1942年在邊區大生產運動中獲「種菜聖人」稱號，由賀敬之、張魯譜曲的《種菜聖人黃立德歌》曾廣為傳唱。

應。而且方言他們聽不懂，交流很困難。古元是畫家，帶一些畫冊，裏面有西方畫家畫的裸體女人。老鄉看了以後就說，這個婆姨連褲子都不穿，醜死了。你說他們怎麼交流，所以他們感到很苦悶。他們幾個在沒有工作的時候經常約好，傍晚就到離鄉政府不遠的一個溝，他們起了個名字叫思索溝，到那兒去思索，回憶在學校時讀過甚麼書，還朗誦普希金的詩，在一起聊天，很愉快。他們跟農民沒法對話嘛！周立波跟他學生在一起實習，老鄉開會他也參加，體驗生活。你想周立波這樣從亭子間出來的人，很真誠的跟農民在一起，回去寫了篇小說叫〈牛〉，是一個水準相當不錯的小說，是像散文的小說。他很善意地寫到農民開會的時候說，今年年景好咱們是托了共產黨的幸福，把農民的精神狀態、窯洞裏的氣氛、魯藝學生跟農民的關係寫得很融洽。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以後，他反思這個小說，自我批評說，我也去過農村、跟農民在一起，但我寫的也不是火熱的鬥爭，就是牛生小牛這些瑣碎的東西。實際這個作品是很好的，但他覺得要寫重大題材，譬如鬥地主、打日寇。

---

1942年春天開始的整風運動，到年底差不多告一段落，從1943年春節開始，延安進入了審查幹部的工作。《解放日報》首先開始審幹。這時，曾經因為翻譯《大眾哲學》而聞名的艾思奇是《解放日報》的編委會委員和副刊部主任。整風開始後，他是整風學習委員會委員；審幹開始時，他也就繼續主持工作。



上：延安木刻家作品兩幅：彥涵——村選；下：古元——逃亡地主又歸來。

黎辛：老艾作風很好，平易、民主，大家都叫他「老艾」。我們審查幹部，陳企霞說他歷史複雜，被國民黨逮捕過兩次，先審查他吧。於是審查陳企霞搞了40多天，結果是沒有大問題。只有一個問題，就是他在1937年全面抗戰以後，翁濤<sup>27</sup>通過陳企霞的弟弟陳適五找到他，應蘇聯大使館要求去浙江組織過抗日游擊隊，結果游擊隊組織不成，失去組織關係了。1938年他到延安，因為江青在上海左聯時是陳企霞的小組長，找江青一證明就行了。可審幹時已經知道翁濤是托派，在延安又沒有別的人認識翁濤，所以這就作為陳企霞的問題，掛起來了。

這以後，留法女博士陳學昭主動要求審查她。她當時已經在延安住了幾年，從最初客居的狀態，變成有常務工作，但是還沒有入黨。

黎辛：陳學昭在上海讀愛國中學時，已經認識不少共產黨員、進步人士。在上海她跟魯迅、茅盾、周建人、戈公振都熟。戈公振派她到法國當記者，她一面工作，一面留學。三天也就審查完了：第一天她講，第二天大家提問題，第三天做結論。大家對她也沒有甚麼問題。

原本艾思奇估計可以很快審查完畢的黎辛，卻並沒有那麼順利地過關。

27 翁濤，托派成員，曾與陳企霞之弟陳適五一同在上海江灣國立勞動大學中學部求學。後因托派問題被關押於上海公安局。



整風運動期間在《解放日報》工作的幹部：艾思奇（左上）、陳學昭（右上）、陳企霞（左下）、黎辛（右下）。

黎辛：審查到第三天，溫濟澤提問，說你在開封讀書，參加復興社沒有？我說沒有參加。溫濟澤就給我提，你肯定是復興社，有人證。這麼搞來搞去，最後老艾說了，審查幹部是內部問題，有甚麼說甚麼，不是搞特務，開會拍桌子也不對。這樣搞了好久。

艾思奇雖然說「不是搞特務」，但是當時從延安到邊區其他地方都已經開始審查幹部，檢查每一個人有沒有特務嫌疑。這個轉向，今天看來既有道理、又無道理，因為延安大部分青年來自國統區，似乎有機會被國民黨招募；但這些人中主要是學生，來延安的學生初來時，如前文中曾彥修所描述的，已經在招待所經過一輪審查了。

當時國民黨的特務機構主要有兩個——中統和軍統。1931年，31歲的陳立夫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組織部是國民黨黨內安全特務機構。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下面有三個組：第一組組長是徐恩曾，第二組組長是戴笠<sup>28</sup>，第三組組長為丁默邨。後來一組、二組分別發展壯大成中統局和軍統局，丁默邨的三組被撤銷。在國民黨內，陳立夫與其兄陳果夫的派系被稱為「二陳」或者CC系。CC指的是當時的中央人士所聚集的中央俱樂部（Central Club）。另外，還有一個是復興社，全名為中華民族復興社，是1932年蔣介石成立的以黃埔精英為成員的

28 戴笠（1897-1946），中華民國陸軍中將，浙江省江山縣保安鄉人，原名春風，浙江第一師範，黃埔軍官學校第六期畢業，長期從事特工與間諜工作。上文提到，戴笠是國民黨黨內安全特務機構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第二組組長，其後壯大成為軍統局，並擔任副局長。

軍事特務組織；後來又發展了「忠勇救國會」和「中國文化學會」等周邊組織。1938年，復興社因和陳立夫、陳果夫的中央俱樂部組織發生矛盾而解散，後來復興社成員大部分加入新成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

在「純潔組織」的過程中，延安冒出的第一個典型人物，是曾在蘭州做過地下黨員的張克勤<sup>29</sup>。

宋金壽：張克勤本來在蘭州作地下黨黨員，身份暴露後一度被國民黨逮捕，後來就把他調到延安。正好延安剛開始搞審查幹部，他遇上兩個麻煩，一是他老婆叛變了；二是有個國民黨黨員給他寄了本《中央週刊》，也就是國民黨黨刊。另外，西安三青團報上登了個自首名單，第一個名字就是張克勤——應該是重名的，可是當時就認定他是反革命了。李裕民、李克農<sup>30</sup>這些人搞疲勞戰術，逼他承

29 張克勤（1919—89），原名樊大畏，1936年10月在西安參加民族解放先鋒隊。抗戰爆發後由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派到蘭州做地下工作，1937年在甘肅加入中國共產黨。後經甘肅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送延安深造，在社會部所屬的西北公學學習。因其父親在蘭州被敵人逮捕自首，本人對領導提意見偏激，加上一名與他同來延安的、在魯藝學習的人檢舉他是特務，所以被康生下令看管起來。

30 李克農（1899—1962），生於安徽巢縣，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3月，國民黨蕪湖縣黨部成立，任宣傳委員，後打入蕪湖青幫組織。1928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領導下從事秘密工作，人稱中共的「特工之王」。1929年12月，經組織批准考入國民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任廣播新聞編輯，後任電務股長。1931年冬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紅軍工作部部長。1937年7月後，任八路軍總部秘書長，中共中央長江局秘書長。1941年起，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面秘書長。後主持中共中央社會部的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原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和原中央軍委總情報部部長、外交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等職。1951年曾參加朝鮮停戰談判。1954年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代表之一，出席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內瓦會議。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認，他就亂編了一些特務組織成員。後來張克勤不但沒有被逮捕，反而到處作報告，說自己「打着紅旗反紅旗」，表面上是共產黨，實際上是國民黨，所以叫「紅旗黨」，還說由他聯繫的甘肅黨、河南黨、四川黨等地下黨，都變成了紅旗黨，介紹他從「特務經歷」反悔的過程。

---

延安的很多年輕人都聽過張克勤的報告，也包括當時只有16歲的灰娃。

---

灰娃：張克勤瘦瘦的、很年輕，才19歲。作報告說：我們家開照相館的，國民黨害了我，在蘭州時讓我當特務，把我派到延安來搞破壞。我的印象中大致如此，那時也沒有擴音器，聽不太清楚。聽完報告回來，把我們兒童劇團的戲劇和音樂老師都抓走了，我心裏邊很害怕。後來我才知道，就和張克勤一樣，讓他們到處做報告去，報告完了回來還在單位裏。開頭就是康生派幾個人來，領導我們整特務。一開會，就是「誰誰誰你站起來」，這麼一聲吼多害怕呀！塞克把高爾基的《夜店》翻成中文，裏面有支歌，「太陽出來又落山，監獄永遠是黑暗」。有個人每天練嗓子，就唱這支歌。那時候是甚麼歌都能唱嘛？結果這就是特務的證據，說他把延安比作監獄，永遠是黑暗的。

---

張克勤承認特務經歷以後，康生到處宣揚「紅旗政策」是國民黨對共產黨內奸政策的新策略，從而得出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不可靠，必須重新估計錯誤結論，並隨即開展了大規

模的追查，把來自甘肅、河南、湖北等地的地下黨員和進步青年中他認為可疑的人捕押起來、審問逼供。於是，早先從四川民族革命大學帶着160多人來到延安的王懷安<sup>31</sup>遇到了麻煩。

王懷安：我1938年參加了地下黨，在四川大學做總支書記。到1939年12月，黨派我去了延安。當時我們利用統戰關係，在閻錫山那邊，薄一波幫助我們辦了個民族革命大學。這個學校在四川招生，收了一百多人。黨派我帶隊，帶了160人來到延安。剛到延安很受歡迎，選我做陝甘寧邊區模範青年，我對黨有無限的信仰和信任。到延安以後，我在法院工作。整風開始後，有天就說請我到保安處去一趟，我以為是案子的事，因為當年我們都是公安提訴到法院辦案，我就跟着去了。一路有說有笑地到了保安處，一進去臉就變了，把我送進監房啦。五雷轟頂啊！我一進去就昏倒在裏面，有幾天不省人事。後來我想大概黨搞錯了、有誤會了。我問：「為甚麼逮捕我？」對方說：「我

31 王懷安（1915-2015），原名王玉琳，生於四川省自貢，於父親的私塾受啟蒙教育。12歲到本族王氏宗祠辦的小學邊讀小學邊做織布學徒。1936年考入四川大學法學院攻讀法律。受一二九運動影響，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黨。任四川大學地下黨總支書記。1939年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受命帶領四川160名地下黨員和進步青年，奔赴延安。後在延安進入澤東青年幹部學校的高級班學習馬列，擔任校學生會主席。不久當選為延安青年聯合會主任，被選為陝甘寧邊區模範青年。1942年在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任推事（法官）。延安整風中，因被認為是紅旗黨、特務，而於1943年5月遭逮捕。在監獄待了三年。1945年得到平反。建國初期調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員兼司法部辦公廳主任、人事廳廳長及司法部黨組副書記。建國後負責起草第一部法院組織法。1958年在司法系統清算「政法系統存在着兩條路線爭論」的整風會議上，被定為反革命集團的軍師、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和漏劃的極右分子，下放勞改。1979年平反復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庭長、副院長。1984年離休。1988年主持法院系統「審判方式改革」，力求實現真正的審判公開和公正。2007年獲最高人民法院頒發「功勳天平獎章」。

正要問你呢！為甚麼就逮捕你？你應當明白！」他不宣佈逮捕的理由，說你自己明白。當時我相信黨，心想是不是我的歷史哪裏還沒搞清白？我就翻箱倒櫃地把我的歷史都交代一番，他們不感興趣；甚麼歷史都交代了，還過不了關。我那時也幼稚，自己精神垮了。我就請示組織說，我想到一個問題，四川黨實際上是不是紅旗黨？當時有個說法叫「分析特務」，特務都是「分析」出來的。

4月1日，組織部長康生進行了一次「延安大逮捕」，當時在陝甘寧保安處一局任局長的師哲<sup>32</sup>回憶，此前一天晚上，

康生手裏拿着一個名單，一邊同我們談話，一邊在名單上作記號，又圈又點，說這個是「復興」，是「CC」，那個是「特務」，是「漢奸」，是「叛徒」，是「日特」等等。最後叫我們把打了「○」的人都抓起來；打了「●」的送進編曲行政學院。<sup>33</sup>

當師哲問他，「要抓的這些人有沒有材料？沒有確切的材料，我們怎麼抓人？怎麼審問？」康生回答：「有材料還要你們

32 師哲（1905-98），陝西省韓城縣西莊鎮井溢村人，俄語翻譯家。1924年，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春，到河南加入國民二軍，進入開封陸軍訓練處學習，同年被送到蘇聯留學，畢業後留蘇工作。1926年在蘇聯基輔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10月至1938年3月被派到西伯利亞國家安全部門工作，親歷蘇聯肅反。1940年隨在蘇聯治傷的周恩來及任弼時回國，進入延安，為毛澤東擔任俄語翻譯。1957年被康生下令開除黨籍，下放至陝西扶風。1962年被中央組織部召回北京關押。1975年被釋放，仍被下放至陝西，1979年獲平反。

33 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249-50頁。



上：康生在延安講話；下：毛澤東在幹部整風會議上講話。

審問幹甚麼？」接着保安處的人忙了整整一夜，抓了260多人<sup>34</sup>，其中包括王實味、五人反黨集團的另外四個人，以及吳奚如、李銳等人。

李銳：把我在保安處關了一年多。那時延安條件差，一個窯洞關很多人，睡在地上、沒有床鋪，生活很糟糕。審問完全是採取江西逼供上刑的那一套，各種刑罰裏面都有過。我同窯洞的陳心，被保安處處長周興，像十字架一樣地綁起來打。作家魏伯<sup>35</sup>不幹了，跳崖了，結果沒有死，又把他捉回來；他跟我一個窯洞睡過覺。我受的罪不算很厲害，保安處科長王范<sup>36</sup>第一次審問我，五天五夜不讓我睡覺。據說這是蘇聯經驗：不讓人睡覺，頭腦控制不住，就會講真話。那五天五夜，真的是連眨眼睛都不讓，有帶槍的人站在你旁邊守着，審問的人走了，帶槍的人還在旁邊指着你。我受的刑罰最輕，讓我立正，站着不准動；要麼就是坐矮板凳，坐着不准動。五天五夜裏面，寫

34 同上。

35 魏伯（1914-84），原名王經川，河南鄭州人。1931年開始發表作品，1936年曾在北京辦《浪花社》，1939年入延安魯藝文學系學習，後歷任宜川《西線文藝》編輯，中共牡丹江縣委書記，遼陽市市長，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教育科長，武鋼生產經理，中南局計委副主任，中南局宣傳部副部長，國防工辦主任，中國文聯副秘書長。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36 王范（1905-67），原名張庭譜，江蘇如東人。1926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出賣，關押在南京陸軍監獄。1937年8月經八路軍南京辦事處與國民黨當局交涉而獲釋。同年10月赴延安。1949年4月毛澤東等中央領導進入北平，王范乘坐第一輛汽車開道，完成保衛任務。渡江戰役開始，負責進入上海後的安全保衛工作，組建中共中央華東局保衛處。1950年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公安部副部長。1954年任上海市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在反「右傾」中，下放到上海縣七一人民公社任工業部副部長、公社黨委副書記。

材料時拿着毛筆手就一直在抖。我沒有亂講一句話：我自己不是特務這個我知道！

---

當時在社會部工作，離休前任公安部部長的凌雲<sup>37</sup>曾經回憶了審問王實味時候的情形：

王實味被捕的第二天就開始審訊，保衛部門的主要負責同志主審，還有二三人參加，我是其中之一。審訊是在夜間進行的，王實味一進審訊室的門，看見正面牆上懸掛着列寧的像，他就徑直走到像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他的舉動很有一點戲劇化。我們要他先談談被捕後的一些想法，他談的很多，一會兒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一會兒又把自己說得似乎很有理，情緒忽高忽低，容易激動。這是初次接觸給我的印象。<sup>38</sup>

在閱讀各種材料和回憶的過程中，基本上從1942年12月15日蕭軍記錄見過王實味之後，就一直沒有看到過王實味的身影。因此看到這一段的時候，不免唏噓，他經歷了近一年的鬥爭，此時又要面對牢獄之災了。

凌雲回憶審訊的人們決定「主要是說理並動之以情，不可操之過急，同時也直截了當地向他提出了問題，要他交代清楚參加托派的全部情況，這樣的審訊大概進行了五、六次。」

37 凌雲（1917-），浙江嘉興人。193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3年，深受「左」傾思想影響，對「兩陳」冤案負有一定責任。1983年，出任第一任國家安全部部长。1985年，由於發生國家安全部幹部俞強聲出走美國，被免去國家安全部部长職務。

38 凌雲《王實味的最後五十個月》，見溫濟澤編《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74頁。

王實味始終盼望能夠早日擺脫這種禁閉生活。1943年4月18日，王實味交出了被捕後的第一份「坦白書」——「我坦白揭發自己，並向黨誠懇悔過徹底轉變」。「坦白書」說：「我的托派破壞活動被黨揭露一年多了」，「黨為了考驗我的悔過和轉變是否真誠，才把我送到保安機關來」；他說他是一個「自命天馬行空、半狂的托派英雄」，要「化作一個兩腳踏地的現實的人」。從4月到6月這段時間，他還寫過幾份書面「交代材料」。但在「坦白」、「交代」之後，接着就是否認這些「坦白」、「交代」，反反覆覆，給辦案人的印象，用當時的話說是「態度狡猾，口供甚多不真實之處」。<sup>39</sup>

此後不久，凌雲調動了工作，審訊王實味的具體情況就不得而知了。

監獄之外，〈野百合花〉中寫到的問題也都進行了調查。

---

黎辛：王實味在〈野百合花〉第三段裏邊寫：中學生吃稀飯吃不飽，問他吃飽了沒有，黨員還得帶頭說吃飽了。這是哪個單位的事？他說是延安師範的語文老師高樹梓跟他說的。去問高樹梓，高說那是王實味編造的，延安師範也是一天吃三頓，兩頓乾的，一頓稀的。有一頓有些學生沒吃飽，就中午多做一點，中午吃飽了就解決問題了。王實味寫的，能查的都查過，結論是沒有一件是真實的。

---

39 同上，74頁。

第八章  
中外記者穿梭





1943年4月3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發佈了〈中共中央關於繼續整風運動的決定〉，繼續之前的思想整風，並開始「純潔組織」的過程：

一年的經驗證明：整風不但是糾正幹部錯誤思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發現內奸與肅清內奸的最好方法……糾正錯誤思想與肅清內奸分子，是在整風過程中互相聯繫着，但在性質上又互相區別絕對不能混同的兩件事。因此在進程序上，在各地整風的初期與中期，除領導機關的主要負責人應十分注意外，在公開號召上，必須絕對不提審查幹部與肅清內奸的任務，只提糾正錯誤思想與檢查工作的任務，否則不但幹部的錯誤思想難於糾正，內奸亦不能發現與肅清。因此在領導策略上，各地在今年繼續整風的第一階段，必須極大地提倡民主，公開號召參加整風的一切同志大膽說話，互相批評，提倡各學習單位出壁報寫文章，批評領導，批評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況例外）絕不加以抑制。<sup>1</sup>

這個決定給審幹確定了基本方法：先引蛇出洞，後一網打盡。在前一年的年初下鄉調查的張聞天和曾彥修，先後收到電報，回到延安，這時中央研究院的搶救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曾彥修：搶救的第一步是「勸說運動」，持續了三個多星期。好幾個人圍着你，要你坦白，要你交代。要你講甚麼呢？就講你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搞了兩三個星期，有人

1 選自《中共中央檔選集》（第十四冊）。

總結半夜12點最能出成績，因為大家都疲勞不堪。搶救的時候，有的同志還給你跪下來，那是出於好心：「哎呀這樣鬧下去，把你拉去關起來還不如承認了呢。」所以我也就承認了。我們單位沒有從外面來的人，本單位的搶救對象有好幾個。這樣就變成把我搶救完，我們四個又去搶救他；把他搶救完，我們四個又去搶救你。最後好了，大家都是特務！看起來好像承認與不承認沒啥不一樣。當時很緊張、很痛苦，但又像小孩子過家家。我們輪着，四個搶救一個，結果我們五個人都變成特務了，互相搶救出來的。

---

中央文件落實到行動，現在看來有些不可思議，但中央研究院之外的其他單位的搶救也如出一轍。

---

何方：共產黨這些搞搶救的人根本不知道國民黨特務甚麼樣。國民黨特務系統軍統下面，有復興社、CC社。有些人承認自己是CC社的老幹部，可審問的人連CC兩個字母也不認識，問我：「小子，那兩個半圓圈甚麼意思啊？」我說：「甚麼半個圓圈，是CC啊！」材料交上去，搞審幹的彭真、康生、劉少奇這些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寫材料的根本字都不識，胡說一氣。我也在想着承認CC好，還是復興好？可能復興好一點。那時只要你肯寫材料交代，你就變成積極分子、就能搶救別人去了。

灰娃：有個人把我叫去，說小孩子你把你的問題說清楚！我不知道我有甚麼問題啊。他說有沒有人跟你接頭啊？我

說「我想不起來，你啟發啟發我吧！」他就說，你想想誰在甚麼地方跟你接過頭？用甚麼方法接的？你的任務是甚麼？上面的關係是誰？你還發展了誰？哎呀！我說我想起來了！我說，「有一次在山下運動場玩雙杠，有個人過來拍拍我的頭，說『小公主你怎麼一個人出來了？你的保姆呢？你的琴師呢？』就這麼問我。」他說你認識這個人麼？我說，「不認識啊。他的手都挨上我的頭了，那不就接上頭了麼？」他一聽這話不耐煩了，就說，去吧去吧！我的問題也算解決了，我拔腿就跑，不想再看他一眼。我們單位90%都打成特務了。有的是當場承認的，但大多數是來回逼幾次以後才承認的。有個女的說：我的第一條戰線就是在敵人的床鋪上。當時我小，就不懂她怎麼跑床鋪上去了呢？後來長大了一點，才知道就是讓她誘惑共產黨男性的意思，她自己自告奮勇這麼說的，沒人逼她。

教師韓書田<sup>2</sup>1943年2月到延安的時候只有18歲，而這時延安被搶救出來的特務已經越來越多，他立即體會到各個機關單位和學校都瀰漫着一股肅殺的氣氛。

韓書田：我記得先是賀龍在青年工坊講了一次話，有幾萬人參加。我們組裏面第一個被搶救的是我。為甚麼？因

2 韓書田（1925-），延大成立後，進入行政學院教育系學習。後轉至魯藝第六期。日本投降後，分到魯藝屬下的研究室工作。跟隨何其芳，參與篩選編輯《陝北民歌選》，由晉察冀新華書店正式出版發行。1953年參與第二套《初級中學課本文學》編撰。1958年劃為右派。在北京郊區勞改。

為我年紀最小，才18、19歲，他們認為是一個容易突破的點，連續搶救了我三天三夜。稍微打個盹，就把你拽起來，不讓睡覺。延安算是比較好，打得少。和我一塊到延安一個姓畢的特別左，拿墨水瓶子打人家，結果被貼了報告、還受到處分。那時候我特別單純，班主任走過來：「你還不交代？」他拍着桌子說他們都交代了。我說：「他交代是他的事。你們要是有證據，馬上槍斃。」這個話我到現在還記得。我們組的郭林，他交代的事情全是編的。他說小韓你得交代，「就算你沒有任何問題，你不交代就是阻礙運動。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又得把你當典型了。」後來我就寫：「我是特務，任務就是長期埋伏。以上交代，希望組織上實施調查。」還畫了好多的圈，當時大哭了兩場：你滿心熱情地投進了共產黨，反而非說你是特務不可，哎，那是真悲傷！

---

7月1日，毛澤東在給康生的批示中，提出了「防奸工作的兩條路線」問題。毛說正確路線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群眾」。錯誤路線是：「逼、供、信」<sup>3</sup>。此即是所謂「審幹九條方針」的首次表述。高華認為，毛的這段指示長期被認為是毛反對審幹、肅奸極左傾向的有力依據，可是在當年，延安的「搶救」反而一步步深入，走向高潮。

3 毛澤東〈防奸工作的兩條路線〉（1943年7月1日），載《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4期。

宋金壽：開始的時候，任弼時<sup>4</sup>在中央和陝甘寧邊區做大規模的動員，開幾千人的大會，發動坦白運動。坦白自己在國民黨統治區或者從國民黨那裏受了些甚麼影響、做過些甚麼事？這是一個認清國民黨本質的政治教育。剛開始坦白的時候，不是自願的。但是坦白到一定程度，真正有問題的人反而不坦白了。

於是在7月15日，在中央黨校禮堂召開大會，會議由彭真主持，康生做了一篇〈搶救失足者〉的報告。

黎辛：7月15號，在中央黨校禮堂開大會，這個時候中央大禮堂還沒蓋好。會議是彭真主持的。彭真這個時候是中央黨校副校長。這段時間他很紅，他緊跟毛澤東，群眾都講他是「小毛澤東」。有幾個機關準備好了，有幾個人上台坦白。然後康生做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我念個開頭：「同志們，今天的大會，是緊急的時間召開的。是軍事動員時期的會議。因為我們這個會議，是正當着國民黨34、37、38三個集團軍的主力，以及一戰25師、61師、28師、53師、新37師，第80、165師，新27師，167師，191師，七個保安團，一個炮兵旅，一個重炮營作為第一線的兵力，

4 任弼時（1904-50），原名任培國，湖南汨羅人。1922年初加入共產黨。1927年7月任第四任共青團中央總書記。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35年11月與賀龍率紅二、紅六軍團長征，長征中擁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協助毛澤東領導「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的重要成員。

將我們邊區南縣緊緊包圍、待令出發之際來開會的。」他說我們沒有時間再慢慢審查了，希望你們有問題的趕快坦白，我們搶救你，把你們從污泥濁水裏頭拉出來。

---

第二天開始，各機關的負責人都前來聽報告，學習會議精神，並在各個機關召開搶救大會。

---

黎辛：有的機關有準備，來得及開搶救大會。《解放日報》來不及。沒有人坦白是特務，大概拖了三五天，《解放日報》才開第一次搶救大會，前後開過兩次。搶救運動時候，各單位都封閉、不來往。除了積極分子跟炊事員接觸、採購，積極分子出去調查以外，大家都不能出去。父子、母女、夫婦都不能來往，不打電話、不寫信、更不見面。延安停止了一切娛樂活動，周末跳舞、演戲都停了。現在有人說搞搶救運動毛澤東不知道，是康生搞的——這完全是胡說。不跳舞、不看戲了，毛澤東能不知道？楊家嶺天天鬥爭，中央辦公廳開搶救會，就在他的窯洞下邊，他聽不見？

---

今天看來尤為荒誕的是，在各個單位都大量「抓特務」期間，延安的氛圍甚至是，如果某個單位的特務抓得不夠多，就會淪為「落後單位」；個人沒有坦白自己「特務」的歷史，也會變成落後的個人。

宋金壽：關於搶救啊，那故事太多了。一個陝北的勞動英雄，他姓惠，他就是脖子後面有一塊肉疙瘩，所以一般都叫他「惠疙瘩」，他是個勞動英雄。他坦白不出來，可是不坦白不是變落後了嗎？所以他坦白自己是特務，人家問他你怎麼是特務啊？他說我要不坦白，我不就是跟不上形勢，落後了嘛！還有一個「後進單位」的一個處長，因為單位下面全是本地人，都是具體幹活的，沒有甚麼可坦白，把他急得團團轉，結果手下的人就商量，說咱們別為難領導，集體坦白吧。於是自己編故事。坦白完了，大家慶功。處長也高興，慶功的時候幹甚麼呢？買幾塊餅乾。那時候吃到餅乾不容易，吃幾塊餅乾。這些都屬於群眾性的。

何方：我也被搶救了。我15歲參加革命，被國民黨抓過又逃跑了。這應該是立功的事情，但後來糟了：既然國民黨抓住你，你怎麼能逃出來呢？肯定是特務。那時說國民黨抓住共產黨員，有個「五分鐘投敵技術」，五分鐘就把他變過來投敵。我領了兩個比我小一點的同學一起參加了革命。有一個始終在抗日前線，另一個可能供出了我。你承認你是特務，你不可能一個人啊，誰和你聯繫？你必須交代這些問題。於是就瞎編一氣，把自己的朋友、認識的人扯進去。我原來是積極分子，還在搶救別人，結果沒過幾天，突然就變成特務了。大家嘩嘩嘩地都來搶救我。我採取「承認戰」。幾個人對我一個，不讓我睡覺，實在累得不行了，就說：「好，我是，我交代。」交代以後要寫材料，

我就訴苦了：「我根本不是特務啊，你們弄錯了。」結果第二次被整得更厲害。三整兩整，我一會承認，一會推翻，到最後挺堅決的，算了，不承認了。這樣折騰了兩年。那時候延安各機關都戒嚴了，個人是不能隨便出去的，勞動生產也得三人同行，而大家誰也不說話。對王實味，很快就上綱上線，說他是特務，而且還是雙料的，又是國民黨特務，又是日本人特務。

---

1943年夏，延安整風開展的風風火火，而在此期間，王實味仍舊被關押在棗園後溝的西北公學。經過幾次的思想鬥爭，他寫出一份關於自己在上海期間的托派組織身份的交代材料。根據當時任審訊員之一的凌雲回憶：

8月13日，王實味交出了題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書面交代，對托派問題補充了新的內容。他說，1930年夏在上海參加托派「十月社」，在托派統一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任上海滬南區區委書記，1931年提補為正式中委兼宣傳部副部長。這些話顯然是他編出來的自誣之詞。<sup>5</sup>

有意思的是，在這些所謂的「自誣之詞」之中，王實味把從朋友那裏聽來的托派小組組織的名稱都用上了。王凡西在《雙山回憶錄》裏提到，1930年夏天時，反對派（即托派）內部又分裂為四個激烈排斥的小組織，其中王凡西與拜會過托洛斯基的劉

5 凌雲〈王實味的最後五十個月〉，76頁。



仁靜<sup>6</sup>，因為合辦《十月》雜誌，而便成為「十月派」，彼時上海連同北方共有八十餘人參加他們的「十月社」。然而當時的四派紛爭只是局限在理論層面，王凡西形容這些紛爭「五花八門，烏煙瘴氣；但若自己想想，這也正是每一個政治思想在運動初期的共通現象。個人與派別偏見，和革命思想的真誠差異交織在一起，時常表現得非常怪誕。」<sup>7</sup>我們無從得知王凡西是否把反對派內部紛爭也告訴了王實味，如果告訴了，大約也只能讓王實味更加堅信，還是應該加入共產黨；因為一個黨派之內紛爭太多，最後只有解散。

班國瑞：我認為王實味的思想裏有托派元素，譬如擔心官僚之風的傳播和民主的缺失；譬如認為文藝不該是黨的工具，而應是從獨立的個體出發的、探索存在的多方位思考。但王實味沒有加入托派組織，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托派，他在延安為共產黨做了很多事情。他從王凡西那裏學到了一些他終生難忘的托派見解，但他又非常忠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認為自己比延安的任何人都更具有共產主義精神。那些代表黨的人，一方面在談論人權、抵制獨裁，

6 劉仁靜，1926年去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參加托洛斯基派的活動。在學習期間，蘇聯黨內爆發了斯大林與托洛斯基的鬥爭。劉仁靜對托洛斯基的遭遇表示同情。1929年4月，在列寧學院學習結束，獲得了共產國際的護照。他沒有直接回國，自作主張從蘇聯啟程，經波蘭、捷克、柏林、羅馬尼亞，來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到太子島，見到了托洛斯基。臨別之前，托洛斯基送給劉仁靜一篇文章，題目叫做〈中國目前政治形勢和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任務〉。後來，這篇文章成為中國托派的基本綱領。1929年8月16日，劉仁靜回到上海。公然以反對派立場批評中共黨內的官僚化。不久，中共黨中央在《紅旗》上刊出〈給劉仁靜的一封信〉，公開信明確要求劉仁靜三天內在報紙上公開交代私訪托洛斯基一事。劉仁靜堅持托派思想，後被開除黨籍。1929年底，他按照托洛斯基的指示，積極穿梭在幾個托派組織之間。

7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173頁。

一方面又帶着舊社會的陋習，依然在延安過着有階級的生活。王實味很看不慣，這導致他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是十分折磨難熬的。

另外由於王凡西和王實味交往比較頻繁的時期，是在大革命失敗之後不久、國民黨瘋狂剿共期間，他們的談話有特殊的歷史背景。王凡西在他的回憶中這樣寫到王實味：

政治上他是較多同意托派主張的。特別對於當時中國局勢的估計：是直接革命的形勢呢，還是革命業已失敗，他認為反對派的看法比較正確。但他懷疑反對派另起爐灶，重建新黨來領導革命是否可能。他希望大家始終留在黨內，即使被開除也不要企圖自立門戶。他的這個想法，我相信是他後來設法回到黨內，並前赴延安的主要原因。<sup>8</sup>

到了1943年秋冬，各個單位已經搶救出很多特務。因為特務人數太多，很多機關單位癱瘓，導致實際工作已經無法維持下去。1943年年末，各個單位紛紛開始對之前抓出的「特務們」進行甄別工作。

宋金壽：搶救到了11、12月，搶救不下去了，好些人都搶救到了自己頭上。譬如綏德師範顯然是一個特務之幫。有人坦白說，我們有一個特務組織，其中有哪些哪些人；這些人坦白以後又揪出一大撥、然後又到學生當中實地去挖，到台上去坦白。有人拿幾個石頭往台上一放，說這是

8 王凡西〈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82頁。

我們反革命的工具，用石頭砸人；還有小女孩說，我們的功夫就在床上，要暗殺的人就是習仲勳，當時的綏德地委書記。

何方：當時延安的脫產幹部大概是三萬，特務就有一萬五。這是正式、公開說的，胡喬木也講過：「搞了兩年搶救運動，搞出一萬五千個特務。」後來為甚麼不繼續搞了呢？因為有幾個機關都癱瘓了。負責發電報的軍委三部，所有報務員都成特務了，不能再發電報了，組織上和根據地聯繫不通，緊張了。後來把這些小青年集中起來去給毛主席拜年，毛就說我們本來是要給你們洗個澡，結果鹽木灰放多了，傷了你們嬌嫩的身體，現在沒事了，你們都回去好好工作，一下子就又不是特務了。共產黨有個說法：母親打兒子打錯了，也還是母親。

---

何方先生說的拜年時毛澤東「敬禮道歉」一事，發生在1944年元旦。韓書田當時負責做講話記錄，他還記得毛澤東「道歉」時候的場景。

---

韓書田：當時我正好是做記錄的。毛澤東講話愛走來走去的，滿口湖南話，講得非常慢。他意思就說，這次整風審幹，我們為了統一思想，採用了一些不必要的方法，是錯誤的。還說：「你們受委屈了，我就在這呢」——這句話我記得很清楚，因為我也受委屈了——「我代表黨中央向你們敬禮道歉」。那時候的毛澤東，還比較謙虛。他接着就說：「唉，咱們中國嘛，講究禮尚往來嘛。我跟你們敬禮道

歉，你們起碼也得還個禮嘛！」這話我還記得，「你們也得還個禮，你們連個禮也不還，也不大好吧？」

曾彥修：搶救特務這個運動到各個地方以後，確實是「一風吹」，就是這個事情根本不存在了，不算了！1943年把我搶救了半天，1944年3月又把我調到中央宣傳部去工作。這真像鬧着玩似的，大家都知道，也都不說了，就這樣。

至於搶救運動中「搶救」出的來15,000個特務中，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特務，李銳在1949年之後，才通過國民黨的資料了解到真相。

李銳：我1949年回到湖南，湖南的公安廳長就告訴我唐縱<sup>9</sup>的日記沒有帶走。唐縱是戴笠的二把手，是國民黨專門管共產黨特務工作的。公安廳長就問我看不看，我說你趕緊拿來，唐縱日記大概有二三十個黑皮本，字寫得非常工整。我看到1942年8月23號日記裏面說，「延安的情況很混亂，可惜我們沒有一個內線。」那時候我們整風開始亂來了，延安打了15,000個特務；可國民黨的大特務頭子卻說，從邊境上過去的沒有，過來的有，從共產黨打進國

9 唐縱（1905-81），湖南省酃縣人，1928年初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校）第六期；1929年畢業後在國民黨軍隊任職，後在南京創辦《建業日報》。1930年任戴笠部情報處主任秘書。1932年任復興社總社副書記。1936年任國民政府駐德國大使館副武官。1938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六組少將組長，主管軍事情報8年。1945年9月起，先後任國民政府中將參軍、軍統局代局長、內政部次長兼員警總署署長，主持全國警政，並負責掌握全國保安部隊。1949年去台灣，歷任「內政部政務次長」、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常委、台灣駐韓國「大使」、大民銀行董事長、「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參與起草《國民黨改造綱領》。著有《思與行》、《美國政治與英美政黨之比較》和《黨友之理論與實踐》等書。

民黨的有，從國民黨打進共產黨的一個都沒有。我看了真是大吃一驚，當時就發表文章，說到我們黨的亂來是從江西蘇區搞內訌就開始了，同歷史上的農民黨——陳勝、吳廣、張獻忠沒有區別！

---

搶救運動形式上的「正式結束」是1944年5月24日，毛澤東在延安大學開學講話的時候。何方和韓書田都記得文藝整風之後延安日常生活發生的劇變。

---

何方：整風以後，生動活潑沒了，硬是強調紀律，批判自由主義、批判小資產階級意識。現在可以這樣評論：中國共產黨能打下江山來，靠的是延安整風，因為思想統一起來，組織上也統一起來了；但同時也埋下了很大的禍根。第一，個人崇拜、集權政府搞起來了；第二，整風留下來的這一套管理體制，可以再管一百年。有大學者還問我：「你是不是太悲觀了？」我說，已經七八十年了，再管二三十年有問題嗎？高度集權和輿論控制，這些都是延安整風搞起來的。

---

灰娃：整風之前生動、活潑、很寬鬆，文藝上古今中外都有，我們唱的歌都是外國歌，我們演的戲很多都是外國戲，演的都是《維也納暴動》呀、《木馬計》呀、還有甚麼《等待戈多》，都是外國的。後來說應該寫延安的現實，就出了秧歌劇《兄妹開荒》了！

---

戲劇如此，當然文學創作更是如此。

---

韓書田：魯藝原來有好幾個文藝刊物，有發表詩的《草葉集》、發表小說的《孤魚》，文藝座談會以後都沒有了。在這些雜誌上發表過短篇小說的何其芳、嚴文井、舒群呀全做了檢查。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只剩下《文藝通信》。我當時還沒有畢業，因為在《解放日報》上發了一篇文章周揚很欣賞，就叫我到研究室搞《文藝通信》。我的工作就是先把稿子收集起來，送到中宣部給周揚，他看完以後再拿回來，接着自己去橋兒溝的商店買紙，自己背着送到《解放日報》社去印。《解放日報》社還要找你去校對，又得在《解放日報》社住一個禮拜。校對完了，印好了，就把這500冊背上，到北門外的新華書店。只辦了一期就完了，日本投降以後就沒有了。

---

當我問道他是否認為延安的「搶救運動」可以溯源到共產黨在江西根據地的肅反時，他又做了以下補充。

---

高華：江西時期，AB團事件的高潮是1930年，那是軍事鬥爭的緊張時期；延安時期基本上是和平時期，也沒有國民黨打過來，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危機，可以慢慢磨豆腐。加上毛澤東本人經過十年鬥爭，各方面也更成熟了。在他或者旁人看來，在黨內大開殺戒，手段過狠，這種情況到延安時代就沒有了。基本上，內部重新集中統一化，樹立自己新權威，以便跟國民黨爭取江山，應該說這些目標都實現了。對於知識分子，他只樹起王實味一個典型，沒有在知識分子中大開殺戒。這點上他自認為比斯大林高明得多。斯大林基本都殺，毛澤東是長期關押，關到老死。其

實我寫作時，並非刻意挖掘江西的AB團事件和延安事件有甚麼必然聯繫。我寫AB團的時候，主要根據還是80年代後期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的浪潮中間，新出現的材料。讓我印象很深、受到一定刺激的，還有80年代末公佈的關於蘇聯的一些歷史真相，有種說法是毛組織「大清洗」比斯大林還早，這個當時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如果撇開道德看問題，這是毛澤東要鞏固他新權威的重大行動。當然寫到延安、寫到王實味的時候，看到他又在知識界鞏固新權威的行動，發現兩者之間事實上有一定的聯繫，但這些聯繫都是寫完以後呈現出來的。

前文提到，早在1943年4月1日王實味被逮捕前的幾個月，國民黨方面就有人估計他已經被殺了。在延安開始普遍整風期間，一些國民黨人還在西安為王實味等被捕的人搞過一場「追悼會」。

宋金壽：國民黨統治區開追悼會，說王實味、吳伯蕭<sup>10</sup>等39人，被延安刀砍活埋。當時用的就是「刀砍」二字。西安那邊有個號稱「好友同窗」的人，給他們開了個追悼會，

10 吳伯蕭（1906-82），原名熙成，文學家、教育家。1925年發表處女作《白天與黑夜》。1938年4月進入延安，在抗日軍政大學政治班學習四個月，後到晉東南前方工作，寫了《潞安風物》、《冰州行》、《響堂鋪》、《路羅鎮》等大量作品。1941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2年5月，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和整風運動，在延安期間，他先後擔任陝甘寧教育廳教育科長、文化協會秘書長、延安大學和華北大學教授，並發表了《戰鬥的豐饒的南泥灣》、《一壇血》、《黑紅點》、《化裝》等文章。1949年7月，參加新中國第一次文代會，被選為中華全國文化工作者協會全國委員會理事，同時被任命為秘書長，後又連續擔任了東北教育學院副院長、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總編輯、中國文聯委員、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等職務。

紀念他們。延安後來把這個叫「活人追悼會」，因為提到的39個人中凡有真名實姓者，個個都活着，有些人在延安找不到，是因為名字是編的。

當時國民政府看到斯諾的《西行漫記》、舒湮的《戰鬥中的陝北》、史沫特萊的《中國在前進》、陳學昭的《延安訪問記》，以及其他中外記者對延安的正面報導，開始越發阻撓中外記者前往延安訪問，但是為了爭取美國的支持，還是允許一支21人組成的中外記者參觀團，在1944年6月9日到達了延安。參觀團規定只能參觀、不能報導，成員包括外國記者六人、中國記者九人、國民黨官方指派的兩個領隊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派來的四名「隨員」。

中國記者之中，有當時《新民報》的主筆趙超構。我們在前文中引用過趙超構對於毛澤東〈反對黨八股〉一文的感想，說明他在來到延安之前，已經作為一個敏銳的新聞人，一直在關心延安和共產黨的情況。他隨着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到達延安，一共進行了43天的訪問，寫了十多萬字的報導，後來集結成書發表，就是著名的《延安一月》。

根據書中記述，可知參觀團成員中的中國記者，除了像之前的中外記者一樣，採訪中共領導、參觀延安生活外，還對探訪在延安工作、生活的作家和藝術家，有特別濃厚的興趣。從題為〈延安文人群像〉的報導中，我們了解到，趙超構拜訪過丁玲、陳學昭、陳波兒三位女文人，見過原創造社成員成仿吾、李初梨，還拜會了蕭三、周揚、艾思奇、艾青等人。他



說，「如果說蕭三有田園詩人的氣息，那麼艾青應該可以稱為『戰鬥詩人』了。」還提到，「和延安人談起，艾青似乎『很受尊敬』，最被人稱道的一件事是他寫了一本《吳滿有》的詩，寫好了還到吳滿有那裏去，親自朗誦給吳滿有聽，並且照吳滿有的意思改正了許多句子。這件事，也正可以表現延安作家寫作生活的特色之一。」<sup>11</sup>趙超構說，由此可見，像艾青這樣留學法國、「染到了拉丁民族的熱情氣質」的詩人，此時正在向工農兵文學靠攏。前文提到，王實味在給毛澤東寫信時，曾經問到不知吳滿有家可有他的一席之地，他沒有看到後來吳滿有「叛變」、轉而和國民黨合作，但是艾青的這本詩，卻成了他以後不願提起的作品。

幾乎所有1943年之後到延安的訪客，從中外記者團到美軍觀察組，都看過延安的秧歌表演。文藝座談會之後，西洋劇目不能演出了，獨創的劇目又因為動輒被批評有小資產階級思想，周揚和魯藝師生只能向民間藝術尋寶。而秧歌劇中，最成功的莫過於《兄妹開荒》。

---

王培元：延安的秧歌劇《兄妹開荒》實際上從東北二人轉脫胎而來。農村這些東西有很多色情成分，一開始是夫妻戲，挑逗嘛。我們學院派要改造這個，無產階級文藝不能是原生態的，魯藝文藝家絞盡腦汁，為了避免色情成分，把夫妻戲改成兄妹戲，兩個人也開玩笑，哥哥在那兒裝着

11 趙超構〈延安文人群像〉，見《延安一月》（上海：新民報社，1945年再版），142-3頁。

睡覺，妹妹說他偷懶。《兄妹開荒》的男主角叫王大化，會表演、會唱，他和李波的《兄妹開荒》為工農兵演唱，是魯藝在歌劇《白毛女》出現之前一個很重要的成果。

韓書田：我到延安的時候正是春節，正月初五，住到教育處，正好看到《兄妹開荒》秧歌劇。魯藝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前，演過不少西方經典作品，像《大雷雨》、莎士比亞的劇啊。座談會以後，開始按照毛澤東的思路，講工農兵、講為政治服務。後來乾脆把戲劇系、音樂系合併成戲音系，主要演秧歌。

但是只演秧歌劇根本不能滿足大家的需求，這時候文藝家要編出新的服務工農兵的劇目。

韓書田：《白毛女》最早的稿子是來自邵子南<sup>12</sup>的一篇報告，是真人真事。賀敬之他們一看，覺得這個編成劇不錯。最初的《白毛女》藝術性相當好，可惜很少人看過。我們第一次在魯藝看採排，黃世仁沒有被槍斃；喜兒要嫁給他，還拿着衣服比來比去，很高興的樣子；還有喜兒吃了白饅饅，到觀音案上去吃貢品，相當地優美。現在想

12 邵子南（1916-54），原名董尊鑫，四川資陽人。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4月至1944年6月，邵子南歷任西北戰地服務團幹事、專職團委文藝隊長等職。創作了《告詩人》、《英雄謠》等詩和《李勇大擺地雷陣》、《閻榮堂九死一生》等作品。參與寫作了現代戲劇史上的名著《白毛女》。曾任延安魯藝教員、《新華日報》採訪部主任、新華通訊社晉綏分社副社長。1950到1954年間，他創作了《木工做機器的故事》、《哥哥回來了》和《趙巧兒送檣燈》等作品。



上：王大化和李波主演的著名秧歌劇《兄妹開荒》；下：魯藝師生演出秧歌時群眾觀看的情形。

來，很符合人之常情。綵排完了，到中央去審查，台下面就有人上去打黃世仁，要求非得槍斃不可。中央審查完以後回來又大改，黃世仁這才給槍斃了，改成後來這樣：好人往高、大、全的方向改，壞人就要他死，比較優美的場面都沒有了。我回憶這幾十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基本上是個分水嶺。

---

趙超構希望採訪而沒有能夠見到的作家有張庚、蕭軍、歐陽山、何其芳，但是意外地，他見到了「以〈野百合花〉鬧出事情來的王實味先生」：

有一天下午，交際處通知我和國民公報記者，請我們到文協晚餐。到那邊的時候，有一個瘦長的男人和丁玲一同出迎，介紹過來，才知道這就是王實味。這種意外的會見，頗使我一時失措，因為我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和他交談。談〈野百合花〉吧，我深恐有傷他的自尊心，可是當我們坐下來的時候，王實味卻先開口談起他自己的事情來了。談話的神情完全像演講，時刻舞着手勢以加強他的語氣，說到他過去的「錯誤」，他的表情嚴肅到可怕。有時，竟是聲色俱厲的。<sup>13</sup>

---

林賢治：當時王實味的表演——那是表演！看上去非常地悲哀。王實味是個鐵漢子，你們要瞭解：第一，他是遵從組織的指示，進行表演，就說你們對我多麼好，主席對我

13 趙超構〈延安文人群像〉，147頁。

多麼好，一點沒有虐待我，這是屈從於組織的指示；第二，作為一個有鋼鐵般意志的漢子，他怎麼一下子變成那樣了？我看了那個場合，我覺得非常悲哀。這點在趙超構《延安一月》那本書裏面就說到過，王實味完全不是王實味了。

談話繼續了一小時之久，我好幾次打斷他的話頭，因為我覺得這種話在說者與聽者兩方都會感到不舒服。最後我們才慢慢的談到文藝上去。我試提他過去所翻譯的幾本小說，他似乎稍為發生一點興趣，但當我勸他回到文藝崗位來，再從事翻譯工作的時候，他的情緒忽然又衝動起來，堅決地說：「不！我現在正對政治發生興趣，以後還是要參加政治工作的」，問到他最近的生活，據說還「在休養中」。據我的觀察，他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們會面的時候，也還是掩飾不了的。要說「野百合花」事件在他心理上，沒有留下一點創傷的疤痕，那是不可能的。<sup>14</sup>

林賢治：我覺得王實味精神出了問題，要不然他不會那樣。他那個表演也不像真的表演，表演也要符合角色啊。但他那個角色是分裂的角色，能看出來他的精神已經有問題了，但是他還是努力地遵照組織的指示精神去做。對黨員來說，「組織的需要」是很重要的。就像過去封建時代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一樣，革命需要你犧牲，你就需要犧牲。

14 同上，147-8頁。

宋金壽：在文聯召開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吳伯蕭做了一個發言——這當然是有意安排的，他說西安有人說我和王實味已經被共產黨殺了，我們還活得好好的，這就引起了中外記者團的興趣，於是他們要求見王實味。延安有個北大校友會，會長是范文瀾，會員中有位吳文燾<sup>15</sup>，我們訪問過。他說校友會成立以後也沒甚麼活動，但是因為中外記者團裏，有兩個在國民黨中宣部工作的人員，一個叫楊西昆的曾經是北大學生，因此吳文燾組織了一次北大同學會，曾經讀過北大的王實味出席了這次同學會，還有簡單的發言。大概就說，大家都有父母，我也有妻兒；你們（指楊西昆）說我已經被殺了，其實我好好的，我委託你，跟我的親友通報一下，我在延安生活得很好。

---

王實味的女兒王勁楓回憶，她的叔伯哥哥王本謙告訴她，1944年王實味的確給他的父親寫過一封信，大意說，國民黨造謠說他已經被共產黨殺害，但沒有誰要殺他，他受到批判，以後會改正，請父親放心。<sup>16</sup>

15 吳文燾（1913—2011），河北直隸人。第一、二、三、六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原局長、黨組書記。1937年6月，北京大學外語系畢業。1937年11月在延安參加革命工作。1938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宣部國際宣傳科幹事、《解放週刊》編輯、部行政秘書、《中國通訊》（英文）主編。1941年6月後，任《解放日報》編輯，新華社副社長主持日常工作兼英文廣播部主任。1945年10月率隊建立新華社東北總分社，曾任社長。1947年7月到東歐工作，次年建立新華社布拉格分社並任社長。1953年5月後，任外文出版社副社長、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1955年11月，任外文出版社副社長、社長兼總編輯，對外文委委員等職。1960年後，在對外文委資料室、幹訓班工作，曾任《毛澤東選集》英文版定稿小組成員、對外文委亞非拉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商務印書館編譯顧問。1979年12月起，任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副局長、1981年3月30日至1982年4月23日任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局長、黨組書記。

16 王勁楓《我的爸爸王實味》，168頁。

---

宋金壽：不論對趙超構、還是楊西昆，王實味都沒有提自己在坐監獄，都是說在修養。現在我們有據可查的文章，作者是趙超構，他在延安跟王實味有過交談，他在《延安一月》中寫到了這次跟王實味的會見。《延安一月》周恩來看了，又把它送給毛澤東，他們都認為趙超構寫得不錯，比較真實地反映了延安，而不是歪曲。

---

凌雲回憶了記者團到訪延安能夠見到王實味，也是根據中央的指示，由中央社會部的幹部陪他去的。

當時王實味還是顧全大局的，他說：我是托派，又犯了錯誤，但生活得很好，為甚麼西安說我被迫害死了，還開甚麼追悼會。王實味奉命說這番話當然是出於無奈，但他還是分清了西安和延安，反擊了西安那些反共的宣傳。王實味見了記者回來以後，非常惱火躺在床上，握緊拳頭，表示了極大的不滿，說當眾承認是托派是「自我犧牲，是被迫的」。<sup>17</sup>

雖說毛澤東在1944年5月24日在延安大學開學時對搶救運動道歉，從形式上結束了搶救，但4月被逮捕的人並沒有立刻被放出來。中外記者團來訪時，李銳是通過特殊關係被釋放的，其他人仍在關押之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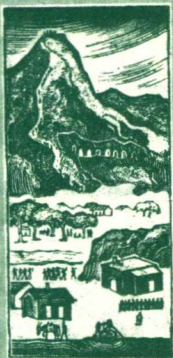
李銳：我是1944年的6月放出來的，為甚麼放出來呢？那個時候有個中外記者團到延安來採訪，團裏有外國記者、有

---

17 凌雲〈王實味的最後五十個月〉，78頁。

# 延安一月

趙超構著



左上：《新民報》主筆趙超構的《延安一月》是一份非常真實的對於延安的報告；右上：被關押的李銳在記者來訪的時候被周恩來放出來做統戰工作；  
下：中外記者團在延安和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前排左四）、朱德（前排右五）等人的合影，朱德身後黑色衣服者為趙超構。



國民黨記者。裏面有個國民黨記者黃磊，和我小學同班，曾經是我的朋友。我看到名單以後就給周恩來寫封信，說他們來了以後，我可以做點工作，所以周恩來就下命令，把我放出來了。其他人都是到1945年日本投降以後才放出來的。

---

當「其他人」被釋放的時候，王實味已經被囚禁了一年多，此後他還會被囚禁三年，直到被處決。

---

黎辛：抓王實味的時候，他就說，我甚麼都交代，可都沒用了。被抓起來坐牢，王實味是很痛苦的。他原來是研究員、中灶待遇，在監獄裏，一般犯人就是一屋子擺個桶，大小便。吃飯就是給點菜湯、有點鹽，飯一碗，饅頭倆，都吃不飽。他說，應該給我吃飽，給我吃菜，給我吃雞蛋，我要營養，我身體不好。

---

薄平：1988年11月，李清寫了一篇關於我和王實味的文章登在《鄭州晚報》上了。一個叫石彬的人就給我寫信，說他去過延安，知道王實味的事，非常想見我。我倆就談，他跟我說，王實味很慘。他是搞設計的，拿筆就給我畫王實味坐的監獄。他畫一個圓圈，旁邊是沒有人煙的荒野。不是很陡峭的那麼一個山，挖了一個天井，挖得很深。底下開一個圓圓的門，裏面一個隧道似的，從這個門進去，有第一、第二、第三，三道崗。再裏面就是個圓形的一個活動場地，他說王實味蹲的那個監獄，就在這裏邊。吃

喝拉撒全在這個圓形的場地上。有人給送飯。你要想跑出來，就這一個隧道，有三道崗。外面的人幾乎沒人知道這是個監獄，可是他在這個牢房裏，你想想這個滋味！

---

趙超構的《延安一月》從1944年7月30日起，先後連載於重慶和成都的《新民報》上，雖然他自己「始終不過是新聞記者，它只能代表一個新聞記者對延安邊區的看法，它不是甚麼正式的調查書或裁判詞」<sup>18</sup>，但其中詳實的記錄，是我們瞭解當時延安的重要文獻。當時國統區的很多人都看到了他的文章，而王實味的老同學王凡西看到這篇文章，已經是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了，他回憶說：

《新民報》記者趙超構寫的《延安一月》，讓我於久違之後，再獲得這位老朋友的消息。原來他去了延安，而且在那裏闖了大禍。「一個臉呈死灰色的青年，讓丁玲帶着，出來背書似地向記者們痛罵自己。」為甚麼呢？為了他寫了一篇「反黨」文章：〈野百合花〉。在他們離滬去延安之間的兩三年中，王實味究竟在何處工作，幹甚麼工作，我只記得陳其昌說他是去山東教書的。他們二人之間的關係此時也斷了。因為1935-36年我都在上海，與陳其昌一起，經常見面，卻從不曾聽他談起這位老同學的消息。據延安整黨文獻上的記載，「王實味直到1936年還與托派分子陳清晨通信」，如果這是真實的話，也不過最普通的問候吧了，否則我不可能不知道的。<sup>19</sup>

18 《趙超構文集》第二卷，文匯出版社1999年版，759-60頁。

19 王凡西〈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83頁。

1944年的延安可為中外訪客穿梭，但是延安也派出了人員到國統區的重慶去宣傳延安《講話》的精神。5月，中央派何其芳、劉白羽到了重慶。

王培元：何其芳這人比較認真、單純，他和劉白羽到重慶去，見到了茅盾、胡風、馮雪峰等好多人。開會何其芳就介紹延安文藝座談會，介紹延安的知識份子開始思想改造，開始轉移方向要為工農民服務了。他就現身說法，把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的那些內容，又在重慶文學家的座談會裏邊講，就是改造自己小資產階級的文藝觀。據說他的講話引起了一些作家的反感，作家梅林就說，好快啊，他們已經改造好了，現在來改造我們來了。馮雪峰說，我們革命的時候，他們在哪？很反感。何其芳和劉白羽回到延安以後，毛澤東就會見了他們兩個，「重慶文藝界的情況怎麼樣啊？」毛說，知識分子有兩種傾向，一種人是松樹性比較多，一種人是柳樹性比較多，你何其芳大概就是柳樹性比較多的那種人。毛的意思就是，松樹性就是立場比較堅定、原則性強；柳樹性比較多就是比較軟弱、沒有原則性。何其芳就反思自己，意識到自己要改造世界觀，但還是沒有堅決地、徹底地實踐毛主席的思想。後來他就基本上不再從事創作，有時候搞研究、搞批評。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美軍加入了二戰的歐亞兩個戰場。到1944年，二戰的局勢逐漸明朗，德國和日本的失敗已成定局。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軍觀察組18名成員

分兩次到達延安，受到熱情歡迎。他們肩負着羅斯福總統直接批准、由美軍在中緬印戰場的總指揮史迪威將軍（Joseph Stiwell）監督的秘密任務，代碼「迪克斯任務」（The Dixie Mission），目的是評估共產黨的武裝和政治力量，是否能夠幫助美軍打敗日本、是否在戰後值得美國繼續支持。8月15日，《解放日報》還專門發表過經毛澤東親自修改的社論，標題是〈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其中「戰友們」三個字是毛澤東審稿時加上去的。社論指出「美軍觀察組戰友們來到延安，對於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實有重大的意義」，「這是中國抗日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毛澤東十分重視這次美軍觀察組的到來，在延安看到的、聽到的一切，也都給觀察組成員留下良好印象。他們留守延安期間，延安政治部關押的大部分犯人已經釋放，只有王實味仍舊被關在監獄裏。

1945年4月23日，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的主席台正中央，懸掛着毛澤東的巨幅畫像。會場後面的牆上，掛着「同心同德」四個大字。兩側牆上張貼着「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等標語，在主席台的正上方，懸掛一行引人注目的大字：「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即便是今天去參觀延安的中央大禮堂，還能夠見到七大的會場。經過了三年多整風運動的洗禮，毛澤東昔日的政治對手及一批黨和軍隊的重要領導幹部，在大會上相繼向全黨和毛澤東作出檢討。

---

何方：在整風上，毛主席有很大信心把各方面都搞好。可從黨章來看，這個整風是非法的，因為中央沒有開大會決

定要進行整風運動，黨章規定每年要開一次代表大會，他就不開，因為思想不統一。六大是1928年在莫斯科開的，1928年到1945年是多長時間？17年不開七大！在那整風，〈改造我們的學習〉<sup>20</sup>報告並不是以中央的名義，是以個人名義。「我認為我們黨的學習應該做一下改變。」這樣以個人名義講話，是因為他已經有基礎了。上有共產國際支持，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sup>21</sup>為甚麼支持他呢？因為他有實權。他已經把全黨給控制起來了。而且當時人人注重武裝鬥爭，毛澤東組織武裝鬥爭確實有一套。大家要支持張聞天，但張根本不會打仗。中國革命的特點就是，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所以關鍵是武裝，一直到現在都是強調這個指揮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從1931年開始，持續了14年的中日戰爭終於結束了。8月16日，「迪克斯

- 20 〈改造我們的學習〉：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上所作的報告，發表於1941年5月19日。這篇報告和〈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是毛澤東關於整風運動的基本著作。
- 21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 Mikhailov, 1882-1949）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在他主持共產國際的八年（1935-43），幫助和指導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運動，主張廢止公開反蔣的口號，指定了毛澤東為中國黨的領導人。1902年，加入保加利亞社會民主工黨。1913年，季米特洛夫被選為國民議會議員。1919年5月，保加利亞社會民主工黨（緊密派）改名為保加利亞共產黨（緊密派社會主義者）。被選為黨的領導成員，成為一名共產國際領導人。1909年7月當選為中央委員。多年擔任《印刷工人報》和《礦工報》的編輯。1923年其領導的反法西斯九月起義失敗後，被迫流亡國外。1929年，季米特洛夫被指定為共產國際執委會西歐局的領導人。1934年4月29日，他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書記，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委員和中歐地區局領導。5月23日，他被吸收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成員。實際上領導着共產國際。1935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1946年11月，季米特洛夫出任保加利亞共和國第一任總理。1948年12月，保加利亞工人黨改名為保加利亞共產黨，季米特洛夫當選為保共中央總書記。



上：1944年，楊尚昆（左二）、葉劍英（左五）、黃華（左六）、朱瑞（左四）等外事組成員與美軍觀察組人員合影；下：1944年美軍觀察組及美飛行員看晉察冀畫報社贈送的圖片（沙飛攝影）。

任務」正式結束，但是觀察組成員並沒有全部撤離。雖然觀察組成員後來也的確給總統寫了很正面的關於延安的報告，但是計劃趕不上變化，日本投降以後，美國對於中國的局勢又有了新的考量。在二戰結束之後的幾個月內，各種勢力忙於「接收」，對中國的版圖控制重新劃分。共產黨很多人隨部隊離開延安，接收了東北；何方、李銳、蕭軍等人都去了東北，把昔日的滿洲里變成了解放區。

何方：我是1945年9月2號，日本投降後第20天，離開延安的。出發前要處理東西，包括好多書、衣服、被褥。上前線哪能扛着，帶背包而已，我們就到集市把自己的東西往那一放，也不好意思叫賣。於是去了兩三趟，頭一天去扛回來，第二天去又扛回來。老百姓有規矩，講價錢還要把手撐在衣袖裏比劃，你看這個價，不行我要這個價。我們不會這個，糊里糊塗賣了就算了。書籍沒人耍，我很喜歡書的，只能很便宜賣給造紙廠了。當時沒有流通貨幣，別的根據地貨幣不一樣。當時規定上前線的人每人可以用邊幣換五個大洋，我也換了五個，這樣就上前線了。當時中共和蘇聯商量，想把東北全部拿下來，所以我們都儘量都往東北去。別的地方已經有幹部，東北一個也沒有。離開延安的時候，都是很高興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延安一直沒幹活，都在整風，現在真正能為國出力了。我們步行一個多月才到了東北。

李銳：日本投降之後，中央最初期有一個方針，就是搬到冀熱遼，搬到熱河去。那個地方是東北與華北的交匯處，



上：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楊家嶺的中央大禮堂召開，圖為禮堂內的會場；下：中央大禮堂今貌。



我們希望能夠把華北控制住，把東北爭取過來。冀熱遼於是變成晉察冀邊區管，後來就歸入東北局管。我在熱河辦報紙，困難得很，電常常發不起來，沒有煤。老幹部從延安去到東北，全體經過熱河，我在熱河辦報，也就直接同黨政領導來往，直接接觸到整個的世界形勢、輿論形勢的發展。那時國共兩黨正在和談，局面非常複雜非常緊張。

---

在整風中一度受挫的蕭軍，後來被罰不准吃公糧，過了一段當農民、試圖自食其力的生活。抗戰勝利後，他已經打算離開延安，返回東北家鄉。他在1945年11月9日的日記中寫到：

上午我正在修補一條破行李袋，毛澤東派來人接我去棗園，當我一個人坐在汽車上，街上的人全以驚奇的眼光望着我，我似乎也有點自得的心情——這在他們看來是「榮耀」。

三年多了，這是第一次到他家裏去看他，這算是告別。

和毛談話中，我們似乎全在有意避免一種東西——過去那些不愉快的歷史——盡可能說得輕鬆，我問了他一些重慶情形，東北情形，那裏準備和國民黨軍隊打，我也提了一些「兵貴神速」等意見。……

最後他鄭重告訴我：

「聽彭真說，你要入黨，我們歡迎，只要你自己什麼時候下決心……一個黨員不是說要取消他一切特性，創造性……」

「我主要是怕自己發脾氣……」

「這不要緊，發一點脾氣可以的，這叫做大團結裏的小摩擦……」在我倆去看朱德的路上他笑着說。

他們對人的態度一直是周到親切的，這也是一種「政治素養」。<sup>22</sup>

與毛澤東告別之後，蕭軍先帶全家和一些魯藝師生步行46天到達張家口，一家人住進晉察冀日報社，等候去東北的機會。第二年，他重返哈爾濱，先後擔任了東北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魯迅文化出版社社長、《文化報》主編等職務，此後再也沒有與毛澤東見面。

1942年，21歲的李敦白被徵兵入伍，1943年被美軍派送到史丹福大學學習中文，老師中有張學良之女兒張閭瑛和當時已經很有名的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945年9月李敦白終於到達中國，戰後繼續留在中國，經宋慶齡介紹在聯合國救濟總署負責監督救援物資的派發。

---

李敦白：我在美國作學生的時候就參加了美國共產黨，但是後來我對這個黨很失望。因此當我到中國的時候，看到中國共產黨那麼民主、為人民做那麼多事情，看到高級官員會因為對老百姓態度不好而受到嚴厲批評，我是很感動的。即便在史丹福大學學中文的時候，我80%的老師都會說，在中國共產黨是好樣的，民主、為人民、努力抗日；而國民黨則很腐敗。

---

22 蕭軍《延安日記》下卷，769頁。

李敦白在押運救濟糧食到湖北省境內的中原解放區時，蔣介石的30萬大軍正將李先念<sup>23</sup>率領的包括一萬傷兵在內的六萬共產黨軍隊，重重包圍在大悟縣宣化店為中心、方圓200來里的狹窄區域中。李敦白一直想找機會親眼一睹解放區的景象，非常願意去宣化工作；但救濟善後總署的官員在行前對他說：「你去了以後，要注意收集共產黨的情報。」到達宣化店後，他看到了和國民黨統治區截然不同的情形，沒有死屍、沒有娼妓、甚至沒有乞丐。在共產黨的組織下，當地農民通過公開討論決定救濟糧食的分配，最後由學生把討論結果公佈，並且按照結果把糧食送到各家。李敦白在宣化結識了李先念、王震等共產黨的高級將領，並且和他們成為朋友。

---

李敦白：1946年4月，我在李先念的新四軍總部，當時國內戰處於一觸即發的狀態。馬歇爾將軍在南京，派出一個三人和談小組，其中有中共代表周恩來、國民黨代表王天

23 李先念（1909-92），湖北黃安人。1926年10月參加農民運動。1927年11月率領家鄉農民參加黃麻起義，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10月，加入紅軍，任紅四方面軍第十一師三十三團政治委員。因該團出色地完成了戰鬥任務，方面軍總部授予「共產國際團」的稱號。1934年1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1937年底，他到達延安，先後在抗日軍政大學、中共中央馬列學院學習。1938年11月，李先念任中共豫鄂邊區省委軍事委員會副主任、軍事部長。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49年5月，李先念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省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主持黨、政、軍全面工作。1952年2月，兼任武漢市委書記和市長，1954年夏，調到中央工作。9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10月，他兼任國務院財貿辦公室主任，負責綜合管理財政部、糧食部、商業部、對外貿易部、中國人民銀行和指導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的工作。1957年，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在五中全會上增選為書記處書記。文革時受到批判，1968年被下放到北京市北郊木材廠勞動。1977年，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軍委常委。1979年3月，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1982年9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6月，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鳴、美方代表白魯德（Henry Byroade, 1913-93）<sup>24</sup>。他們第一天晚上在一個宗祠裏面開會，房子很大，但是只點了一盞豆油燈，因此很黑。我和一個朋友坐在後面聽，會後我走回到我住的小學校時，碰到李先念帶着周恩來回去，李先念就把我介紹給周恩來。周恩來指着我說，我注意到你在我發言後大聲鼓掌，而美國和國民黨代表發言後你卻沒有反應，這不好。以後你回到上海會有麻煩。我當時想，這人真直接啊，連招呼都沒打就批評我了。但是我感到他把我當成了兄弟或朋友。我乾脆說，如果你們覺得我能幫上忙，我可以留下來。回到上海之後，我從聯合國救濟屬辭職，因為大部分救濟糧都被貪官控制，根本不能直接發到人民手中。

有趣的是，國、共、美三方代表到達不久，李敦白就在廁所裏碰到了白魯德，而白魯德則把李敦白這個美國同鄉當作「自己人」，警告他不要久留：「我可以告訴你會發生甚麼事，這裏的人將會被消滅。我剛從東北回來，那裏的共軍是政府軍的十倍，政府軍不可能獲勝。但是政府軍在這裏卻佔上風，所以我們決定讓他們殲滅此地的共軍。」白魯德的話讓李敦白了解到和談的實情，他決定把這個情報透露給李先念。雖

24 白魯德（Henry Alfred Byroade, 1913-93），1937年畢業於美國西典軍校，軍官出身，1946年被授予將軍軍銜。他在1937至1944年期間，被派往中國-緬甸-印度戰區，1944至1945年參與亞洲戰區行動，1946至1947年作為馬歇爾將軍的副手在延安領導美軍觀察組工作。1949至1952年，負責美國政府的德國事務；1952至1955年負責近東、南亞、非洲事務，後來作為駐外大使，曾被派駐埃及（1955-56）、南非（1956-59）、阿富汗（1959-62）、緬甸（1963-68）、菲律賓（1969-73）、巴基斯坦（1973-77）等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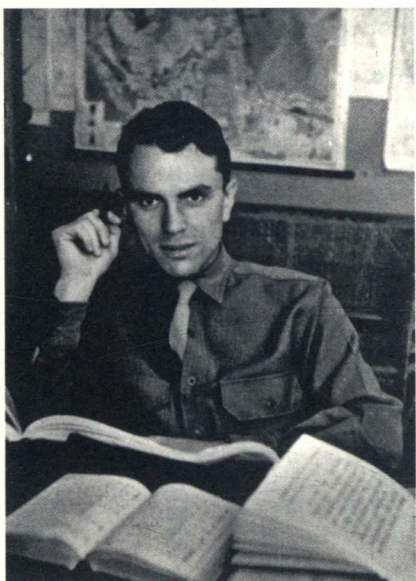
然李先念率領的部隊已經做好了應戰準備，但李敦白的情報讓他們更確信不能對和談抱希望。

李敦白回到上海去，和宋慶齡告別，宋慶齡則建議他去南京和周恩來告別。他告訴周恩來回美國後會繼續中國研究，周恩來卻說，不如我想辦法讓你去延安。經過一番周折，李敦白先到內蒙的解放區工作了一段時間，終於在1946年10月到達了他嚮往已久的延安。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在他到達之前，美軍觀察組已經離開延安一年多，但是美國軍方人士和記者卻一直從北京等地乘坐專機飛來延安。我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找到一本手寫的延安往來登記冊（Post Registry），上面記錄了1946年坐美軍飛機出入延安的軍人和記者，有他們到達、離開的時間，還有他們的簽名。2015年我到美國鳳凰城去拍攝李敦白時，把這本小冊子的掃描件給他看，他看到好幾個他認識的人。

---

李敦白：白魯德是停戰團的美國代表，這裏寫着他在1946年的3月4號進駐了延安。我很驚訝為甚麼他會去延安？我猜他可能是走遍了所有的解放區。我們在宣化碰面的時候，他剛從滿洲里出來。這位約翰·羅德里克（John Roderick）是著名的大事件報導記者，在《聯合報》和《紐約時報》供職，他們早在我到達之前就已經進駐了延安。還有這個，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簽名，她是我急於進延安的原因之一。路易斯採訪毛澤東、周恩來或者其他要人的時候，我負責給她翻譯。路易斯住在觀察組院子的平房裏，就在那裏給報紙寫稿子。

---



上：在史丹福大學學習中文、準備前往中國戰區的美國士兵李敦白；  
下：毛澤東和美軍觀察團團長白魯德將軍。

曾彥修：1946年，毛主席大概為了見外賓方便，又住到楊家嶺來了。棗園、楊家嶺，究竟他平時住在哪兒我們也不知道。當時是日本投降以後的第二年，國共談判跟民族運動正進行地非常熱烈，上海的報刊也非常活躍，全面內戰還沒開始。上海跟延安之間，時有飛機來往，當然都是美軍飛機。美軍觀察組的人一直到1947年才走光。

班國瑞：當時左翼的西方人也比較天真，他們比較國民黨在重慶的統治，感受到中國共產黨人的農業革命，給解放區帶來了新鮮的空氣，這一點也給了美軍觀察組一個理由，去進駐延安。不過，美軍觀察組在延安也只不過是匆匆一瞥，看到的是共產黨最光輝的一面，而沒有接觸到中國共產黨的陰暗面，譬如王實味的例子。

曾彥修：抗戰後上海那邊最新的報刊，就通過這些飛機運到延安，首先交到毛主席那裏看。范用<sup>25</sup>還寫了篇〈給毛澤東買書〉，後來那些書報都到我這裏來了。因為我在宣傳部工作，宣傳部長是陳伯達，有事都是江青通知他，平

25 范用（1923—2010），出生於江蘇鎮江。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去武漢投奔舅公，不久舅公去世，他被讀書生活出版社的經理收留，成為練習生，開始參與出版工作。1939年，他年僅16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1年皖南事變，他輾轉武漢、桂林、重慶等地。1946年被調往上海，黨組織派他調查國民黨的書店、印刷廠、出版社的情況，陳毅率領的第三野戰軍解放上海時，就按調查的材料去接收。曾先後擔任讀書出版社桂林、重慶分社經理，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輯兼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1949年8月，范用被調至北平的中宣部出版委員會。建國後，歷任中宣部出版委員會科長，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出版局副主任，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副社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等職，是《讀書》、《新華文摘》等著名雜誌的創辦人。范用〈給毛澤東買書〉刊登在《文匯讀書週報》2003年第8期。

時他自己除了寫書甚麼都不管。毛主席這裏不斷有上海寄來的新刊物，毛主席翻翻匆匆了事，也沒地方放。江青派紀委員把我帶到她那兒去，給我一大堆報刊，告訴我把毛主席劃了的東西注意一下。毛主席住的地方外面有石頭桌子，我就坐在外面看。那是絕對的禁區，周圍、山上都有人巡邏的。我去了，見着他不敢打擾他。但對於他，似乎打擾都是正常的。就這樣我去了大概四、五次，有兩、三次看見他。

---

作為國際友人，李敦白雖然比曾彥修還年輕兩歲，但是在延安受到十分的重視。他跨過黃河到達陝西之後，由習仲勛把他接到陝北，在一個大地主家休息一晚之後，在一個星期六下午到達延安，先見到了陸定一和陳伯達，然後由馮文彬帶他到中央大禮堂。

---

李敦白：我記得他帶我進去的時候，我一眼就看到了毛澤東。他正在和一個比他矮小很多的女孩子跳舞。看見我，他停了下來，馮文彬就介紹我。他和我握手，說歡迎美國同志加入我們的工作。我的感覺就是在牆上看到過很多次的畫像站在了地上，仿佛我在和歷史對話。他帶我到禮堂牆邊的一排椅子那裏，坐下，然後對我說希望我能夠用一兩天時間給他講講美國的情況。他和我交談的時候非常專注，仿佛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接着朱德進來了，我看見他對朱德也十分尊重。

---



不久後，李敦白由李先念和王震作為介紹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我問他入黨的理由，他說，「如果我留在根據地，那麼我和外界的消息來源就切斷了；如果我不入黨，那麼我從內部也得不到消息，所以我必須入黨。」經過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批准，他成為馬海德之後，第二個美國籍的黨員，當時叫做秘密入黨，外人並不知道。1947年元旦，李敦白和廖承志、于廣勝等幾個人坐着一輛日軍的卡車，到毛澤東住的地方去向他問候新年，他記得守衛毛澤東窯洞的李克農還和他們開玩笑。到了晚上，大家還一起看了話劇《保衛延安》和秦腔《棒打薄情郎》。

第九章  
命斷塵埃不落



1947年3月，蔣介石命令時任陸軍上將、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胡宗南<sup>1</sup>，以數十萬兵力進攻延安。中共中央機關開始全面撤離延安，李敦白也隨着部隊和所在部門撤出。他記得在撤離的路上，但凡走到一個可以停留休息的村莊，大家都會抽時間學習，他本人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開始了解整風的。

李敦白：我是這樣理解整風的。首先這兩個字可以溯源到《詩經》，那裏面這兩個字的意思和我們今天理解的不完全一樣。我們的思想，總是有正面、負面，而整風目標就是讓正面思想佔上風。我所經歷的整風過程，是10個、15個人一個小組，大家在一起工作、學習，完全是出於自願，輪流寫報告，寫自己參加革命的動機、目標是否實現，寫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個人的優點和缺點，目的是徹底地改變自我，因此別人不能替你做，你只能自己經歷這個過程，必須完全誠實。我在新華社工作，親眼看到幾個有點貴族氣的人變成了最溫和、謙讓的人。而我當時老是因為敵機轟炸而驚慌，看到其他人竟然可以泰然處之、繼續工作，讓我也慢慢跟着克服了恐懼心理。這個時期的整風，用毛的話說是「和風細雨」。但是我確看到了1943年

1 胡宗南（1896-1962），原名琴齋，浙江安吉人。1922-24年間，任《孝豐日報》總編輯，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1933年復興社成立，成為「十三太保」之一。1937年，參加淞滬戰役，抵抗日軍侵略，奉行蔣介石的「限共」、「反共」政策。1945年，升戰區司令長官，領陸軍上將銜，並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1947年，因內戰失利，敗退往四川，據守成都，不久退駐西昌，後又兵敗去海南島。1950年西昌解放，去台灣。此後，相繼任「江浙反共救國軍」總指揮兼「浙江省政府主席」、「總統府」戰略顧問和澎湖防守軍司令官等職。

整風期間，有幾個人被說成是特務之後，幾乎發瘋，後來也一直未能恢復。

我特地詢問了李敦白，知不知道誰是王實味，因為在他到延安之前，可以說丁玲、蕭軍、王實味是延安最有名的三個文人，家喻戶曉；在他到達延安時，王實味也還在關押中。但是他說，王實味的事情他是後來才聽說的，可見整風過後，很少有人願意再提起他。

1947年3月，王實味也隨社會部幹部組成的大隊撤離延安，前往山西省西北部的興縣。在路上，他遇到曾經審查過他的凌雲。據凌雲回憶：

當時我正在鄰縣南莊村進行土改工作，南莊村在臨縣到興縣的大路邊上。有一天，我正在大路上由東向西走，忽然看見迎面而來的王實味，一身灰布棉衣褲，拄着一根木棍，蹣跚而行，沒有看守人員，也沒有相伴同行的人。他見到我，表示意外，也很高興，拉着我在旁邊的石頭上坐了下來。他說他是同社會部的幹部一起從延安撤退過黃河來的，因為走得慢，一時離開了大隊。他抱怨一路上老挨批評，表示有委屈，但心情看來還是好的。我勸了他幾句，告訴他要服從管理，爭取有好的表現，就促他上路了。<sup>2</sup>

2 凌雲〈王實味的最後五十個月〉，79頁。

據凌雲後來了解，王實味到達興縣後，於4月16日被送押至晉綏公安總局第四科。

對王實味從延安到晉綏路上的表現，幹部帶隊的負責人認為他「常說刺激人的怪話」，「故意找麻煩」，在行軍檢討會上不接受批評，打擊別人，以致「拍案大怒，拂袖而去」，而他自已又不「認罪」，說他是「為黨犧牲的好同志」。晉綏公安總局的有關方面認為他是中社部交下來的重要案犯，對他這一路的表現就看得重了，說成是「在行軍途中盡想挑撥離間等破壞活動」，因此「對其看押特為嚴密（專管，嚴鎖，不准見人，不准出門）」，看來比在延安的逮捕初期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個期間王實味曾經多次要求給他一定的工作來做，要求改善居住環境，為此他也寫了一些表示悔過自新的書信和材料，過後又叫冤屈。<sup>3</sup>

凌雲這段回憶，對王實味顯然帶着同情，其中寫到的王實味的表現，也與在延安的情形一脈相承，王實味不穩定的精神狀態可見一斑。如果薄平引述的石彬的回憶準確的話，那麼原本就有肺病的王實味，在不見天日的地窖裏面被關了近四年時間之後，身體情況只能更差，根本無法和其他人一樣行軍。

那麼王實味究竟說了甚麼「刺激人的怪話」呢？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於1948年5月17日夜整理了一份題為《反革命托派犯王實味的捕後表現與處理經過》，這份文件中提到，「4

3 同上，79-80頁。

月16日晚上收押登記時該犯即說：『我是犯了錯誤的，我犯了共產黨員修養上的二、五兩條（即不能擁護真理和容忍委屈成全）——故改名張二五』」。當公安局的人員告訴他，這裏是看守所時，他說：「我過去在棗園工作及修養時，因有些人說些刺激我的話，因此使我神經不健康，身體也不好，希望這裏在環境上不要刺激我，在生活上能夠體貼我，特殊的照護我，要求吃白麵雞蛋。」他還說，「『我在延安中組部給我送保健費時還是稱我同志，只是在行軍中發脾氣受處分。』」並諷刺的說：『來這裏也好很安靜的，可好好的修養一下』」。文件中還提到，「後王犯曾三次給甘露、譚政文、張稼夫三同志寫信承認其問題，說明沒有神經病，要求到分（局）宣傳部或報社作翻譯工作。」<sup>4</sup> 這段話與凌雲的敘述大同小異，可能凌雲看到的也是同一份文件。王實味幾次提到希望能有工作，可見他在關押期間十分痛苦，沒有人想到工作權的剝奪對他是一種怎樣的處罰！

1947年7月1日晚上，王實味被秘密處決。圍繞着王實味的處決令究竟是賀龍、康生、抑或李克農下達的，多年來一直流行着不同的說法。在2013年的第6期《炎黃春秋》雜誌上，原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副部長李維民發表了一篇〈檔案中的王實味死因〉，其中提供了三份有關處死王實味的原始檔案材料，指出了處決命令的下達者為當時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及副部長李克農兩人。第一份材料是晉綏公安總局局長陳養山寫給康生和李克農的毛筆信。初稿寫於1947年6月13日，

4 李維民〈檔案中的王實味死因〉，見《炎黃春秋》（2013年6月），9-10頁。

「我處審訊科昨日被蔣機轟炸，快要搬家，對王實味究如何處理，望速來信示知！」李維民推測這封事前請示可能沒有發出，所以第三段內容改為事後報告，日期是1947年7月2日：

康、李部長：

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王實味由延安至晉綏行軍途中進行挑別離間等破壞活動，4月16日，送來我處關押後，不僅毫無悔意，且更變本加厲，污蔑謾罵我黨，剛來即說他不是托派，是好共產黨員，冤枉了好幾年，快拖垮了，又說他向記者說話承認他是托派奸細是自我犧牲，是被迫的，使他神經受了刺激，身體也垮了，因此提出要特別優待他，每天要吃雞子白麵。

後又說他本來沒問題，只是在行軍中發了一下脾氣，便將他扣起來，說共產黨不講民主，不保障人權，言行不一致。

我處審訊科昨日被蔣機轟炸，急於搬家，根據王實味的罪惡及表現，實屬無法改造，故請示處決批准後，我們於昨夜在興縣將王犯密秘處死，特此報告！

致

布禮

陳養山

47年7月2日<sup>5</sup>

第二份文件則是多處塗改了的看守所的手寫文件〈對托匪王實味的看押審訊與處理經過〉：

5 同上，8-9頁。

1947年4月16日中社部將王實味送交我處關押，時附有甄別結論與王犯在行軍中的表現材料兩份，說明王犯是一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在行軍中仍進行挑撥離間等破壞活動，因此，我們對其看押特為嚴密（指定可靠的看守班長專管，嚴鎖，不准見人，不准出門）。

根據中社部附來之兩份材料及王犯在獄內表現，林左夫同志曾與其談話兩次，嚴責批[評]勸導後，彼供出其參加托派與反革命破壞活動等問題，於5月23日自寫罪[責?]材料十[三?]頁，但毫無悔意，說在延安對我亦沒辦法，看你們能把我怎樣。

6月經中社部康、李部長批准處死後，於7月1日夜在興縣將該犯秘密處死。關於王犯關押我處及處死經過，除少數可靠的參與此事的同志知道外，此外任何人都不知悉。

晉綏公安總局看守所

47年7月2日<sup>6</sup>

李維民先生引用的第三份材料《反革命托派犯王實味的捕後表現與處理經過》中，大部分內容與以上重覆，不再贅述。如之前引用，王實味說「我犯了共產黨員修養上的二、五條（即不能擁護真理和容忍委屈求全）」、「我決不是托派」、以及「來這裏也好，很安靜的，可好好修養一下」等語，儘管寫組織材料的人說他不無諷刺，我卻可以感到王實味在臨終時也沒有就範，仍舊痛苦地維持着人的尊嚴。

6 同上，9頁。引文中括號部分照李維民引文抄錄。



高向明：我聽押送他的人講，王實味這人很彆扭，路上人家管他，他不聽話；讓他走，他走不動，讓他騎毛驢，他不騎驢。原先我們並不知道王實味被處決了，後來有次見到一個參加押送他的熟人，在安全部工作，也是我們馬列學院的同學，叫作朱鳳熙，我問他，「王實味現在怎麼樣？」他說：「嗨，王實味他早變成鬼了！」我心裏頭很難過，當時說他是托派，但我們也不瞭解，光覺得這個人很有學問、外文非常好，調到馬列學院翻譯馬列主義著作，還是張聞天親自點名的。我覺得很可惜，但那時王實味戴了幾頂反革命帽子，誰敢講啊？

薄平：王實味是1947年的7月1號被砍殺的。1948年鄭州就解放了。他堅信唯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馬上就要成立新中國了，可他卻被砍殺了。王實味一生都是泡在苦水中的，求學沒錢，就業、失業、生病；還有那個脾氣，即便找到工作，也能把飯碗砸了。他在延安十年，做了四年最有意義的工作，翻譯了一百多萬字的馬列著作，可以說是最閃光的歲月。但是接下來就是被批判、最後坐了四年多牢。我們分別的時候他30多歲，我現在90多歲，寫他就像寫我的弟弟。我對他的懷念，心裏的那種可惜，就是感覺到疼。

由於王實味是被秘密處死的，不要說延安以外的人不知情，就是延安出來的人也不知道。

曾彥修：這事我們絕對不知道，當時我們就跟着康生在晉西北搞土改，晉區的公安組長、社會部的副部長是李克農。現在書面材料說，是李克農請示康生，康生就批准槍斃了。到現在為止，我不太相信。康生不傻，王實味是隨便哪個人、包括他自己下個命令就能殺的嗎？殺掉了問你康生要人你還拿得出來嗎？康生聰明得很呢！他付這個責任幹甚麼？這個事情存疑，卻不想追查下去，推在康生身上，反正他已經被打倒了。王實味也沒甚麼政治地位，他主要是個作家、翻譯家，他到延安前，翻譯的書商務印書館都出過，都知道他外語好、文學好、文字也確實漂亮，他的名氣全部人都知道。他的〈野百合花〉，我的天哪，光那個開頭，現在看也還是要流眼淚的。

林賢治：應該是有命令的，沒有命令不敢殺他的，後來他們互相推諉罷了。李克農最後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到底怎麼回事還是個問題。我個人認為，老毛不一定想殺死他，還是貓玩老鼠的態度。毛直接殺人的情況很少，斯大林比他厲害。比起斯大林，我覺得毛還有一點念舊，對故交、老朋友、老同學，還有所顧念。一個人如果還能念舊，我覺得他身上還有點好的東西。

目前很多關於王實味的回憶，都提到1948年毛澤東才了解到王實味已經被殺，並且發了很大的脾氣。李克農，在8月「作為中央社會部部長，向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寫了了書面報告」<sup>7</sup>。

7 凌雲〈王實味的最後五十個月〉，80頁。

戴晴：王實味被殺，毛澤東說：李克農，你還我一個王實味！李克農一句話都不說。但誰都知道，從1941年一直到王實味被殺，這是做惡做到沒有辦法說出口的案子。李克農覺得，反正老毛他愛玩這個，玩一陣下邊就過去了，就撫捋撫捋腦袋，說給你平反；咱們還是黨員，咱們還一塊玩。毛是這樣的，可沒想到最後王實味是這麼個結果。幾次來人訪問延安，王實味不是像行屍走肉一樣出來，背他的那些宣傳詞嗎？毛澤東的目標大致也達到了，所以在毛的心裏，這樣的人在肉體上可以不必把他滅掉的。

朱正：在中共文字獄中間，最知名、有姓名可考的第一個受害者，就是王實味。在他以前因為文字受害的人大概也有，那時還說不出來，但他是第一個典型。這種事情，我覺得魯迅有篇叫做〈隔膜〉的文章寫很深刻。魯迅講清朝的文字獄時說，有些人自以為是在盡忠，實際上是犯了罪。他舉了一個很形象的例子：一個人說，主子！您這袍子有一點破了，還是補一補為好。他自以為是提了很好的建議，實際上犯罪了，因為這話是不能隨便說的。

宋金壽：王實味這個悲劇不是他個人的悲劇，最後形成了全黨一個大悲劇。這個問題是關鍵。所以最後平反，就是給他平反托派。當時為甚麼沒有黨中央組織部的來做這個事情呢，最後由公安部來做這個事情，因為最後結論是誤殺。更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你把人打成托派，你不能殺他嘛！共產黨在跟國民黨談判，國民黨老說你們把王實味這些人都殺了，毛澤東指示中央同國民黨談判的代表，要強

調王實味我們並沒有殺。所以知道王實味被殺的時候，毛澤東非常生氣。最後平反也是由公安部作為錯殺這個事情來平反的。

---

1940年劉瑩曾經帶着子女，試圖從重慶到延安去找王實味團聚，輾轉湖南常德、湖北宜昌等地，終因戰亂導致水路不通，路費耗盡而沒有能夠到達重慶，更沒有能從重慶到達延安。她留在湖南辰溪的一間女中教書，和同學們的感情都很好。

---

王旭楓：1947年已經放暑假了，可是有兩個女學生要留在宿舍這邊玩。我母親除了教課以外，學校還讓她管理學生。我們住的地方很靠近女生食宿區，是一個木製建築。那天比較晚了，我已經入睡了。母親一般睡得都比較晚，突然樓上淒慘的聲音就喊叫起來，「劉老師啊！劉老師啊！救我們啊！」。我母親知道出事了，一辦門啊，門被從外面插了，那壞人早有準備。我姑姥姥就說，你要注意啊，你身體單薄，鬥不過壞人啊。我母親根本不聽她，情急生智，就從我們兩間房子中間到旁邊那個屋，然後從邊門出去了。我母親衝到樓上，她的學生在那發抖，都說不出話了。我媽媽說怎麼回事？學生指着那個二層樓的窗戶，他們已經從窗戶跳下去了。那兩個壞人臉上都蒙了黑布，老師們都分析，兩個學生中間有一個比較漂亮，可能有人打壞主意的。後來我母親囑咐她們，為了保護名譽，你們就說是小偷。那兩個學生走的時候，對我母親的感情就不用說了。她對任何學生，不管出身，感情都是很真摯的，無

論學業、品德，能拉上一把的，她都義不容辭。所以那時候有很多學生，沒事的時候就圍上來找我母親談心。

---

1948年開始，劉瑩在長沙市郊的三峰中學教書，次年又參加了地下黨，擔任聯絡員。8月長沙解放時，全家人都很高興，以為不久就可以和王實味見面了。她曾給中央組織部寫信，詢問王實味的下落，得到的回答是：「王實味在敵人進犯延安時，要求到敵後工作，得到組織批准，從此失去連繫。」<sup>8</sup>

---

王旭楓：1948、49年，就是長沙解放前，我姐上高中、我初中，也有些頭腦了。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問起父親的事，我母親可以非常流暢的回答，說他去打日本人，那表情也很自豪。可是後來她不能這樣說了，她就採取回避的態度，或者說「這個問題會搞清楚的」，「你們就先別細問了」。

---

劉瑩後來又聽說王實味去了東北，為了有一線希望可以找到他，就趁1950年4月吉林省教育廳來湖南招聘教師的機會，去了東北，分配到吉林市女中教書。1951年在她參加思想改造運動的過程中，才知道王實味在延安整風時犯了錯誤，但是詳細的情況卻不能夠了解。

---

8 劉瑩〈沉痛的訴說，無限的思念〉，160頁。



上：40年代劉瑩偕同子女與學生們合影；下：50年代的劉瑩及子女。

1952年，已經流亡在澳門的王凡西，還以「潤土」的筆名在香港的《星島晚報》上發表了〈記野百合花作者王實味〉，這樣寫到王實味的經歷：

他加入中共很早，約在1927年春天，他之入黨，與其說是由於思想，毋寧說是由於感情。對於他，任何種類的壓迫都是難於容忍的。舉凡政治、經濟、思想等領域內既成的與陳舊的東西，他幾乎都反對。說得抽象些，大概他的血液裏天賦有反叛的氣質，正是這個氣質，使他走進了一個站在最左邊的革命黨。不是馬克思主義使他成為共產黨員的。關於馬克思主義，他不但讀過，而且還譯過一些書，可是始終不能算已精通，這是說，馬克思主義始終不曾進入他的靈魂深處。不管他讀過多少本歷史唯物論的著作，他卻牢牢地保持着一個見解，那就是「人性改革論」。根據歷史唯物論，社會制度改變，人性才會跟着逐漸地改變；根據王實味的見解，若不同時（或者首先）改革人性，則社會制度也終於改不好的。至於如何改變，則他就想到教育、藝術，甚至道德說教方面。

為了這個「人性」，王實味和朋友不知面紅耳赤地吵過多少嘴。吵多了，後來朋友們多半當他說瘋話，或者和和他的調，隨他去。可是在紀律嚴明、思想劃一的政黨裏，這可闖下大禍了。這回在〈野百合花〉案中，「人性論」構成了王實味的諸大罪狀之一。<sup>9</sup>

9 轉引自王凡西〈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88頁。

王凡西寫這篇文章時，正值延安文藝座談會，也是〈野百合花〉發表十周年，不過他當時仍舊未知這位老同學的最終命運。

王旭楓：1953年的時候組織上，別人不發，就給我母親發了一本《思想指南》，解放初期很流行、很多幹部都讀過的一本書。那裏邊通篇都是延安批判我父親的文章，我父親就這麼在東北也出名了。後來我自己也跑到書店裏邊找到這本書，我和姐姐就問母親，我爸怎麼回事？是不是托派？是不是國民黨特務？母親再也回避不了了，說你們要相信，「媽不是一個沒有眼光的人，憑我對你父親這麼多年的瞭解，他絕不是這樣一個人。但是這事現在說不清，但你們還要相信這個問題早晚能弄清。」另外，她說了她一些想法，「可能有人要陷害你父親」，她也知道是誰；同時你父親一定也有錯誤，但是這三個罪名絕對不能接受，作為子女你們要心中有數。她還找出報紙，指着挨個登出的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的照片說，「現在黨的領導人非常團結，大的問題他們一定看的是對的，小的問題他們不一定每個都能處理得好。」就這樣說服我們。她強調「決不能因為這件事情對黨有任何怨氣，你們一定要要求進步。」

然而1954年春，劉瑩就被下放到蛟河縣城的蛟河一中工作，兩年後又再次下放，到新站鎮的蛟河二中，她只能盡量不去想下放的原因，只是積極投入工作以忘卻心中的煩惱。但是女兒王勁楓心中不平，背着母親再次寫信給中組部，這次得到



的是另一種說法，「王實味到台灣去了」<sup>10</sup>。對於這簡單而含糊其辭的說法，母女只能自圓其說，猜想王實味可能到台灣做地下工作去了，而且劉瑩覺得應該相信組織，仍舊希望有朝一日，全家能夠團聚。劉瑩就這樣一直工作到1962年退休，王勁楓、王旭楓姐弟雖然一直受到另類眼光，連王勁楓的女兒也是「在幼兒園裏都要遭受小朋友和阿姨的謾罵與冷言冷語」<sup>11</sup>，但是全家人還算是基本上安然地度過了後來的政治運動以及文革動亂的十年。

在延安唯一公開站出來為王實味說過話的蕭軍，抗戰後回到東北，經過長途跋涉，終於在1946年秋天回到光復後的哈爾濱。當年他的文學生涯在這裏起步，因為戰亂離開故鄉12年之後，幾多感慨都在詩中：「金風急故壘，遊子賦還鄉；景物依稀是，親朋半死亡；白雲紅葉暮，秋水遠山蒼；十二年如昨，杯酒熱衷腸。」根據張毓茂的記述，

他在東北局彭真等黨的領導同志的關懷和鼓勵下，一頭撲入工作，在哈爾濱各學校、機關和團體做過五十多天的巡迴講演。有時一天講三場，每場人數多達一兩千。宣傳馬列主義和黨的政策，解答群眾提出的各式各樣的問題，對提高群眾覺悟，肅清日本帝國主義奴化教育的反動影響，發揮了很好的作用。為了同樣目的，東北局資助蕭軍辦起了「魯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報》」。<sup>12</sup>

10 同上，161頁。

11 王勁楓〈我的爸爸王實味〉，169頁。

12 張毓茂〈蕭軍與「文化報事件」〉，見《新文學史料》（2007年第3期），48-49頁。

除了衣錦還鄉的感受，同時因為剛剛光復的東北儼然一片文化沙漠，有這樣一位知名的作家來到，大家是十分歡迎的。《八月的鄉村》在東北書店再版，以前的老朋友們也陸陸續續來到東北。但是漸漸地，他發現和舒群、羅烽、白朗等諸多老友在延安受到損害的關係，即使大家都回到了東北也仍無可修補；因為別人都基本改造好了，只有他，用王實味的詞來說，仍舊「人性」太充沛、太希望別人顧及他作為「人」的思想和情感。他像在延安一樣，不斷督促自己寫作，但是仍舊不能寫作較長的作品，每天還是盡量堅持寫日記。在1947年元旦時，他在日記中寫道：「過去一年中，在創作上沒有甚麼成就，大部分時間是寫政治性的雜文，開會、講話。這是我做社會活動最多的一年。」<sup>13</sup> 他的「社會工作」中，有一部分是希望推廣魯迅研究、成立魯迅出版社，但這些努力並不是黨工作的方向，因此最終不可能有甚麼成果。1947年7月1日，王實味被殺的當天，正好是他因為感情和其他方面的錯誤，被從哈爾濱發配，到達齊齊哈爾的那天。而這次下放，只是他其後30年苦難歷程的開始。

在東北接收的過程中，蘇聯紅軍在東北發生了多次搶劫財物、奸淫婦女的事件。從紅色延安來的蕭軍最初聽到這樣的事情，並不以為意，實際上是主觀上不願相信而已。他以一貫積極的心態工作，把《文化報》作為「教育落後和組織前進」的手段，他說「《文化報》編輯的方針就是選擇了改良性的方法和步驟：首先是選定了對象，而後就這對象思想和感情的狀

13 蕭軍《東北日記》，155頁。

態所喜愛的形式……投而好之，接而引之，使他們不覺不由地說出自己底真心話，無拘束、無恐懼底表露出自己底感情，無勉強、無造作、愉快、高興地蛻盡了自己底腐皮爛肉，健康底一步步走向革命的大花園裏來」<sup>14</sup>。《文化報》開始的時候只發行一兩千份，但三個月後就有了七八千個訂戶，其影響已經直逼當時東北的兩大報紙《東北日報》和《哈爾濱公報》<sup>15</sup>。1947年夏天，由宣傳部秘書長劉芝明領導、30年代國防戲劇家宋之的主編的《生活報》創刊，創刊號上就登出一則題為〈今古王通〉。蕭軍本人和他的友人們，都知道這篇文章借古諷今，矛頭直指蕭軍。

到了1948年8月15日，整個東北的所有報紙，都被要求必須向蘇聯紅軍「致敬，感謝他們解放我國東北的恩德和豐功偉績」。蕭軍因為幾天前已經聯合幾個作家寫了致敬文章，那一天的「社論」題目是〈三周年「八一五」和第六次勞動「全代大會」〉，沒想到這篇文章惹下「塌天大禍」，其中一句「各色帝國主義」被攻擊指代「赤色帝國主義」，也就是蘇聯。不久後，就演繹出一場「文化報事件」。

1948年8月26日，《生活報》抓住《文化報》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而發表的社評中的一句話大做文章，刊出〈斥《文化報》的謬論〉的社論，指責蕭軍和國民黨反動派一樣，誣滅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接着連篇累牘地發表圍攻蕭軍和《文

14 蕭軍〈古潭裏的聲音之三——關於《文化報》〉，原載《文化報》，轉引自《人與人問——蕭軍傳》（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年），489頁。

15 蕭軍《蕭軍：人與人問》，470-1頁。



上：1949年時，時年42歲的蕭軍；下：蕭軍（後排左三）初闖文壇時的兄弟舒群（後排左一）和羅烽（後排左二）和他已經基本不再來往。

化報》的文章，對蕭軍的思想、言行、創作，進行了多方面的毀滅性的所謂「批判」。蕭軍被判定為攻擊蘇聯，挑撥中蘇友誼，誹謗人民政府，誣蔑土地改革，反對人民解放戰爭。儘管蕭軍及替蕭軍鳴不平的同志寫了一系列文章答辯，但終究無濟於事。因為對方憑藉強大的政治力量、組織手段和經濟措施，以絕對優勢，壓垮了蕭軍及其《文化報》。隨即，有關方面公佈了關於蕭軍問題的「結論」和「決定」。從此蕭軍便被釘在反蘇、反共、反人民的恥辱柱上，各種文章和文學史教材，凡提到蕭軍時都口誅筆伐。<sup>16</sup>

按照蕭軍自己的表述，在「《生活報》開始運用、施展了政治上、組織上、群眾中間所具有的影響和實力，從各方面向《文化報》進軍」之後不久，「《文化報》的訂戶開始紛紛退訂了。各機關、學校禁止《文化報》入內了。凡屬代收《文化報》的地方、報販，也拒絕代售了。」他也只好「封社、停報，把出版社的資產等一起全數交公。」1948年冬，他第三次離開哈爾濱<sup>17</sup>。今天回望，蕭軍儼然就是王實味之後，第一位被有組織、大規模地整肅的作家<sup>18</sup>。在此之後，他在文壇上已經不可能有所作為了。

在文藝座談會之後，方針上提出了文藝為政治服務，很多作家感到被束縛了手腳，創作不出能夠適應新時代、新要求的作品了。周揚在延安從秧歌開始到《白毛女》，到再後來，

16 張毓茂〈蕭軍與「文化報事件」〉，49頁。

17 蕭軍《蕭軍：人與人間》，476-7頁。

18 蕭大忠〈蕭軍《東北日記》暨日記補遺出版後記〉，見蕭軍《東北日記》，847頁。

都一直希望能夠找出反映工農兵生活的作品。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當時文壇上大部分作家都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離開延安之後，只有兩位作家拿出了長篇小說力作：一位是周立波，另一位是丁玲；他們寫的都是東北解放區的新生活。1948年6月，丁玲新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完稿，她把滕抄複寫稿親自交給當時已遷駐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村的胡喬木，請他審讀。7月，胡喬木、蕭三、艾思奇等人在傳閱小說稿後，一致認為「這是一本最早的最好的表現了中國農村階級鬥爭的書」。胡喬木立即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認為寫得好就可以發表。「胡喬木隨即打電報給已在大連準備赴蘇聯、匈牙利訪問的丁玲，傳達修改意見。丁玲隨即奉命對原稿作了修改。9月，《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在「黨中央的直接關心下」趕印出來。丁玲終於帶上這部小說於1948年11月9日離開哈爾濱出國。」<sup>19</sup>第二年，丁玲首次見到家在瀋陽的張鳳珠，幾年後她成為丁玲的秘書。

---

張鳳珠：我從小就崇拜她，最初讀到她的《母親》就很喜歡。我對她、盧隱、冰心這三位特別崇拜。1948年我到解放區，聽說丁玲在哈爾濱。1949年丁玲路過瀋陽，去參加世界婦女代表大會，在瀋陽給文藝界做了報告，是東北文藝家協會辦的。我那時在文協工作，在台上做記錄，那天我就覺得將來我一定要認識丁玲。她作報告是在台上，她面對觀眾，我在後邊不是看的很清楚。後來她到北京創辦

19 龔明德〈《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版本變遷〉，見《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1期），121-122頁。

文學研究所，我想去文研所學習。東北文協的舒群是丁玲的老朋友，他寫了一封信給我，讓我到大連找她，丁玲那時在大連養病。我到療養院，裏面都是解放區的老幹部，她穿一個長睡袍，我一看見就覺得這人很有氣派。她看了舒群的信問，「你為甚麼願意上文研所學習呀？文研所創辦的對象，都是在戰爭當中寫過一些東西的作家。」我說就因為你是所長，我就願意到你這來學習。她就笑了，說：「好吧，那你就去吧，我給田間<sup>20</sup>打個電話。」

丁玲寫《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時候，周立波也在寫他的關於土改的小說。

王培元：講話之後，周立波覺得不能關在象牙之塔裏，魯藝也是延安的象牙塔。他先是跟着王震南下到華北，然後從華北就到東北去，在哈爾濱附近的一個縣參加土改，並以此經歷寫成了《暴風驟雨》。這跟過去不一樣了，他開始寫土改這樣重大的政治題材，而且是以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為思想導向來寫農民。那個報告中寫道，在不遠的將來，農民、農村要有一場「暴風驟雨」，周立波的小說就用了這幾個字作書名。

20 田間（1916—85），原名童天鑒，安徽省無為縣開城鎮羊山人。著名詩人。1934年加入左翼作家聯盟。次年任《每週詩歌》主編，創作並出版處女作《未明集》，1936年出版以東北人民抗日為背景的《中國牧歌》和以長征為背景的《中國·農村的故事》，被國民黨列為禁書追捕。1937年春留日，七七事變後回國抗日。年底到西北佔地服務團當戰地記者。1938年進入延安，8月加入共產黨。1949年參加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任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創作部部長、文學研究室主任等。1950年任全國文聯研究會主任。

這部小說完成於1948年底。故事設定在1946年到1947年的名為元茂屯的東北小村莊。人物設置中，有代表共產黨的郭全海，代表農民的趙玉林，和代表地主的韓老六等。小說描寫了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東北地區的土地革命運動，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和地主，在土地歸屬權上展開的爭奪，及由此而生的武裝衝突。

---

王培元：寫完《暴風驟雨》，周立波就在作協任職，1955年又回到湖南老家體驗生活，寫了《山鄉巨變》。我小時候看過連環畫冊《山鄉巨變》，畫得很好，畫家叫賀有直。《山鄉巨變》寫的不錯，把他們故鄉的風俗、人情、方言都融入到故事裏。周立波應該說是很有才華的作家，但是要按照無產階級政治的要求來進行創作，實際上損害了作品的藝術性，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這就是我們走過來的歷史。

---

《山鄉巨變》由正、續篇組成，創作於1955至1959年期間，在1958至1960年發表。小說完整地描述了湖南省清溪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從初級社到高級社的發展過程，藝術化地記錄了合作化運動前後，農民走上集體化道路時的心理轉變和新農村的社會面貌。這部作品可以說是《暴風驟雨》的姊妹篇，說明農業合作化是中國農村的第二次暴風驟雨。

1949年初，我們書中的另一位人物李敦白，突然被叫道廖承志的辦公室，廖承志向他宣佈，組織需要他去完成一個特



殊任務，半小時後就有人來接他去北平。他開始還以為是要他幫助接收北京的工作，十分欣喜，但是在廖承志那裏卻聽到消息，他的導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莫斯科被作為美國國家間諜逮捕。當時他還沒有想到這件事和他的關係，只是跟隨來接他的社會部的師哲上路。1月21日，還沒到北平，他就被投入牢獄，而且在一個沒有陽光的小房間裏單身監禁。他離開的時候沒來得及和新婚的中國妻子魏林告別，幾年後她因為不知他的下落，而向組織提出和他離婚。他則在監獄裏度過了人生最為痛苦的六年。審問中他不知道如何交代，於是夜晚不斷地做噩夢，夢中見到他的好友、延安入黨的另一個美國黨員馬海德，被幾個人用刀切割，向他求救。而以往與他相熟的毛澤東、朱德等人也都以猙獰的面目出現。他左思右想，不知道自己甚麼地方犯了錯誤，於是開始用整風中學到的方法，來挖掘自己的言語、行為、思想深處的種種弱點。一年後，他牢房窗戶上釘的木板被拿掉，他見到了光明，有人給他一摞報紙，他這才知道已經是1950年了。接下來的幾年，他仍舊在獄中，1953年初，他在報上看到斯大林去世的消息，當時他還不知道，是斯大林致電毛澤東說他也是美國間諜。

1955年4月4日，曾經審訊過王實味的凌雲，來到了李敦白所在的監獄，告訴他，「經過長時間調查，我們發現你其實是一個好人。你受到了錯誤的指控、並被關了監獄。你受了很大的委屈。我代表中央政府和公安部，向你道歉！」而李敦白的反應竟然是不希望他們道歉。當他問到自己的妻子時，凌雲告訴他魏林等了他三年，但是現在和一個在外交部工作的同志結婚了。雖然他在獄中十分思念她，但對這個消息，竟然也沒

有感到撕心裂肺。他對凌雲說，自己已經不是六年前的李敦白了。<sup>21</sup>

李敦白被釋放之後，原本可以選擇回美國，但是他已經改造好了思想，十分希望能為新中國服務。他到了新華社廣播局工作，具體工作是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擔任外國專家，審讀英文稿件，享受專家待遇。在延安時就認識的溫濟澤，是李敦白所在部門的二把手，也就是中央國際廣播事務局的副局長和黨委書記，老幹部梅益<sup>22</sup>是一把手。李敦白開始工作之後，幾乎馬上就遇上了全國規模的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

---

李敦白：中國很大，很多事情也是匪夷所思。反胡風運動中，報紙上整版整版地發表批判胡風的文章，引用他的日記、他寫給朋友的信作為反革命證據，我們都知道那些編者按是毛澤東寫的。我們英語部有一個女同志，在會議上說，「我讀了胡風所有的日記和信。我就是沒有看到一點反革命的東西。我不明白為甚麼會批判他。」當時我們都覺得她這樣說很幼稚，但是她並沒有因此受到任何影響。

---

21 Sidney Rittenberg and Amanda Bennett,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171頁。

22 梅益（1913–2003），原名陳少卿，廣東潮州人，作家、翻譯家、學者。自幼家貧，曾就讀汕頭金山中學、上海中國公學、北平中國大學，1934年開始寫稿為生。1935年經陳伯達介紹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期間編輯《譯報》（後改稱《每日譯報》）。1945–46年任中共上海文委書記，1946年任中國共產黨駐南京代表團發言人。1947–49年在延安、太行新華通訊社總社任編委、副總編輯。1949年共和國建國後，曾任中央廣播事業局副局長、局長、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秘書長、副院長、第一書記；《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等職。是第一位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從英文譯本轉譯為漢語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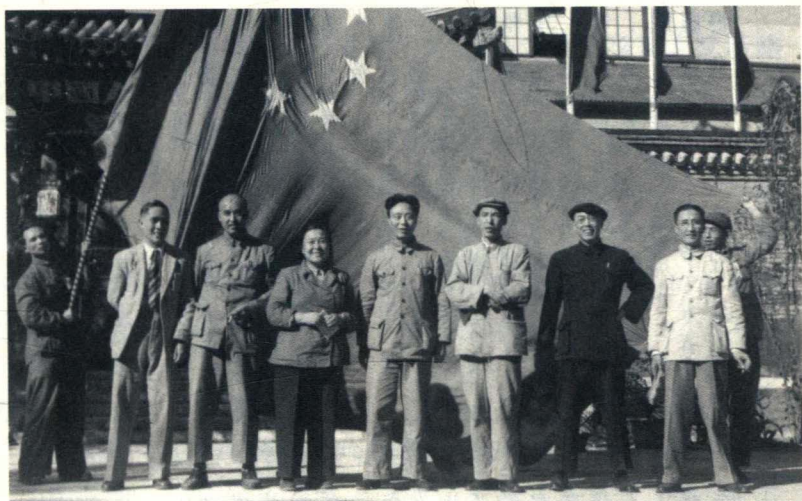
胡風曾經是王實味 1925 年北大文預科班的同班同學，是蕭軍的好友、也是丁玲的好友：蕭軍在延安的那些年一直有和胡風通信；而丁玲曾在邊區受到國民黨威脅時，把毛澤東給她寫的詩詞的手稿交給胡風保存多年。1948 年蕭軍受到批判，但是在 1949 年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上，丁玲還和胡風、周揚等人在第一面新中國的國旗下合影。

---

張鳳珠：從 1954 年的春天一直到 1955 年的春天，我給丁玲做秘書的時候，她是作協的黨組書記、中宣部的文藝處長，她想辭去這兩個職務，專心寫作。她給胡喬木寫信，就說：「女同志到 50 歲，是一個比較痛苦的年齡。」我當時年輕，還不瞭解 50 歲為甚麼就痛苦呢？後來就批准了她當專業作家。這以後有段時間，我就沒甚麼工作，給收收文件、給讀者寫信，她那時讀者來信真不少，就這些事情。她後來不需要我了，一早上兩個人起來在院子裏起來散步，她就問我你願意到哪去呢？我說我願意去《新觀察》，她覺得我不去作協最好，她就給《新觀察》主編戈揚打電話，1955 年夏天我就去了《新觀察》。

---

1955 年 5 月胡風及友人先被定為「反黨集團」，未到 6 月已經升級為「反革命集團」，92 人被逮捕，全國馬上開始繼續肅清反革命的運動，《人民日報》風聲鶴唳，整版整版的文章批判胡風，比當年批判王實味和蕭軍的聲勢大多了。丁玲、陳企霞這時被作為「丁陳反黨集團」，也被重翻舊賬，受到批判。



上：1949年9月29日，在北京懷仁堂第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旗下，文化名人們合影（左起：馬思聰、胡風、丁玲、周揚、艾青、趙樹理、田漢）；下：1949年在莫斯科與幾位女作家合影。

張鳳珠：第一次開批丁、陳反黨集團大會，在王府大街，就現在的商務印書館，原來是作協、文聯的大樓。我跟着往人群裏面躲，不願意讓丁玲看見我。她跟陳明坐着，也還平靜。有時候人家發言也讓她答辯幾句，再往後開會，就不讓她說話。到最後，就命令我發言。哎呀，我怎麼辦呀？那時真是傷透腦筋了，我也真想不出她有甚麼反黨的地方。我就挑一些她驕傲呀甚麼說。譬如在家裏丁玲的照片跟托爾斯泰照片放在一起，意思就是丁玲也能夠達到托爾斯泰的水平。我發言完，讓她講的時候，丁玲說，她曾經迷惑青年，今天聽了張鳳珠的發言，可以說她迷惑不了年輕人。接着有很多的檢舉揭發都是胡編的，後來她給中央、給毛主席寫信，就說作協給她處分，上報材料都沒有經過她看過，中央就重新複查，結果1956年把揭發她的十分之九都推翻。那時搞得周揚、劉白羽、郭小川這些領導特別尷尬，都當面向丁玲道歉，作協還讓各個支部去看望在頤和園修養的丁玲。

1956年，政治局勢有所鬆動，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再次號召給黨提意見；周揚給丁玲道了歉，大部分逮捕的胡風分子也釋放了。

公安部在1955年搜查詩人、理論家、「胡風集團骨幹分子」阿壘的家時，發現了1942年統一出版社出版的小冊子《關於〈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文字獄真相》。1957年8月，這本小冊子被重印成題為《〈三八節有感〉、〈野百合花〉及其

他》的小冊子，前面加了「說明」：「在今天全國整個思想戰綫上開展這反右派鬥爭的時候，特別是文學界正進行着反對丁、陳反黨集團鬥爭的時候，重新來閱讀這些文章，對認識丁玲等人的思想面目和他們的一貫的反黨罪行是有幫助的。」<sup>23</sup>反右涉及的面很大，本書訪問的當事人，幾乎人人都受到影響。經歷了延安整風的幹部，如何對待反右？曾彥修給出的可能是最有尊嚴的答案。

曾彥修：簡單的說，當時我在人民出版社，社長跟總編輯是胡繩，一直掛名，我去的時候是副社長，王子野<sup>24</sup>也是副社長，我們都叫副總編輯。但是反胡風以後，內部就有一個五人小組，這個五人小組就領導反胡風、抓特務、審查幹部這些，最高權力。我是五人小組的組長，那客觀上就形成了整肅的編制了。整風以後很熱鬧，人民出版社全是雞毛蒜皮的事情，王子野跟我兩個，面對群眾沒有任何見不得人的事，所以我們兩個沒有大字報。

23 徐慶全在《革命吞噬了他的兒女》（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一書中，對於「丁陳反革命集團案」有着詳盡的記述，本書不贅述。

24 王子野（1916-94），原名程扶鐸，生於安徽績溪，編輯、出版家。1938年改用王子野一名，在延安入陝北公學高級研習班，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畢業後任王稼祥的秘書約五年，兼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圖書資料室副主作，中央軍委編譯局翻譯處處長、編譯局秘書長，1946年擔任《晉察冀日報》社編委兼編輯部長，此後擔任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出版科長，出版委員會委員。1949年至1950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審局處長，1950至1966年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曾任社長兼總編輯，文革中受到衝擊，下放幹校五年。1975年後，歷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理論組組長，國家出版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國家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兼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副組長。

但是到了反右的批判氛圍中，有個記者對曾彥修做了訪問，他原本想大而化之把這件事應付過去，不批評共產黨現狀，於是說了一些歷史的教訓必須吸取之類的話。

曾彥修：我說我們共產黨，原來在根據地的時候，威信很高，跟群眾的關係很好。但是一進城以後就不一樣了。我們應該接受蔣介石的歷史教訓，否則我們就很容易腐敗、產生官僚主義，脫離群眾。我還引用了杜甫兩句詩，「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解釋說我們共產黨是在山泉水清，出水的泉水也還是清的；不過沒有在農村耕地的時候那麼清啦，所以我們要注意、要抓整治風範。稿子由宣傳部拿去，我的全部罪狀就由《宣教動態》印出來了，一頁兩面印，發給全國的宣傳部、報紙、新華社等等。翻譯家曹葆華比我大十幾歲，但他叫我老兄，「你怎麼回事嘛，說話怎麼沒個遮攔呢？」當時我是五人小組的組長，照樣表面上每天像辦公地動員大家、做報告，內部的指示、毛主席的東西通通我先看見，文化部副部長錢俊瑞召開各種會議，五人小組，照樣叫我參加。我也沒敢出聲。但是上面討論要公佈右派名單，民主黨派、電影界、作家、新聞出版界，我們單位討論了兩天，大家關係都很好，誰報都不對。到了第三天，我說這樣下去不行，問題越來越嚴重，最後報了三四個人，我是第一個。我就自己遞交反右派的名單，上面第一個就是我，從此以後「五人小組」的組長我就自動辭職了。全國領導反右派，把自己放在名單頭一個，自己交上去的，我也不知道還有沒有。我不但是出版界第一個，也是共產黨第一個右派。真是，我現在說我都不好意思！

曾彥修說到這裏，我們都不禁跟着他笑了。此後他也一如既往，在單位裏有了問題，都是自己承擔。他送我一本晚年出的書，書名叫《天堂往事錄》。在他生活的時代，他最為自豪的事是：他一生未整過人；因此他在香港出的自傳標題是《微覺此生未整人》。一個單位有了他這樣的領導，應該說是很幸運的，李銳告訴我們，激進如《湖南日報》那樣的單位，一共一百零幾個人，右派打了54人，所有的骨幹全打了，報紙幾乎搞垮了。

1957年7月大規模的反右運動開始之後，當年在延安《解放日報》簽發了王實味〈野百合花〉一文的丁玲和陳企霞被打成「丁陳反黨集團」，從此這兩人也開始了他們的煉獄。

---

張鳳珠：1955年那次整過火了，底下的人又開始圍攻周揚等人，甚麼話都說了，到該開三次黨組擴大會，就等中央最後批。這時就開始反右了，不但沒有批，丁玲反而變成文藝界頭號大右派。我就不明白，毛澤東在延安對丁玲那麼好，給丁玲那首詞還用電報打到前方，對別的作家沒有過這樣；延安查丁玲的歷史，組織部長陳雲和李富春做的結論，拿到毛澤東那兒，毛澤東最後還加一句「丁玲依舊是忠誠的共產黨的黨員。」毛澤東是絕對不講交情的，政治需要甚麼都能做的出，那時候文藝界要找一個知名的右派，正好丁玲就撞上了。

陳恭懷：我父親（陳企霞）1955年的8月19日被捕，到1956年的5月22號放出來，就是關了九個月，這段時間他沒發言



權、不能自我辯護。5月份放出來這段時間，他到處搞活動、告狀，想把這事兒翻過來。中宣部最後審查出來，周揚在事實面前不得不同意調查結果，但他死活不肯簽字。到反右時，批丁陳的運動越捲越大，把艾青、羅烽、白朗、馮雪峰，都捲進去了，最後丁陳反黨集團到底是幾個人也搞不清楚，然後又搞了個甚麼丁馮陳反黨集團、舒羅白反黨集團，就是舒群、羅烽跟白朗。到晚年的時候，艾青還跟我父親開玩笑，他說我是丁陳反黨集團，誠然受你領導。

---

在審查丁陳反黨集團材料的過程中，在中宣部工作的老革命抱着比較同情的態度，一度為丁陳辯護，此時卻因為包庇丁陳也被打成右派反黨集團，這就是「李之璉、張海、崔毅、黎辛」反黨集團。丁玲、陳企霞都劃成大右派，被判勞動教養，李之璉、張海、崔毅、黎辛也不能幸免厄運。

此時李敦白所在的單位，當然也必須劃出右派，被選中者是何人？

---

李敦白：梅益不太能容得下比他有本事、客觀上挑戰了他權威的人。溫濟澤尊重梅益，但是對於怎樣運作一個國際廣播，有自己的一套。反右開始的時候，梅益就準備把溫濟澤和另外兩個人劃成右派了。令我自己感到羞恥的是，我參加了這個運動，找到溫濟澤，勸說他好好自我批評。雖然我對整個運動都感覺不妙，但是我剛剛坐了六年牢，

不想再惹麻煩，同時也在想，「毛主席和中央知道他們在做甚麼，我知道甚麼呀？」此後20年，溫濟澤不但被撤銷職務，還被開除出黨，一直在廣播的研究部門做研究助理。

宋金壽：溫濟澤這人慢慢悠悠、文文靜靜的，他批判王實味也不是那麼兇橫，揮拳頭、喊口號甚麼的，所以康生指責他是「溫情主義」。反右當中，有個5%的指標，他是中央國際廣播事務局的副局長和黨委書記，他在自己單位找不出來那麼多「右派」，他的局長就非逼着他抓，還說因為你自己有問題，所以才看不出問題。這樣把他打成右派，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後才平反。

---

在我們的受訪人之中，還有一位無端被定為右派分子的人就是朱正。他不到18歲就參加了工作，沒有任何歷史問題，但是在反右過程中因為兩條罪名被定為右派。

---

朱正：有人問我為甚麼是右派，「你究竟犯了甚麼事、說了甚麼話？」我就笑了：「你的問題提得非常外行。」為甚麼呢？一個人，要把他劃成右派，就可以把他劃成右派，有甚麼言論、做了些甚麼，那是次要的。我的兩條罪名呢，第一是攻擊肅反運動。1955年肅反的時候，我們四個人先是被叫做反革命集團；鬥了一段時間以後，就溫和了一點，叫做反動小集團；但最後定案材料讓我簽字的時候，改成叫思想落後小集團。我說這好，政策規定了甚麼算反革命甚麼不算，可我沒有辦法證明我不落後。1957年整風

的時候我就提出來，如果這個運動叫做肅落後運動，我承認我落後；但你是叫做肅反運動，你寫的材料裏面，一條反革命也沒有，那你算不算說錯了呢？有了這一條，就足夠劃為右派了，但我還有一條。1956年蘇共二四大，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就批評斯大林，我們是聽說、但沒有辦法看到。當時《文匯報》復刊的時候，登出美國記者斯特朗寫斯大林的一篇文章，裏面有一章就叫〈巨大的瘋狂〉。我一看就說我們中國也差不多，也是巨大的瘋狂，我說，「斯大林對於人類歷史有不可估量的貢獻，對於斯大林的批判，同樣對於人類有不可估量的貢獻。」前一句特別作為一個修辭的搭配，實際上後一句倒是真心話。肅反時我的第二條罪狀，就是朱正攻擊斯大林，其實這個也不冤枉。有了這兩條我就劃成右派了，而且在右派的六種處分中受了最嚴重的處分，開除公職、勞動教養。

---

朱正先生因為親身經歷了反右的噩夢，把寫反右運動的歷史視為己任，2004年在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了《反右派鬥爭始末》上下卷本，2013年又在秀威資訊科技出版了增訂過的《反右派鬥爭全史》。

到了1958年，反右運動持續着，又補劃了一批右派。由《文藝報》編輯部編輯，把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在醫院中〉、〈我在霞村的時候〉，蕭軍的〈論同志的「愛」與「耐」〉，羅烽的〈還是雜文的時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曾在延安引發一些爭論和批

判的雜文、文章作為「附錄」結集，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再批判》一書。其中丁玲的文章多收入兩篇，顯然是為了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需要。這本書的正文，則是由十篇在《文藝報》上發表過的批評文章組成，作者都是當時有名的人物，包括林默涵<sup>25</sup>、王子野、張光年（華夫）<sup>26</sup>、馬鐵丁<sup>27</sup>、

- 25 林默涵（1913-2008），原名林烈，福建武平人，文藝理論家。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5年留日，一二九運動爆發後回國，開始以筆名「默涵」發表文章。1938年到達延安，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2年5月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抗日戰爭及第二次國內戰時期，他先後編輯過《解放日報》、重慶《新華日報》、《群眾》週刊、《新文化》、《大眾文藝叢刊》等。1949年後，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宣傳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等職。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嚴厲批判。晚年被視為左派代表人物，1988年與著名作家魏巍合作，主編《中流》雜誌，後因反對江澤民政策而被停刊。
- 26 張光年（1913-2002），筆名光未然、華夫，湖北省光化縣人，現代詩人、文學評論家。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5年肄業於私立武昌中華大學，同年發表《五月的鮮花》，經閻述詩譜曲後在「一二九」運動中廣為流傳。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1月赴延安，同年3月創作《黃河大合唱》，經冼星海譜曲後流傳全國。1940年在重慶創作長篇敘事詩《屈原》。1941年皖南事變後到緬甸；1942年回到雲南。1946年經北平進入華北解放區，先後任教於北方大學、華北大學。1949年後一直在北京，先後任《劇本》、《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
- 27 解放初期，陳笑雨（1917-66），張鐵夫（1922-2006）、郭小川（1919-76）曾同以「馬鐵丁」為筆名，在《長江日報》為「思想雜談」專欄寫雜文，這些文章後來結集出版十餘冊，「馬鐵丁」也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三人中，雜文家、文藝評論家陳笑雨曾經在1938年就讀延安陝北工學，後歷任新華社編輯、記者、主任、分社社長。1949年後歷任《文藝報》副主編、《新觀察》主編、《人民日報》編委兼文藝部主任，著有《思想雜談》、《雜文雜詩集》、《說東道西集》、《張弛集》、《革命風格集》等。1966年文革開始後遭到批鬥，不甘受侮辱，投河自盡。著名詩人郭小川，1937年參加八路軍，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部隊寫下大量詩歌，1941年被選送到延安中央研究院學習。1945年11月赴東北，擔任熱河省豐寧縣縣長等職。1948年後歷任《群眾日報》副總編兼《大眾日報》社社長、《天津日報》社編委兼編輯部主任，後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曾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秘書長及《詩刊》編委等職。文革中多次受到迫害，四人幫被逮捕後被召回北京，返京路上卻因吸煙引起火災而身亡。

嚴文井、馮至、張天翼、王燎熒<sup>28</sup>、陸耀東<sup>29</sup>等，其中除張天翼、馮至、陸耀東外，其餘作者都去過延安，經歷過延安整風，多少了解王實味、丁玲、蕭軍等人在延安受過的批判。

高華：最早看到王實味的文章，是《文藝報》有個版面「再批判」，毛還寫了按語。《文藝報》編了小冊子，就是把當時延安時期幾個被批評的知識分子的作品匯總起來的，其中有王實味、丁玲、蕭軍、羅烽。但當時我並不知道王實味的結局，看了他的文章感到很震撼，沒想到在延安的「紅太陽」下面還有陰影。王實味的批評，當時直覺的感受好像也沒甚麼錯，為甚麼把他當成反黨分子？還看到了丁玲的〈在醫院中〉，覺得丁玲的這篇文章也沒有錯啊，為甚麼也是反黨作品？讀了這些之後，反而產生了很多疑問。雖然王實味事件在國統區早有人知道，但公開化應該是1958年，批判也沒有大張旗鼓，更多人覺得這是文藝界內部的思想爭論。

- 28 王燎熒（1921-95），重慶人。1938年陝北公立學校畢業，曾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歷任陝甘寧邊區關中分區抗敵後援會秘書長，延安中央農村工作委員會和西北中央局第四局文教秘書，延安行政學院文工隊、中原軍區文工團、延安中央黨校研究室、晉冀魯豫邊區人民文工團編劇，《華北文藝》、《人民文學》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1942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劇本《好莊稼》、《圍家山天亮了》、《紅軍回來了》，主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偉大文獻》。
- 29 陸耀東（1930-2010），湖南邵陽人。1955年畢業於武漢大學中文系，留校任教，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1958年任《文藝報》評論員。現兼任中國聞一多研究學會會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名譽理事，五個學術機構顧問委員，中南作協會員。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56年開始發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專著《二十年代中國各流派詩人論》、《徐志摩評傳》、《中國現代四作家論》、《馮至傳》、《中國新詩史》（第一卷）等，合著《魯迅小說獨創性初探》等四種，主編《中國詩學叢書》等五種。

從1944年讀到趙超構的《延安一月》之後，王實味的老朋友、老同學王凡西，到1962年才再次聽到王實味的消息，這個消息來自當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又稱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講稿最後提到了王實味：

還有個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在延安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題名〈野百合花〉，攻擊革命，誣毀共產黨。後來把他抓起來，殺掉了。那是保安機關在行審中間，自己殺的，不是中央的決定。對於這件事件，我們總是提出批評，認為不應當殺。他當特務，寫文章罵我們，又死不肯改，那就放在那裏吧，讓他勞動去吧，殺了不好。<sup>30</sup>

值得注意的是，「托派反革命」的罪名已經在此處改成「國民黨探子」了。為甚麼改變說法？是否因為中國托派已早在1952年底就「一網打盡」了呢？

---

黎辛：在中央擴大會議的時候，我們已經不講托派是「反革命」了，而說托派是國際共產主義的一個派別。抗戰以後，中國是跟着蘇聯，就說托派是「法西斯的第五縱隊」，都是特務。我考抗大的時候，八路軍辦事處的主考就給我提過這個問題，為甚麼托派是特務？那時候很強調這個問題。斯大林死後一些年，就把托派講成一個革命的派別了。毛澤東還是肯定搞王實味是對的，只是不能說他是托派，就說了國民黨的探子，換了個說法。

---

30 見1969年原文復刊《毛澤東思想萬歲》，421頁。

毛澤東的講稿是一篇公開發表的文字，後來又重印在文革中幾乎人手一冊的紅色封皮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中。

對於去延安的人，王實味這個名字當然還不會遺忘；但是大部分人並不知道王實味為甚麼是「反革命」。

---

高華：毛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提到王實味，但七千人大會不是傳達給全體老百姓，都是黨的高級幹部，頂多也就是到縣委書記這一級，真正的全面普及化還是到文革。我想這其中的原因，是因為共產革命需要對國統區人民進行一個光明的敘述，而王實味事件的悲劇性有損於它的光明敘述。所以40到50年代一直是把這件事遮蔽的，它的公開化是多年以後。當然由於王實味表達出的意義還存在，譬如某種程度上的權力異化，他就持續性地被人們記憶。只有以後社會進步了，他才會變成一種人格的符號，而他的社會歷史價值就會淡化了。但是現在，他談的社會問題還存在。

---

對王凡西來說，1962年讀到：

毛澤東給王實味發的這個「訃聞」自然使我悲憤。一個真摯、熱情、坦率的文人，一個懷有純潔高尚的理想主義的革命者，一個為中國共產主義的事業艱苦奮鬥了幾達20年之久的老黨員，竟為了對黨提出忠告與批評的小文章，給加上「國民黨探子」的罪名處死了！但是我並不感到震驚，因為

自從20年代末期以來，斯大林以及全世界斯大林主義者對待政治上與思想上異己者的野蠻和荒唐的作風，我已見慣不怪了。<sup>31</sup>

---

班國瑞：王凡西說，王實味是一個非常忠誠、有激情的人。每當共產黨開始自由討論異見者案子的時候，王實味就不斷地被提及，1957年反右、文化大革命，甚至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都是如此。王實味都被作為反抗的犧牲者，他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為了社會公義去對抗組織的勢單力薄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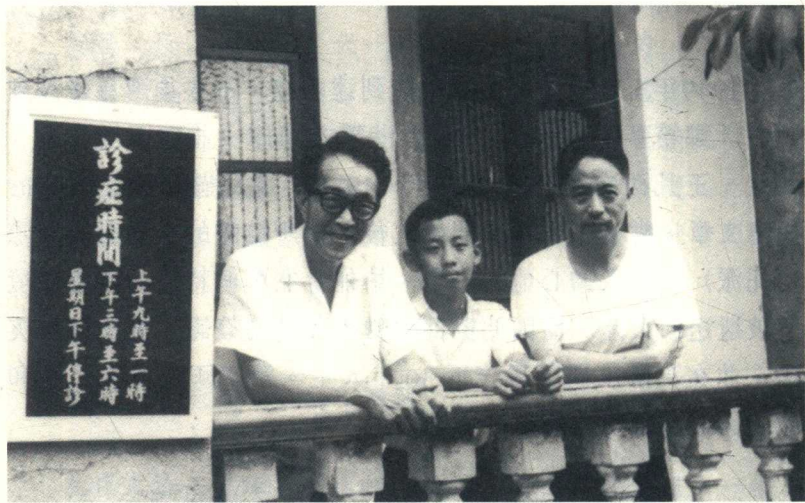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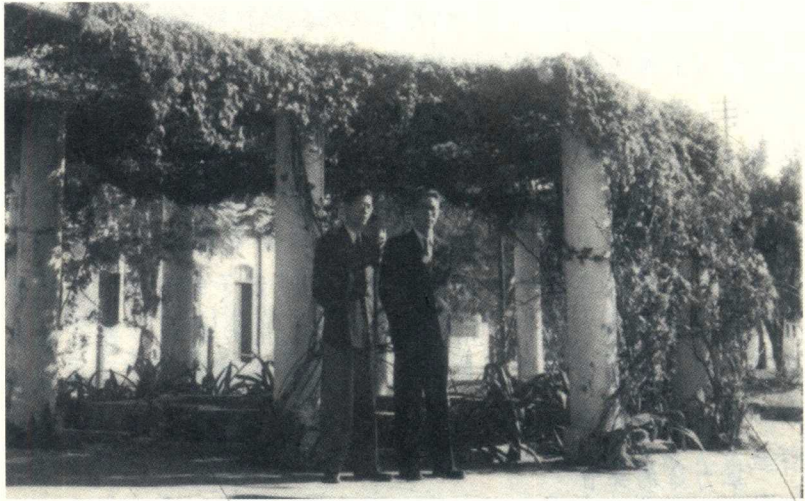
---

1949年王凡西離開中國大陸到達香港，不久後因為牽涉到一個「郵箱事件」<sup>32</sup>之中，被香港警方拘捕，並驅逐出香港。此後，王凡西在澳門蝸居多年，1956年還寫過關於王實味的回憶文章。當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他所結識的一些第四國際（托派）的友人擔心他的安全，怕他會在那個特殊的歷史環境下被遣送回大陸，而因此協助他獲得英國的簽證，從此移居英國，並在英國度過了最後近30年人生。第四國際友人之中和他關係最為密切的就是班國瑞。

31 王凡西〈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83頁。

32 郵箱事件：此事件會在本系列《王凡西——他山之石與流放之旅》一卷中詳述。1949年9月，托派劉家良利用商人李騰蛟的信箱收取第四國際的函文，結果信箱被香港政府截查，導致樓國華、劉家良、王凡西同時被捕。事後，王凡西主動承擔責任認領信函，被驅出境。





上：1949年時，王凡西牽涉「郵箱事件」被捕，但是由此和詩人謝山（左）成為好友；下：在澳門居住的二十年間，王凡西（右）借住在劉醫生（左）家裏，但劉醫生並不了解他的歷史，直到他出版了《雙山回憶錄》。

班國瑞：在西方，最早寫到王實味的學者是 Merle Goldman，1967年就發表了關於中共四五十年代整風的研究。1975年，我在《新左派評論》<sup>33</sup>上，第一次發表了自己翻譯的王實味的雜文，期刊猶豫了很久應不應該將這樣的一篇文章收錄進去，因為這個做法有些反毛澤東主義。他們並不十分確定發表王實味的文章，在當時是否是被認可的。在1976年開始的後毛澤東時代，很多反毛思想的作家作品得以重見天日，王實味就是其中之一，像〈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家〉等。也是1975年，王凡西到了英國，我把這些東西拿給他看的時候，他說他認識王實味。我說我知道他認識王實味，因為王實味的手稿裏提到王凡西是一個人性很好的人。

33 《新左派評論》(*New Leftist Review*) 於1960年在英國創辦，是一份帶有左派傾向的政治半月刊，內容主要涉及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其前身是《新推理家》(*The New Reasoner*)、《大學》(*Universities*)、及《左派評論》(*Left Review*)。根據2012年《期刊引證報告》的資料，《新左派評論》在157本政治科學期刊中排名第25位。



第十章  
思想改造之難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訪問過的老人們、曾經整過他們的領導們，幾乎全體受難。被劃成右派的曾彥修、黎辛、朱正在文革中繼續被批判，1959年因為廬山會議被牽連的李銳，文革中在秦城監獄被關了八年單身監禁。文革開始時已經在農場的丁玲，從1966年9月第一次被遊街、戴高帽、塗黑臉之後，1967年又多次被造反派批鬥、毆打，住房被多次查抄，到1968年又被關進牛棚，1970至1974年被關進了秦城監獄，單身監禁長達五年之久，但在獄中卻得以避免毆打，並通讀了39卷的《馬恩全集》，每天還可以看《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雖然1973年之後，她受到的待遇有所改善，但是在她出獄之後，經歷了漫長的申訴才獲得徹底平反。在延安時期就和丁玲十分熟悉的李銳，也盡了他的一份努力。

---

李銳：丁玲的歷史複雜，44年間共產黨給她做過四次不同的結論，現在要想回到1940年的結論，又談何容易？當年的宣傳部長陸定一，文革中曾遭大難，他在80年代初對許多問題有所反思，但對丁玲的問題，和周揚一樣不改觀。當時我是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後來走了另一條途徑，我把寫好的結論送到書記處每個人的手上，個別徵求意見，直到所有人都簽了名，經過一年多的調查落實，幾次慎重討論，中央批准了。1984年8月1日，經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組織部下發了9號文件，〈關於為丁玲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通知〉中撤銷了1955和1958年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呈報中央的兩個報告，推倒一切不實之詞，維持1940年在延安時中央為丁玲歷史問題所作的結論，再次肯定她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重申她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



上：1958年反右時的丁玲和丈夫陳明；下：1981年丁玲訪問耶魯大學時，與著名劇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合影

產黨員。丁玲在得到這一通知後對她的愛人陳明說，現在我可以死了，這一年丁玲80歲。

---

李敦白在文革初期，因為高調表達支持文革，而成了紅人；但1968年他再次入獄，這第二次牢獄生涯持續了十年。雖然1972年尼克遜（Richard Nixon）訪華的時候，向中國政府詢問過李敦白的下落，但是當時他還在牢房裏，只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來訪的時候，才會假裝沒事兒一樣，把他放出來，讓他陪昔日的老師吃飯。1978年，當年介紹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王震和李先念，一起幫助李敦白出獄了。李敦白的中國妻子王玉琳，在十年中含辛茹苦養大了他們的四個孩子。此時因為不願留在中國，不願再次經受政治運動。於是在離開美國35年之後，李敦白要返回美國了。

---

李敦白：1979年我們第一次要回美國，王震副總理找我們談。他對我說，「你以前給我們解放區介紹了美國的大夫、教授、記者，但是現在我們需要美國財團，你想辦法介紹出來。」我跟他講，「甚麼財團啊？我十七八歲參加共產黨，我要知道財團，我就不會來這兒了。」他說，我們都得改，你看我，我原來是帶軍隊打仗的，現在當副總理，我們都得學新的一套。我說我們不用去找人，有人慢慢會找我們。我們一回美國，報紙電視都來報導，第一天到紐約，NBC Today每日黃金時段大節目就採訪。第二天《紐約時報》派了個記者，寫了整個第二版，寫得非常好的好，標題〈本土兒子回來告訴我們他的親家的故事〉

(Native Son, Returns to Tell (his folks) about His In-laws) , 寫得太棒了！當時我跟玉琳講，在美國，《紐約時報》說你好你就好，說你不好你就不好；他們說我們好，所有報紙果然都跟那個調子採訪、報導，我們一下就紅了。

---

雖然 1972 年中美邦交開始正常化，但是當時美國對中國的了解還是很有限。美國媒體對李敦白這位在紅色中國住了 35 年、坐牢 16 年的中國共產黨員十分好奇，美國的政要們似乎也對他很友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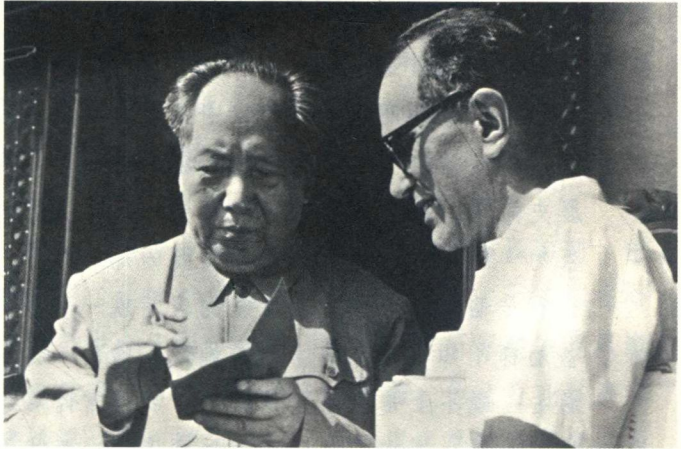
李敦白：1979 年我們一到，就被請到華盛頓，副國務卿來正式接見。1946 年在北京死活不讓我坐美國飛機去延安的沃特·羅賓遜 (Walter Robinson) ，做過副國務卿。接見我的副國務卿理查·豪布魯克 (Richard Holbrooke) 是個民主黨自由派，我一進去他就說，我的前任不一定會這樣正式接見你；我回答，你的前任請我，我也不見得來。我們談得不錯。美國情報界人員和一些記者，都認為我是替美國秘密搞情報的，否則為甚麼我回來沒事，美國政府還這麼承認我們？最近我的口述歷史在中國出了以後，有位教授寫書評說，「李敦白，美國人懷疑是中國特務，中國人懷疑是美國特務，蘇聯人認為他是雙料特務」(笑)。其實我只是我。1979、80 年那時候，任何一個美國人從中國回來，聯邦調查局 (FBI) 都要找他談，看能不能提供一點信息嘛，但他們沒找過我。

---



和王震相識了幾十年的李敦白，於是開始以另一種角色來為中國服務。

李敦白：大公司慢慢就開始找我們，我們不會跟人家要錢。聯邦科技（United Technologies）是個龐大的公司，讓我坐飛機到他們總部，請我吃飯、住酒店，跟我談中國，然後坐飛機再回來。我覺得挺不錯，我姐夫就問，「你跟他們要多少錢？」我說怎麼能要錢？他是海軍陸戰隊退伍軍官，他罵我，「笨蛋！笨蛋！他們拿你的情報，要發大財了！你甚麼錢都不要。」我當時想不通啊，在中國35年，以前也是幹革命的，怎麼能夠談話就跟人要錢。後來美國的電腦天地公司（Computer Land）的大老闆比爾·馬拉德（Bill Mallard）打電話找我們，說有個副部長領隊的中國電子部代表團來跟他們談判，他說手下只有一個懂中文的日本人，問我能不能過來幾天給他做諮詢。諮詢對我是個新詞兒，我下了決心，這次我肯定要錢。結果我去了，談判三天，簽了一個大合同。最後老闆把我找一邊說，「為了讓這個合同能夠成功，我最需要的是甚麼？」我說，「我。」他說，「你願意來嗎？」我說可以來。然後他讓他的國際總裁來跟我談條件了。這個老闆非常聰明，他要玉琳、要我們孩子都參加。一般美國的公司不要夫妻一塊，他要。玉琳呢，剛答應中國旅遊公司當駐美國公司總經理。馬拉德請我們到他家吃飯，要說服玉琳。她說我已經答應了別的工作，短說長說都不行。然後馬拉德看着她說，「玉琳，我下了決心，要讓每個中國人都有一台個人電腦。難道對中國



上：文革開始時，李敦白因為支持文革而成了紅人；下：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給他簽了一本小紅書

人民有這麼大好處的事，你都不願意幫忙嗎？」哈，一下就說服了。

---

在此之前，夫妻兩人還發愁衣食，李敦白到處演講，演講費也沒有多少，這下全家一下就過上了舒適的生活，玉琳業餘教中文、教烹飪，都很受歡迎。

1979年，在王實味被處決32年之後，劉瑩才第一次從廣播裏得知丈夫早已被處決的消息。改革的空氣下，反右運動以及文革中的受害者紛紛獲得平反，而對於王實味的說法卻仍然沒有扭轉的跡象。女兒王勁楓曾向組織部遞交了一封申訴信，希望得到關於父親平反的消息，但一直杳無音訊。

---

王旭楓：應該是1979年，我們家不是有一台收音機嗎？打開了，就那麼巧，那時候中央台正在廣播關於我父親的事。那廣播也不是單獨說我父親的問題，是聯繫黨的一些歷史問題，或者是有關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啊，這樣帶出來的。這對於我媽來說，雖然聽的那一段並不太長，但也許就是個補課。當時我母親的表情就一下就呆滯了，好像甚麼都不知道了似的。你跟她說話啥的，她眼睛根本沒回過去，說不上是悲痛還是驚訝。我們當時在東北就坐在炕上，我們說媽咋的啦？我們反應過來，肯定是聽到剛才那段話的結果，我們擔心的事情發生了。

---

從1980年春天開始，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在延安主持過中央研究院的整風運動，並直接參與處理王實味問題的李

維漢（即羅邁），開始撰寫回憶錄，希望將王實味問題重新審查。「如果是錯案，即使人死了，該平反的仍然應該平反。」

宋金壽：李維漢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統戰部部長被撤掉了，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坐牢了；溫濟澤也被劃成了右派。所以這些人就知道王實味的體會了。李維漢提出為王實味平反，但是他沒有完成任務就去世了，而且他的回憶錄裏面仍然把王實味當作「托派反革命」。這就是王實味平反的癥結：「托派」的帽子摘不掉，王實味的問題永遠無法平反。1984年，我發表了一篇關於王實味問題的文章。我當時的主要觀點是，一，王實味是有小資產階級思想；二，王實味的「托派問題」是個歷史問題，他1941年就已經交代了，而中央組織部那個時候根本就沒有另眼看待他。這篇文章的反響非常強烈。王實味的老伴劉瑩，還有他的兒子和侄女，專門到北京來拜訪我。當然他們還去拜訪了溫濟澤，而且交給我很多資料。

黎辛：王實味問題過去幾十年了，不過延安整風初期，主持中央研究院工作的李維漢還在主持研究院，他還記在心裏。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研究與總結中央研究院的整風運動時，他建議複查當時的結論；去世前，他又委託溫濟澤等同志繼續關心和催辦，表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高度的革命責任心和良心。

黃昌勇：劉瑩寫了不少申訴材料，其中很客觀地回憶，當時王實味在上海和這些托派們到底有多少交往。她就一個

目的，證明王實味當時沒有參加托派組織。但是延安那個時候給王實味定罪，沒有搞清楚思想和組織的關係，這兩者一定要區分開來。你思想上有問題，就推測你一定是組織上也有問題，這是一個很大的混淆。那麼平反過程中關鍵的、最重要的，應該說是王凡西的證詞，因為王凡西那個時候提出來王實味沒有參加托派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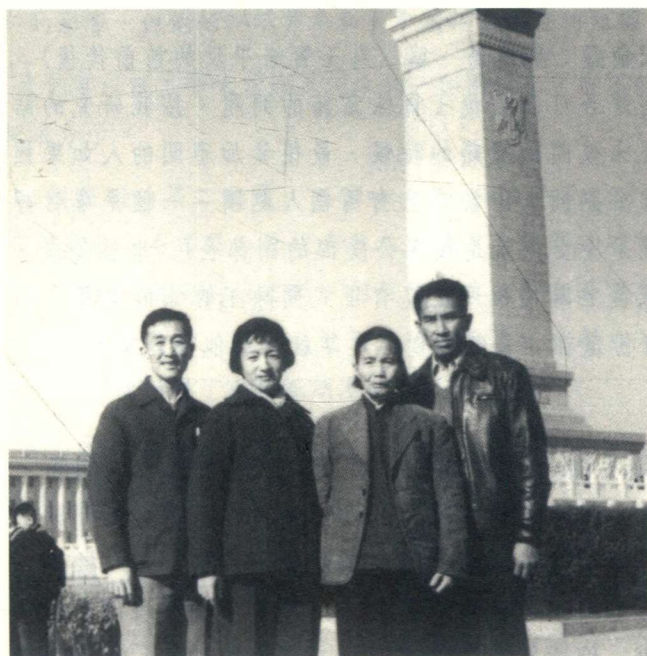
王旭楓：我姐寫信一直碰壁，後來有了李老、溫濟澤和宋金壽他們這條線，我們就建立了聯繫管道。我們到了溫濟澤家，溫濟澤談起我父親的事情很感慨，眼睛裏邊有淚光、很激動。但他也勸我們，說平反到這個程度，已經盡力，目前也就只能如此。我母親表態說很不滿意，他安慰我們說平反是一個形式，總算恢復了名譽，你們家的政治壓力小多了。然後他就講，在江西還有很多共產黨員、紅軍家屬，到現在還承受着巨大的壓力，現在還不能告慰死者的英靈。溫濟澤的態度是明確的，但他個人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

這時候，王實味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他的家人決定親自到北京去上訪。

---

王旭楓：1985年那時候上訪的空氣很流行。我們到達上訪地點時，人山人海，好多人就在周圍搭帳篷，太多人有話想說。我們徑直闖進去。那接待同志說：「哎喲，這同志你幹甚麼、你有甚麼事？」我就說我們要來解決一個大



上：劉瑩（右）和女兒王勁楓和兒子王旭楓；下：劉瑩和弟弟（左一）、弟媳（左二）、女婿（右）在北京。

案子。他說甚麼大案啊？我說延安王實味的大案，誰都知道，我們有話想向中央、向黨說。他們就在裏邊商量了一下，說王同志你進來吧。接待同志很客氣很熱情，我們申訴材料的標題是〈向黨訴不平〉，我說你們一定要交給耀邦同志。他們說親手遞交到胡耀邦本人不敢保證，但一定遞給他的辦公室。我母親當年74、我舅舅80歲，每天不辭辛苦就這麼跑。中紀委他們也去過，遞材料每當要排隊的時候，我舅舅就拿出證件來，說你看我是多少級的幹部，我們歲數都這麼大了，就給了一些照顧。

宋金壽：我寫過一篇〈為王實味平反的前前後後〉，其中提到是否可以恢復王實味黨籍的問題。按我研究的結論，王實味被開除黨籍的時候，最後參加審閱的人如果核實了，就要劃圈，但當時只有兩個人劃圈，一個是羅青禪，一個就是凌雲（就是後來公安部的副部長）；也就是說，從嚴格意義上講，程序上沒有正式開除王實味的黨籍，他黨員的身份還在。當然事實上，早就認為他不是黨員了。

到了80年代中期，「平反」已經大致不成問題。官方新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的注釋中，對王實味的問題，已經採用了「關於他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一事，據查，不能成立。」的說法。此時，王實味只剩下「托派身份」這一問題懸而未決。他遠在英國的老同學王凡西知道後，特地撰寫了〈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一文，並在1985年5月發表在香港的《九十年代》月刊上，說明之前《雙山回憶錄》上有關王實

味的原文不甚確切，實際上王實味從未參加過托派組織，只曾經是托派一個同情者：

在我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句話：

「在中共統治區內，一些自動前去參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實味等），遭到了無情的鬥爭，並最後被殺害了。」

這裏我應該指出，這句話說得不甚確切。正如我在上面所憶述的，王實味雖與陳其昌和我有過長期較密切的關係，雖然他思想上受過托洛斯基某些意見（特別是文學方面的見解）的影響，但他始終不曾參加過中國托派的任何組織。

我們可以說王實味曾經是托派的一個同情者，卻不能說他是托派分子。

必須聲明的第二點是，王實味大約 1929 年至 1934 年這個時期與黨失去聯繫，為想重新參加組織，他那時確曾徘徊於「中央派」與反對派之間。但最後他參加前者而不參加後者，而這完全是出於他獨自的決定。當他決定重新加入中共組織之後，便斷絕了與托派朋友的來往。

這裏絕不可能存在甚麼「派遣」問題；絕對談不上甚麼「滲透」用意。<sup>1</sup>

宋金壽說，「解鈴還需繫鈴人。」這篇文章的發表，無疑是對王實味平反存留問題最有力的解答。不過王凡西還是王凡西，他對宋金壽文章裏面提到延安對王實味的指責與批駁也做了反

1 王凡西《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85頁。



駁。譬如「說王實味挑撥青年，鼓吹絕對平均主義」，他反駁說：

就拿中共本身的歷史來說吧，當年如果沒有《新青年》「挑撥」起中國一批青年的「純潔、敏感、熱情、勇敢與充滿了生命的新銳的力」，「挑撥」他們起來大聲疾呼，反對舊中國的「黑暗」與「骯髒」，哪裏來的中國共產黨？哪裏來的中國革命？延安當局那時要出來反對並壓制這種「挑撥」，只能證明在割據區域內做了十幾年執政黨的中共，此時已染上濃重的官僚主義的色彩，已部分喪失其革命的青春氣了吧。<sup>2</sup>

這一點李敦白也十分同意，他覺得一個黨應該不斷地年輕化，找回青春活力。對於批判王實味「鼓吹絕對的平均主義」，王凡西說：「王實味在這裏明明說『一切應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他分明不曾主張不論衣食或其他待遇，應一律平等，一切平均。……馬克思主義者時時刻刻要在『必要與合理的原則』下，去消滅特權，使人人能逐漸趨於平等，使種種享用趨於平均的。」至於「王實味被扣上的第三頂帽子」也就是「主張和宣揚資產階級的文藝觀」，王凡西說：

證以最近30年來中共的文藝政策及其所造成的結果，特別看到了所謂「文化大革命」中文藝之如何受到摧殘，一般文化人與特殊的藝術家之如何遭到糟塌，我們只能說王實味確曾提出過及時的警告，他確有真知灼見。經過「十年浩劫」之後，今天竟尚有人主張文藝工作者必須是「歌德派」，必須為黨的領導者隱惡揚善，必不可揭發「不正之風」，必不可

2 同上。

對「自己的陣營」提出批評；否則便是「敵我不分」，便是「站錯立場」——這，至少是讓人驚奇的。<sup>3</sup>

看到描述王實味的文字被張貼在延安南門外，王凡西聯想到這些壁報，「無論在形式上與內容上，都與30多年（按：此處指1976年清明前後）後天安門前與西單牆上的詩歌與文章，前後一致，相互呼應的。」而且，王實味「在1942年春天寫作的這幾篇雜文，其中所透露的思想與感情，比之以34年後，即1976年4月5日北京十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以詩歌表達出來的抗議，雖然無此激昂，卻更為系統與深刻。」<sup>4</sup>

與此同時，戴晴與溫濟澤相談之後，開始收集資料並且採訪與王實味有關的當事人。我們問起戴晴，最初怎麼會要研究王實味。

---

戴晴：那時候應該說，上政治課或者看政治參考書，王實味這個名字在每個人心裏都有一點隱約的印象。我對他知道得略微多一點，因為我繼父在延安時也在中央研究院，經過了整風和搶救運動，他被嚇瘋了，精神病一生也沒有離開過他。在不正常的時候，他就會很恐怖地跟我說，「小晴啊，我一定要改造思想，要不就像王實味那樣去做特務了。」我就在想，他這麼優秀的人，為甚麼會給嚇成這樣？王實味到底是甚麼人？教科書上寫的很抽象，於是心裏的疑問就一直存着。到了80年代，應該說是最開放的十年，

3 同上。

4 同上。

我認識了對王實味研究最貼切的、也就是在延安寫〈鬥爭日記〉的溫濟澤。他內心有種感情、有種內疚，使他在對王實味平反這個問題上出力最多、心情最迫切。碰巧那時溫老在主持一本《中共烈士傳》，要收入我父親的故事，我們就有接觸了。談話之中，他談起王實味，一下子觸動了我心中那個疑點。我就向他表達，乾脆我來寫關於王實味的書吧，他幾乎沒有猶豫，就把包括劉瑩的線索，包括所有他認識的中央研究院、魯藝，當時在延安的那批人的線索都交給我。我是記得特別清楚，1986年，溫濟澤把劉瑩的聯繫方式告訴我，我就立刻跟她聯繫上了。見到劉瑩，那時候她還非常清楚，我應該算是第一個採訪她的記者吧。我覺得如果沒有我們這些人能夠介入採訪，劉瑩即使上訪，可能就還是帶着一肚子的冤枉地離開了。像這樣的人，中國何止千百萬？我見到劉瑩的時候她72歲。她是一個很硬的人，她給我講過一件事，就是她給丁玲打電話，丁玲不在，陳明接的電話，她絕對不會再打第二次。你可以從這一個小小的細節看出來，她這麼多年，是怎麼挺過去的。

---

經過了一系列的採訪和收集資料，戴晴在1988年撰寫了〈王實味與《野百合花》〉，登載在《文匯月刊》上，這本刊物的影響與今天的《炎黃春秋》相類似。

---

王旭楓：親自來採訪，戴晴是第一個。而且她當時那篇文章，引起了比溫濟澤的〈鬥爭日記〉要更大的影響。我認



上：幫助王實味平凡的溫濟澤；下：1986年10月，戴晴（右一）到湖北十堰來探訪劉瑩和王旭楓。

為溫濟澤基本上是在內部的一種活動，不能夠讓社會廣大公眾知道王實味，談不上在社會上有甚麼震動、或對大家有甚麼啟發和教育。戴晴的文字就是引起了很大震動。我們單位同志想辦法買了這本月刊傳閱。戴晴很負責任，托她的一個朋友，把《文匯月刊》寄來了，我母親對戴晴的文字是很滿意的，認為比較真實不走樣。

---

1989年，北京發生了學運，當時在境外的李敦白通過國外媒體了解了事態的進展。此後他們有次回國的時候，在北京301醫院見到了老朋友王震。

---

李敦白：他的太太打電話給玉琳，希望我們去看他。我們去了，可以說看到這個人最深層的本質。當他說到北京的學運時，他說，「我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我們應該把這些人集中起來，這些學生都是反社會主義的分子，應該全殺了。」我不知道該說什麼，你可以說他的思維是極右、極其保守。當時他的三個兒子中，一個是大電腦公司的總裁，一個是海軍的高官，他卻不認他們，一個都不認。

---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最終作出了〈關於對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複查決定〉，否定了王實味同志參加過托派組織一事，其中指出：

經複查，王實味同志1930年在滬期間與原北大同學王凡西、陳清晨（均是托派分子）的來往中，接受和同情他們的某些

托派觀點，幫助翻譯過托派的文章。在現有王實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對參加托派組織一事反反覆覆。在複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同志參加托派組織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王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sup>5</sup>

王實味案終於有了個公正的說法，王實味也被恢復了「同志」的稱呼，這已經距他被秘密處決有44年的時間了。

---

戴晴：我記得最後快平反時，可能因為文章，公安部的人還到我家來了，告訴我說王實味可以平反了。有一件事我這個書裏面沒寫，後來又寫過一篇文章，就說公安部當時給王實味家裏賠了一萬多塊錢慰問金，公安部說這些錢家屬沒有接受，但是家屬同意十堰市文聯可以代存這筆錢，每年的利息就用在每年的文學新人獎上，發獎金時要聲明是「王實味同志平反」慰問金。最後我還介入了，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心裏真是特別難受。有的事情不可改變，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我們作為經歷人，再把這個事情告訴社會、告訴後代。

---

1994年底，年輕的學者黃昌勇在探訪了王實味和他共同的老家——河南潢川之後，又乘火車造訪了十堰，當時劉瑩一家居住的地方。

5 《王實味文存》，編者朱鴻召，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12月第1版。

黃昌勇：當時我記得下了火車以後，下着雨，半夜也找不到地方。因為他們家離火車站還有一段距離。後來我自己在外面住了一晚，當時劉瑩已經說不了太多話，所以我跟她聊就是講她寫材料的一些事。主要就是跟他兒子聊天，我覺得看到他兒子，從照片上也好，或者從他的語言表達也好，完全是王實味的一個翻版，個性也很強。我在他兒子教書的學校住了五天，幾乎除了吃飯和休息以外，他每天都在和我辯論，除了講述一些歷史事實以外，幾乎都是和我辯論。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從他家到他們學校的招待所要跨過一條河，這條河非常有意思，是反向流的，因為河一般都是由西到東嘛，可是這條河恰恰是從東邊流到西邊。這條河的名字叫「強河」，倔強的強。我說你們住這邊，王實味的性格不就跟這條河一樣，堅持自己，打死都不回頭嗎？王實味的老家不在十堰，但是我對這個感觸很深。

黃昌勇最早發表的關於王實味的綜述，是在1994年第一期《新文學史料》雜誌上的文章〈生命的光華與暗影——王實味傳〉。王凡西在香港的好友樓子春看到這本雜誌，給他寄到了英國，王凡西看了之後在5月1日寫下一則日記：

作者摘引王實味夫人劉瑩於1985年7月向中共有關方面提出的「申訴材料」，其中提及王實味與陳其昌和我的來往情況，卻使我感到很大的失望與痛苦。在〈申訴〉中，劉瑩把其昌和我都說成說謊者。說為了「別有用心地達到他托派宣

傳的一絲目的」，我「完全對王實味撒謊」，隱瞞自己的托派身份。同時又說我為了籌措一筆錢來給妻子生產，需要王實味幫忙翻譯托傳，卻不告訴王實味托洛斯基是甚麼樣的人，直到王實味譯完「二章」之後，劉瑩才知道譯的是托洛斯基自傳，此時她才勸王實味不要再譯。對陳其昌，劉瑩說他隱瞞托派身份，而且連自己的地址都不告訴他們，因此引起了他們的懷疑，不久搬家，「從此與一般同學和熟人斷絕了來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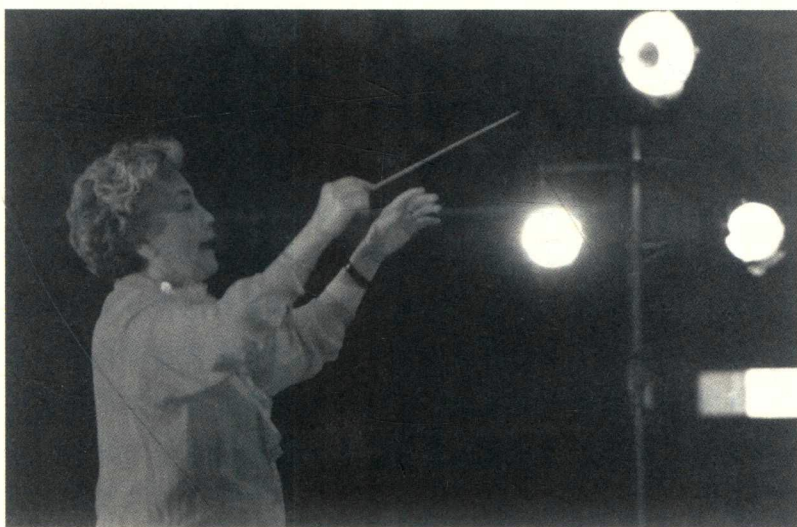
雖然王凡西明白，「這樣的『申訴』」，目的顯然是「為了給丈夫洗冤，為了爭取他的徹底平反」。他理解「她的這份苦衷」，但對於她「把王實味的，同時也是她自己的兩位老同學，形容得如此不堪，」讓王凡西感到心痛：這些陳述「怎能與王實味當年在延安所作聲明，即在他遭到批鬥前後，仍然說那二人的『人性是好的』這個事實相調和呢？」他說自己「本想給《新文學史料》的編者寫一封信，糾正那些不確之點」，尤其說「王實味譯完了托傳二章之後，仍然不知道托洛斯基的政治立場……未免把王實味的政治知識與認識說得太糟糕了。」但轉念一想，「更正信人家未必會登」，如果登出，又「必然讓這位受夠了痛苦的老婦人心中再添若干隱痛。」最後他說，「『身後是非誰管得』，隨它去吧！」這是王凡西最後一次寫到王實味。

在延安與王實味有過一年短暫婚姻的薄平，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一直被「限制使用」，從來沒有像其他那些在延安學習、工作過的人那麼風光。王實味的陰影一直籠罩在她的生活



中，她的音樂理想也未能夠充分得以實現。但是無獨有偶，她和劉瑩一樣，也是一位盡職的老師，以自己的奉獻贏得了很多學生的愛戴。到了老年的時候，還做了老年合唱團的指揮。隨着80年代末關於王實味文字的出版，逐漸豐富了王實味在她心中的形象。從85歲開始，她也開始逐漸用自己的文字來紀念這位昔日的老師和她生命中一段特別的交集。

薄平：我和王實味從師生到結婚，我們交往長達四年之久，可是我對他非常陌生。後來先是1986年左右，《毛澤東選讀》上給王實味摘掉了「王實味國民黨特務」的那個注釋，接着就是1989年戴晴發表文章，後來1998年朱鴻召發表《王實味文存》，2000年黃昌勇的《王實味傳》也出版了。我讀了這些東西就覺得，這個王實味的形象，不是我在延安認識的王實味，好像說的是另外一個人。他在我腦子裏就形成一個更立體、更完整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完全是一個奇特的、舉世難求的形象。從那時候起，內心就有一種衝動，我都已經85歲了，1996年是王實味的90周年，我就開始寫我跟王實味過去的點點滴滴，我有種說不完、道不盡的新的體會，我希望要盡我所能為他做點事。我對他心裏的那種親情、那種疼，來自我作為一個人能夠享受到的最好的東西，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是我最有人的尊嚴的時候。他關心你、從心裏頭疼愛你，這不是每個人都能得到的。他在我90歲之後成了我的一種感情寄託，我把他的相片放在鋼琴上兩幅畫的中間，前面擺了一束花，我想用這樣一種簡單的擺設來永遠懷念他。



上：50年代，薄平（右一）和她教的中學女生；下：1994年5月，薄平在鄭州指揮鐵路局老幹部合唱團演出《長征組歌》。

薄平付出了很多努力，一直希望能夠寫出她自己的回憶錄。我第一次去鄭州採訪她的時候，一進門看見她的鋼琴上確實放着一個相框，裏面是王實味僅存於世的唯一照片的複印件。為了讓更多的人注意王實味、知道王實味的故事，她也接受了幾次採訪，讓學者們對於她所經過的延安的時代有了生動的認識。

我2011年採訪王旭楓時，他還回憶了2004年10月，在劉瑩去世後的第二年，在朋友的支持下，前往山西興縣去尋找王實味被處決的地點，希望能夠祭奠一次他的父親。

王旭楓：因為年代太久遠，瞭解這段歷史的人不多了。甚至社會部駐地在哪？槍決犯人的刑場在哪？都沒人知道。後來終於轉來轉去慢慢找，終於找到一個退休老幹部，他叫白應和。他的這個名字，和他這人的氣質差不多，真是有求必應、態度和藹得很。他告訴我，當時社會部大概是在蔡家崖，那是一個很大的鎮；社會部大致確定是在一個溝裏邊，那個村就叫「木欄杆村」，具體哪幾個字不太清楚，因為當地人說山西話，我只能聽個大概，也就隨便寫下了。中央社會部就隱蔽在那裏，我去看了一下，確實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地方。那村後邊有一個很開闊的大溝，是槍斃一般犯人的刑場。我們進去到右側，還有一條又深又細的澗溝，我父親就是那裏邊被處決的。當時有一大幫同志參加祭奠，還寫花圈甚麼的。我們進村時，天上還是一片陽光，在村裏邊坐了一下。當我們往溝那邊走的時候，天就有點慢慢地發暗了。等我們把一切都佈置好了，放了炮，我又說幾句話，那個地方陽光就完全不見

了。當時天色暗下來，我就覺得有一種莫名的感情湧上來了。當時我就說，「爸，我們這麼多年來……這麼多年來都沒來看你，也不知道地方。現在呢，媽她也已經走了。按中國的說法，應該也到你那個世界去了。現在我來，也代表我姐，一起來看你……」

---

說到這裏的時候，王旭楓先生忍不住掩面而泣。過了一會兒，他才慢慢平靜下來，告訴我，「當時上來的那個情緒，比現在還要強烈些。」

---

王旭楓：我們按照祭奠的習慣燒紙、點燭等等，等我們把祭奠的程序都走完了以後，就開始下雨了。我就跟那些同志說，你們趕快去避雨吧。他們這一大隊人馬就往村裏邊跑。他們沒跑出多遠，雨就下大了，我在後邊捧着靈牌，也沒躲雨，慢慢走，慢慢想。你說怪不怪？當我們走到木欄杆村村長家時，居然天又慢慢變好了。當我們走出這個村的時候，天上又大放光明。哪來這麼一陣雲彩呀？我不迷信，也不相信甚麼天人感應；可去的那些人，鎮幹部、村幹部，他們都大感驚訝，後來吃飯的時候還一直說這件事。歷史記載上說，我父親被砍殺以後，就推倒在枯井裏邊。但是白應和老人就告訴我說，可能不是甚麼枯井，而是在潤溝裏邊，過了這麼多年，到雨季的時候漲水，埋他的土也可能都被沖掉了。但是我心中就想，還是要取塊土回去，我父親的血總是順着這個溝淌下來的，對不對？物質不滅，他身上的物質總會在這一片大地上有所反應吧。

所以我就取了一捧土帶回來，後來把那個和我母親的骨灰埋在一起。

---

在我關於王實味的採訪中，一再被討論的仍然他為之投身創作、為之投身革命、以致最後為之所付出生命代價的「人性論」。也許正是他這樣倔強卻純真的人格，可以在時隔多年以後，很多在延安的當事者看盡了人性扭曲之後，才明白他堅持的真理，才會不遺餘力地為他平反。回望歷史，不僅王凡西談到自己的兩位老同學王實味和胡風時，覺得他們命運類似，其他的學者作家也會把他們做比較。

---

戴晴：王實味和胡風他們兩個，在他們所謂的價值系統來講，今天用大家都容易接受的話，根深柢固、不可轉移的就是他們的普世價值觀，就是「人」最根本的權利：人的自由、言論、平等、公正。至於怎麼使得我們能夠達到這樣一個社會，王實味，包括胡風，就是希望通過共產黨這個辦法。接着就是表達的方式：胡風是很有號召力的，在淪陷區裏辦雜誌；王實味呢，雖然他的任務是翻譯馬列著作，但他一有表述想法的機會，一下子就說到點上，這是由他的才華來決定的。第三個就是他們的性情，他們倆都不是那種「見風轉舵」的人，中國老話那套，甚麼「出頭的椽子先爛」、甚麼「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等等，他們都不接受，他們非常驕傲，認為自己是革命者，自己做的是最純潔的事業。於是，你嚇不倒我，就是所謂的「軟硬

不吃」。我後來採訪了那麼多人，他們都覺得王實味沒甚麼錯，可是太不可愛了。

---

我在2011年春天訪問王旭楓的時候，已經比黃昌勇初見他時遲了十多年，我對於他的感受與黃昌勇完全不同。他也再次把王實味那張小照拿出來給我看，家裏也擺着父母的牌位，他一直在關注着所有和王實味、和延安整風有關的研究，但是他自己也從生命的歷程中感受着父親對於馬克思理論的修正理論：人性論。

---

王旭楓：人會慢慢老，如果人已經糊塗到沒有意識的話，也就談不到甚麼「人性」了。可是我現在一點也不認為「人性論」有甚麼錯誤。我還跟你說一句玩笑話，共產黨講的是「階級鬥爭是歷史前進的動力」，我想把它修改一下，我這個修改可能是個「小修正主義」、也可能是個「大修正主義」。我認為「人性」，它才是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

---

聽了王旭楓的話，看到他思考的結果，回到了王實味的人性論，我必須繼續思考。思想究竟可不可以改造？思想需不需要改造？政治家和藝術家是否有可能理解對方？這些問題，我們還會在本系列的「胡風卷」和「王凡西卷」中繼續討論。



# 附錄

- \* 本書作者到日本京都訪問學者竹內實先生時，對方送她十幾本30年代的研究筆記，當中包括一本1930年的《展開》雜誌，裏面有王實味一篇其他現代文集裏未曾收入過的中篇小說〈三代〉，還有王實味從英文譯文轉譯的所謂「被托派篡改過的」列寧的〈遺囑〉，特原文未經修改收錄於此，以伺讀者。文中註釋則為本書作者所新增。



### 三代

王實味

“沁兒，看，你底頭髮呀，蓬亂得就像雞窩。剪髮也該天天梳理一下啊，懶孩子”。

在一個靜悄悄的小院中，西廂外屋檐下，正坐着一個老人和一個少女在晒太陽；老人一面說一面撫摩着少女草樣的短髮，同時癟縮的嘴巴上掛着微笑，慈愛的，優然的。

回答也是一個笑，一個裝作狡憨的笑。說裝作狡憨是因為她蒼白瘦削的額上，兩道不大女性的黑眉在緊緊暫蹙着。

接着，像忽然想起了答語似的：

“爸，不是懶，是因為我底梳子被瑜侄兒打斷了，又懶得去街上買”，依然笑着，但這笑的笑之成分較先前更微更淡了。

“瑜兒呢？還沒起來嗎？”

“齊媽說還沒醒。”

“唉……！”

老人抬頭看了看初雪新晴後的天空，不自覺地嘆了口長氣。但一意識到自己發了嘆聲，便立刻低下頭來用手撫摩女兒的亂髮，並用昏花的眼吃力地看定她那蒼白的面孔。

“沁兒，怎麼像不快活的樣子呢？”——強笑着。

老人看見少女的嘴在笑，但她那雙黑的大眼中是含着什麼表情，便不是他那昏花老眼所能察看出來的了。

“沁兒，今天是臘月初五了，你民哥整整一月沒寄信家來啦，是不？”

“真的，爸好記性；民哥許是趕年考忙哩。今兒初五，——呵，後天是……”女孩子忽然想起了什麼事要說出，但忽然又忍住了，眼眶中噙着淚珠。

“後天，後天是你大哥大嫂的忌日是不是？孩子，不要想這事，不要提起他們逗我難過。他們的死是自作孽，是過於中了新思想的毒了，雖然我深知道，他們都是好孩子。最使我傷心的是，你二哥竟在他們死後兩個月又蹈他們的覆轍，不但自己送了命，還——”老人說到這兒已經涕淚泫然了，“還帶累你母親悲傷致病，一臥不起！不過，唉，沁兒，他從發蒙入學直到中學畢業，差不多是我親自教養成人的，他是一個多麼聰明可愛的孩子呀！不料也誤入了迷途，斷送了性命！唉，爸爸一生無惡行，也許是前生造了什麼大罪孽吧！”

女兒頭伏在爸爸懷裏，爸爸俯首吻着女兒底亂髮，一雙父女在微溫的陽光中無語哽咽着。死寂的小院中，除了那少女的輕輕抽噎聲而外，一點聲息沒有；院中央兩盆瑞香花中間側臥着一頂黑花的小白貓，琥珀樣的眼珠一霎不霎地呆瞪着那啜泣飲淚的父女，他像連呼吸逗不敢過重似地。

忽然，堂屋中傳出了兩聲兒童的哭聲。

“唉！沁兒呵，別哭了罷”，老人先恢復了平靜，摸弄着女兒底兩頰說；“他們死已死了，忘記他們吧，你一向不也是這樣勸慰爸爸麼？為了伴我，你已經輟學一年了，在這種陰慘的家庭中，你是哀傷消瘦得不像樣兒了，沁。寒假後，我底意思還是要你同民哥一路到省城復學去，我不忍見你在這淒涼的空氣中斷喪你底青春。聽，小瑜兒在哭，去看看，等齊媽穿他好了，吃過奶，抱他到院中來。”

女兒拭乾了淚，站起身手扶着爸爸底肩立了片刻，又假了喂爸爸底臉才緩步走向堂屋去。少女去後，老人從衣袋裏取出一付大墨鏡來，用手絹拭了拭戴上向堂屋門外注視着。

約有十分鐘以後，少女抱着一個不滿兩週歲的男孩走出來，後面跟着個三十歲模樣的奶媽。

“爸，瑜兒真乖喲，一醒來就喊：要爺，要爺。”

“好，來，爺抱抱。”

孩子從少女的懷中撲向老人，發出銀鈴樣的笑聲。

“爺買糖！爺買糖！”一面嚷着一面用小手兒抓弄着老人花白的短髮。

“老爺，你老人家看，孫少爺，這幾天更胖了。——不是麼，小姐？”奶媽說。

“沒有爹媽的孩子倒是長的結實，唏……！”老人又不自覺地長吁了一聲。

“爺買糖呢，芝麻糖，瑜要吃，要吃芝麻糖，”孩子依然抓弄着老人底鬍鬚姣呼着。

“好，爺待會兒上街去給瑜兒買，”老人在孩子蘋果般的小腮苞上吻了一下。

“要沁姑姑抱，要沁姑姑抱，”玩老人的鬍子玩膩了，小孩又掙下地跑到沁姑姑面前糾纏。

沁姑姑抱了不久，他又掙下來去玩那個小花貓。他摸牠底耳朵，撫牠底背，扯牠底尾巴，把牠從地下抱到椅子上。不久，又膩了，終於哭叫着：“要上街，要上街！”

奶媽把他抱到街上玩去了。

孩子去後的老人與女兒，頓時感到無限的沉寂。廚娘蘇媽送了茶來，但老人並不吃，只忘神地隔着大墨鏡凝視着茶杯。

少女到室內取了本陶詩看着，但每隔兩分鐘總要抬頭看看爸爸，烏黑的大眼睛濕潤潤地，書中的字並印不到腦中去。

這本是一個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家庭，老人李慕白是縣中有名的清高有道的人。因為祖上有點遺產，他在滿清時一第後就縱情詩酒，不事生業，不求上進。辛亥革命前他也曾奔走呼號，但革命後看見國家社會依然是一團糟，一革命就有光明世界出現的浪漫理想受了打擊，他就心灰意冷地回到家來閉門課子，種花飼鳥，過他優然的城市隱逸生活。

雖然不求宦達，不與社會人士多接觸，但慕白先生卻並不忘記讀書。不惟中國的舊籍滿堆在案頭櫥上，就是西洋的文

學哲學書籍，自嚴幾道以至林琴南的譯品，他也都儘量地郵購着瀏覽涉獵，因此，他雖是過着隱逸生活，卻是個頭腦嶄新的共和民主國國民，並不是那種爛臭的舊名士之類。可是生不逢辰，他底時代是連腐敗的所謂民主政體也要沒落，也要蛻殼兒變成另一種新人類社會的時代了。

慕白先生一生最引為自慰自豪的是，他比縣中一班人有着更為清秀聰睿，頭角崢嶸的兒女。大兒伯彝，二兒仲華，三兒叔民，第四的雖是女孩，但慕白先生並沒有那種重男輕女的思想了，就挨着排行取名季沁，然而，正為着他有這些可愛的兒女，他底生命遭了特殊意外的創傷了，這創傷，是無情的時代所給與的。創傷是那樣深刻，那樣劇烈，瀟灑曠達的慕白先生也不得不在這五十二歲頭上，就變得鬚髮斑白，額上滿佈着縐紋。他那僅在兩年中就佈滿了額上的深而長的縐紋，是有着那樣的力，如果不是他底所謂陶養，他底為弱小者的系念拉扯着他，也許已經把他縛進坟墓去了。

事情應該從一九二五年說起。在這年的五月卅日，上海的大英帝國主義者把中國人像豬羊一樣在南京路屠殺了許許多多，革命的怒潮便因之激蕩起來。就在這年十月，慕白先生接到了大兒子一封長信，原來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只差一學期畢業的伯彝已不待父親應允，決然往廣東黃埔軍官學校作入伍生去了，信是在天津上輪前發的。伯彝在這封信裏寫着他在五卅慘案發生後是受了怎樣的刺激，半年來他是怎樣地拋開了空疏的宇宙論人生觀的哲學課本，怎樣地埋頭研讀馬克思，列寧的政治經濟偉著，怎樣地認識了現社會的不合理與矛盾，以及怎樣地了解了一切落後的中國受列強帝國主義壓迫宰割是必然的；

最後，他底結論是：中國只有同蘇俄一樣行 XX 主義革命，進而撼動世界革命，才有真正的出路。這封信雖給了慕白先生一個不小的驚詫，覺得未免“過激”，但少年人心地光明，感情熱烈，他很能了解，並覺得不愧是自己的兒子，反因之感到點兒驕意。他以為這些話只是志向遠大的兒子的抱負，並不明瞭它們底含義，更沒夢想到這些話頃刻就要從言論見之於行動！

不到一年，北伐開始了，慕白先生接到伯彝的信說已奉委任為第三軍某團的團指導員，隨軍北伐，不久就會達到江西來與父親團聚。果然，不到四五月，由湖南而湖北，由湖北而江西，——打到江西了。不但兒子回來了，意外地還為他帶了個又英勇，又美麗的兒媳來。姓朱，湖南寶慶人，叫朱猛，不但名字不類女人，那打扮也簡直是丘八，同伯彝一樣地穿着灰軍服，掛着斜皮帶。這給與慕白先生的是一個大大的，大大的驚喜，尤其喜歡的是聽兒子說媳婦肚裏已經懷了個兩月的孫孫。兒子媳婦在家裏共住了兩天，這兩天中慕白夫人底嘴簡直合不攏來，老是笑着。婆婆勸媳婦在家裏養息着，但媳婦卻不聽那些，第三天依然伴着愛人往南昌去了。

這期間，社會上起了慕白先生不曾想到過的劇變。據他想，革命軍到來不過換換統治，把軍閥任用的壞官吏攆走甚至殺掉，做些有益於地方和人民的事就算完，誰知竟全出乎他意料之外。前此被人卑視的工人，農人，他們組織起了什麼工會，農民協會，簡直氣焰萬丈，社會上的上流人士倒消聲匿跡了。甚至於，有些紳士都被他們拴起來游街，拷打，或者殺掉了。說他們是土豪劣紳，不錯，他們都是些壞東西：但有罪也該由官廳懲治，這種行為是太違反常軌了。於是，對於有些事

他就繃眉，搖頭，甚至不快了。可怪的事是，兒子伯彝在家的兩天中，也曾去參加那什麼會，高聲喊着打倒這個，打倒那個，當晚他曾經告誡兒子，要他不可亂來，一切得慎重些。但兒子只是笑，不加解釋，也不加辯駁。他心裏想：像父親這樣年紀的人是不能夠了解目前所發生的一切的。這時，還有一件事使慕白先生大感不快，就是，兒子們差不多都失了學。伯彝不用說了，在北京藝術專門學着音樂繪畫的仲華也跑到武漢做起政治工作來，省城裏學校都不上課，叔民季沁也都在南昌亂跑亂跳，游行呀，講演呀，慰勞呀，鬧個不休。像這樣下去將會成個什麼世界呢？——慕白先生與老妻談起時老妻繃着眉頭這樣說。

一九二七年的三月，兒子發表了萍鄉公安局長，他勸止兒子別就，但兒子卻不聽。四月，上海的反動新軍閥，帝國主義的忠狗開始屠殺無產階級了；八月，武漢的所謂左派政府也開始屠殺無產階級了。白色恐怖彌漫了江西，慕白先生底眉頭可為了另一種原因而繃着。這時，他因為在半年中受了許許多多的刺激，神經有些疲鈍了，於是他發生了逃避刺激的哲學：變亂相循，過相當時期自然轉到太平。然而——然而呀，一個意外的大刺激使他想逃避也無從逃避了！

兒子媳婦都是共黨！在萍鄉領導着工人農人暴動！一師的白色軍隊開到以後，工農革命軍潰散了，兒子媳婦被捕了！跟着被擄的還有個未滿五月的嬰兒！呵，許是資產階級的仁慈吧，慕白先生沒有被株連。一對青年男女解到南昌以後慕白先生妃纔得到消息，趕到省城是臘八節，兒子媳婦已在頭一天鎗決了！感謝資產階級的深仁厚澤，准予殮屍，准予具保領嬰

兒，於是，兩個死者都留有一滴骨血！嬰兒和兩具棺木到家時，夫人，民兒，沁兒，與自己同路扶柩歸來的華兒，大家都哭得死去活來，但他卻冷靜地說：哭有何益呢，他們底死一半是受了新思想的毒，一半是自作孽！但他心裏卻酸痛地想：一對可憐可愛的孩子呀！

是的，他所能理解的兒子媳婦，只是一對可憐可愛的孩子，純潔，熱血，走進了迷路，送了命。但事實卻全不是那麼回事。他們除了純潔熱血以外，還有堅定的信仰，強韌的理智，洗練的思想，他們是把生命殉了這一切。這父代與子代之不能了解，正反映了舊人類沒落新人類興起時期的矛盾面。社會上也許有些人比慕白先生更不能理解這人類前史落幕時的種種，更頑固地作些落幕後的稽稽跳舞來延長正史開幕的時間，但那畢竟是垂死人彌留時的喘息一樣，頃刻便要成過去的。

死氣沉沉地過了所謂舊曆新年，新正初五日二兒子仲華便向慕白先生說要去北京藝專復學，經過母親含淚的勸止，但孩子卻執拗着非出門不可，雖然是拿些理由極溫和地論爭。這是老夫婦最鍾愛的一個兒子，看着他在家裏捐着，一天天消瘦，覺得讓他回北京學校去散淡散淡也好，他終於在初九日束裝就道了。在動身的前一夜，父親，母親，弟弟，妹妹，都聚集在他底房裏，囑咐東，囑咐西，而慈愛的母親更一壁流着淚一壁顫聲地叮嚀：世道亂，出外一切要小心，安分讀書用功，別多管閒事。再四再五地催促，兩個老人才去睡了，剩下三個兄妹是默默無言，只季沁眼睛裏含着淚珠。弟妹是懂得哥哥的，他們知道哥哥離家並不是要去北京復什麼學，而是要出去找他生命的活躍；在所謂元旦那天來拜年，同哥哥小聲密談了許久的



那位青年羅邁龍，是他們在南昌時見過而且知道是何如人的。“弟弟，妹妹，我並沒有許多話要對你們說。你們當已知道，我這次離家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回來了。父親母親是愛我的，我心酸地感動，但我在家這一月中，內心的痛苦與毒恨無日不嚙咬着我，像這樣悶下去我怕會悶死的。我走後你們只要好生侍奉他們，不要向他們露一點聲息。其次，小侄兒須加意照應，他是大哥和嫂嫂偉大精神的結晶，也是新人類的萌芽。好了，你們去睡罷”。這篇話使弟弟妹妹哽咽着，哽暗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他們想勸哥哥不走，但他們的理智使他們不能如是說。

三個兒女一夜未睡，是兩位老人所不知的。清晨的寒風中，只有叔民一個人送哥哥往碼頭搭小火輪。老太太把兒子送到大門外。“仲華，在外面一切總要小心謹慎呀！到九江，到上海，沿途都寫封信回來！”——一顆慈母的心像完全溶化在這兩句話中了，聲音令人聞之酸鼻，一切情感都已理智化了的仲華也忍不住落下幾滴熱淚來；但他終於跟定挑夫頭也不回地去了，去了。

七天過了，九天過了，九江的信不見來；半月過了，二十天過了，上海的信也不見到，——這簡直把老太太急瘋了。像預感到了一個新的不幸似地，她天天坐臥不甯地盼望華兒的消息，每到晚上便淚流飲泣着。慕白先生也開始感覺不安了。過一天就比一年還要長，日子比那兩局棺材和嬰兒初到家時還覺陰慘。叔民和季沁想盡種種方法安慰母親，但只有加多老人的淚水望外流，而他們自己也常背着父母談到大哥嫂之死和二哥之去而在清晨或深夜作楚囚對泣，傷心中燃燒着悲憤。

如我們所已知的，仲華也在白色恐怖之下犧牲了，地點在武漢，時間是他離家後的一月零兩天。消息是這樣傳來：慕白夫人的堂弟是在漢口經商的，一天在大智門車站後看見他同一個戴鴨舌帽的鐵路工人同道走，他向外甥招呼，請他往家裏玩，他答應着好，轉倏便在人叢中不見了，以後再也沒有看見他。不久，戍衛部槍決共黨，他底十三歲小表弟去看熱鬧，看出了車中有一個褪去了上衣，脊背上滿是鱗傷的確是他底表兄李仲華，雖然他背上插的“亡命旗”是寫着“共匪首要張受清一名”。聽見兒子報告的堂舅，事後曾到刑場去偷看屍身，從相貌和左耳門外的一顆小小贅瘤，證實了確是外甥。因為當時的白色恐怖正是慘酷萬分，殺人如麻的時候連想收屍都不敢。

舊創尚未合口的一個新創！這創傷把慕白夫人帶到另一個世界去了！在三個月中遭遇了這樣多重大變故的慕白先生，生命像被奪去了大半，他衰老了。事變後的最初幾個月，一家中除了那繖袍中的嬰兒以外，父，子，女，甚至連僕婦也都跟着過那以淚洗面的生活。後來，慕白先生覺得讓僅存的一雙未成年兒女長在悲哀中浸着有些不忍，遂強自鎮靜起來，常帶着他們出去散步，每當他們談到死者，便拿別的話岔開，更進而用曠達的話開導他們。家庭中漸漸地有了點活氣。但慕白先生雖理智上想為生着的兒女忘去那些死者，死者卻依然在夢寐中縈繞着他，而屍身不知落在何處，就死前被打得鱗傷遍體的二兒，更常使他一想起便心疼欲裂！

長子夫婦的死，他所感到的是痛惜，是悲傷，同時還有點覺得是咎由自取。自己最喜愛二兒的死，——殺他的人是那樣殘酷！而他的死是那樣淒慘！——緊接着的因悲傷致命的夫人

的死，卻是在肉體上使他衰老得失去了大半的生命，在理智上感受了更深刻的複雜的刺激。第一，他感到了現時的統治者是比较豺狼更凶毒，心裏燃起了一種忿恨；第二，他感到了孩子們之拋開安樂的生活去受罪苦，去死，並不一定是如他前此所推想的誤入迷途，而是有着一種純潔偉大的意志在支配着他們，着使他對於自己兒子的他們也起了幾分敬意。不過，他對這些都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沒有理解，沒有認識，因此，為要保全他底僅存的愛而愛女，他對叔民季沁談起伯彝仲華時，依然說他們是自作孽，是中了新思想的毒。

新秋了，慕白先生親自把叔民送到南昌去復學，並託了位朋友照顧。季沁本也被他帶到了省城去繼續她女子師範學業的，但他臨歸時想到一個人在家中將是怎樣地悲哀寂寞，終于又把她帶回家來了。種種花，讀讀詩，攜着女兒出去散散步，抱抱孫孫，雖然這前此舒適安閒的家庭變成了淒涼不過，悲哀更無日不有一時要來襲擊他，日子倒也容易過去，現在，可是臘八節在眼前了。

此刻，是晚飯後。

天色變了，寒風嗚嗚地刮着，像又想下雪的樣子。慕白先生在前進空屋中視察了一遍，親自關上大門，把腳步一寸一寸地移到後院，移到堂屋中。兩個女僕在燈下做活計，女兒在拿着個紙老虎逗着孫兒玩。

“看呵，小瑜，爺進來了，”他剛拉開風門跨進門限，女兒便指着他告訴孫兒。

小孩子搖搖晃晃地走到他面前，

“瑜兒真是乖乖的小寶寶啊，”他抱起孫兒把鬍子嘴吻在那玫瑰瓣兒樣的小嘴巴上。

孩子喜歡得把身子一聳一聳，手中的玩具鑿鉞兒連連地拍着。奶媽也停了針線，遠遠地瑜呵瑜呵，寶寶的瑜呵地喊着湊趣，融融然的空氣使人忘記這三代的家庭是如何地畸形，以及造成這畸形的悲慘故事了。

“爸，你看我給瑜侄兒打的這毛繩衣好看不？”女兒說，從桌上取了件淡紅色尚未織成的小毛繩衣給爸爸看。

“好得很，瑜兒穿起來更可愛了。”

玩弄了一會兒孩子，同女兒和傭婦們談了幾句閑話，他一個人回到自己住的西廂中來了。每天，挑燈獨坐的夜中，一切不遠的往事照例來襲擊他；此刻因為天氣的陰霾晦暗，更使他一踏進房門便覺心頭像壓着大石，同時可像有一種辛酸潑辣的滋味在肚裏激盪。他已經有了充分的經驗，知道把舊的創口撥開是痛苦的，是難忍受的，於是他拿出數年前自信已經深入三昧了的程周陸王式的性理陶養來平靜自己。他節勻着自己底呼吸，把眼睛無視地微合着，在室內輕緩無聲地蹙蹙，希望能心靜神安，忘物忘我。可是無效，心裏重壓不曾去，而那辛酸潑辣的滋味是更洶湧地往上衝。他不得已在書棹前坐下，閉目斂神，實行所謂禪定，但內在裏激盪着的東西是再也鎮壓不下去，窗外山魑般嗚嗚叫着的寒風像在為牠助勢。

最後，他睜開眼來隨手取一本史記看着，想把自己的心躲避在文章裏，——太史公那抑鬱雄邁的筆調是他所酷愛的。然而，看不兩行，堂屋中孫兒的哭聲使他心頭像刀刺樣疼了一

下，接着，電樣快，腦中浮現了兩具胸穿額碎的屍體！

唉——！一聲拖長的咳嘆，跟着心裏一酸，淚水泛出眼眶了。

像映演電影一樣，腦子活動下去：掛着斜皮帶的英勇的兒媳，……兩具血跡模糊的死屍……棺材，……五個月的嬰兒……——二兒的噩耗，……戴鴨舌帽的鐵路工人……張受清，……遍體鱗傷！……遍體鱗傷！……呵，比豺狼蛇蠍更狠毒的統治階級！……——痛苦昏厥的夫人……吐血，……臥病，……死！……死！

突然，一陣大門被擊的響聲，使他悲慟憤激迅急循環着的血流停緩了一下。

“老爺，信；——快信，要蓋圖章，”出去開門的蘇媽一面說一面把手持的一封帶收據的快信遞給他。

聽說有快信來的季沁也飛步跑到爸爸房裏來了。

“是你民哥的信，沁，”女僕拿蓋過章的收據去後，老人一面向女兒說着一面拆信看。

“噯噯！民哥怎樣到南京了呢！”眼光明快的季沁已看出發信地址之寫着南京什麼地方，接着又看見低下是：“呵呀！第一監獄！”

把厚厚一疊信紙抽出了半截的慕白老人，聽了女兒的驚呼，持着信的兩手開始抖顫起來。

父女兩個共同看信：

我最親愛的父親！

在你未看信以前，我先請求你鎮靜些，看後不要太為我傷心，太為我悲慟。我執着筆覺得有許許多多的話要向你說，但不知從那兒說起好，終於，我決定先告訴你一個消息：在你讀這封信時，你底民兒，繼續着成千成萬為主義而流血的青年，繼續着他底哥嫂們，大概已被現時統治階級，狗彘不食的XXX<sup>1</sup>斬決或鎗斃好幾天了！……

老人看到這兒已經感受了死之打擊！但他不哭，不暈厥，他底血液和肌肉冷縮，冷縮，冷縮，使他覺得自己像變成了一個鐵鑄的人，而他底腦與心是在熾燒着原始獸性的毒恨之火焰，牙齒咬嚼着像要把那些狗彘不食的東西們拿來寸割寸磔！

女兒昏倒在地上了，他繼續把信看下去——

……父親，我很知道這消息在你是怎樣一個致命傷，但如果不寫信告你，則此後讓你抱着一顆創傷重疊的心，朝夕懸望着不知下落的僅存的民兒，那更是多麼悲慘呀！而且，我還希望這信能使父親對於你失去了三個兒子得到較深的認識，能使父親忘去悲哀而獲得新的生之力量，把這力量致獻給孩子們犧牲以殉的信仰。

父親，正如大哥二哥一樣，我也是一個XX主義<sup>2</sup>的信徒；也正如大哥二哥一樣，我沒有讓你知道。大哥二哥之死，不惟沒有使我的信念動搖，倒更使我在感情上得到激勵，誓要踏着牠

1 此處指國民黨。

2 此處指共產主義。

們底血跡與反動勢力作殊死戰。母親為二哥哀慟而死後，我們家中的情形是那樣地淒慘，看見可憐的父親在年餘中變得衰老不堪，幾乎也要被悲哀吞去，使我累次想離家又累次不忍。暑假後我和妹妹倒南昌復學，你親自送我們到校，但妹妹終又隨你回家了，為了你那滕王閣畔老淚橫揮的囑語，我也確曾在初到南昌的一月中埋頭讀書，輕易連校門都不出。但不久，我底理智與激沸的熱血就把我骨肉的繫念情感戰敗了。父親！如果你能了解我是怎樣地為了骨肉感情與主義而在尖利灼熾的痛苦中掙扎，終於纔拋棄了骨肉感情，你當不至以我為不肖。

在三個月前，我重行參加了XXX<sup>3</sup>的組織。父親，你是個接受社會主義思想的人，不過你反對無產階級用暴力革命，反對流血的恐怖鬥爭；要知道，人類生存依賴者的無產階級，生產一切的無產階級，在過去奮鬥史中曾有許多次被資產階級欺騙或用白色恐怖壓服下去，到今依然在不勞而獲的壓迫統治者蹂躪之下呻吟着，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使他們非用暴力的革命，流血的鬥爭來澈底毀滅現社會不可了！

加入了組織之後，我把整個生命都獻與了牠，為牠而活動着，很少回學校去過。我先做學生工作，但我因為熱血激漲太利害，便感覺學生工作的平凡沉悶。後來我做碼頭工人的工作，自己也化裝成了碼頭小工，終天與那些血腥汗臭的勞動者交接，纔從那些粗黑健勁而赤裸着的臂和腿之中找到了興奮和愉快。二十天以前，就是我最後復你一封家信的第二天，我們X內有重要使命須人來南京接頭，沒有相當人來，我就自告奮勇來了。

3 此處指共產黨。

從南昌到九江，從九江到南京，一路上都平安無事，誰知道了下關進城時，為了箱中一本不關緊要的小書被檢查出來，我被扣留了。也怨自己疏忽，小書還是在南昌放在一件短衣的口袋裏，臨行時忽忽把衣服放進箱子，把牠忘去了，我來南京所帶的重要物品，其實還在我貼身裏褲的插袋中。既然被扣，知道必定會在身上搜檢，趁幾個可憐又可恨的兵把我解送狗戍衛司令部時，我把一件有接頭地址和人名的文件掏出放進了口裏用力嚼。其時已被一個狗排長看見，他把我打了個嘴巴，並要從我口裏搶那文件，等他和兩個士兵硬掰開了我底嘴，兩張紙已嚼得糟爛，一個字也看不清了。我心裏感到一種輕鬆，但狗們卻因此把我底兩手背綁起來了。

一解到狗戍衛司令部，就由軍法處審我。因為在我身上搜出另一件他們看不懂的東西，他們知道我是個比較重要的分子，遂開始刑訊，但我咬着牙一字不答。一個蓄八字鬚的胖狗問我嚼碎的是什麼，我只向他作獠笑，故意使他急躁，他也無可如何我。七天前我被移押到這第一監獄來了，住的是一間有鐵欄的黑暗小房子，與他犯隔絕，是特別為XXX<sup>4</sup>而設的。

到獄中來的第二天，一個狗軍法官帶兩個衛兵又來審我。他用特備的刑具叫衛兵拷打我，炮烙我，但我依然沒招出一字。第三天又來一次，依然得不到我半句他所須要的招供。直到大前天上午，才把我送到一個法廳模模糊糊判處死刑了，執行期大概就在三幾天內。記得我從狗戍衛司令部被押來第一監獄時，曾聽一個兵說地方是在什麼老虎橋畔，父親呵，狗彘不

4 共產黨或政治犯。



食的XXX<sup>5</sup>統治真是比虎狼還要狠毒呀！父親！盡你底力量為無產階級革命作前驅，推翻這狗統治罷！

判定死刑後我被移入待決室，生活也比較優待了。這室裏還有幾個狗XXX<sup>6</sup>的俘虜，有兩個是與我一樣的罪名。父親！為了要使你更了解你底孩子們，為了要使你從致命的悲傷中求活路，我央求了一個尚有人心的獄卒，說要在垂死前寫封信給老父，才得他為我弄了紙筆，並允許代為寄發，想這信當能達到你底目前。

最後，我告訴父親：妹妹雖然較我小好幾歲，但她地思想也早已受了XXXX<sup>7</sup>的洗禮，為了心性較柔，為了不忍背離父親，她還在你底身畔。不過，長久下去，悶苦悲哀和憤恨也許會使她斷喪而死，如果父親是愛她的話，你應當伴着她去做澈底毀滅這現社會的工作！去做重新建立新人類社會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工作！

這封信是我一整天中屢輟屢續，忍着創疼寫成的，想說的話還多，但也無力寫下去了。永訣了，我最親愛的父親！

你底民兒

慕白老人在一種無可形容的心理生理狀態之下讀完了這封信，終於仆倒在昏厥未醒的女兒身上。

5 國民黨。

6 國民黨。

7 共產主義。

# 遺 囑

蒼滄轉譯

(正如許多列甯的遺言遺著，以及許多反對派的重要文件一樣，這重要的列甯遺囑也被蘇聯黨的官僚統治者斯塔林布哈林等隱匿起來了，為的是這遺囑嚴厲地批評了斯塔林，並囑黨把他從黨的秘書長的位置調開。此刻是根據遺囑的見證者之一 Max Eastman 的英譯文重譯的。據 M. E 說，他底譯文是完全的，毫無訛誤的，雖然斯布的黨徒們都拼命否認，並在 XX 黨各機關報上拼命否認。)

“我從前曾說過要使中央委員會鞏固起來，意思是，要儘可能地採取一種處置以防止破裂。因為，那魯斯加牙米斯爾 (Russkaya Mysl) 的白軍首領 (我記得是歐登保) 是有見地的，他活動反對蘇俄的時候，第一就佇望我們黨發生一個破裂，其次，他希望那破裂由於我們黨中嚴重的衝突。

“我們黨憑倚於兩個階級，因此，不鞏固是意中事，在這兩階級中如果沒有一種融洽，黨的墜墮是不可避免的。在這種事態中，想行任何處置，或泛泛地討論怎樣鞏固我們中央委員會，是無用的。在這種事態中，沒有十分有效的處置足以防止破裂。不過，我相信那該是在很遠的將來，那該是很無發生可能的事，就目下談起來。

“我覺得，在最近的將來，鞏固乃是破裂的一個保障，在這兒，我想對於幾個純屬個人性格的值得注意的地方加以檢查。

“從鞏固中央委員會的觀點上看，牠所以需要鞏固的基本原因，乃在於中央委員會有斯塔林和托洛斯基這樣的委員。依我看，他們間的關係實造成了那種破裂的大部分危機；那種破裂是可以避免的，依我看，把中委會的委員人數增加到五十名或一百名，就足以增進避免破裂的力量。

“斯塔林同志作了秘書長，把大權攬集在他底手裏，但我可不敢說他是否常常知道怎樣審慎地去行使那權力。另一方面，托洛斯基同志，從他對於交通設計人民委員會（Peoples Commissariat of Ways of Communication）問題對中委會的抗爭看來，不僅使人知道他是個有特殊能力的人，——確切，就個人說他乃是現在中委會中，最能幹的人，——也使人知道他是自信太過，而他底稟性又太易於被事體的純屬政務方面所吸引。

“現在中委會中這兩個最有能力的領袖底這兩種性格，怕很坦白無知地會引起一個破裂；如果我們黨不設法防止他，一個破裂會出人意外地發生的。

“我不願再多描摹中委會其他委員的個人性格。我只提醒你們，十月革命中濟諾維也夫（Zinoviev）和加門內夫（Zamenev）的事件，當然，不是偶發的，但那正如托洛斯基從前的非布爾雪維克一樣，不應當利用來反對他們個人。

（蒼滄按：這兒所說托洛斯基的非布爾雪維克，乃係指1604以前托洛斯基屬於門雪維克與布爾雪維克相抗時代而言，斯塔林等常拿這與所謂托洛斯基主義連起來攻擊托洛斯基，其實一個革命者一生決不能不做錯誤，我們不能拿一個人底過去來衡量現在，說他做過錯誤便永遠不會正確。只有黨的官僚為鞏固自己的統治，不把反對派綱領公佈給全體黨員公開討論，隨便加以誣衊，說他是所謂托洛斯基主義，說他是“反黨”，——堅持自己的錯誤並用殘暴的手段壓迫反對派，纔是真正的無恥）！

“對於中委會年青點的委員們，我想對布哈林和別塔可夫（Piatakov）說幾句話。依我看來，他們乃是最有能力的部隊，（在最年青的當中）關於他們，下述的話須要緊記在心裏：布哈林不僅是黨中最有價值的最大的理論家，並且可以認真地說是全黨的愛悅者；不過，他底理論觀點只可以萬分懷疑地說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因為他這人有點賣弄筆墨的書生氣，（他沒有學過辯證法，我覺得他也從沒有完全懂他）。

“其次說道別塔可夫——不用說，一個意志與能力都很使人讚佩的人，可是，他太耽溺於行政事宜，以及是否可信賴還是嚴重政治問題的事件行政方面。

“當然，我所指出的這兩點都是就現下而論，許有點怕他們兩個能幹忠實的工作者，此後找不到機會去補充學識，改正他們底畸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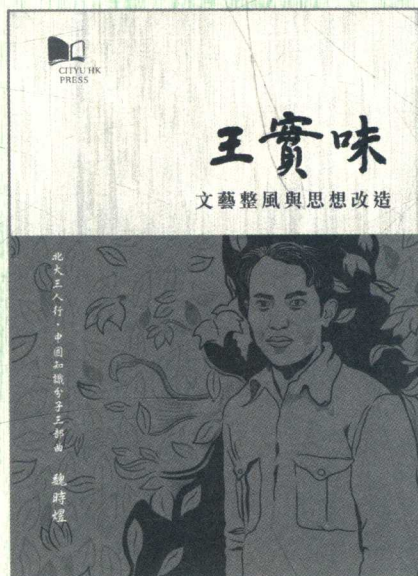
“1922.12.22

“再者：斯塔林太粗魯，這缺點對於我們 XX 主義者雖是完全不要緊的，但在秘書辦公室中可就有害了。所以，我提議於同志們想法把他從那個位置調開，指定一個只要在各點上都比斯塔林更優長的人——就是，更有耐心，更忠實，更溫和有禮，對同志們更殷勤些，更不反覆無常些，等等。這事情或似乎是個無關緊要的細故，不過，從防止破裂的觀點上看，從我前面所論的斯塔林與托洛斯基之間關係的觀點上看，我覺得卻不是細故，或者是一個終於要引起一個重變的細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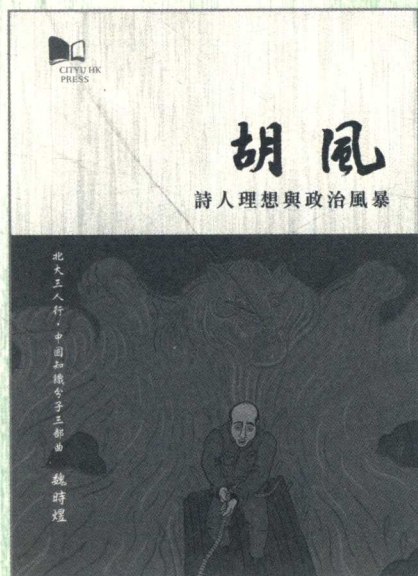
“伊理基 1923.1.4”<sup>1</sup>

1 伊理基是列寧的名字。當時為避開媒體審查，很多蘇聯領導人被提到時只用名而不用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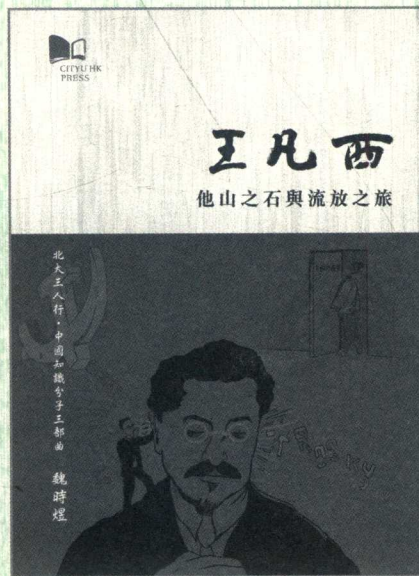
# 北大三人行 · 中國知識分子三部曲



王實味：文藝整風與思想改造  
978-962-937-258-3



胡風：詩人理想與政治風暴  
978-962-937-259-0



王凡西：他山之石與流放之旅  
978-962-937-260-6

王實味是五四運動中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人，因為一篇雜文〈野百合花〉，使他成為延安整風的重點批判對象，有人稱他為共產黨文字獄首位有姓名的犧牲者。本書作者自2008年開始，訪談了十多位與王實味同時在延安、親歷整風的老人；這些受訪者大多是近代歷史的見證者，並且對經歷過的一連串的政治運動都有反思。

本書透過口述筆錄、檔案資料、文本解讀，以及作者新發掘的材料，比較不同的聲音和視點，了解和記錄未能被成功改造思想的王實味的意義。作為珍貴的歷史材料，本書還首次全文附錄王實味1930年發表在「托派雜誌」《展開》上的中篇小說〈三代〉，以及他轉譯並加了按語的〈列寧遺囑〉，以伺讀者。

1925年秋，三個來自不同省份的年輕人同時入讀北京大學文預科。在動盪的時局中，他們選擇了三種不同的革命道路；王實味留在黨內，胡風一直是黨的同路人，而王凡西則轉向黨的反對派。「北大三人行」這部歷史三部曲，以王實味、胡風、王凡西的生命脈絡為中心，借用紀錄片的手法，以多重視點組織材料，重塑三人之間遙遙相望又息息相關的顛沛命運，折射中國知識分子追求革命的歷史變奏，冀為讀者提供一部時間跨度大、但可讀性強的中國知識分子通史。

在歷史材料梳理中，作者抓住了王實味這個典型，顛覆官方修史的主流話語權，揭開大歷史現場中個性不同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

**孫立川** 香港天地圖書總編輯

「整風批判，改造思想」是毛澤東發明的整治知識分子方程式，它發軔於王實味個案。本書史料豐富，考據充足，從側面揭示了中國共產黨與知識分子的歷史演變。

**黃煜**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院長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ISBN 978-962-937-258-3



9 789629 372583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